

面色与自由

570.78

225.1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一集(傑作集)

1. ☆ 自傳.....巴金譯
2. ✓ 俄法獄中記.....巴金譯
3. ☆ 一個反抗者的話.....巴金譯
4. ☆ 麵包與自由.....巴金譯
5. 田園工廠與手工場.....克剛譯
6. 互助論.....朱洗譯
7. 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陸蠡譯
8. ✓ 法蘭西大革命史.....人楨譯
9. 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巴金合譯
朱洗
10. 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巴金譯

第二集

- | | |
|-------------|-------------|
| 11. 科學藝術論文集 | 16. 經濟思想論文集 |
| 12. 倫理教育論文集 | 17. 通信集(一) |
| 13. 勞動問題論文集 | 18. 通信集(二) |
| 14. 農民問題論文集 | 19. 通信集(三) |
| 15. 社會思想論文集 | 20. 克魯泡特金研究 |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四卷

麵包與自由

巴金譯

私立華東
聯合中學
圖書室

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平裝本 1—950 冊 實價二元四角
精裝本 951—975 冊 實價每冊十元
特裝記數本 976—1000 冊 實價十二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克魯泡特金像

麵包與自由

前 記

麵包與自由是克魯泡特金的最被人廣讀的著作，甚至被人稱爲社會革命文學之古典的名著。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期中沒有一本書有過這樣巨大的影響。它的雄辯的論據和熱情的話語在今天還會激動着我們的心。

在麵包與自由中我們深切地感到了作者對於理想的自由社會的憧憬和對於不合理的現社會制度的憎惡，對於正義的愛和對於罪惡的恨。一個偉大的革命者的熱情在字裏行間燃燒着。這的確是一本熱情的書。但是單用“熱情的”這個形容詞在這裏是不夠的。同樣重要的，這是一本訴於理性的書。作者不僅是一個革命者，他還是一個科學家。無論研究學理或觀察生活，他沒有一個時候離開過自然科學的方法。正因爲他能夠證實他的理論之真確性，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事實的基礎上，他才能夠那麼深地愛這理論和這理想。

麵包與自由就是科學家的頭腦與革命者的熱情之結合的產物。它是克魯泡特金的社會思想之綜合的表現，其實也可以說

是他的全部知識之一個明確的綱領。每一章節都可以發展為一本大書，一個專門的研究。作者的其後的更偉大的著作的根基已經星光似的在這書中閃耀了。

克魯泡特金在這書裏闡明了他的經濟學說，他甚至建立了真正的經濟學(經濟的科學)之最初的基础，他將經濟學稱作社會生理學，並且給它下了這樣的一個定義：人類欲求(需要)及以人類精力之可能的最少耗費來滿足此種欲求的方法之研究。這就是麵包的 Conquête，(略取，征服之意)，不過麵包這名詞在這裏應該解釋作“安樂”。他依着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法)在實生活中蒐集了千千萬萬的事實來證明這是可能的，而且有大的效果的。這裏說的“科學方法”是用着它的嚴格正確的意義，克魯泡特金的觀察和蒐集例證的範圍是很廣大的，他的眼光不會遺漏過任何一個角落。瑞士的村落，英國的礦坑，巴黎郊外的市場園藝，蓋因稷和傑稷的農業，比利時的工人區，馬德里的美術館……都是這個虛心精細的研究者的觀察停腳的地方。這是科學的工作。這又是他的社會學的基础。

克魯泡特金的社會主義是綜合的，這是政治的自由與經濟的平等之綜合的表現。所以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必須是自由的。人對於人的支配應該跟着人對於人的榨取一起消滅，權力的獨占也應該隨着財產的獨占消失。不是征服國家，而是消滅國家。

中央集權的機關應該讓位給自治的公社(或共同社會)之自由聯合;自由合意與相互了解會來代替法律的力量。在自由合作與自由創意上面展開了未來社會的全景。這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安那其主義的要義。

“麵包(安樂)與自由,”這似乎是兩個簡單的名詞,但我們可以用它們來概括克魯泡特金的安那其主義。這兩個名詞甚至可以作為未來的自由社會的兩大標語。另一個標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完成這兩大目標的手段。

這兩大目標是不可分的。缺少一個,則其他一個也不能實現。經濟的平等保證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經濟的平等。這是互相依賴着的。沒有萬人的麵包(安樂),則沒有萬人的自由;沒有萬人的自由,則不能獲得萬人的麵包。

在現在社會裏麵包與自由只是為着極少數的人而存在的。我們有着謬誤的政治機構,我們也有着不合理的經濟組織。因此我們的生產事業是朝着完全錯誤的方向進行的。這不是人類精力的經濟,這簡直是人類精力的浪費了。

然而這個錯誤是必須糾正的,因為正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社會是不能這樣生存下去的;它必須回到真理的路上去,不然就會滅亡”。這樣的話也許還有人會不明瞭,我再加添一點解釋:人類社會是不得不前進的。它可以一時落後,它不能永久

躊躇不前，或者不停地倒退，除非它已經落在了滅亡的命運裏面。但是甚至在今日的社會生活中也有着千千萬萬的事實（我們應該感謝克魯泡特金爲我們把它們全蒐集起來），它們指明出來：我們的社會還不停地在往前進，雖然脚步不快，但它總是向着真理的路進行的。有一天它會達到它的目標。

那時候克魯泡特金在本書中爲我們描繪的保證萬人的麵包與自由的未來社會就會實現了。自然未來的發展常常會超過現今的預料與推論。但克魯泡特金在這裏所描繪的只是一個輪廓，而且還是繪在堅實的科學的背景上面。它是不會錯誤的。至於上色加工，那却是後人的事了。

麵包與自由可以說是克魯泡特金立下的一個不朽的紀念碑。萬人的麵包（安樂）與自由！真，美，善之正確的意義都包括在這裏面了。克魯泡特金把個人間的自由合意自由聯合的理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安那其主義的理想，把未來社會的輪廓表現得如此真實，如此美麗，如此活潑，如此完滿！法國的偉大的小說家左拉稱這書爲“一首真正的詩”（un vrai poème），我想把它稱作“一首真理的詩”。它是值得這個名稱的。

巴 金

1940年3月25日

目 次

前記	i
邵可侶序(法文本序)	v
自序一(俄譯本序)	xiii
自序二(英譯本序)	xix
自序三(俄譯本再版序)	xxxiii
洛克爾序(德譯本序)	xxxix
第一章 我們的財富	1
第二章 萬人的安樂	15
第三章 安那其共產主義	31
第四章 充公	47
第五章 食物	65
第六章 住居	101
第七章 衣服	115

第八章	生產的方法與手段	119
第九章	奢侈的欲求	129
第十章	愉快的勞動	151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163
第十二章	反對論	183
第十三章	集產主義的工錢制度	207
第十四章	消費與生產	229
第十五章	分工	239
第十六章	工業的分散	245
第十七章	農業	261
附錄		293
後記		297
索引		299

愛利賽·邵可侶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要我在他的著作的卷頭寫幾句話，雖然這使我感到某種困難，我也順從了他的意思。對於他在這著作中所闡明的種種論據，我不能添加一點新的見解，我恐怕我來說話，反會減弱他的話的力量。但是友誼會寬恕我。當法國的“共和黨人”以匍匐在“沙皇”¹的腳下為無上美味的時候，我却愛接近那些會受他鞭笞，會被他監禁在要塞的地牢中或絞死在堡壘的僻院裏的自由人。我和這些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會暫時忘却那般在年青時代高呼“自由！自由！”叫啞了喉嚨，而現在却將馬賽曲和上帝保佑沙皇兩首歌同唱的變節者的卑鄙行爲。²

克魯泡特金的前一本著作，一個反抗者的話，³特別注重於

¹ Tsar, 俄國皇帝的稱號。——譯者。

² 克魯泡特金 1883年在里昂法庭被判處徒刑後，檢察官等居然得到俄國政府獎給的聖安娜十字章，法國政府也允許他們接收。又本書出版時俄法兩國甚為接近，俄法密約也在醞釀中。——譯者。

³ 中譯本全集第三卷，這書是由愛利賽·邵可侶編輯出版的，作者當時

激烈地抨擊這個殘酷而又腐敗的資產階級社會，同時喚起革命的力量來反抗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本書是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續篇，它的筆調比較平和。它在對那些真心願意來襄助社會改革事業的有善意的人說話，並且以雄偉的筆調向他們指出當前的歷史的局面，此等局面便使我們能夠在銀行與國家的廢墟上建立起人類的家族來。

對於本書的題名：麵包略取，我們應該加以最廣義的解釋，因為“人不單是靠着麵包生活”。在某個時代那些仁愛勇敢的人企圖使他們的社會正義之理想成為現實，那時候我們的欲望也並不是只限於奪回麵包，甚至奪回酒和鹽之類；同時我們還以為應該奪回安樂生活所必需的或者單是對安樂有益的一切東西；應該使我們能夠保證萬人的需要與享樂都得以完全滿足。只要我們還沒有做到這樣的“略取”（奪回），只要“在我們中間還有窮人存在”，那麼把現在這個像一羣關在鬥獸場裏的猛獸似地彼此嫉恨互相殘害的人類集合體稱做“社會”，實在是一個刻薄的諷刺。

從本書的第一章起，著者就列舉出人類已有的莫大的財富和由於集合的勞動得來的不可思議的機械的工具。就現在說，每年的出產品便足以供給一切人的麵包；倘使都市，房屋，可耕

被囚在法國監獄中，故書名也由邵可侶代擬。----譯者。

的田地，工廠，運輸的道路與學校等等的巨大資本不再歸私人佔有，而變成公共的財產，萬人的安樂便是很容易得到的：那時我們可以自由支配的力量也不會再用到無益的或矛盾的勞動上面了；它們却要被用來生產人類在營養，住居，衣服，安適，學術研究與藝術修養等等方面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然而人類財富的取回，簡言之，即充公，只能由安那其的共產主義來完成：應該消滅政府，撕碎它的法律，摒棄它的道德，不理它的辦事人，只顧依着自己的發意力，並且照着自己的親和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理想和所進行的事業的性質來從事工作。這個充公的問題乃是本書的核心，也是作者以平靜的態度和明徹的眼光，很清楚，很平和地論得最詳細的一個問題，這種平靜的態度與明徹的眼光正是研究那個下次的不可避免的革命時所不可缺少的。在國家消滅以後，解放了的勞動者的團體不必再替那些壟斷者和寄生蟲出力了，他們可以盡力於自由選擇的合意工作，可以依照科學的方法來耕種土地，來從事於工業的生產，並且還有閒暇來研究學問和行樂。本書中論述農業勞動的一部分是極有興味的，因為它敘述的事實都是經過了實驗的，並且可以大規模地在各地應用，以謀萬人的利益，却不像現在這樣只替少數人賺錢。

那些愛笑談的人常以“世紀末”的話來譏諷一般闊少年的惡

習與乖僻；然而現在所說的一個世紀的末日却另有一種意義；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時代的末日，一個歷史的紀元的末日了。我們會看見全部古代文明的毀滅。武力的權利和強權的反覆任性，猶太的苛酷的傳統與羅馬的殘忍的法學，對我們再沒有威壓的力量了；我們宣佈一種新的信仰，要是這個信仰（它同時又是科學）將來成爲一切探求真理的人的信仰時，它就會在現實的世界中具體實現，因爲歷史法則的第一個便是：社會依據着它的理想構成它的形式。那般陳腐的秩序的擁護者怎麼能夠保持這種秩序呢？他們並不再信仰什麼了；他們既無領導者，又無旗幟，他們只是無目的地作戰。他們固然還有着法律和槍砲，帶棒的警察和砲兵工廠來對付改革者，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一種思想的對手，而且全部專制與壓迫的舊制度也註定了不久便要湮沒無聞的。

的確這個即來的革命不管它在人類發展中會佔着如何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完成“一個突然的跳躍”這一點上，却與以前的革命無異。這突然的跳躍在自然界中是沒有的。但我們可以說，安那其的社會藉着無數的現象，藉着無數的深的變化，早已充分地發育起來了。只要在一個地方，自由思想脫離了教條的死文字的束縛，探求真理者的天才打破了陳舊的公式，人類的意志藉獨立的行動表現出來，只要在一個地方，那些反抗一切強迫的紀律的誠實人自動地聯合起來，互相交換知識，並且（不要頭目長

官之類) 共同去奪回他們在生活上應有的一部分，使他們的欲求得以完全滿足，——在這樣一個地方，安那其的社會就實現了。這一切就是安那其，(即使它並沒有知道自身是安那其，其實也還是一樣)，而且它漸漸地顯露出來了。它有着它的理想，它有着勇敢的意志，而它的大羣的仇敵却已經失掉了信仰，把自己交給命運去支配，整天發出“世紀末! 世紀末!”的悲鳴; 對這些敵人它怎麼會不得到勝利呢?

這個已經顯出兆候的革命是要成功的，而我們的友人克魯泡特金依着他的歷史家的權利，出來在革命的時期中闡明他的奪回由萬人的勞動而積成的共同的財產的見解，並且喚起那般懦弱的人來參加這偉大的革命工作——那般人也都知道目前的不公道的情形，但是他們却被無數的利益與傳統的繩索繫在這個社會上面，因此他們對這個社會便不敢明目張胆地加以反抗。他們知道法律是不公平的，虛偽的，他們知道官更是強者的侍臣和弱者的暴君，他們知道生活上的正規的行爲和藉勞力以維持生活的誠實態度，時常得不到一片麵包的報酬，而證券投機者的無恥卑鄙和以押當爲業者的冷酷殘忍却是較好的武器，它在“略取麵包”與安樂一點上反而勝過一切的美德; 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依照他們的正確的正義心規定他們的思想，決心，計畫和行動，他們却遁入一條側面的窄路以避免採取率直態度的危

險。例如新宗教家，他們不能再信奉他們的祖先的“荒謬的信仰”，便沉溺在某種更獨創的神秘教示中，並沒有確定的教條，而且迷入在混亂的感情的雲霧裏：他們會變做行降神術者，鍊金術士，⁴ 佛教徒，通神者之類。又如那般患憂鬱症的紳士與害神經病的淑女，他們自命爲釋迦牟尼的信徒，却不化費一點功夫去研究他們祖師的教義，他們假裝着要在所謂涅槃的寂滅中尋求和平。

但是這般新宗教者既然不斷地談論着理想，那麼就請這些“優美的靈魂”安心罷。我們的身體是屬於物質的，我們當然有想得食物的弱點，因爲我們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充足的食物；現在我們的數百萬的斯拉夫的兄弟，沙皇的臣民就缺乏着食物，還有別的地方的千百萬人也缺乏糧食。然而在麵包以外，在安樂和一切集合的財富以外（這些是我們把我們的田野認真經營起來以後便可以得到的），我們還看見一個新的世界遠遠地在我們前面顯現出來，在這個新世界中我們可以充分地相親相愛，可以滿足這種理想的崇高的感情（那般輕視物質生活的美的溺愛者說，這感情是他們的靈魂的不止之渴！）當世界上再沒有貧富之分，當啼饑的人不再以羨妬的眼光望着飽暖者的時候，自然的友情就可以在人們中間復生，而現今受壓抑被摧殘的休戚相關（即聯

⁴ Rose-Croix 即十五世紀中德人 C. ROSENKREUZ 創設的一種祕密結社的社員，他們以行奇術或魔法爲事。——譯者。

帶性)的宗教就會代替目前這種專門描繪浮雲上的幻影的空虛的宗教而存在了。

革命的成就會超過他所預計的，它要革新生命的泉源，給我們洗淨一切警察的醜惡的接觸，把我們終於從那些毒害我們生存的金錢的勾當中解救出來。那時候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勞動者會完成對他適合的工作，探求真理者會毫無隱匿地努力研究，藝術家也不再爲了餬口的緣故而出賣他的美的理想，一切的人以後都是朋友了，我們可以同心協力地來實現詩人們所隱約見到的偉大的事業。

這時人一定會偶爾記起那些用他們的熱誠的宣傳（爲着這種宣傳他們受到了流亡與監禁的處罰）對新社會的建立工作有過大貢獻的人的名字。我們出版麵包略取時想着的便是他們：他們在囚窗中或在異國的土地上收到這個共同的思想的證據，他們會感到一點精神舒暢的。作者一定允許我將他的這本書獻給一切爲我們的主義受苦的人，尤其是獻給一個親愛的朋友，⁵他的一生便是一個擁護正義的長期的鬥爭。我用不着舉出他的

⁵ 卽 PIERRE MARTIN, 克魯泡特金的好友, 法國偉也勒的織工, 曾和克魯泡特金一起被禁在法國克來服中央監獄內。1916年6月6日病故。(插圖一)——譯者。

名字，不過他讀到他的一個弟兄的這些話時，他會隨着他的心的跳動而理解他自己的。

愛利賽·邵可侶⁶

⁶ ELISÉE RECLUS (1830—1905) 法國地理學家，著有人與地 (*L'homme et la terre* 1905—1908)，世界新地理 (*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875—1894) 等。他還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並且是克魯泡特金的好友，本書的題名便是他代擬的。——譯者。

自序一(俄文本序)

本書原名“麵包略取”，用法文寫成出版，我想在這書裏，把安那其共產主義的革命的發端的時期儘可能地描寫出來。

從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來批判現社會制度，並且對於代議制，法律與強權等等成見，加以分析與抨擊，我在一個反抗者的話（俄文譯本的名稱爲“現社會制度的崩壞或一個反抗者的話”）一書裏已經做過了。那書的結論是：應該實行充公，即一切土地與積聚的財產，必須爲人類的生產與生活而使用，因此現在被私人佔有了的均須歸社會公有。本書原文曾連續刊載於反抗者（*Le Révolté*）⁷的社論欄，後來我在法國被捕入獄，便沒有機會發表這類文字了。

三年後我出獄，仍繼續在反抗者中發表這類文章。那時該報已移至巴黎，因受法國政府干涉又改名爲反抗（*La Révolte*）。

⁷ 反抗者半月刊是1879年2月在瑞士日內瓦創刊的，後來移到巴黎出版，因宣傳反軍備主義受壓迫，在1887年9月改名反抗。——譯者。

倘使要根據我們的意見來說明怎樣實行社會主義，我以為最好還是不要描寫理想，却用事實來證明，社會革命應該向着何種方面進行，才可以脫離現社會的制度，而達到安那其的共產主義。順從着這樣的環境之自然的推移，而且去操縱它以實現這個社會的動向，或者因舊社會根深蒂固，成見尙未完全拋棄，只能夠仍舊循着奴隸的道路，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這個也等待着事實的說明。

我拿巴黎來做例子是由於下列的原因：

無論任何文明國家，決不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程度在同一的水平線上的整體。實際上它的各部分總是站在不同的等級上面的。

法國雖然經過了1789年，1793年與1848年的革命，與它在十九世紀中國內物質文明的發達（不像英國靠着向外的侵略政策，榨取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利益，占它的收入總額的半數），以及依着最近百年間的政治的潮流而發生思想運動，但是它仍和從前一樣，各地方的公共生活並無聯繫，其西北各省比東部的省分，至少落後半世紀。農民運動的偉大革命，取消了農奴的贖金。二三百年來地主與教會侵佔的土地，也被農民奪了回來。都市勞動者的暴動，企圖消滅都市的半奴隸制，脫離君主的獨裁政治的桎梏。當時這類民衆運動，是限於法國的東部，與東南各

地，至於西北與西部等處，則為貴族與國王的柱石，甚至在凡德省暴動裏，農民拿着武器去反對雅各賓黨的共和國。但是法國的東西的區分，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現今法蘭西共和國⁸ 建立後，在選舉議員（選舉國會議員三百六十三名）時，共和黨與王黨等競爭，兩派的選舉地盤，據說我所知道的，正與1789與1792年的農民與市民的暴動地點相同。自從現在法蘭西共和國成立後，民主思想才得傳入西北與西部的農民中去。

法國的東西部分，西南，東北，中央高原與龍河（Rhone）窪地，都像各個獨立的世界。這種分別不但在那幾省的農民中間（猶拉的鄉村的工匠與勃列東的農民二者的民族性是不相同的），便是市民裏也是一樣。祇有高賽或聖德田與盧昂等處，現在還在教士的權力之下，迷信着君主政治！

法蘭西雖經過幾世紀的集權政府的統治，實際上國家的生活，除表面的官僚政策的統一外，各省還是各個獨立的部分。在意大利與西班牙更是如此。因為拉丁諸國（連法國在內），是聯合主義的國家。但德國的國家主義者與雅各賓派，常把他們所深恨的各省獨立主義⁹（在薩克遜—科堡—哥塔¹⁰ 的帝政時代中

8 即第三共和國。——譯者。

9 Partikularismus，普通指德意志各邦在1866年戰爭後與普魯士合併時，企圖保持其固有的法律的制度。——譯者。

發生)與各省各都市的人民聯合主義混同。

因此我深信法國的社會革命，無論它的傾向怎樣，總脫不了地方公社的性質，決不是雅各賓派的國家。任何明白本國情形的法國人，並沒有為被雅各賓派的集權主義所迷惑，他們深知(西班牙的畢·伊·馬加爾¹¹也是這樣說)法國的任何革命，須是1871年的自由公社，即在巴黎和聖德田兩處所宣布的，與夫巴枯寧派¹²在馬賽，里昂所嘗試的。所以在法國國會的會議中決不能規定社會革命，而且各城市不會服從國會，恐怕也如1792與1793年巴黎不服從嚴刻的國會一樣。

大概各地方的革命狀況，也視當地的情形與需要而異，一般宣布自由公社的人，也將自動地解決了二十世紀的社會問題。

10 Sachsen-Koburg-Gotha 公國在德意志中部，是一個立憲的君主國，由兩個獨立公國即Koburg 與 Gotha 聯合而成。現在成了德意志聯邦中的兩個共和國。——譯者。

11 PI Y MARGALL (1824 — 1901) 他是西班牙聯合主義者的領袖，而且是蒲魯東的信徒。他是西班牙的第一流的學者，還是一個偉大的，心地廣大的哲人，他的著作對於西班牙自由主義的的思想之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引用洛克爾的話，見他的小冊西班牙的真相)。——譯者。

12 即巴枯寧和他的友人及信從者。MICHAL BAKUNIN (1814—1876) 是俄國著名安那其主義的革命家。這裏指的是巴枯寧和他的友人1870年在里昂發動的暴動。巴枯寧在暴動失敗後又到馬賽去。——譯者。

換句話說，假使拉丁國家發生社會革命，則必定帶着地方的性質。基埃里¹³說得非常確切。這是二十世紀的都市革命的方向。英國將來也免不了這樣，西班牙與荷蘭的大多數城市，也會全是如此。我深信俄國各部由都市主動，如不將土地與工廠收歸公有，組織農業耕種的團體，並且將產業歸社會公共經營，（即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則恐怕社會主義將歸於失敗。

我在反抗者上發表文章，是給法國勞動者看的，所以就拿巴黎做例子，因為巴黎這是法國的文化最高的城市。我想描寫在法國與其近郊實行社會革命時，即使像1793年的共和國那樣受着各反動派的攻擊，也可以支持下去。

本書末尾所論及的問題，即“到底怎樣生產，”我想量力在英文本的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中說明。

¹³ A. THIERRY (1795—1856), 法國歷史家。——譯者。

自序二(英文本序)

反對共產主義和一般社會主義的流行的論調之一，即是說這個思想已經是這樣舊了，然而它從來不曾實現過。古希臘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國家的計畫；稍後，初期的基督教徒組織了共產的團體；又過了數百年，在宗教改革運動的時期，便有大的共產主義結社發生。後來在英法兩國大革命之際，這同樣的理想又復活起來；最後近世法國1848年的革命爆發了，這個革命受到社會主義的理想的鼓舞甚大。因此便有人對我們說：“但是你們看你們的計畫的實現期還遠得很呢！你們有沒有想到，你們對於人類的本性和欲求的了解有着根本的錯誤嗎？”

驟然看來，這個反對論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而當我們更精密地考察人類歷史時，這個反對論就會失掉力量了。第一，我們看見億萬的人在他們的共產村落中能夠維持那社會主義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將那作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土地收歸公有，並且以各家族的勞動能力為標準來分配它）以至於數百年之久；其次我們又知道西歐土地共有制度的崩壞，不是從內部，而是

從外部被政府創設土地的獨占制度以幫助貴族和中產階級所促成。再次我們又知道中世紀的都市能夠在連續的幾百年中間維持着某種社會化的生產和商業的組織；這數百年都是知識上，工業上和藝術上進步最速的時期；至於此等共產制度的衰頹，大半因為當時人們沒有能力，不能將農村和都市，農人和市民聯合起來，協力反對那個破壞了自由都市的武力國家之生長。

這樣地了解的人類歷史，並不能夠供給一個不利於共產主義的論據。反之，它却像是實現某種共產組織的努力之一種連續，這種努力在某時期以內是得着了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們還敢斷言人類至今還沒有尋到一種依據共產主義的原理，把農業和急速發達的工業以及進展得很快的國際貿易結合起來的適當方式。這所謂國際貿易尤其顯出是一個攪亂的要素，因為藉遠道的商業和出口貿易而致富的並不再單是個人的或城市了；而是一國或數國，它們剝削了那些工業落後的國家來增加自己的財富。

這些情形，雖開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末葉，然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之後，才完全發展。近代共產主義自然要考慮到這些情形。

我們現在知道法國大革命，在其政治的意義之外，還是法國人民（在1793年和1794年中間）在三種不同的方向接近社會主

義的一種嘗試。第一就是財產的平均；用很高的累進率徵收所得稅和遺產承繼稅，又直接沒收土地，然後來重新分配，並且單獨向富人徵收苛重的戰爭稅。第二個企圖就是一種都市的共產主義，日常最需要的消費品，由都市購備，以實價出售。第三是制定全國標準物價的制度，注意生產的實費和相當的販賣的利潤。國約議會熱心地盡力來實施此種計畫，然而快要成功的時候，反動派便得勢，這工作也遭破壞了。

這個卓越的運動從來不曾被人適當地研究過，然而近代的社會主義正是發生於這個運動的當時——如里昂的南吉¹⁴的福利業主義，與夫蓬拿洛底¹⁵，巴布夫¹⁶及其同志的強權共產主義。恰當大革命之後，近代社會主義三派學說的偉大的建立者——

14 L'ANGE, 法國大革命中的法官和地方官吏，福利業的先驅者。——譯者。

15 PHILIPPE BUONARROTI (1764——1837), 意大利的律師，因宣傳法國革命的原理，被逐出國外，1793年歸化法國。後因參加巴布夫的活動被捕，1797年5月被判逐出法國。1830年再到法國，以後死在巴黎。他寫過一本叫作巴布夫與平等團的陰謀 (*Gracchus Babeuf et le Conspiration des Egaux*)的書。——譯者。

16 FRANÇOIS NOEL BABEUF (1760——1797), 法國大革命中抱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家，後來發動所謂“平等團的陰謀”企圖推翻當時的執政府，

聖西門¹⁷ (插圖2), 福利葉¹⁸ (插圖3), 渦文¹⁹ (插圖4) 以及無國家社會主義的建立者高德文²⁰ 便同時出現了; 而蓬拿洛底, 巴布夫 等所創立的共產主義的秘密團體, 則為後來五十年間戰鬥的強權共產主義的模範。

正確地說, 近代社會主義從發生到現在, 還不過一百年, 而且這一百年的前半期中, 只有兩個站在工業運動前頭的國家——

恢復 1793 年的憲法, 事洩被捕, 在 1797 年 5 月被 Vendôme 高等法庭判處死刑, 當時自殺未死, 後來勇敢地死在斷頭台上。——譯者。

17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 (1760——1825) 法國著作家, 十九世紀的三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之一。他的學說和馬克思的相近。——譯者。

18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法國的社會改革家, 十九世紀的三大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之一。他的思想和安那其主義的思想相近。——譯者。

19 ROBERT OWEN (1771——1858), 英國社會改革家, 十九世紀三大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之一。他的學說接近着近代的合作主義。——譯者。

20 WILLIAM GOLDWIN (1756——1836), 英國哲學家 and 著作家, 安那其主義的最初的建立者。他的名著是政治的正義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共二卷, 1793 年在倫敦出版。——譯者。

即英法兩國，對於近代社會主義的完成是有功勞的。在拿破崙的十五年慘酷戰爭中間，這兩個國家流血最多，又被捲入在從東方來的歐洲大反動的漩渦中。

其實，只有在法國1830年7月革命和英國1830—32年的改革運動²¹ 開始動搖了那可怕的反動之後，直至1848年革命的前幾年，社會主義的討論，才成爲可能的事。在這些年中間，福利葉聖西門，渦文的志願，才由他們的信從者努力完成，取了確定的形式，現在存在的各派社會主義的定義遂因而決定了。

在英國，渦文和他的信從者同時完成了他們的農業和工業的共產村的計畫；創立了很大的合作社，想以他們的股息來創立更多的共產殖民地；於是大團結的職工組合（Great Consolidated Trade Union）成立了，——這便是國際勞工協會與如今的勞工黨的先驅。

在法國，福利葉派的昆西大朗發表了他的超著的宣言²²，這個宣言包含着（發展得非常好）資本主義的生長之一切理論的

²¹ 1830年7月巴黎人民暴動把國王查理十世驅逐出國，成立新政府。英國的改革運動即憲政改革運動，亦即所謂普選運動。在1832年完了一成部分的改革。——譯者。

²² 指昆西大朗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原理，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的宣言（*Principes du Socialisme, Manifeste de la Démocratie au XIX*

考察，這便是現在所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蒲魯東（插圖5）完成了他的安那其主義和互依主義（Mutualism）²³，不要國家的干涉的思想。路易·布朗²⁴刊行了他的大著勞働組織，後來便成了拉沙爾²⁵的綱領，法國的維達²⁶和德國的斯太因²⁷也著了兩

Siècle, 1843) 昆西大則 (V. CONSIDERANT, 1802—1893), 法國社會主義 著作家。——譯者。

²³ 關於蒲魯東，見正文註50，互依主義，據德·柏樸（C. DE PAEPE，蒲魯東的信從者，比利時勞動運動的領袖，第一國際的最活動的會員之一）解釋如下：勞力的生產物應該屬於生產者，而生產者在將它交換出去時，也不該收取超過它所值的代價，這就是說，應與化費了同等量的勞力所生產的物品交換。此等事業可以由合作主義的團體和人民銀行來完成。將一切收歸國有的辦法是有害的，國家應該消滅。——譯者。

²⁴ LOUIS BLANC (1811 — 1882), 法國歷史家和社會主義者。1848年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是裏面的一個委員，又是一個改造生產組織的特殊委員會的主席。1849年亡命英國。他的重要著作有勞働組織（*L'Organisation du Travail*）和法國大革命史等，參看正文註21。——譯者。

²⁵ F. LASSALLE (1825 — 1864), 德籍猶太的社會主義者。——譯者。

²⁶ FRANÇOIS VIDAL (1812—18??), 法國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曾任國民議會的議員。——譯者。

²⁷ 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 德國政治學教授。——譯者。

本超著的書，祖述昆西大朗的理論的概念，出版於1846年和1847年，²⁸ 後來維達，尤其是柏格爾，更詳細地完成了集產主義的體系，他甚至還希望1848年國民議會以法律的形式來批准它。²⁹

然而那時期的一切社會主義者的計畫中有一個共通的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在十九世紀初期著書的社會主義的三大創始者，為社會主義所展開在他們眼前的廣大的地平線所迷

²⁸ 指維達的論財富的重分 (*De la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 1846年出版) 和斯太因的第三法國革命後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運動 (*Die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seit der 3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848年出版)。——譯者。

²⁹ 柏格爾 (CONSTANTIN PECQUER, 1801—1887) 是法國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克魯泡特金在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 (全集第八卷) 第十一章中論到維達與柏格爾兩人，說“這兩個卓越的著作家也主張在一切交易中均用勞動券代替金錢，然而礦山，鐵道，工廠則應該歸國家所有，他們稱他們的體系為集產主義。維達是盧森堡委員會的書記。柏格爾關於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詳細的論文。他在這文章中闡明了他的體系，甚至用着法律的形式，以便由議會表決通過，來實現社會革命。第一國際創立的時候，維達和柏格爾的名字似乎已經被人完全忘記了，但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思想却流傳甚廣，而且不久就被人視作新的發見，在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集產主義的名稱下廣為傳佈了”。——譯者。

惑了，竟視社會主義爲一個新的天啓，視自己爲新宗教的建設者。社會主義應該成爲一個宗教，他們也應該像新的教會的首領一樣，去規定它的進行，而且他們在法國大革命後反動的時期中著書，看見它的失敗方面多過於成功方面，便不信賴羣衆，他們不鼓舞羣衆把他們以爲必需的改革實現出來。他們反而去信仰某一個偉大的統治者，和某一個社會主義者中的拿破崙。他們以爲他也會了解這個天啓的；他看見了他們的共同居住³⁰或協會的實驗的成功以後，也許會相信這是必要的；他也許會用自己的權力來和平地完成革命，帶來人類的安樂和幸福。那時候一個軍事的天才拿破崙正統治着歐洲，爲什麼一個社會的天才不上前去使新福音在歐洲的社會裏實現呢？

只有在1840—48年之際人人覺得革命是快要來的了。無產階級在障礙物上樹起了社會主義的旗幟，在社會改革者的心中又發生了對於平民的信仰：一方面有人信仰着共和主義的民主制，一方面有的人信仰自由聯合，信仰勞動者自身的組織能力。

然而1848年的2月革命，中產階級的共和國來了，從此又把希望打破了。共和國成立了僅有四個月之久，巴黎無產階級的

³⁰ 這是福利葉的理想社會中的市民共同居住的地方，叫做 Phalanstère，參看正文註33。——譯者。

6月暴動便爆發起來，但爲血潮所鎮壓下去了。勞動者大批地飲彈而死，大批地被流放到新幾內亞去，最後路易·拿破崙的政變又繼之而起。³¹社會主義者更受着極猛烈的迫害，剪除的方法又殘酷，又精密，以至其後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之間社會主義竟然完全絕跡：社會主義的書籍也完全散失了，甚至在1848年以前人們異常熟習的書至此時也無人知道了。當時流行的思想（即1848年前社會主義者的根本思想）皆完全消滅，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又把此種思想視爲新的發現了。

大約在1866年，新的復活的日子來了，共產主義和集產主義重到人間，關於實現它們的方法的概念，却已有着一個很深刻的變更了。對於政治的民主制的舊信仰已經消失了。當1862年和1864年巴黎的勞動者同英國的職工組合主義者³²和渦文派在倫敦會見時，他們同意的第一個原則便是“工人解放的事應由工人

³¹ 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1851年實行政變，解散議會，逮捕共和黨人，延長總統任期，並且獨攬大權。第二年他又改行帝制，即皇帝位。——譯者。

³² trade-unionists。所謂職工組合主義(trade-unionism)是在工業革命後，伴隨着工廠組織的發達而產生的一種勞工運動。它的意義可以從“職工組合”(trade union)這名詞本身上看出來，(即是同一個職業裏所有工人聯合起來之意)。它起初僅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爲目的，到了後來，在1875——1880之間便開始進化爲一種活動的戰鬥的工團主義。職工組合主義的發祥地是英國，但這個運動現今在各國內都很發達。希特勒執政前的德國便是

自己去做”。關於另外的某一點，他們也是一致的。即勞工組合自身應該掌握生產的工具，自己組織生產。法國福利葉派和互依主義者的“協會”的觀念和渦文的“全國職工大團結”（現在已經擴大了）的觀念攜手，於是國際勞工協會³³便成立起來了。

然而這次社會主義的新復活，也不過有數年的壽命。未幾1870—71年的戰爭爆發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又繼之而起——但隨後社會主義的自由發展在法國又成爲不可能了。可是當德國由社會主義的德國傳道者馬克思，昂格思³⁴的著作中接受了

它最活躍的地方。英國的柯爾（G.D.H. COLLE）和韋伯（S. WEBB）都是職工組合主義的理論家。——譯者。

³³ 即第一國際，1864年在倫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出席的人是參加協會的六國工團的代表。協會不久便成了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機關。後因馬克思與巴枯寧兩派的衝突，（德英兩國代表傾向於馬克思，並且相信私有財產制度廢除以後國家仍可存在，拉丁民族的代表則信仰巴枯寧，反對國家，不相信代議制。）在1872年的海牙大會裏，協會分裂成兩個同名的團體。巴枯寧派在聖德田開會後，打起自由聯合主義的旗幟，繼續第一國際的工作，直到1878年。馬克思派的總評議會遷至紐約後，在1876年6月開過最後一次會議便消滅了。——譯者。

³⁴ 關於馬克思，參看正文註27。昂格思（F. ENGELS, 1820—1895）是德國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的好友和同志，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二三兩卷便是由他整理出版的。——譯者。

法國“1848年諸人”的社會主義，即是昆西大朗和路易·布郎的社會主義，和柏格爾的集產主義的時候，法國也更進一步了。

1871年3月，巴黎宣言它此後不再等待法國的那些進步遲滯的部分，而立意在它的公社內開始它自己的社會的發展。

因為這個運動的壽命太短，所以不會生出什麼積極的效果。它只是公社主義的；這只能確定公社的完全自治的權利而已。然而第一國際的工人階級立刻會看出它的歷史的意義來。他們了解自由的公社今後會是實現近代社會主義的方法。自由的農工業的公社（這是1848年前英法人常常說起的）並不必像共同居住或二千人的小社會那樣，它們必須是像巴黎那樣的大的團結；或者更好一點，像小的州縣那樣。那些公社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聯合起來，甚至不管現今的國界分別。（如英國的五港³⁵和德國的漢撒同盟³⁶）同時爲着處理各公社間聯合的鐵道，船渠及其他的事業，便成了大規模的勞工聯合會。

這便是1871年以後在有思想的工人中，特別在拉丁諸國的工人中間不大明確地傳布着的思想。一般勞動者在這類的組織

³⁵ 五港指英國南海岸的五港，即 Dover, Sandwich, Hastings, Romney, Hythe。——譯者。

³⁶ Hansa, 中世紀北德意志和鄰近的各都市爲着保護擴張相互間的貿易而結的同盟條約。——譯者。

中，(其詳細部分應由生活本身來決定)已經看出來，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生活形態，這個方法是比較由國家占有全部的工業財產，和由國家來組織農工業的方法容易得多。

我在這本書裏便想把這些思想多少說明一下。

現在回顧到這本書寫成後好些年來的情形，我能夠帶着完全的確信說，這本書的主要觀念是不錯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然也有了不少的進步，國有鐵路，國有銀行和國營商業在各處都實行了。但是向這方面走的每一步伐，縱使結果能夠把貨物的價格減低，却成了工人解放的戰鬥中的一個新阻礙。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工人中間，特別在西歐的工人中間，發生出來一種很有勢力的思想，即像鐵道網那樣的龐大的國有財產，與其歸諸國家管理，不如由鐵道雇員的聯合團體來管理好得多。

在別一方面，我們還看見了遍於全歐美的無數的企圖，它們的主要的觀念，一在收回生產機關由工人管理，一在逐漸擴大各都市爲着它的居民的利益而行的職務的範圍。職工組合主義有着一個向着將各種職業國際地團結起來之發展的趨勢，它不但是改良勞動條件的一個工具，還成了在某一個指定時期中取回生產之管理的一個組織；生產的和分配的合作，在工業上和在農業上的合作，以及在實驗的移居地上把兩種合作聯成一起的企圖，和最後所謂“都市社會主義”的廣大的複雜的領域，——這

些便是近來發展了最大量的創造力的三個方向了。

自然，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代替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因為這兩者都含有生產工具公有的意義。但我們必須把所有這些企圖都當作試驗——像渦文，福利葉和聖西門在他們的移居地上所做的試驗那樣，——這些試驗是用來使人類思想可以明曉共產社會將由此實現的某種實際的方式。所有那些部分的試驗，將來有一天會由文明國民的建設天才做出一個綜合來。然而這個大綜合的建築所用的磚石的樣品，甚至其中某一些房間的樣品，却是如今正由人類的建設天才的絕大努力在製造的。

作 者，1913年1月於 Brighton

自序三(俄文本再版序)

本書是爲着法國的社會改造，在二十五年前寫成的。當時一班參加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的革命者，失敗以後亡命外國，他們目睹反動勢力的勝利，甚至對社會主義的革新的可能性也懷疑起來。

那時深信着社會革命的只有兩派：一是布朗基派，³⁷ 他們是中央集權與國家共產主義的信徒，其他是第一國際內的少數安那其主義者，他們堅決主張無國家與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或者也稱做集產主義。）其目的在廢棄資本與國家，我想在本書中加以說明。

當然，我也不想描寫社會改造的正確圖案。但是我以爲必須把它的大概寫出，使一般革命者對於社會革命時所發生的問題，能夠預先考慮一下。

本書中所解說的思想，在本書的西班牙文本出版以後，立刻

³⁷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 的信從者，參看正文註 16。

——譯者。

引起勞動者的共鳴。“麵包略取”（這是當時本書的名稱）成了勞動者中間，尤其是安那其主義者中間的口號。而且有一部分國家，認為中央集權是絕大的罪惡，故組織自由公社實行社會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多數人的同情。

但是歐洲的反動却是有加無已，所以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竟然告訴勞動者說，現在國家權力發展極高，所以革命已不可能，且“資本集中”尚未減少許多資本家，消滅小工業與小商業。自從這種學說得勢以來，那種對社會革命時期將近的信仰，便漸漸地消滅了。甚至我們的同志中間也有人說，用不着討論社會革命的形式，有的人還說：“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實現，也許要過二百年以後！”

其實這五年的歐戰的結果，已經證明了這種思想的錯誤。一方協約國與德國等在大戰中間，沒有經過革命，便實行了國家社會主義。英國在戰爭的幾年中，國家是麵包，肉，糖與其他大小商業的供給者，它管理鐵道與煤礦，又為經營糧食的主要人。在他方面法，意兩國的都市自治團體，又開始自己製造與支配食物。

所以歐洲社會在恐慌襲來時即實行共產主義與各取所需，本書中的這樣的推測，竟然一一證實了。

其他，勞動者的要求也被證實，這是工人自己管理工廠與製

造所，並且參加生產的組織，這思想在戰前認為空想的，現在已為英國所公認，即政府委員會也認為必須組織“勞工議會，”以便代表全體產業工人的利益。

最後，俄國企圖把一萬五千萬人民的生活，改造成為共產主義的，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這次試驗中的最大錯誤，便是由國家的中央集權與官僚政治產生出來的，所以這種試驗可以證明，必須使民衆的生活條件，脫離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而過渡到社會的共產制。

人類生活不因初次的失敗而停頓，如今各國均沿着相同的方向走着改造的路，（有許多已在各國開始了。）所以每個社會主義者的責任，是為着人類與本人盡力，探求更好的社會的條件，達到非資本制度，而避免我們現在所受的痛苦，如破壞，悲慘，疾病，浪費與惡劣的投機本能的發展等等。

1864年法，英勞動者所組織的第一國際，目的即在探求脫離資本主義的桎梏，而達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但是資產階級與內部的紛爭，使得這個國際崩壞了，後來組織的“第二國際”³⁸已經不是勞動者的團體，却是社會民主黨的

³⁸ 通常把1879年巴黎會議的日期視作第二個國際勞工協會的開始。不過第二國際的中央機關却是在1800年成立的。這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團體。書記部設在荷蘭。——譯者。

機關，它的目的即是最初應該“奪取政權，”所以社會革命須得到政權的援助。至於我們提倡的自下而上的改造，不依賴中央政府，由人民自己建設，已經被認人爲玄想了。

我們從未做過執政者，所以不想討論這些爭論未決的問題，只請大家注意下列一點。即是我們既然重視未來，想目睹真的社會革命的實現，須誠意地研究這種條件，使革命可以成功。科學供給我們的，是研究社會的現實力量與可能的改造。但是我們研究生活條件，並不得自書籍與小冊子，却該實際地去體驗，如到鄉村，製造所，工廠，鐵路與礦坑中去，我們應該知道舊社會的反抗力，明白了解它的堅固的性質，並且鼓動起新社會的創造力。

本書中所指出的，是一種可能的改造的方向，而拉丁國家的協同的生產與消費，必可更廣地應用，並有公社的聯合來解決各省與全民族的問題。

其他一種可能的傾向，也是安那其主義的，即我們的工團主義的同志布惹³⁹ 他在的我們怎樣完成革命⁴⁰ 中所敘述的由職工組織的工團，來完成改革，這是許多工團主義者的意見，我希

³⁹ EMILE POUGET (1860—1931) 法國工團主義的鬥士，革命的工團主義運動的指導者之一。——譯者。

⁴⁰ *Comment nous ferons la Révolution*，這是布惹與他的同志

望該書的俄文譯本早日出版⁴¹。

同時我希望蒲魯東與他的美國的信從者倍拉米⁴²的社會革命觀，即在平等⁴³一書中所敘述的，不久也能夠譯成俄文出版。（還有格林⁴⁴簡略紀述蒲魯東的學說的一本書也好。）又因現在俄國盲目崇拜德國社會民主黨，所以希望一般人注意英國的市自治的趨勢與基爾特社會主義，⁴⁵此外如拉丁國家的合作主義，即消費的社會化也須加以注意。

巴多 (E. PATAUD) 合著的一部理想小說，卷首有克魯泡特金在1911年2月27日寫的序文。——譯者。

⁴¹ 俄文譯本於1920年由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兩地的勞動之聲社 (Golos Truda) 出版，並有克魯泡特金在1920年4月寫的新序。——譯者。

⁴² EDWARD BELLAMY (1850—1898)，美國著作家。他的最出名的著作是一本叫做回顧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1) 的描寫理想社會的小說。——譯者。

⁴³ *Equality* 是回顧的續篇，1897年6月出版。——譯者。

⁴⁴ 我沒有看見俄文本原序，賈維的舊譯文作“基里渥姆”，我疑心這是指 WILLIAM B. GREENE (1819—1878) 的小書 *Mutual Banking* (1850) 格林是美國的社會改革家和著作家。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的作者 E. M. SCHUSTER 說，格林把蒲魯東派的互依主義用它的最純粹最有系統的形式表現出來了。——譯者。

能夠略略了解上述的問題，尙不是把土地，工業與商業等收爲公有，因爲現在生活須有絕大的變更，所以我們如果仍和從前一樣，毫無生活上的知識，則一切新的嘗試必將歸於失敗。

大家一定明白，我重讀本書時的感想，它將爲建築新社會的堅固房屋的許多基石之一，這所大廈的基礎不是盲目服從政權，而是羣衆的自由合作。

作 者，1919年6月於 Dmitroff 村

45 Guild Socialism是在英國流行過一時的一種社會主義，它的原則即是所謂“產業上的民主主義”。“基爾特”即中世紀的同業公會。不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基爾特却含有適應現代產業狀況的新的全國組織（依着產業的各部門）的意思。生產事業由從事該項生產的勞動者管理。但“基爾特”是和國家（實行產業的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存而且合作的。——譯者。

魯多爾夫·洛克爾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在1876年夏天從彼得保羅壘的陸軍醫院中逃走之後，再赴西歐，他不知不覺間又走到瑞士猶拉山谷裏的那般富於同情心的人中間，四年前他的燃燒着求知的慾望的心在那羣人中得到了極深刻而且難消滅的印象。自由社會主義在它的理論的發展上，當時正經過一個重要的新階段。1876年在佛羅倫斯（Florenz）舉行的意大利聯盟的大會中加非洛⁴⁶與馬拉鐵斯達⁴⁷主張不僅土地和生產手段應該收歸公有，同時勞動產物也應該歸社會所有。他們以為在對於集產主義綱領的此種補充裏面，實在含有最能適應休戚相關原理之必要的社會基礎；大會通過了他們的提議。於是，共產主義的標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便出來代替了集產主義的格言：“各人應得其勞力之全

⁴⁶ CARLO CAFIERO（1846——1883），意大利安那其主義者，巴枯寧的好友。——譯者

⁴⁷ ERRICO MALATESTA（1853——1932），意大利安那其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好友。克魯泡特金以後的最偉大的安那其主義者。——譯者。

部產物’。

這個新的見地在猶拉同盟⁴⁸所屬的各分部中引起了激烈的論戰，新舊兩種見解各有它的贊成反對之人。克魯泡特金是贊成共產主義的。1879年10月在勺得封 (Chaux des Fonds)開的猶拉同盟的大會中克魯泡特金宣讀了他的一篇題作“從實際的實現之觀點所見的安那其主義思想”的報告書，⁴⁹這篇報告書可算是安那其共產主義之第一次的理論告白，自此以後，他始終是這主義之天才的，博學的，深到的理論的創立者。

同年2月克魯泡特金和少數友人創刊了題名反抗者的刊物，他在反抗者上面發展了他的世界觀的基本思想，在拉丁諸國的知識階級中，尤其在無產階級中得到了無數確信的，勇於犧牲的信奉者。

1885年克魯泡特金尚在法國克來服監獄中的時候，(里昂法庭因為克魯泡特金是第一國際的會員判了他五年的徒刑) 愛利

48 1871年11月在瑞士松維葉 (Sonvillier)成立的擁護自由社會主義和聯合主義的勞動團體。在第一國際中它還是巴枯寧的主張之主要的支持者。
——譯者。

49 原名 *Idée anarchiste au point de vue de sa réalisation pratique*。克魯泡特金用 LEVACHOFF (來瓦學夫) 的假名赴會宣讀這篇報告書。——譯者。

賽·邵可侶便把這類文章的評論的一部分編成一個反抗者的話出版了。在這書裏面燃燒着克魯泡特金的全部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所感動的一切，他的心靈所銘刻的一切都在這書裏找到了一個極其深刻的表現。這本書不單依據着冷靜打算的與慎密思考的理解，並且還訴於人的心靈，在人心喚醒對於我們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一切泉源之即來的更新的一種豫感。在代議制度，法律與強權，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證明作者的淵博的歷史知識之光輝的論文以外，還有那篇光芒萬丈的告青年，它以它的自然的素樸與熱烈的感情成爲社會主義的通俗宣傳品中空前的文獻了，從這燃燒着最深的人類愛與最高的理想主義的字裏行間，人們第一次得以正確地理解那個驚人的運動的精神，這精神當時曾經抓住俄國青年的心，感動了千百青年男女，使他們拋棄了以前的生活，甘願過那種手工匠，農工，看護婦等等的艱苦的日子，去向人民報告關於他們的就要到來的解放的新消息。⁵⁰

1886年1月克魯泡特金在三年的監獄生活之後恢復了自由，他在巴黎住了短的時期，便去到倫敦。在那裏他又繼續從事於他在監禁期中所中斷了的關於安那其共產主義之哲學的與社會學的基礎之研究，寫成了一些連續的論文，起先在反抗者與反抗

⁵⁰ 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的“到民間去”的運動。——譯者。

上面發表，後於1892年印成單行本，題名“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在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便知道應該把工業生產之最新的發達和農業及近代園藝方面的最近的成就根本研究一番。這個研究的結果使他起先於1888—1890年間在英文雜誌十九世紀 (*Nineteenth Century*) 與公所 (*Forum*) 上面發表了連續的論文，後來於1898年增補了許多新的材料，在田園工廠手工場⁵¹的題名下出版了單行本。這書是作者在麵包略取中所闡明的見解之當然的增補，它的最近的版本是在世界大戰爆發前剛印出的，內容比初版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這正是新的思想與具體的事實之無窮盡的寶庫，我們還可以斷定說最近三十年來全部社會主義的文獻中，再沒有一本比這更重要的著作。

克魯泡特金很久就知道安那其主義在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秩序之特殊的理解或普通的行動方法以外，還有更深的意義。他愈埋頭於安那其主義思想界的研究，他愈明白安那其主義乃是一般的，自然的與社會的哲學之一部分，這種哲學的發展與建設必須依據着一種新的方法，不應該靠着玄學的與辯證的方法的幫助，而事實上不幸在人類學與社會學兩種科學之創立的嘗試上，辯證的方法却佔了很重大的而且不應有的地位。克魯泡特金所說的新的方法就是近代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的方法，這個

⁵¹ 中譯本全集第五卷，原名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方法他很早就充分理解的。他素來對於生活的實在現象與科學的確信就有着明晰的認識，他又是一個獨立的學者和研究家（他的關於亞洲北部山脈與高原的發端的學說，已經使他在科學界中有了相當的名聲），因此他對於任何形式的辯證法及其不可避免的謬誤推論，便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種憎厭。他知道它不僅在近代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上不斷地產生了有害的影響，並且還把大部分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家都束縛在它的圈子裏面。

克魯泡特金說：“所謂辯證法，在近代自然科學家看來，不過是一種屬於遼遠的過去的東西，久已被科學忘記了的東西。十九世紀中在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等的領域內的各種發見，並沒有一件是得過辯證法的幫助的。它們全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即歸納的演繹法的成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與一朵草花的生長，或螞蟻與蜂的社會中生活之進化等同樣，都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因此我們從草花移到人類，從海狸的村落移到人類的都市時，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來變更我們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法之優越性已經如此確切地被證實了：十九世紀這一百年中間科學的發達所以能夠超過過去二千年間的，就全靠着這個研究方法的力量。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當歸納的演繹法開始被人應用來研究人類社會的時候，並沒有人遇到不得不摒棄這個方法而回到那

個黑格爾⁵²復活起來的中世紀的煩瑣哲學⁵³的這樣一個論點⁵⁴。

克魯泡特金始終堅守着這個確信。因此當他著手構成他的世界觀的建設的方面，起草安那其主義社會秩序的大綱時，他決不肯學從前許多社會主義者的榜樣，讓自己受着思辨的概念與純粹抽象的假定二者的支配，來向讀者變戲法；他專門根據着社會生活的已有事實以及對於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努力之精細觀察來立論。他開始便蒐集那些暗示着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就要到來的兆候，然後將組織上本質的事物與偶然的事物分開，以便可以在這樣得來的基礎上而引出一般的結論。這個方法便必然使他與近代經濟學的規制立即發生衝突，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今這個名稱所包含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玄學的公式與詭辯的狡計，不過人們努力給它們加上一個科學的圖記罷了。社會主義

52 G. W.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絕對的唯心論之創立者。——譯者。

53 或譯經院哲學，因為當時的學問為教會壟斷，僧侶集會於經院研究教理，稱為經院學者。他們研究學問大抵奉教義為中心，而採取哲學的理論，以證明教會的信仰與人間的認識絕不相反。後人因其談空理，且支離瑣碎，故稱它為煩瑣哲學。——譯者。

54 見克魯泡特金的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中譯本全集第九卷）第八章。——譯者。

者的經濟學大部分也沿着這個舊軌道進行。它依據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論證引出了自己的結論：資本家靠着榨取勞動者而存在。蒲魯東與馬克思就這樣做過了的。然而依照克魯泡特金的見解，這和科學大體上並沒有一點關係，而且也不能是真正國民經濟學的本來目的。

“經濟學應該被視作一種自然科學，而且應該採用一切精確的，經驗的科學所用的方法；它應該追求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對於人類社會所處的地位，應該與生理學對於植物和動物的地位相等。它應該是一種社會生理學。它的目的應該是來研究社會之不斷增加的欲求（即需要）的總量，而且還研究過去與現在所用來滿足此等欲求的種種方法。……既然每一種科學的最終目的都是實際生活的要求之指示與應用，（培根⁵⁵早已這樣說過了），那麼經濟學也應該來研究怎樣以最少的勞力消耗來盡量滿足現在和將來的欲求，而為全人類獲得最好的效果。⁵⁶”

因此克魯泡特金便把人類欲求之滿足作為他的觀察的第一義，而顯明地與那般對財富之生產異常重視的經濟學的代表者對抗。這個好像完全是不重要的區別，實際上却有着一個深的意義。資本主義社會之最中心的本質，便是將個人的致富放在

⁵⁵ 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譯者。

⁵⁶ 見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第十四章，（英之本第十三章）。——譯者。

社會全體的負擔上面，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物質的價值之生產當然佔着最重要的決定的地位。經濟學的目的既然是給資本主義制度之社會的認可與必要，找到一個理論的基礎，那麼無怪乎它的代表者們要把他們的注意集中在生產問題上面了。克魯泡特金却完全不是這樣。他把財富生產與消費的狀況引回到它的本來的基礎上；他認為生產只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手段。在他，問題的中心乃是：人類欲求的滿足；它的本質的意義就完全在這個目的上面。因此在合理的社會秩序之下，欲求之研究便佔着最重要的位置，而生產作為它的基礎，則應該來完成這個效果。

在這個研究中克魯泡特金得到的結果和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所得到的完全不同，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在現今社會秩序之下人類的生產量已經比較保證萬人的幸福所必需的超過很多。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現在的生產關係之下，生產量實在比較滿足我們的生活欲求所必需的少得很多。這應該歸咎於下面一件事情：生產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走入了完全錯誤的道路。因此在革命實現以後，單是讓各人仍舊繼續他的日常的工作，只把如今落在資本家的袋裏的“剩餘價值”收為社會全體的利益，這樣來求問題的解決，也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信賴這樣的思想，即是，我們的全部生產必須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面，並且依着這個原理規畫進行，來使一切部分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以

便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萬人的安樂。

克魯泡特金依着詳細的科學的研究給我們指示出來：所謂這樣的社會狀態之可能性決不是空想的；他又向我們證明：在我們經濟生活之合理的而且有計畫的組織中，生產能力真可以增高到不可測量的程度。然而最要緊的還是先把那個以為近代的“分工”與“工業集中”是絕對必要之盲目的信仰擺脫掉，（那個信仰在現代的經濟學家看來却是完全無誤的教條，而且它又像一個夢魘似的壓在我們的身上。）在近代國民經濟學的那些偉大的創立者的心目中，這兩個現象啓示了一個有着無限經濟的可能性之新時代，這個新學說的印象竟是如此之深，以致在社會主義的陣營中，人們也習慣地把它認為實現社會主義之歷史地必然的前提條件。然而實際上它不過是那個與社會主義衝突最厲害的資本主義榨取制度存在之前提條件罷了。在如今我們近代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中現出來的千萬兆候給我們指示出來，這個不健全的制度，對於生產者的肉體的與精神的發展，對於社會一般的正常的存續，實有可怖的影響與危害。我們的工業與農業之不調和以及精神勞動與筋肉勞動之不幸的對立，便足以證明這個事實。因此要解決我們的經濟生活，適用的口號並不是工業的集中，而且工業的分散，並不是分工，而是全工（勞動的結合）；到社會主義去的路便是朝着這個方向的。

克魯泡特金給我們指出了這個新的發展之正確的指標，這個新發展便是將我們的教育根本加以改造，使我們的全部生產的出產能力大為增高，以便能夠毫無困難地滿足社會安樂之一切的要求。正是這個確信使得他反對任何形式的工錢制度，擁護“自由享樂權，”並且排斥一切將社會所完成的勞動依着它的個別的價值來評價來計量之企圖。依據這個理由他便根本否定從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至馬克思所定的“特殊勞動”與“單純勞動”的區別，認為這只是隨意的假設。他用他的簡明的筆調指出來里加圖，蒲魯東與馬克思等所主張的一件貨物的價值當依它所含有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來計算，只是一個缺乏科學根據之無益的思辨。交換價值與勞動量並不互相為比例；要以一個作標準來量其他一個，是不可能的。亞丹·斯密說，必要的勞動量一增加，則貨物的交換價值也隨之增加，克魯泡特金對這種說法並不表示反對；“不過要從這個引出結論說，因此這兩個數量是互為比例的，一個可以作為另一個的尺度，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正如斷定明天將落的雨量和明天晴雨表下降到當地與本季節的通常氣壓以下的度數為比例，是同樣的大錯。”⁵⁷

然而克魯泡特金所注意的並不僅是經濟的問題。我們就要遇到的社會大革命，不只是社會的經濟基礎之根本的改變，並且

⁵⁷ 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譯者。

也必須是現代政治組織之完全的革新。因此向着資本主義制度的突擊，同時也是向着國家的支配的突擊。在十六世紀開始才在歐洲發達的近代國家之中央集權組織，並非隨意地形成的，這是當時在歐洲各國所發生的巨大社會變動之自然的結論。由於私人獨占之擴張與社會之階級的分化，（這是和那個立在封建基礎上的舊文化羣之暴力的而且有組織的壓制相關聯的），在支配階級便感到有創造一個制度來保護他們的經濟特權，維持他們的社會勢力之必要。這個制度便是近代國家，行政的中央集權化以及社會的權力之歸個人掌握。這個制度實際上不過是有產階級之組織化的強權罷了，或者用克魯泡特金的話，即是“領主，僧侶，軍人，法官等的一個互相保險的團體，它的目的是在支配人民，並且利用民衆的貧苦來增加他們自己的財富。”⁵⁸

人對於人的支配將與人對於人的搾取同時消滅。權力的獨占也將與財產的獨占一起從人類歷史中消去。國家的中央集權必須讓位給自治的公社的聯合，法律的強制也應該讓位給自由合意。克魯泡特金在人類活動的各方面之千百的團體與社會結合（它們的工作與存在都是建立在會員間互相的自由合意上面的）裏面，已經見到了這個新的發展的兆候。因此在他看來安那

⁵⁸ 見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第十四章，又參看國家和它的歷史的任務

（中譯本全集第九卷）第八節。——譯者。

其共產主義乃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中特別顯著的在經濟生活與政治組織兩方面之二大精神的運動之一種綜合。他和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主張土地，資本與勞動工具的私有制度應該消滅，而生產手段則應該收歸社會共有，由社會價值的生產者自身來管理。他並且和那般政治急進主義之最進步的代表者一樣，主張政府的權能應當縮至最小限度，社會的各分子應有發意之自由和自決權。在社會主義方面，克魯泡特金得到了它的最後的結論，他主張工錢制度之完全的廢除——他主張共產主義。在政治急進主義方面，他達到了這個理論之終極的歸結，他主張將政府的權能縮小到沒有，這使他達到一個沒有政治支配制度的社會狀態之觀念，使他達到了安那其。

關於社會之發展傾向的這種見解是和離世孤立的觀念論者的空想的認識並無絲毫關係的，這一點克魯泡特金在他的光輝的著作如國家和它的歷史的任務，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近代國家論中已經十分明確地證明出來了。而在他的那本充滿着不滅的價值的名著互助論（互助——一個進化的因素）中他更特別顯著地給我們展開自然界的運行中之完全新的景象，並且立下人類進化史的一個全新的理解之基礎。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論旨，甚至近代博物學的最優秀的代表者們也以爲這單是指在同一動物種族或同一人羣的個體中間發生的繼續不斷的鬥爭，

在這鬥爭中強者殘存而弱者滅亡——數十年來都流行着這樣的解釋。現在克魯泡特金却出來用了如許多有力的材料給我們證明，對於自然界的這種見解不過是將生活的真正事實弄成了一幅可笑的滑稽畫罷了。他告訴我們所謂生存競爭除了這一種殘酷的形式外，還有另一種形式，這就是在弱種的社會的結合中與在同種彼此間的互助的實際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然而這個生存競爭的第二個形式對於個體的生存與種族的存續，實較強者壓迫弱者的殘酷鬥爭更為有效，這已經由下面一個事實充分地證明了：即營着孤立生活，而且只靠着自己的純粹肉體的優越性保持生命的物種逐漸歸於衰滅。

這個事實人類進化史中最為明顯。在這進化中的每一個階段上，我們都可以見到無數社會的制度與習慣，它們是藉着休戚相關的感情產生的。在蒙昧人的氏族中，在野蠻人的共產村落中，在中世紀自由都市的工匠和手工業者的同業公會中，在我們現代的無數的團體與制度中，互助的精神都很活躍而且發生大的作用，並且它還作為我們社會的與文化的進化之最有力的因素而在到處活動。國家決不是如某一些人所說“對抗強者之橫暴弱者的保護者”，它倒是人類史上最殘忍的生存競爭的形式，不管它對於任何從下面發出來的自由的發意抱着如何顯明而當然的敵視，然而連它也不能夠遏止社會感情的這種表現。

“在人類中間有着一種社會的習慣與觀察之胚芽，它可以被視作尙未得到充分評價的過去時代的遺產，而且它不依靠着外部的強制手段，却反而超越過這種手段。人類的一切進化都基礎在這個胚芽上面，只要人類在肉體與精神兩方面不改變，那麼無論怎樣多的非難與一時的暴力的侵害，都不能使這個胚芽消滅。”⁵⁹ ——克魯泡特金的這段深刻的話語使我們得以透徹地洞察了一切社會的大運動和大革命之倫理的方面，這個洞察非常深透，實非現代辯證法論者之最美妙的幻術所能比擬的。他是一個新的認識之開拓者，又是一個社會成長的道路（從瀕於死滅的文明時代之混亂中進入自由社會主義之新天地）之指路人——作爲思想家和人的克魯泡特金的全部意義就在這裏了。

魯多夫·洛克爾⁶⁰

1919年8月於Neukölln.

⁵⁹ 參看克魯泡特金的論文：安那其共產主義，它的基礎和原理（1920年倫敦自由社版。）33頁。——譯者。

⁶⁰ RUDOLF ROCKER（1873——）。德國的亡命者，安那其主義的理論家和革命家。他在希特勒執政後，亡命美國。——譯者。

第一章

我們的財富

I

人類已經走過長遠的路程了，在太古時代人類製造粗拙的石器，並且靠着不穩定的狩獵所得的東西來維繫自己的生命，他們所留給子孫的唯一遺產，不過是避雨露的巖窟和幾件粗劣的石頭器具，——以及那茫茫偉大的，不可思議的，可怖的自然，他們爲了他們的微小的生存，不得不和這自然鬥爭。

在此後物換星移的幾千年之間，人類漸漸積蓄了無限量的財富，他們開墾了土地，排洩了沼澤，斬伐了森林，開闢了道路，貫通了山脈；他們又不斷地建築，發明，觀察，推理；他們創造出複雜的機械，啓發了自然的秘密，而且終於役使了蒸汽和電氣。其結果，現在文明人的小孩，在他出世的時候，便有前人所積蓄下來的莫大的資本，這都是預備着爲他使用的。既有了這莫大的資本，只要再加以自己和他人的勞動的聯合，那麼，財富的增多，一定比天方夜談¹中所描寫的東方人夢裏的豪富還要多。

土地被開墾的，已到異常寬廣的範圍了，並且適於上等種子的播種，如果再加以熟練和勤勉，便可以得到豐富的收穫——這收穫是足以供給全人類的一切需要而有餘。合理的耕種方法已是充分知道了的。

在美國的大原野，每一百個農夫使用有力的機械，能夠在數月之內，生產出足以支持一萬人全年生活的小麥來。假使人們還想得到二倍，三倍，乃至百倍的生產物，只要他們去製造土壤，好好地培養每一棵幼苗，便可以得到這莫大的收穫。古代的獵人爲了一家的食物，不得不跑遍五六十方里去搜尋食物；現在文明人只在那地方的千分之一以內，便能夠更容易，更有把握地養活了他的全家。氣候的寒暖也不會有什麼阻礙了。太陽光線不足的時候，可以用人工的熱力來代替；用人工的光線來促進植物發育的時候也到了。在同一個地方，用玻璃和熱水管，比較任其自然時，可以多得到十倍乃至五十倍的生產。

工業的偉大成就，更可驚異。靠着那些靈巧的東西（這便是近代的機械，它們自身是許多無名的發明家的三四代苦心的結果）的協力，現在一百個工人能夠製造出一萬人在兩年中間所

¹ 即一千零一夜 (*Mille et une nuits*) 阿剌伯的傳說文學，裏面包含着一連串的故事，都是古波斯大臣的女兒 SHEHRAZADE 對波斯國王講述的。這書有中文節譯本。——譯者。

穿的衣物；若有經營完善的煤礦，一百名礦工的勞動便能夠供給每個嚴寒的冬季中一萬個家庭煖屋子的燃料。而且我們近來親眼見到爲了舉辦萬國博覽會在一兩個月中間突然出現的卓越的都市的奇觀，法國國民的日常工作却絲毫不因之而紊亂。²

在製造工業中與在農業中一樣，並且實在與在現社會制度全體中一樣，我們祖先的勤勞，發見和發明，大都被少數人利用了，然而人類全體只要靠已有的鋼鐵的機械幫助，那麼，社會的各分子都一定能夠得到富裕安穩的生存。

的確，我們是富裕的——比我們所想到的更富裕得多；只就我們已有的而論，我們已經是富裕的了；而且我們現在機械的設備所能夠生產的，更要富裕得多；從我們的土壤，從我們的工業，從我們的科學，從我們的技術的知識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專門爲着萬人的安樂而使用，那麼，我們便是世間最富裕的。

II

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我們是富裕的。然則爲什麼還有那許多的窮人呢？爲什麼多數民衆還不得不從事困苦的賤役呢？在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財富中，並且還有每日數小時的勞動便足以保證萬人安樂的生產機關，爲什麼便是那些得着上等工錢

² 指1889年及1900年的巴黎博覽會。——日譯者。

的工人，也還不能夠得到明日的安全的保證呢？

社會主義者反覆不倦地說到這個問題。他們天天反覆地討論這個問題，並且從科學的論據來證實它。這種現象是因為在那強奪盜竊，被脅迫的移民與戰爭，愚昧無知，以及壓制等等的長期歷史的過程中，生產上所必需的物品，如土地，礦山，道路，機械，食物，住居，教育，學識——盡被少數人強占去了。這掠奪壓制的歷史便是人類不知道征服自然力以前的生活。這是因為那少數人憑藉着過去所獲得的假定的權利，依舊壟斷着現在人們的勞動產物的三分之二，然後更用極愚笨的，極可恥的方法來浪費這許多搶奪得來的東西。這是因為那少數人使多數民衆陷於不能維持一個月甚或一星期的生活的地步，然後只允許他們在少數人自己應收得生產品的大部分的一種條件之下工作。這是因為少數人禁止其他的人生產他們的必需物品，而強迫他們去製造那些於大眾的生活不必要而於獨占者却有最大利益的東西。

資本主義的本質就在這裏了。³

試看一個文明的國家。那曾經遮蔽全土的森林已經斬伐盡了，沼澤已經排洩了，氣候已經改良了，這已是適於住居的了。

³ 這一句依照1921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譯本。這和法文本，英文本都不相同。——譯者。

以前僅有下等雜草的土地，現在竟被豐饒的百穀掩蓋了。山谷間的巖壁也已築成了階段，而且還有金色菓實纍纍的青籐繁茂地掩蓋着。那些菓實苦辣而根不可食的野生植物，經過幾代的培養，也變成了多汁的蔬菜和甘美的菓樹。成千的公路和鐵道通過了地面，貫穿了山嶺。囂囂的機械的響聲，便在阿爾普斯，高加索，喜馬拉亞的空曠的峽谷中，也都能夠聽見了。河流可通行船隻；海岸經過精密的測量也容易泊近了；人造的港灣，經過極力的浚掘，並且設法避免海中怒濤的襲擊，已足以作為船隻的避難所了。深的礦坑深入在巖石裏面，地底下的繁密的坑道已直達到掘煤採礦的地方。在公路交叉的地方大都市勃興了；而且在這些城市裏工業，科學和藝術等等一切財富都積蓄起來了。

遺留給我們的時代以這莫大的遺產的，便是那子子孫孫生長死亡於貧苦之中，受着主人的壓迫和虐待，被勞役所摧殘了的世世代代的人民。

幾千年來，數百萬人民為斬伐森林，排洩沼澤，開通水陸道路而勞動過了。便是現在我們在歐洲所耕種的每一“路特”，（等於四分之一英畝）的土地，也沒有不是由各種民族的血汗灌溉來的。每一英畝的土地都有強迫的勞動，難堪的苦役和人民的艱苦的歷史。每一哩的鐵路，每一碼的隧道，都會吸取過相當的人類的血液的。

礦山的豎井至今還在石壁上保留着那些用勞力開鑿了它的工人的鶴嘴鋤所造成的痕跡。地底下坑道的每根支柱間的空地，簡直可以看作礦工的墳墓。每年因為煤氣爆發，巖石墜落，或坑內出水的緣故而喪命的勞動者真是不可計數；誰能知道這些墳墓究竟引起了那般倚靠着死者的微少工錢活命的家族的若干眼淚，艱辛和說不盡的不幸呢！

被鐵路和水道聯絡起來的各都市，都是有着數百年壽命的有機體。若把它們下面的地底掘開，便可以看見層層壘壘的市街，房屋，劇場，跑馬場，公共建築的基礎。你若去探索它們的歷史，你將知道這都市的文明，它的工業和它的特徵等等，在變成現在的形態以前，還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居民的合作，纔慢慢地發達而成熟的。各種住宅，工場，倉庫，都是那死亡了埋葬了的數百萬工人的積蓄的勞力所創造的；便是在今天，它們的價值也只是靠着住在世界各地的民衆的勞力來維持。那構成我們所謂“國富”的分子，因為是偉大的全體的一部分，所以才有價值。倫敦的大船塢，巴黎的大倉庫，它們的位置如果不是在國際商場的大中心，那麼，還有什麼價值呢？我們的礦山，我們的工廠，我們的手工場，我們的鐵道，如果沒有每日從海陸運輸的無限量的貨物，它們的價值又將怎樣呢？

幾百萬的人不停地勞動着，創造出來我們現在所誇耀的文

明。又有幾百萬的人不停地勞動着來維持這文明。要是沒有了他們，不出五十年之間，我們的世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而外，甚麼也都沒有了。

便是一種思想，一種發明，無一不是過去和現在所產生的公共財產。那表現人類天才的各種機械的發明，也無一不是由知名的與不知名的，死於貧困之中的千萬發明家所協力完成的。

幾千的著作家，詩人，學者，不斷地勞動着來增進知識，消除謬誤，造成科學思想的空氣。要是沒有了他們的事業，絕對不會有我們今日這樣可驚的文明進步。便是這幾千個哲學家，詩人，學者，發明家，他們自己也是靠着過去幾百年間的勞動的幫助，才能成就的，他們在一生中，身心兩方面都受着各種勞動者和工匠的支持與培養，他們的原動力也是從環境中得來的。

像施甘⁴，馬搖⁵，格勞夫⁶那樣的天才，他們促進工業向着新方

4 施甘 (MARC SEGUIN, 1786—1875), 法國工程師, 是最先計算出來熱之力學的等價量的人。——譯者。

5 馬搖 (JULES-ROBERT DE MAYER, 1814—1878), 德國物理學家與醫生, 他計算由氣體的壓縮而產生熱的量, 因而決定“熱之力學的等價量”, 並於1851年發表熱之力學的等價量。——譯者。

6 格勞夫 (M. R. GROVE, 1811—1896), 英國物理學家, 曾著書論物理力的統一(1846)。——譯者。

向發展，的確遠勝於全世界的資本家。但是天才自身還是科學的產兒，也是工業的產兒。直到有許多蒸汽機在萬人的眼前工作了多年，不斷地使熱變為動力，又使動力變為聲，光，電，於是天才的識見纔能夠說明物理力的統一與機械的原因。如果我們這般十九世紀的產兒終於能夠了解這個觀念，如果我們現在知道怎樣來應用它，這也是每日的經驗所教給我們的。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早已知道了這個觀念，並且宣示過，然而當時這個觀念不能有如何的發展，實在是因為十八世紀並沒有像我們現代這樣，伴隨了蒸汽機的進步而發達長成。

試想，因為瓦特⁷在沙何尋着熟練的工人把他的理想用金屬體現出來，以完成他的機械的各部分，於是那藏入機械中，比馬易馭，比水易制的蒸汽終於成了近代工業的真正靈魂；如果瓦特做不到這樣，那麼，我們經過幾十年還不能夠知道近世工業革命的法則！

每一種機械都有同樣的歷史，——這長篇的紀錄中，有許多不成眠的長夜，有貧困，有幻滅，有歡喜，有無名工人世世代代所發見的部分的改良；那些無名工人對於最初的發明所增加的，幾乎少到沒有，然而如果沒有這極其微小的貢獻，許多豐富的理想

⁷ 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蘇格蘭工程師，近代蒸汽機的發明者。他後來在沙何(Soho)經營鐵工廠。——譯者。

是不會結果實的。不僅是這樣，無論任何一種新發明，都不過是在機械和工業的廣大世界中的從前無量發明的總合與結果而已。

科學與工業，智識與應用，發見與引入新的發見的實際應用，腦筋的聰明與手腕的機巧，心智和筋肉的勤勞——一切都是共同勞動着的。無論任何一種發見，任何一種進步，任何一種人類的財富額中的增加，未有不出於過去與現在的心身兩方面的勤勞。

那麼誰有什麼權利來占有這無量數的財富中的一小部分，而這樣地說：“這是我的，不是你的”呢？

III

然而在人類所經歷過的許多時代的歷程中，那些使人們能夠生產，使人們能夠增加生產力的一切必需的東西，都被少數人強占去了。將來我們再敘述這種情形是怎樣發生的。現在，只敘述這件事實而且分析它的結果便夠了。

現在的土地，它的價值是由於繼續增加的人口之需要而生出來的，但已經是屬於少數人的了，他們阻止人民去耕種，——或者不許人用近代的方法去耕種。

各地的礦坑便代表各時代的勞動的結果，它們的唯一的價

值是從一個國家的工業的需要和人口的密度中生出來的，但那些礦坑又歸少數人所有；他們如果發見了別的更有利益的投資事業，便要限制煤的採掘，或者甚至完全停止了掘煤。機械也成了少數人的特有財產。機械本來是由三四代工人從最初的粗拙發明逐漸加以改良才完成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然而機械仍然為少數人所有。如果百餘年前最初造出製花邊機器的發明家的子孫，現在跑到伯勒，(Bale) 諾定漢(Nottingham) 的花邊工廠去要求他們的權利，他們會被叱罵道：“滾開！這機器不是你們的，”假使他們還想收管這個工廠，他們一定會遭鎗斃。

鐵路，倘若沒有歐洲那樣繁盛的人口，以及歐洲的工商業和商場，那麼，無論怎樣長的鐵路都不過是許多無用的廢鐵罷了；但鐵路也是屬於少數股東的，那些股東大概連路線經過什麼地方都弄不清楚，然而鐵路所供給他們的歲入，比較中世紀的王侯的歲入還要多。假使那些為開鑿鐵道和山洞而死的千萬工人的小孩們，迫於飢寒，一旦集合起來，向股東要求麵包，別人便會用鎗刺和炮彈來驅散他們，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由於這種奇怪的制度，工人的兒子出世之後，倘使他不肯承認把生產品的大部分獻給主人，他便得不到他可以耕種的田地，他可以運轉的機械，他可以開掘的礦坑。他不得不為着很少的不確定的工錢，把勞力售與他人。他的父親和他的祖

父曾經不斷地勞動來排洩這田野，來建築這工廠，來完成這機械，他們把全副氣力都用在這工業上面了。然而他們的子孫走進這世界，却比最下等的蒙昧人還更貧苦。假使他要得着耕田的許可，一定要遵守“將生產品四分之一獻給主人，另外四分之一獻給政府和中間人（經紀人）”的這個條件。這種政府，資本家，地主，中間人，向他徵收的租稅是不斷地增加的；這使他沒有改良農事的餘力。倘使他改業為工人，也要在“將生產品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獻給國家所承認的機械所有者”這種條件之下，才能夠得到工作；有時甚至在這種條件之下尋求工作，也得不到。

在從前，倘使農夫不將收穫的四分之一獻給封建的領主，他便連一塊耕地都不會得到，我們認為這樣的領主是太無恥了。我們稱那個時代為野蠻的時代。如今形式雖已改變，而實際的關係却依然一樣；勞動者在自由契約名義之下，還被強迫着承認封建的義務。因為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總不會找到較好的境遇。萬物都成了私有財產，他也不能不承認；不然，就只有餓死。

這樣情形的結果，便使我們全部生產都向着錯誤的方向走去。企業也從不會顧到社會全體的需要。它的唯一目的在增加投資者的利益。因此，發生了市場的不斷變動，工業的定期的恐慌，每一次都要使數百萬的工人失業而徬徨街頭。

勞動者不能用他們所得的工錢購買他們所生產的財富。工業便尋找外國的市場，在他國的富裕階級中去尋求銷路。因此在東方，非洲，以及埃及，東京，（這是安南的東京），剛果等等地方，歐洲人便不得不促進了農奴制的生長。他居然這樣做了。然而在各處他都遇着同樣的競爭。一切的國家都是向着同一的路線上發展的。於是戰爭，永久的戰爭，爲着爭奪市場的優先權的緣故而爆發了。爲着侵佔東方的戰爭，爲爭奪海上霸權的戰爭，爲課輸入品稅，和提出條件逼迫鄰國接受的戰爭，爲壓制反叛的“黑人”的戰爭，都爆發了！大砲的怒吼在世界中不曾停止過；許多種族盡被屠戮；歐洲諸國軍備的耗費，要占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一；我們知道這種賦稅壓在勞動者的頭上，是何等沈重難堪！

教育也是少數人的特權。工人的小孩僅僅在十三歲時，便不得不跑到礦坑中作工，或者在田野上給他的父親幫忙；這樣還說到教育，簡直是多餘的！工人白天在野蠻殘酷的空氣中做了過度的工作，晚上疲倦地回到家中，這樣還向他們說起研究學問，也是多餘的！社會便這樣地分做了兩個敵對的營壘；在這種狀態下，自由全是空話。那些急進派最初主張政治權利的擴張，但是他不久就明白自由的呼吸會引起無產階級的向上活動，他便轉換了方向，改變了意見，依舊回到壓制的立法和殘暴專制的政府上去。

法庭，裁判官，行刑官，警察，獄吏這一大羣都是爲着維持這種特權而設的；再由這些又生出偵探，偽證，間諜，以及威嚇和腐敗的全部組織。

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組織還阻礙着社會感情的生長。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正直，沒有自尊，沒有同情和互助，人類必會滅亡，恰像以強奪爲生活的二三種動物，和蓄奴的蟻族的滅亡一樣。但是這種思想是不合支配階級的嗜好的，他們便苦心慘澹地造出似是而非的科學的體系以養成和這反對的思想。

巧妙的說教，屢屢說到“有的人應該分給沒有的人”這個題目；但是倘使某人把這條教義實行，立刻便有人來告訴他：這種美麗的感情在詩歌中是很好的，但不宜於實行。我們說：“欺騙是自卑，自侮，”然而一切文明的生活真是個大欺騙。我們使自己並且還使我們的子孫習慣於那種兩面的道德，過那種虛僞的生活。然而我們腦筋本不安於虛僞，於是常以詭辯來自欺，自解。實在虛僞和詭辯，已成爲文明人的第二天性了。

但是社會是不能夠這樣生存下去的，社會必須回復到真理的路上；不然，就會滅亡。

從最初的獨占行爲生出來的結果已經蔓延到了社會生活的全部。人類社會不能坐待滅亡，便不得不恢復下面的基本原理：生產的工具既然是人類的協同工作的結果，生產品就應該爲種

族全體的共同財產。個人的占有是不當的，而且有害的。萬物屬於萬人；萬物為萬人所用。因為萬人需用萬物，因為萬人用全力來生產萬物，因為在世界的財富的生產中不能估計出各個人的一部分來，所以萬物是為萬人所有的。

萬物為萬人所有！這裏有無數的工具和器械，這裏有能夠任我們使用的鐵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稱為機械的東西，它能夠為我們或鋸，或刨，或紡，或織，或破壞，或改造，使用原料以生產我們現代的奇蹟。然而沒有一個人有權利去強占這些機械的一種，而且還說：“這是我的；你要使用它，必須在你的各種生產品中繳納租稅給我。”這又何異於中世紀的王侯對農夫說：“這丘陵，這牧場，都是我的。你必須從你收穫的每束穀物，你所積的每個稻草堆，你所造的每塊磚中間抽稅給我！”

萬物為萬人所有！無論男女，只要能夠分担正當的工作，他們便有權利來正當地分配萬人所生產的萬物；這種分配足以担保萬人的安樂。什麼“作工的權利”什麼“把各人的勞動結果的全部給各人，”這種空泛的方式，早用不着了。我們所主張的，是：安樂的權利；萬人的安樂！

第二章

萬人的安樂

I

萬人的安樂並不是夢想。我們的祖先爲着增加我們的生產力的世世代代的勞動，便證明出來這是可能的，實實在在做得到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實際從事生產的人數雖僅有文明國家的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他們所生產的物品却是很多的，能夠使家家戶戶都得着相當的安適。我們更知道假使現在那些以耗費他人勞動的結果爲生的人，一旦把他們的閒蕩時間用來製造有用的物品，那麼，我們財富的增加，當然是以生產者的人數爲比例的，或者還有更多的增加。人類的生產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過他的生殖力，這恰和中產階級經濟學的教主馬爾薩斯⁸

⁸ 馬爾薩斯(THOMAS-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國經濟學家。他認爲人類的生殖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過他的生產力，即是：人口按照着等比級數(幾何級數)增加；而食物則按照等差級數(算數級數)增加。爲了調濟這

的學說相反。一個地方的人口愈稠密，他們的創造財富力的生長便愈速。

因此英國的人口從 1844 年到 1890 年之間，僅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而其生產力的增加，就以最小的數目來計算，也是二倍於人口的增加率，即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國的人口增加最遲緩，然而其生產力的增加也是很快的。雖然農業常常遇到恐慌，雖然國家常來干涉，還有什麼所謂“血稅”（即徵兵）以及投機商業和財政等等的限制，然而過去八十年間法國小麥生產量的增加却有四倍之多，工業的生產更增加到十倍以上。至於美國，則這種進步更是顯著。美國的財富並不因歐洲過剩的工人的移往而減少；反而因為這個緣故增加了十倍。

但是這些數字還不足以指出在將來更完善的社會情形之下，我們的財富應該增加到怎樣地步；現在的推算恐怕還不到將來的財富的百分之一。因為現在我們的生產力雖是增加很快，然而一方面遊民和中間人的數目的增加，也是很驚人的。一般社會主義者預料資本會漸漸地自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所以只要把幾個大富翁的財產充公便行了。然而這種預料不惟不能實

種人口過剩的現象，便產生“預防的障礙”（如節慾，避姪，墮胎等）與“實質的障礙”（如戰爭，飢饉，殺嬰等等）兩種制止方法。克魯泡特金在本書和其後的田園工廠手工場中反覆申述，證實了馬爾薩斯學說的錯誤。——譯者。

現，並且發生了相反的事實，就是那些依靠他人勞力而生活的寄生者還是不斷地增加。

在法國每三十個居民中，實際的生產者還不到十個人。統計全國的農產，不過是不滿七百萬人的勞力的結果。在礦業和紡織兩大工業中，工人的數目還不到二百五十萬；然而掠奪勞力而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在英帝國從事於紡織業的工人，合女工童工在內僅有一百萬；從事礦業的不到九十萬，耕田的不到二百萬。據最近工業調查的結果，在全部工業中被雇用的男女工及童工僅有四百餘萬。⁹ 那些統計學家要在四千五百萬居民中算出八百萬生產者的最高額，便不得不誇大其說了。嚴格地說，從英帝國輸出於全球的貨物，也不過是六七百萬工人製造的。至於那些股東和中間人，他們直接間接斂取勞動者的精華，又插身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坐收厚利，這種人的數目究竟有多少呢？

不但這樣，並且那些擁有資本的人還不斷地限制生產，以減少貨物的產額。我們且不必說那些專門供富人吃的牡蠣，當可

⁹ 在五十三種不同的工業的各部分（連軍用品製造業在內）中雇用勞動者的總數為四百零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在鐵道的敷設與保線事業中有二十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人。他們的生產總數價值達到1,041,037,000鎊，而他們的淨產數是406,799,000鎊。——著者（英文本）。

一車一車的拋在海裏，只爲了免得牠變成平民的食品。我們更不必說起像牡蠣那樣地處置了的千百種奢侈品——織物，食品等等。我們只要記着他們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限制人類最必需的物品生產便夠了。無數的礦工準備着，並且也很願意來天天挖煤，送給那些冷得打顫的人；然而通常他們裏面的三分之一，甚或三分之二在一個星期內不能作工到三天以上，因爲老闆要維持煤炭的價格，不願因煤的出產加多而使其價格減低。成千成萬的織工也同樣地被禁止使用紡織機，雖然他們的妻子，兒女只穿着破布，雖然全歐洲四分之三的人都穿着不像樣子的衣服。

時常有幾百個熔鑪，幾千所工廠休息着不開工，又有許多只作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個文明國家裏面，都有二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他們到處找尋工作，却始終得不到一個！

倘使叫幾百萬人來開墾荒地，或把瘠地化爲收成很好的沃土，他們將會是何等地歡喜！一年間的方法得宜的勞動，可以使英國數百萬英畝荒廢着的像現在所謂絕對不毛之地，生產出五倍多的東西來；更可以使現在一英畝只產出八英斗的小麥的法國南部的乾地，增加五倍多的出產。然而這些勤勉的願意去開墾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過着閒蕩生活。這實在是因爲那些土地，礦山和工廠的主人喜歡把他們從公共社會掠奪來的資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債裏，投到巴達哥尼亞的金鑛中，

使埃及的農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國的苦力作他們的工錢奴隸。

這不過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產。此外還有間接地，無意地限制生產的方法，這便是把人類的勞力耗費在製造絕對無用的，或僅能滿足富人的虛榮心的物品上面。

財富遭受着間接的限制到怎樣的程度呢？應該用於生產上的精力，並且特別用於生產所必需的機械的設備上的精力，又被耗費到怎樣的程度呢？我們簡直不能用數目字算出來。我們但看歐洲每年耗費在軍備上的那筆大款，其目的不過是爲着攫取各國市場的支配權，使自己的貨物暢銷於鄰近的地方，俾國內的掠奪更見容易。又每年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供養各種官吏，他們的職務却僅僅是來維持少數人的“權利”（即是幾個富豪的權利），少數人操縱國民經濟活動的權利，並且還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維持裁判官，監獄，警察，以及一切所謂“正義”的裝飾品，這完全是耗費於無用之地了。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市中的貧乏稍微減輕一點，犯罪的事也會因之而減少的。最後我們還要說每年耗費在宣傳毒言邪說的印刷物上，以及爲黨派，爲政治家和投機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的造謠的報紙上面的金錢，也有數百萬之多。

然而還有前面未舉出來的勞力的浪費。譬如保持富豪家中的馬廐，狗窩，奴僕等等的事；助長交際社會的新奇流行和迎合

庸俗的大眾的低級趣味的事；又如強迫那些消費者購買他們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誇大的廣告來把劣貨賣與他們的事；此外還有製造者爲着貪圖厚利的緣故，去生產絕對有害的物品的的事：這樣的浪費是很可驚的。假使把這種浪費完全用來生產有益的物品，那麼，我們的財富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假使把這種浪費用來置備機械，放在工廠與製造所裏面，那麼現在三分之二的國民所缺乏的物品又會充滿在商店中了。在現今的制度之下，各國的生產者中，差不多整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中間有三四個月是得不到工作的，還有四分之一的勞力（其實甚至可說是二分之一）的結果完全造就了富人的娛樂和公衆的掠奪而已。

因此倘使我們考察一下現在的情形，看見一方面各文明國內生產的增加異常迅速，一方面又看見現在情形下直接或間接的限制生產，我們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倘使把經濟制度改良一下，使它更爲合理一點，那麼，不到幾年的工夫，必要的生產品便會積蓄了很多。到了那時，人人都要說：“夠了！夠了！我們的煤炭，麵包，衣服等等都很夠了！我們休息一下，再來考究怎樣纔能夠好好地利用我們的閑暇，發展我們的能力！”

從此，我們可以相信萬人的安樂不是夢想了。誠然，在上古時代，人用盡他一身的力量耕種一畝土地，只得着幾斗小麥，並且還要用手來製造農業上，工業上的器具時，這算是夢想的。然

而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現在人們已經發明了發動機，只用少量的鐵和幾包煤炭，便能運轉複雜的機械像駕馭柔順的馬一般，在這時候，萬人的安樂不再是夢想了。

但是要實現萬人的安樂，就不應該將這莫大的資本——城市，房屋，牧場，耕地，工廠，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認為一種可以由少數壟斷者自由支配的私產。

這些由我們的祖先在困苦艱難中所獲得，所建築，所創造，所發明的豐富的生產工具，應該成爲一種公共財產，俾萬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衆人的共同利益中產生。

應該要有充公的創舉。應該知道萬人的安樂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II

“充公”，這就是歷史放在我們二十世紀¹⁰的人面前的一個問題。一切能夠用來創造衆人幸福的東西皆歸衆人所有，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這個問題却不能靠立法解決。現在沒有人會這樣想。窮人和富翁一樣，知道非但現在的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便是將來任何政治革命所產生的政府也不能夠解決它。人們已經感到社會革命的必要了，無論貧人或富人，大

¹⁰ 法文原本出版於1892年，故作“十九世紀末葉”。——譯者。

家都公然相信這個革命已經逼近了，它是時時刻刻可以爆發的。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人類思想有了一種大的變化；這種新的精神被少數人（換言之，即有產階級）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發展，所以它必須以強力衝破藩籬而爆發為一個革命。

革命從何發生呢？革命怎樣爆發呢？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未來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夠觀察而又能深思的人決不會看錯它的兆候；勞動者與雇主，革命者與保守黨，思想家與實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經站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麼，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們將做什麼呢？

我們大家都用心研究過革命的戲劇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實際的革命工作，所以我們中間有很多的人只見到這些大運動的舞台的效果，如起初幾天的戰鬥，障礙物等等。但是這種戰鬥，這種開始，不久就完結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舊政府倒塌以後，才能說是開始。

舊的統治者已經無能為力，而又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會被暴動的烈焰疾捲而去。1848年有產階級的帝政只在幾天內就消滅了；並且在國王路易·腓力布坐着馬車逃出法國（插圖6）以後，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廢王¹¹。同樣濟業政府在1871年

¹¹ 指法國二月革命的事。——譯者。

3月18日那天幾小時內就不見了，¹² 讓巴黎去決定它自己的運命。然而1848年與1871年仍只是暴動而已。在民衆革命之前，舊的統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這班舊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國去，在安全的地方躲着，圖謀再舉，設法捲土重來。

舊政府消滅了，軍隊也在輿論的怒潮之前遲疑起來了，他們再不肯服從他們的指揮官；那些指揮官也很聰明，很謹慎地逃開了戰地。於是軍隊交叉着兩手讓革命黨人自由行動，或者去和暴動者聯成一氣。連警察也垂着雙手不知道應該打革命黨人呢，還是應該高呼“公社萬歲！”有的便回家去，“等待新政府的成立。”富有的人收拾他們的行李，逃到安穩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裏。——看，一個革命就是這樣爆發的！（插圖7）

在許多大城市，公社制度宣告成立了。幾千幾萬的人在街上遊行，夜間自己跑到各種臨時俱樂部裏去問：“現在應該做什麼？”並熱烈地討論公衆事務。一切的人都很關心社會的變動；昨天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天最熱心的人。到處都有自願犧牲者，每個人都希望着維持勝利。崇高的獻身的行爲就在這時發生了，羣衆的唯一的願望就是向前邁進。

這一切都是極美妙，極崇高的。但這還不是革命。革命的

¹² 指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濟葉（AD. THIERS）在六十幾天以後又攻進了巴黎，參看註20。譯一者。

工作不過從這時候開始。

自然這時不免有乘機復仇的事情。像瓦德林，託馬士¹³ 這類的人因為名聲太壞，不免要受着懲罰；但這不過是鬥爭中偶然的事，並不是革命。

社會黨的政客，急進派，新聞界的失意分子，中產階級與工人中的競選演說家，不免興高彩烈地跑到市政廳和政府機關裏去佔一個空位置。有些掛起金銀的帶子，心滿意足，對着部裏的鏡子，而且用心學習適合於他們新地位的威儀去發號施令。他們要是不掛起赤色的飾帶，戴上錦繡的制帽，裝起官僚的模樣，怎麼能夠威壓從前在工場和事務所中的舊同事呢！又有一些人却埋頭在檔案中間，費盡氣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個頭緒。他們要製造法律，還要發布誇大的告示，然而這時再沒有人來奉行這些了，因為革命已經發生了。

這些人想使自己握着他們從來未有過的權勢，他們依舊去求助於舊的形式的政府。他們便成立了如“臨時政府”，“公安委員會”，“市長”，“縣長”，“公安委員”等等名目，有的是選出的，有的是推舉的，他們都會出席委員會或公社的會議。這一羣人一

¹³ 託馬士 (CLEMENT THOMAS) 被稱為 1848年6月革命時的“屠夫”，最為巴黎人民所憎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時，他在國民軍總司令，被羣衆殺害。——譯者。

共包含着二三十種意見不同的黨派，對於革命的範圍，態度，目的等等，各有不同的概念，“實行派”¹⁴，“集產主義者”，“急進黨”，“雅各賓派”¹⁵，“布朗基派”¹⁶，同聚於一室，虛耗時間於口舌的爭論中。誠實的人和野心家聚在一起，那些野心家只夢想着攫取權力，他們一旦得勢，便會排除人民。大家各懷着正相反對的意見聚集在一處，組成暫時的聯盟，爲着要造成多數，然而這多數的壽命只能夠維持一天。他們彼此爭論，互相罵爲反動派，官僚，流氓等等；一遇重要措置意見便不能一致；平時只就極其微小的瑣事爭論；除了發出誇大的布告而外，甚麼事都做不出來；大家都以爲自己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而其實革命的真正力量却是在街巷之間。

這些事在那些平素喜歡看戲的人，倒覺得快意，但這決不是革命，什麼事都還沒有辦到！

¹⁴ 實行派(Possibilistes)即法國社會主義勞工會會員的名稱，又稱爲布魯斯主義者(Broussistes)，以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 1854—1912)爲領袖。——譯者。

¹⁵ 雅各賓派(Jacobins)如今用來稱呼一般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革命政府的人；不是指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俱樂部的會員。——譯者。

¹⁶ 布朗基派，即布朗基主義者，這是法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布朗基的信從者，反對帝國及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譯者。

在這個時候只有人民受苦。製造所停辦了，工廠關門了，商業也全部停頓了。工人甚至不能夠再獲得他從前的那樣微小的工錢。食物的售價却一天一天地增高起來。但是民衆有英勇的獻身精神，這種精神每次臨到絕大危機，便愈見崇高：他們要堅忍地等待着。在1848年革命時，他們曾這樣地說：“我們要忍耐過這三個月的艱難困苦，以盡力於共和；”而同時“他們的代表”與新政府的大人先生以至於最卑劣的自負多能的小官僚，還是要按期支取薪俸。

民衆受着痛苦。他們有着小孩的那樣的信仰。他們有着那些迷信領袖的羣衆的好脾氣，他們還以為在“那裏”——在議院，在市政廳，在公安委員會——有人在爭取他們的權利。然而實際上在“那裏”所討論的，什麼事情都有，獨於民衆的福利一層却未提起。在1789年饑饉蹂躪了法國全境，使革命遭受挫折；當人民陷於貧困的深淵的時候，在香·熱里熱¹⁷還是華麗的輕車相連，滿載着那些飾珠玉，競艷裝的美女麗人，羅伯斯比爾¹⁸還催着雅各賓黨¹⁹討論他個人的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當1848年勞

¹⁷ 香·熱里熱(Champs-Élysées)巴黎的大馬路。——譯者。

¹⁸ 羅伯斯比爾(M. ROBESPIERRE, 1758—1794),法國大革命中山嶽黨的三人領袖之一,恐怖時期的獨裁者。——譯者。

¹⁹ 雅各賓黨是法國大革命中革命黨人的左派,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比爾是他們的領袖。——譯者。

動者因工商業總停頓而受苦的時候，臨時政府與國民議會却在討論軍人的餉銀和囚徒的工作，反把那處在可怖的危機中的人民的生活置之不顧。又如那在普魯士砲彈之下產生出來的巴黎公社²⁰，雖僅僅支持了七十日，也犯了這同樣的錯誤——這失敗證明出來：民衆餓着肚子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個人每天只得着三十個“蘇”（一個蘇值五生丁，共合一個半法郎）要他同時在城壘上作戰，並且養活家庭，是辦不到的事。

民衆受着苦，他們常常自問：“有什麼方法能夠免除這種困難呢？”

III

在我們看來，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必須承認並且高聲宣言：每個人不管他在舊社會中的等級如何，不管他是強，弱，巧，拙，而且社會中所有的衣，食，住等等維持生存的

²⁰ 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指1871年法國的工人革命。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皇帝拿破崙三世被擄。國內資產階級另組織臨時政府的臨時政府，以濟葉為領袖。次年(1871)3月18日巴黎民衆暴動，推翻臨時政府，濟葉等逃往凡爾賽。巴黎民衆另組工人政府，即歷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5月22日凡爾賽軍隊攻入巴黎，經過一個星期的屠殺後，巴黎公社完全毀滅。——譯者。

必需品都應該沒有差別地分配給萬人。我們必須承認這個，要高聲宣傳這個，更要去實行這個。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置一切事務，使工人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已經橫在他們的眼前。從此以後便再沒有人會蜷伏在高樓大廈附近的橋下了；也沒有人會在食物堆積的地方挨餓絕食了；更沒有人會在皮毛堆積如山的衣店旁邊凍死了。萬物為萬人所有，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最後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真正革命終於成功了。這革命要先考慮了民衆的需要，然後才來叫民衆盡義務。

這決不是“議會的法令”所能辦到的，我們必須直接地並且有效地把那保證萬人安樂的一切必要物品占有了，這才算是唯一的真正科學的進行方法，這才是唯一的多數民衆所能了解並且希求的方法。我們必須以民衆的名義去占有穀倉，衣店，住宅。不要使一件東西被浪費。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組織起來從事拯救饑餓，填補缺乏，應付一切需要；不為某一個人的利益而生產。應為保全社會全體的生活及其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從事生產。

“作工的權利”那一類的曖昧的語句，是在1848年的當時用來欺騙民衆的，到現在還有人想用它來欺騙民衆，然而這類的語句我們不要了。讓我們來大膽地承認：萬人的安樂既是今後可

以實行的，我們就必須使它實現。

當 1848 年工人要求作工的權利的時候，國有和市有的工場便設立起來，工人被驅到那裏去作苦工，每人每日僅得着四十個“蘇”(英幣一先令八便士)的工資。當他們要求“勞工組織”²¹時，政府便回答說：“朋友！忍耐着，政府正在給你想法。這裏有今天的四十個蘇。我勇敢的工友們！你們爲着餬口奮鬥了一輩子，現在稍爲休息罷”。同時政府又修理大砲，召集預備兵，用盡中產階級所熟習的方法，使工人自己分裂解體，後來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工人到非洲去殖民，要是不去，便處以槍斃的刑罰：這時是在 1848 年 6 月，離前政府推倒之期不過四個月罷了。²²

²¹ “勞工組織”屬於路易·布朗的社會改造計畫，布朗在 1848 年的臨時政府中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他還是臨時政府勞工委員會的主席，當時所組織的國民工場便是模倣布朗的計畫而組織的，但布朗所籌劃的社會改造計畫並未能實行。——譯者。

²² 2月24日法王路易·腓力布逃亡，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四個月後發生 6 月的革命，這 6 月事變可以說是當時的國民議會促成的，在國民議會的選舉中反動派佔了優勢，它選出後的第一炮便是發布停閉國家工廠的法令，更激起工人階級的惡感。6 月 23 到 26 日四天中巴黎工人與國民軍在巴黎市內外巷戰，事敗，工人被捕者有一萬多人，其中多數被槍決。——譯者。

反之，倘使工人去要求安樂的權利，其結果必然兩樣。所謂要求安樂的權利，即是要求占有社會財富的權利，——這含有適應各家庭的需要占有住宅，把食物的倉庫收歸公有，在熟知饑饉的苦況以後，再來認識富裕的意義。他們主張他們對於一切社會財富的權利（這財富是過去和現在世世代代民衆的勞力的結果）；並且還要利用這財富來使他們也享受資產階級獨占去了的科學和藝術的高等快樂。

他們主張過着適意生活的權利，同時他們還主張更重要的權利，要有權利來爲他們自己決定如何纔是適意的生活，要保證這種適意的生活須生產何物，何種東西是無用而應該排斥的。

“安樂的權利”便是說要能夠過着人過的生活的意思，要能夠養育子孫，使之成爲比較我們現在這社會更優美的社會的一分子的意思；而“作工的權利”的意思，不過是使工人成爲工錢奴隸和苦役者，他們的子孫將永受資產階級的掠奪和支配罷了。

“安樂的權利”是社會革命，而“作工的權利”不過是商業制度的踏車²³而已。

現在是時候了。工人應該起來主張對公共遺產的權利，並且應該占有這個遺產。

²³ 踏車是從前設在監獄內令囚犯踏磨的東西。——譯者。

第三章

安那其共產主義

I

我們以爲無論任何社會，只要廢止了私有財產後，便不得不依着共產的安那其(Communist Anarchy)的方向進行。由安那其生出共產制；由共產制達到安那其。兩者都是近代社會中的主要傾向的表現：卽是對平等的追求。

在從前有個時候，農家把他們自己耕種得來的穀麥和在茅屋內織就的毛布衣服看作自己勞動的產物。但是這樣看法，也不是很正確的。便是在那時，道路，橋樑也是公共修建的；低濕地方的排水，也要靠着公衆的力量；公用的牧場，周圍有一道籬笆，這也是要衆人共同修補的。一兩個人把織布機和染料改良了，萬人都得着利益，便是在這樣的日子裏，農家也不能夠單靠自己生活。他們在各方面都要靠着鄉村或公社的人民合力去做。

況且在今日的工業狀況中，一切都是互相維繫的，生產的各

部門都是和其他的一切相聯屬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各種工業的生產品，要說是個人製造的結果，要主張一種個人主義的起源，這是不能成立的。文明各國內的紡織業和礦業之所以達到異常完美的地步，還是由於其他千百種大小工業同時發達所致；這也是由於鐵道網的擴張，海洋間的航行，勞動者的技能之熟練以及勞動階級全體的教養程度達到某一定的水準等所致；簡言之，這完全靠着世界各地的人的勞動的力量。

開鑿蘇彝士運河而患虎列拉，和造聖哥塔特隧道²⁴患關節病而死的意大利人，以及參加解放黑奴的戰爭而死於槍林彈雨之下的美國人，對於英，法棉紗工業的發達所盡的力量，並不減於那些憔悴在曼奇士脫(Manchester) 和盧昂(Rouen)的工廠中的青年女工，和改良織機的發明家，(他也是依着別個工人的暗示而成功的。)

然則，我們對於這萬人的力量所積蓄下來的財富怎樣能夠計算出來其中各個人所有的實額呢？

假若我們用一般的綜合的見地去觀察生產，我們便不能不反對集產主義者的意見；他們拿各個人對於財富之生產所化費的勞動時間為比例，來分給報酬，並且以為這可以是一種理想的

²⁴ St. Gothard 隧道，在瑞士南部阿爾普斯山中，長約九公里半，在1828年造成。——譯者。

安排，甚或是向着正路的邁進。在現社會中，物品的交換價值果真能夠依着生產這件物品所必需的勞動量來計算麼？（如亞丹·斯密²⁵ 李嘉圖²⁶所提倡，而馬克思²⁷所追從的學說。）這問題且留在後章中討論，我在這裏只略說幾句：在我們看來，集產主義者²⁸的理想決不能在以生產機關為共有財產的社會中實現。若要根據着這個原理，則那樣的社會第一步便不得不澈底廢除工錢制度。

集產主義的那種緩和的個人主義決不能夠和部分的共產主義（生產機關與土地的共有）同時并存。財產的新形式也需要着報酬的新形式。生產的新方法不能與消費的舊形式并存，猶如它不適合於舊形式的政治組織一樣。

工錢制度是由土地與生產機關的個人私有而生出來的。這

²⁵ ADAM SMITH (1723—1790), 蘇格蘭經濟學家，名著原富 (*The Wealth of Nation*) 的著者。——譯者。

²⁶ DAVID RICARDO (1772—1823), 英國經濟學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譯者。

²⁷ KARL MARX (1818—1883), 德國經濟學家，即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他的名著資本論 (*Das Kapital*) 共三卷，有邵大力，王亞南的中文譯本。——譯者。

²⁸ 這裏的集產主義者是指社會民主黨，集產主義即是他們的“共產主義”。——譯者。

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必要條件；即使工錢制度戴上了“勞動券”²⁹的面具來騙人，但也免不掉要同資本制度一齊滅亡。生產機關收歸公有以後，人人都可以享受共同勞動所產生出來的結果，這是必然的事實。

我們更以為共產主義³⁰不僅是值得願望的，便是建設在個人主義上的現社會也是不可避免地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進行的。最近三百年間個人主義的發達，是由於各個人為着抵抗資本與國家的威權，保衛自身的努力。有一個時候，他以為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掉國家與社會的羈絆，而那些代他表示出他的思想的人也是這樣地說。他說：“我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能夠用金錢購得”。但是他却走上了錯誤的路，近代歷史已經使他明白，假使沒有一切人的幫助，便縱有金銀滿箱，也仍舊不會做出一件事來。

實在，在近代史中我們可以看見還有一種傾向，隨着個人主義的潮流前進，它一方面保存着古代共產主義的遺物，一方面在近代生活的一切發展中，建立起共產主義的原理。

²⁹ 勞動券 (Bons de travail 或 Arbeitsbons) 英文本作 Profit-sharing。——譯者。

³⁰ 指自由的共產主義，即安那其共產主義，與馬克思和列寧 (N. LE-NIN) 的共產主義不同。——譯者。

當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紀的公社脫離了宗教的和世俗的領主的羈絆以後，它們的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便立刻很快地擴張發達。都市（不是私人）租賃了船舶，組織了遠征貿易隊，把它們的製造品輸到他處，由這外國貿易得來的利益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全體。並且由都市購買糧食以供市民需用。到了十九世紀這種制度的遺跡還保存着，平民便把它們的紀念傳爲口碑，製爲傳說，異常讚歎，景仰。

可惜現在都不見了。但是鄉村公社仍竭力保存着這共產主義的最後遺跡，只要國家不來妨害，它的結果便是成功的。

同時，那些建設在這同樣的原則——各取所需——上面的新組織，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勃興起來了；要是沒有一點共產主義的酵母，現在社會便不能夠存在。雖然現在的商業制度足以使狹隘的利己思想深入人心，但這共產主義的傾向，仍不斷地出現，並且還以各種方法影響我們的活動。

在從前，橋樑是要徵稅的，現在却成了共有財產，任人通行；從前要向旅行者徵收通行稅的大路，現在也是任人通行，只有偶爾在少數東方國家中還要徵收這樣的稅。博物院，免費圖書館，免費學校，免費的兒童食堂是很多了；公園，花園，都開放了，任何人都可以去遊玩；鋪石燃燈的街衢，萬人可以自由往來了；水也無限制地供給萬家使用了。——這樣的一切設備都是

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原則上面的。

電車與鐵道已經發售一月或一年的長期券了，乘車的次數是不限制的。俄羅斯和匈牙利兩國的鐵道已通用“區域制度”(Zone System)的車票了，這種車票可使乘客以同樣的車費行五百哩或八百哩的路程。³¹ 這與郵政所採用的郵費均一制相差不遠。在這一切的改革中都有一種傾向，就是不計較消費量的多寡。一個人要走八百哩，另一個人要走五百哩。這是各個人的需要。爲什麼因爲一個人的需要二倍於他人的需要，他便應該付出二倍的價錢，這是沒有充分理由的。便是在我們現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也可以看出這樣的兆候了。

此外尚有一種趨勢，雖然這還是極其細微的，也值得注意；這便是供給各個人的需要時，並不較量這個人過去和現在對於社會所盡的力如何。我們開始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它的各部分是互相密切地結合着的，所以爲着一個人盡力便是對全體盡力。

假若你走進一個公共圖書館——例如不是巴黎國家圖書館，而是倫敦博物院，或柏林圖書館³²，——那館員並不問你在

³¹ 法文原本僅有匈牙利一國，無俄羅斯。據我所知，法國巴黎地鐵車也是採用這種制度的。——譯者。

³² 這是對法國人說的，所以舉出英國或德國的圖書館，雖然不是那兩國的公民，仍然可以在那兩國的圖書館中自由閱書。我們到巴黎國立圖書館中也是如此。——譯者。

社會上所盡的勤勞如何，只要你要看書，一本或五十本他都會立刻借給你；假使你不曾檢尋目錄，他還要來給你幫忙。你倘使有會員證書，（有許多是以勤勞來代替的，）還可以到各學術團體的陳列所，花園，藏書室，實驗室和每年的講演會，不管你是達爾文或平常的人。

在聖彼得堡，假若你正從事於某一種發明，你便可以到特別實驗室裏去，在那裏你可以得着座位，一個木匠用的凳子，一個旋轉的車床，其他一切必需的工具，以及科學的器械，只要你會使用你便可以取用的；至於在裏面時間的長短也是隨你自己的意思。那裏有的是工具；又有各種技巧熟練的職工同伴，你要使他人對你的思想感到興趣，便與他們合作也可以；不然，你要是喜歡單獨工作也可以，都隨着你自己的意思。將來發明一架飛機，或什麼都不能發明，——那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從事研究來實現你的理想——那就夠了。

同樣，那些駕駛救生艇的人也不會要遭難水手的身價保證，他們立刻開船，冒着怒濤狂瀾的危險，有時甚至有滅頂喪身之禍；他們犧牲一己的生命去救那些不知姓名的人。何必定要知道他們呢？“他們也是人，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只這兩句便夠了，他們的權利由此便可成立了，）快去援救他們！”

這樣看來，可見便是在這個理論上是個人主義的現社會裏

面，共產主義的傾向已經在各方面勃興起來了。

假設我們的大都市中的某一個，它在平常是自私自利的，如今一旦遭了禍患，——譬如說是被圍攻了，——這自私自利的都市也會最先安置城內的老人和小孩，並不問這些人平日對於社會盡過力沒有，也不問他們將來能不能對社會盡力；却先去養活他們，然後才來照顧戰士。城內的男女都爭先恐後地去看護那些負傷者，並不以他們所表示出來的勇敢和才能來分別待遇的優劣。

這種傾向存在着。當我們各人的迫切的需要滿足後，我們便會覺察到這種傾向，它的發達是與人類的生產力成正比例的。每每在日常生活的淺陋的成見被一個偉大的思想驅逐去了的時候，這種傾向便成爲一種活潑的力量。

然則，到了生產機關收歸萬人使用，一切事務均依共產主義而行，勞動在社會中占着最尊貴的地位，生產出超過萬人所需要的物品的時候，這個已經如此強大的力量自然要擴張它的活動範圍，直到它成爲社會生活之支配原理爲止，我們怎麼還可以疑惑什麼呢？

我們根據這些兆候來推論，更考究後章中所論的充公的實際方面，我們便可以決定當革命打破了維持現在制度的勢力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責任便是毫不猶豫地去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我們的共產主義並不是福利葉和共同住居論者³³的共產主義，也不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共產主義，這是安那其主義者的共產主義，即是說沒有政府的共產主義——自由的共產主義。這是我們人類經年累月所追求的二大理想之綜合。這二大理想就是——經濟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II

我們把“安那其”(l'anarchie)當作我們的政治組織之理想，不過表明人類進步的另一個顯著的傾向。當歐洲社會發達到某一點的時候，它們便打破了強權的束縛，而代替以一種多少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原理上面的制度。並且在歷史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此等部分的或者一般的革命的時代，(那時舊政府已被推翻了)，也就是經濟和智力兩方面急速進步的時代。在中世紀的各公社得着自由獨立後的情形是這樣，公社的那些紀念物(由各工業公會的自由勞動產生出來的)的技巧真是千古無比；³⁴在農

³³ 法文本無福利葉，只有共同住居論者。共同住居論者係依據日譯名，原文為Phalanstériens，即指福利葉的信徒。福利葉的理想社會組織是法蘭市(Phalange ou Phalanx)由四百個家族約千八百人組成的團體生活，住在叫做法蘭司德爾(Phalanstère)的共同建築中，故福利葉的信徒又稱為Phalanstériens。——譯者。

³⁴ 參看著者的另一著作互助論(全集第六卷，生洗譯)的第五、六章。——譯者。

民大暴動發生，隨後便引起宗教改革，動搖了教皇的權勢，那時的情形是這樣；舊世界（指歐洲——譯者）的不平者在大西洋對岸所創設的，僅有一時自由的社會也是這樣。

假若我們更來觀察文明各國現時的發達，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出一種更顯著的傾向來，就是逐漸限制政府的活動範圍，而增加個人的自由。這種進化雖不免爲舊制度和舊迷信的破磚碎瓦所阻礙，但是它依然進行不止。這也是和其他的進化一樣，只待着革命的爆發來掃去阻塞進路的舊障礙。那麼，進化便可以在更生的社會中找到自由活動的範圍了。

人們費了許多力量想解決那個不可解的問題——建設一羣“一面說是社會的公僕，一面又壓迫個人使之服從”的政府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決，直到後來才想到從一切形式的政府下面解放出來，單靠那些由於具着同一目的的團體和個人中間的自由契約而成立的組織，來滿足他們的欲求。於是各個小的地方單位的自立便成了迫切的需要了，以互相合意來代替法律；取消現在的國家的國境，以共同的目的和見地來調節個人的利害

從前人們所目爲政府的功能的一切，現在都成了問題了，事情的處置安排用不着國家的干涉，已經是更容易而且更滿足的了。我們觀察向着這方面的進步，便一定會得着下面的結論：人類的趨勢是在減少政府的干涉以至於零；實在就是要消滅

那不公平，壓制，獨占三者的化身——國家。

我們已能夠大略地看出將來的世界了。在將來世界中維繫個人間的結合的，不是法律，而是社會習慣——這是我們各個人所感到的要求鄰人來幫助，合作與同情的需要之結果。

不消說，這種無國家的社會的思想，會引起許多的反對論的；至少那種廢棄私人資本的社會的經濟學是一定有人反對的，我們大家從小所受的教育都以爲國家之建立是出于神意。我們在學校中所習的羅馬史，後來我們習羅馬法時所研究的東羅馬法典³⁵以及在大學中所習的各種科學，無一不使我們迷信政府和尊重神意的國家的德行。

爲了保持這種迷信起見，便完成了整個哲學的體系，並且輾轉地教授傳播；一切的政治都基礎在此種原理上面。無論何種黨派的政治家都對人民說：“把權力交給我們的黨，我們願意並且也能夠使你們脫離多年來壓在你們身上的那些困苦。”

我們從搖籃走到墳墓，這中間的一切行動，都是受着這種原理的支配的。試翻開一本社會學或法理學的書，我們便可以看出政府，及其組織，其設施等等占去了一大部分，因此使我們不

³⁵ 東羅馬法典(Byzantium Code)。康士坦丁大帝於紀元前 326年移羅馬都城於拜占庭(Byzantium，即現今之君士坦丁堡)，是爲東羅馬。故東羅馬法典稱爲“拜占庭法典。”——譯者。

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客而外甚麼都沒有似的。

報紙也同樣地使我們相信這些，全篇都是討論國會的辯論和政治的陰謀的；至於人民的日常生活，僅僅在經濟欄，或者關於訴訟或警察局發布消息的雜聞欄中說到一點。我們讀報紙時，很難使我們想起那些生存的或者死亡的，知道悲傷的，勞動的，消費的，有思想的，有創造力的無數的生物（即全人類）；我們只看到那些“偉大的”少數人，他們乘着我們的愚昧無知，擴大了他們的陰翳，把全人類都遮掩了。

我們再來觀察生活的本身，看看實際的社會，我們便知道在其中，政府所做的是異常微小的，這是令人驚奇的事。巴爾扎克³⁶曾描寫過幾百萬的農民一生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只知道國家強迫他們繳納的重稅。每天都有幾百萬件事情進行了，並不要政府的干涉。其中最大的事，如商業貿易之類，縱使訂契約者的一方有不履行契約的意思，也不必訴於政府便可以得到解決。假若你和一個熟悉商業情形的人談談，他便會告訴你，商人間每日的貿易要不是以互相信用為基礎，便是絕對不行的。踐言的習慣和保全信用的存心，皆足以維持此種比較的誠實。

³⁶ 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法國寫實主義小說家，人類喜劇(*Comedie humaine*, 他的全部長篇小說的總名目)的創造者。——譯者。

便是那種把有害的藥包裝得很精緻，出售與人，使顧客中囊還不悔恨的人，爲了名譽起見，還是要遵守着他們的信約。在現在以賺錢爲唯一目的和唯一誘因的社會情形之下，這種道德居然也能發達，那麼，到了社會不基礎在壟斷他人勞力的結果上面的時候，對於它的急速的進步，我們還用得着疑惑麼？

還有另一個顯著的事實，（這正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徵）更足以證明我們的思想之正確。這便是，私人發起的事業的範圍不斷地擴大，而各種的自由組織也異常發達。在後面“自由合意”一章內我們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在這裏我們只說明這種事實是很多而且很普遍的，雖然一般政論家和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把這種事實全然漠視不顧，只顧向我們談論政府的職權，但這類事實已經成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主潮了。

這些自由的，各種不同的組織，都是我們的文明之極其自然的結果。它們發展得很快，並且很容易團結起來；它們是文明人的需要繼續增進後一個必然的結果。它們很有效地代替了政府的干涉，結果是非常之好，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它們在社會的生活中是一個重大要素。倘使它們不能擴張到生活現象的全部，這實在是因爲工人的貧困，現社會中階級的區分，資本之被私人壟斷以及國家等等阻礙了它們的發展。要是把這些阻礙物除去了，我們便可以看見它們的存在遍於文明人的活動的全部領域。

近五十年的歷史便足以證明代議政體完全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所希望它做的，它完全做不到。在將來，一定有人舉出十九世紀來作為目擊着議會政治之失敗的證人。

議會政治的無能，衆人都明白了；議會政治的缺點和代議制度的固有弊害是異常明顯的，將它們作過批判的研究的少數思想家如彌爾³⁷ 奈渥爾德斯 (LEVERDAYS)等不過以文字來表示一般人民的不平罷了。實在要指定少數人並且對他們說：“請你們製造法律來規定我們一切活動的範圍，縱然你們自己對它們一點都不知道，也不要緊！”這樣辦法的荒謬，並不是不容易知道的。

我們漸漸知道了所謂多數政治也不過是把一切的國家事務委之於一般毫無定見，只在議會和選舉委員會中占大多數的人們的手中罷了。

人類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方法，而且現在已經找到了。

萬國郵政聯合會，鐵道聯合會，以及各種學術團體已經把自由合意足以代替法律的這個好例子指示給我們了。

到了現在，凡散處在各地的團體，爲着某一件事情要聯絡起來，也用不着選出幾個“無所不能的人”，組織一個國際議會來處

³⁷ J. S. MILL (1806—1873), 詹姆士的兒子，英國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

——譯者。

置一切，並向他們說：“你們替我們議定法規罷，我們是要服從的”。他們採用另一種辦法。倘使在不能直接集談，用通信方法不能彼此合意的時候，便遣派熟悉這個問題的委員赴會討論，並且吩咐他們說：“如此這般的問題，務必要勉力達到合意的地步；我們希望你們帶回來的不是法規，而是合意的提案；至於提案之承認與否，却由我們自己決定。”

這便是全歐，美的大的實業公司，學術團體及其他各種協會所採取的方法。便是將來的自由社會也應該採用這個方法。既要實行充公，而一面又要保存國會代議制度的原理是絕對不可能的。建築在農奴制度上面的社會必不能脫離君主專制政體；建築在工錢制度和資本家掠奪民衆上面的社會必定不能脫離議會政治。然而自由社會——恢復了共同的財產的自由社會，必定要在自由的團體和各團體的自由聯合中，尋出與歷史的新經濟現象相和諧的新組織來。

每一個經濟現象必有一個與它相合的政治現象。要推翻私有財產制，同時不去尋求一個政治生活的新方式，到底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

充公

I

據說大富豪羅斯齊爾德³⁸在1848年法國發生革命的時候，看見他的財產有點危險，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說：“我完全承認我的財產是靠了別的無數的人幫忙積蓄起來的；可是倘使把我的財產分配給那麼多的歐洲人，每個人也不過得着四個先令。好罷，無論誰要向我討還這四個先令，我隨時都可以拿給他。”

這個大富豪把話說了以後，他仍舊逍遙自在地在弗蘭克福 (Frankfort——在德國)的大街上散步。偶爾有三四個過路的人向他要他們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錢給了他們。他的計策果

³⁸ ROTHSCHILD 一姓在十九世紀歐洲銀行界中佔着極大的勢力，是一個豪富的猶太的家族。這裏指的是 JAMES DE ROTHSCHILD (1792—1868)，他創辦巴黎銀行。1822年他任奧匈駐巴黎總領事，給路易·腓力布的政府幫過大忙。——譯者。

然成功了。羅斯齊爾德一家至今仍舊保持着他們的財產。

那些狡猾的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想法，他們說：“呵！充公！我也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把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處讓各人自由取用，並且把那些最好的搶去就是了。”

這種取笑的話其實並沒有根據，並且也是錯誤的。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把大衣拿來這樣地分配，雖然我們也可以說便是這樣的辦法，對於那些凍着的人也有一點好處。我們並不想把羅斯齊爾德的財產拿來這樣地分配。我們預備做的是把社會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十分合宜，使得這世界中的每個人都有學到一種有用的職業，而且還能夠熟習這種職業的機會，其次是應該讓他自由地作事，不必要得到什麼主人的允許，也不必把他的生產的大部分送給地主和資本家。至於羅斯齊爾德或范德貝爾特³⁹諸人的財產，只合供我們組織這種共同生產制度的需用罷了。

在將來農人耕田不必再拿他的出產品的一半獻給地主的時
候，在那改良土地使收穫豐饒的機器可以由耕田人自由使用的
時候，在工場內工人不再為獨占者利用，而得盡力為社會製造物
品的時候，——那時我們可以看見勞動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

³⁹ 范德貝爾特一家(VANDERBILTS)是美國的富豪。父親 CORNELIUS (1794—1877)是一個著名的財政家。長孫 CORNELIUS(1843—1899)又是一個有名的企業家，曾任幾個鐵路公司的總理。——譯者。

充足的飲食吃了；而羅斯齊爾德和其他的掠奪者却早已不存在了。

在那個時候也沒有人爲着那點少得只值他的生產的小部分的工錢，而出賣他的勞力了。

反對我們的主張的人會說：“這固然很好，然而羅斯齊爾德這類人也可以從外國跑進來的。譬如一個人在中國積了億萬的財富，然後跑到你們中間來，你們又有什麼法子阻止他呢？你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雇用僕人和工錢勞動者——不許他掠奪他們，利用他們的勞力來發財呢？

“你們不能使全世界同時發生革命。那麼，你們不是要在邊境上設立稅關，檢查一切行人，並且沒收他身邊所帶的金錢麼？——安那其主義的警察向着旅客放槍——這真是奇觀呢！”

這種議論根本就有一個大錯誤。發這種議論的人完全沒有考究過有錢人的財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要是他們稍爲想一下，他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財產是從貧民的窮苦中來的。沒有窮人的地方，也就沒有掠奪窮人以自肥的富翁。

我們看看中世紀，那是大富豪勃興的時期。

一個封建的領主占領了一塊肥沃的土地。然而這塊土地上沒有居民的時候，這個領主仍還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對於他並沒有什麼貢獻；好像他有着月球裏的一個地方一樣。

我們這個領主怎樣去發財呢？他去尋找農夫——尋找那些貧窮的農夫！

假若每一個農夫都有一塊土地，不必繳納什麼租稅，並且還有耕種上所必需的器具和資本，那麼，誰肯去耕種領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顧他自己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却還有許多貧窮的人。他們是受了戰爭，洪水和瘟疫的摧殘以後才變成貧困的。他們沒有耕田的馬，也沒有鋤頭。（在中世紀鐵價異常昂貴，而馱馬更值價。）

那些貧民無日不想努力改善他們的情形。不用說有一天他們在路上，在領主的地方看見了一塊牌子，用他們所能夠了解的符號寫着：那些願意在這境內居住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來建造房屋，耕種田地，並且一部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內，得免納租稅。這年限是用許許多多的十字符號來表示的，那些農夫能夠了解這些十字的意思。

這樣，那許多貧民便來到領主的土地上住下來。他們修道路，排沼澤，建村落。過了九年或十年，領主便開始向他們徵稅了。再過了五年，他又要增加他們的租稅了。隨後領主又把地租增加到兩倍，那些農夫只有服從，因為到處都是一樣，他們不能夠在外面找到較好的地方。後來領主們又製造出了法律，靠着這法律的力量，農夫們的貧困就漸漸地變成了領主們的財源。

掠奪農民的不僅是領主，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掠奪者也跑到鄉村裏來了。農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們的數目也增加一倍。

這便是中世紀內富豪勃興的情形。我們再看現在的情形是不是和從前一樣麼？假使農夫們都有着可以自由耕種不納租稅的土地，那麼，誰還願意出五十鎊的金錢去哀求“大人老爺們”賞給一小塊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占了他的出產的三分之一，他們還肯擔負麼？難道他們還願意實行那“折半制度”(Metayer System)把他的收穫的一半獻給地主麼？

然而他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只要他們能夠靠着耕種土地肥飽地主來維持自己的貧窮的生活，那麼，無論何種條件，他們都肯承認。

目前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紀的情形一樣，農夫的貧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財富的泉源。

II

地主的財富是從農夫的貧困得來的，資本家的財富也何嘗不是從這同樣的財源得來！

例如一個中產階級的市民，他有二萬鎊的財產。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千鎊，在目前這樣奢侈的社會裏這簡直是一筆很小很小的數目。然而到了第十年年尾他便一錢莫名了。所以他

如果是一個注重實際利益的人，他便把他的財產放着不用，另外去找一點小小的常年進款。

這在現社會中是很容易的事，因為城裏或村裏，都住滿了那些連一個月甚或兩星期中間的生活都不能夠維持的勞動者。這位先生便開辦了一所工廠。倘使他在外面有一種“能幹”的聲譽，那麼銀行又會另外借二萬鎊給他；他有了這四萬鎊，便可以雇用二百五十個工人了⁴⁰。

倘使這附近的人的每日生活都不成問題，既不必憂慮麵包缺乏，而日常必需的物品也頗充足，那麼，誰還願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產值一克郎（法文本作五，六法郎）以上的物品的時間，用來替資本家作工，去換取每日半個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的工錢呢？

不幸——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都市的貧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鎮內都住滿了極可憐的貧民；他們的小孩終日叫喊着要吃麵包。所以在工廠還未設備完善的時候，他們便連忙去報名了。一個只要雇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也有三百人圍在工廠的門前。要是廠主有普通的辦事才幹，在他的機械動轉以後，一年中間他便可以從他所雇用的每個工人身上獲得四千鎊的淨

⁴⁰ 四萬鎊法文本作五十萬法郎；二百五十個工人法文本作五百個。——

譯者。

利。

這樣，他便可以積起小小的財產了，要是他選擇了一種更有利的事業，並且自己又有辦事的才幹，他便可以把他所掠奪的人的數目增加一倍，同時他的收入也會增加一倍的。

於是他便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他便可以請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的巨頭以及府廳，官衙，警察局的官僚先生們，——來赴他的宴會。他用他所有的金錢，又可以“和別人的金錢結婚”，驅進更多的金錢來，漸漸地他又可以為他的兒孫取得有利的地位。後來他又得着政府的保護和特許，不過政府要他出點錢供給軍隊或警察；他的金錢又生出更多的金錢來；後來發生戰爭，甚或戰爭的謠言，或者從事證券交易所的投機事業，這些都是他搶錢的大機會。

美國大財產的十分之九都是那種得着國家幫助的大規模的欺騙的結果。（如亨利·喬治⁴¹在他的社會問題一書中所說的。）在歐洲各國（無論是君主國，或民主國）中的財產的十分之九，也是由這同樣的原因生出來的。要成一個大富豪，並沒有兩條路可走。

⁴¹ HENRY GEORGE (1839—1890), 美國經濟學家和新聞記者。“土地單一稅”運動在美國的主倡者，反對土地私有制度最力，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譯者。

致富的秘訣是這樣：去找飢餓窮苦的人，每天給他們半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叫他們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十法郎）的物品；用這種方法把錢積蓄起來，然後再靠着國家的幫助做些大的投機事業，使得金錢不斷地增加。

我們也不必來說那些小的財產，經濟學家以為這是由於先見和節儉而積起來的，其實我們知道積蓄起來的金錢若不用去掠奪貧民，這樣的積蓄絕對不會生利的。

我們就拿一個鞋匠為例，他靠自己的工作獲得很多的錢，他又有許多主顧；他又能拚命地節省，每天可以存起十八便士乃至兩先令；一個月可以存到兩鎊。

假定這個鞋匠並不患病，他雖然拚命節省，每天却不肯餓着肚皮；又假定他不結婚，他沒有兒女；他也不會患肺病死掉；假定一切情形都和你們所想的一樣！

好，就這樣，他到了五十歲也不能夠存到八百鎊；在他不能夠作工的時候，他要靠這筆款子來支持他的殘年，他是不能夠的。這確實不是積蓄財產的方法。然而假使這個鞋匠每次存了幾個便士，便立刻拿去存在儲蓄銀行裏。儲蓄銀行又把這筆款子借給資本案，那些資本案恰恰要“雇用勞動者，”這就是說要掠奪貧民。一方面這個鞋匠又收了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做徒弟，這個窮人還以為要是五年以後他的孩子學成了手藝能夠自

謀生活，他自己便是很幸福的。

同時這個鞋匠也沒有因為雇了徒弟便受到損失。假若他的生意忙，他便要收第二個徒弟，後來又收第三個。漸漸地他又雇了兩三個工人來——這自然也是貧民，他們每天做出值五先令的東西，然而只得到半克郎的工錢，便非常感激了。倘使這個鞋匠“運氣好”，這就是說倘使他是一個很機敏又很卑鄙的人，他每天便可以從工人和徒弟的身上掠取一鎊的錢，這還要超過他自己生產的東西的價值。他便能夠擴充他的事業。漸漸地他就成了富翁了。他不感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了，也不必為日用的衣食而勞動了。他還要把他的小小的財產留給他的子孫。

這便是人們常說的“經濟致富，勤儉持家。”其實不過是掠奪貧民罷了。

至於商業，似乎是在這規則以外的。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人從中國買了茶葉運到法國，在他的本錢之外，獲得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他並沒有掠奪過什麼人。”

其實這情形仍還是一樣的。要是這個商人把茶包放在背上自己運過來，倒很好。在中世紀初葉通行的外國貿易方法確實是這樣的，所以那時富人的財產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多。中世紀的商人長途跋涉，冒險航海，所得的金錢却是很少，並且這微小的金錢也很不容易得到；他們並不是為着金錢的緣故才來做這

種事情；他們愛旅行愛冒險的心還要勝過他們的愛金錢的心。

到了現在，方法更簡單了。只要有點資本的商人，他想致富，也不必離開他的桌子。他只向代理人打個電報說要買一百噸茶葉，便行了。貨物裝上了船，在幾個星期以內便可以運到，倘使這是帆船，在三個月以內也可以運到。他的茶葉和船都是保了險的，所以在中途也不怕發生危險事情；他費去了四千鎊的資本，可以得到五六千鎊以上的錢；要是他不販賣新奇貨物做投機事業（成功時可得兩倍的利，失敗時一文也不會剩下），他那五六千鎊是靠得住的了。

然而，他怎樣能夠看見那些甘願飄洋過海，往來中國，忍耐苦痛的賤役，爲着微少的工錢就置生命於不顧的水手呢？他又怎樣能夠看見那些爲飢寒所迫，圖少許工資，來替他上貨卸貨的苦力呢？那些都是又餓又冷的窮人。試走到海港地方去，並且走進碼頭上的小飯館小酒店去看看那些來求餬口的人。他們在天一明便羣集在碼頭的入口，希望能夠在船上找點工作做。再看那些水手有時幾星期或者幾個月得不到工作，一旦被雇去航行遠洋，他們還以爲是異常幸福的事。他們一生大概以船爲家，長久在海上生活，他們住的船也是常常改換的，他們到後來終於葬身於渺渺波濤之中。

你們再到他們的家裏，就可看見他們的妻子兒女穿着襤褸

的衣服，他們不知道怎樣活下去，只有等着丈夫和父親歸來。你們看見這種情形，那麼，你們的疑問總可以得到解答罷。

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們隨意去選罷；你們去考察一切財產的起源，不問大小，不問是由商業，金融，工業，土地得來的。你們一定會發見，富人的財富總是從貧民的窮困中生出來的。這便是安那其主義的社會不怕羅斯齊爾德搬進來居住的理由。假若社會中的各個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時的生產勞動以後，誰也有權利享受文明所帶來的一切快樂，並且還有權利享受科學藝術所貢獻與人類的更深的娛樂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學和藝術便可以得到。）他們絕對不會爲着微少的工錢，出賣他們的體力了。那時絕對沒有人願意爲着增加羅斯齊爾德的財富，去替他作工了。他的金幣不過是許多金屬的碎片而已，他可以拿來做別的用，然而要用它來增加他的財富，却是斷乎不行。

這樣答覆了上面的反對論，同時也把充公的範圍表示出來了。凡是能夠使人（不管是金融家，工業主或地主）壟斷他人勞力的產物的一切東西都應該充公。我們的方式是簡單而易了解的。

我們並不想剝取任何人的大衣，我們只想給勞動者以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常常因爲缺乏這些東西的緣故，便不得不墜入掠奪者的陷阱裏面；我們還要盡我們的全力來使任何人都

會感到缺乏什麼，使任何人都不會爲着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兒女的緣故，不得不出賣他的腕力。總之，這樣的事，在將來是不會再發生的了。

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充公的意義；這也就是在革命時期中我們應該盡的責任；我們知道這革命的到來，並不是一二百年後的事，在最近的將來，革命便要來了。

III

安那其主義的大體觀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獨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遊蕩當作最上理想的人們中間，得到了很多的共鳴，而且還比我們所想像的多得多。我們的朋友常常警告我們說：“你們也不可以走得太遠了！人類不能在一天裏面便改變過來的。你們所說的充公和安那其的計畫不可做得很急，否則，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險。”

然而我們對於充公的憂慮正與這個意見相反。我們是恐怕充公不能盡量地做去；恐怕實行的規模太小，以致不能繼續長久。我們怕的是把革命的熱情半途抑壓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澈底做去；這樣的辦法，既不能討好任何人，並且還會生出可怕的社會混亂，阻止了社會的常態的活動，完全把生氣喪失了——這種不澈底的辦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並且一

定會幫助反動勢力的復興。

實在，在近代國家中，已經建立了許久的各種關係是不能夠部分地改革的。現在的經濟組織正像是許多車輪之中又包含着車輪那樣——這種機關是異常複雜，並且互相綜錯的，倘使不攪亂全體，只求一部分的改良，這是一定做不到的。當我們著手把一些東西充公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立刻了解這種道理的。

我們姑且假定在某一國內已經實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像從前就有人提倡過許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財產收歸社會所有，工廠則完全不管，（如亨利·喬治所主張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內，房產已歸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歸私人所有；又或在一個工業中心地，工廠已收歸公有，但土地仍讓私人領有着。

在這些情形裏仍會得到同樣的結果——這便是工業組織之可怕的瓦解，無法依照新方針來改革工業組織。工業和金融完全阻滯了；甚至要回復到正義的第一原則也不能夠；而社會也不能保持其全體的和諧。

假若農業脫離了大地主的束縛，而工業仍舊是資本家，商人和銀行的奴隸，那麼，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出來。現在的農人所苦的，不僅是要納地租給地主，而且還要受着那四方八面來的現社會情形的壓迫。他也會受到商人的掠奪，那個商人拿了土地

鋤頭要他出半克郎買去，其實就造成這把鋤頭所費的勞力算來，它的價值還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個蘇）呢！國家也向他徵稅了；國家沒有那一羣可怖的官僚階級是不能夠存在的，而且還要維持耗費極大的軍隊，因為各國商人不斷地競爭市場，有一天會因為亞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奪事件，起了一點小糾紛，結果便引起一場大戰。

而且農人因鄉村人口的減少也要受苦的；鄉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製造奢侈品的資本家的暫時增高的工錢的誘惑，或者受着活躍的都市生活的引誘，羣集到大都市來。還有工業的人為的保護，外國的工業的掠奪，證券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產機械的困難等等，——這一切的作用現今都是不利於農業的。總之，農夫所苦的，不僅是地租，而且是整個基礎在掠奪上面的複雜的現社會情形。因此縱使土地的充公實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種田地，使土壤得盡量發展，得到最大的收穫，而且又不納地租，然而事實上農業也只能享着一時的繁盛，（其實這是極不可靠的，沒有這樣的事，）後來一定要退到現在這樣的慘狀的。一切又非從新開始不可，並且還增加了許多困難。

就工業而論，道理也是一樣。把工廠交給工人，如像前面所說把土地收歸農人共有一樣。廠主雖然沒有了，然而仍舊讓地主私有土地，銀行家私有金錢，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

那一羣依靠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遊民和幾千百個中間人以及那個養着無數官吏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這樣一來，工業自然會陷於停頓。在多數貧苦農民中間，實在找不出工業製造品的主顧來。工人自己沒有原料；又因為通商的阻止和工業遍於世界的緣故，他們的製造品不能輸出；製造者便覺得不能夠競爭下去了，於是無數的勞動者又被驅逐到街上來。這些迫於飢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幾個正要預備來掠奪他們的陰謀家面前低頭了。他們只要得着允許他們作工的保證，甚至恢復了舊的奴隸制，他們也承認的。

或者，更進一步，把地主也驅逐了，工廠與製造所自然仍歸工人管理；可是經手買賣的中間人依然存在；他們便要來榨取製造者的生產物，並且還要在大的商業中心地做穀類，麵粉，肉類，雜貨等等的投機貿易。生產物的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麵包，而同時大的製造業中心地所出產的奢侈品又找不到買主，（如里昂的絲綢沒有人要了）——這時反革命便會立刻發生。於是殺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會被槍林彈雨掃蕩淨盡。而政敵的處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斷地發生，恰如1815年⁴²，1848年和1871年法國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樣。

文明社會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綜錯的；不去變更全體只來

⁴² 這裏似乎應該作1793年。——譯者。

改良一部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攻擊私有財產的時候，不論是工業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們應該攻擊到全體。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着這一點。

而且，縱使我們自己希望只實現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時我們會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神聖的財產權”的原理動搖了以後，無論什麼理論學說都不能夠救它了。這一個地方的田野奴隸，那一個地方的工業奴隸，都要起來推翻私有財產，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個大都市（如巴黎）單把住宅和工廠充公，那麼同時對於銀行家以從前公債的利息這個名義向公社徵收二百萬鎊稅款的事，勢必加以拒絕。這個大都市又不得不和農業地方接觸，它的影響一定會使農人脫去地主的束縛。並且爲着使市民容易得到食物和工作的緣故，特別爲着防止糧食糜費的緣故，鐵道也應該收歸公有。還要防備那些收買穀糧的投機者，不可像1793年巴黎公社⁴³（插圖8）那樣吃了那種人的虧，所以物品的貯藏和生產物的分配這些事，非由都市自己辦理不可。

然而有些社會主義者還要想建立一種區別出來。他們說：“自然哪，土地，礦山，工廠非充公不可；這些東西是生產工具，

⁴³ 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機關，在法國大革命中漸漸成了指導革命運動的一個巨大力量。1871年的巴黎公社，則是勞動者的革命政府。——譯者。

看做公共財產是正常的，但是消費品(食物，衣服，住宅等)則應該視作私有財產。”

這個微妙的區別其實還不及一般人的常識高明。我們不是那些住在森林中靠樹枝避蔭的蒙昧人。文明人是離不開屋頂，居室，火爐，臥床的。不錯，臥床，居室，房屋確實是那般不生產的人的懶惰的家庭。至於勞動者的溫暖而又明亮的居室，不過是他的生產器械，恰與其他的器具，機械一樣。這居室便是他積蓄明日工作所需要的體力的地方。勞動者的休息，好像是機械的每日修繕一樣。

這樣的議論，應用到食物上去更易瞭解。那些建立上述充公的區別的所謂經濟學家恐怕也不得不承認機械中燃燒的煤與原料本身一樣，皆是生產上的必需。同樣，沒有食物，人的機械也就不能夠動作；然則，我們怎麼能夠把食物一項從生產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呢？這是宗教的玄學之遺物嗎？富豪的盛饌誠然是過於奢侈的東西；然而勞動者的食物不過是生產的一部分，恰與蒸汽機中所燒的煤一樣。

說到衣服，這種道理仍是一樣。我們並不是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蒙昧人。要是那些在生產品與消費品中間定下區別的經濟學家自己奉行着新幾內亞蒙昧人的風俗習慣，那麼，他們的反對論我們還可以了解。那些一個字都不會寫，身上也不穿

襯衫的人，便沒有資格來判別襯衫和筆兩樣東西的區別。倘使我們現社會中的太太們所穿的華麗衣服應該算在奢侈品之列，然而許多麻布的，棉布的，毛織的衣服却是生產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們作工時穿的襯衫和褲子以及工作完畢後穿的短衣，都是他們不能離開的東西，恰如鐵鏈之於鐵砧一樣。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然而民衆心目中的革命却是這樣。當他們把政府推倒以後，他們最先便要找尋他們的相當的住所，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確實保證，——並不必付什麼租稅給資本家。

民衆是不會錯的。民衆的手段還要比那些在生產工具與消費品中間劃出許多區別的經濟學家的手段更合於科學，民衆知道這革命的出發點。他們要建立名實相符真正合於科學的唯一經濟科學的基礎，使經濟學值得稱爲“人類欲求及其滿足的經濟方法之研究”的科學。

第 五 章

食 物

I

假使將來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則不僅它的目的，連它的方法也是和從前的一切暴動不同。要達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來法國的三大民衆運動，雖然在許多點上互有差異，它們却有着一個共同現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來顛覆舊的制度，爲着這個主張，他們耗費了他們的心血。然而在擔負了劇烈的戰爭之後，便湮沒無聞了。那些多少有點誠實的人又聚集起來成立一個政府，企圖建設新的制度：如 1793 年的共和國，1848 年的勞動，1871 年的自由公社。這個政府浸染着雅各賓派的思想，故以討論政治問題爲第一要務，像政治機構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國家與教會之分離（即政教分離），以及公民自由權等都是它極重視的問題。誠然，當時有工人俱樂部來監視新政府人員的行動，並常以工人的意見來督責他們。然而便是在這些俱樂部中，不問他們的首領屬於

中產階級或勞動階級，中產階級的思想却總是占着最大的勢力。他們長久地討論政治問題，反把麵包問題忘記了。

在那樣的時期中偉大的思想，震動全世界的思想發生了。許多動人的話語被說出來，經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還激動着我們的心。然而平民仍還蜷伏在陋巷裏挨餓。

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工業不免要停頓——生產物的流通受着阻礙了，資本也隱藏起來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時並無所恐懼，縱然他們不做投機事業來掠奪他們周圍的貧苦人，他們還可以靠着賺取利息金來生活。至於工錢勞動者，他們簡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窮乏不時在敲着他們的房門。

飢饉遍於國內——這樣的飢饉便在舊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見的。（插圖9）

“吉隆特黨人⁴⁴使我們飢餓呀！”這是 1793 年的勞動者陣營中的呼聲，因此吉隆特黨人便被送上斷頭台去了，政權完全落在“山嶽黨”⁴⁵和公社的手中。公社實在熱心研究麵包問題，

⁴⁴ Les Girondins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革命黨內的溫和派，是穩健的共和主義者，南部議員大都隸屬此派，以法國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後失勢，主要黨人皆被處死刑。——譯者。

⁴⁵ 山嶽黨人，是當時的左派革命黨，領袖是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等，因為在議會中的座位最高，故被稱為山嶽黨人。——譯者。

它會勇敢地努力來養活全巴黎的人。在里昂，福協和柯羅·德爾布瓦⁴⁶建立了城市的穀倉，然而要充實這些穀倉所費的款項常常不夠。市議會曾努力想收集穀物；私藏麵粉的烘麵包人也被處死刑了，可是平民仍還缺少麵包。

於是他們轉而攻擊王黨的謀叛人，歸咎於他們。一天殺了十二個或十五個，——僕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樣地被殺了，特別僕婢被殺的很多，因為公爵夫人們都已逃到柯布林茲⁴⁷去了。縱使每天殺掉一百個公爵，子爵，情形還是一樣地無望。

窮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錢勞動者沒有工錢是不能生活的，然而他們偏偏又得不到工錢。縱然橫屍千萬，對於他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因而人民漸漸覺得厭倦了。反動派向勞動者說：“你們所誇耀的革命，不過如斯而已。你們不是比以前更窮困麼？”富豪們漸漸鼓起勇氣，從隱匿的地方出來了。在飢餓的羣衆前，誇耀他們的奢侈。他們穿得像花花公子一樣，向勞動者說道；“來！這蠢笨的把戲已經夠了！你們從革命究竟得到些什麼？”

⁴⁶ J. FOUCHÉ(1759—1820),山嶽黨議員。J. M. COLLOT D'HERBOIS (1750—1796),公安委員會委員。——譯者。

⁴⁷ Coblentz 或 Koblentz, 普魯士的萊茵省分。這個德國小城當時成了王黨的陰謀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貴族都住在這裏。——譯者。

革命黨人心灰氣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後來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主張又歸於失敗，於是退到陋室裏去等待滅亡的到來。

反動又得着勝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變。革命已經死了，它只有去踐踏革命的屍骸而已。

白色恐怖⁴⁸開始了。血流得像河一般，斷頭機沒有一刻休息的時候，牢獄裏關滿了囚人；同時官爵位階又恢復舊制，像從前一樣地狂歡擺闊，誇耀於世。

這樣的景象是我們一切革命的標本。在1848年巴黎的勞動者爲着共和政體，忍受了“三個月的飢餓”。到了他們力竭的時候，他們還在6月裏作最後一次不顧危險的努力，——這努力是被淹沒在血泊之中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因爲缺乏戰士而消滅了。公社空講國家與教會分離的方法，而把供給人民的麵包的問題忽略了，到了後來，它才動手解決這個問題，却又太遲了。所以後來在巴黎，風流都雅的淑女和闊氣的紳士居然可以踢開同盟的市民，叫他們爲着微少的工資出賣生命，而他們“上等人”，這時却在時髦的酒店飯館中飽食逸居地過日子。

到後來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錯誤，開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遲了。日子已經過去了。凡爾賽的軍隊已經佔了城壘。(插圖10)

⁴⁸ 俄國及西歐革命黨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殺手段，謂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殺戮政策則稱爲白色恐怖。——日譯者。

“麵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麵包！”

別人要發誇大的宣言，穿金邊的制服，喋喋於政治自由——讓他們去罷！

但是我們自己要努力，使從革命的開始到最後的一日，在爭自由的各地方內，沒有一個男子會缺乏麵包；沒有一個女子同她的飢餓的同伴集在麵包店的門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惡的麵包；沒有一個小孩子會因食物的缺乏而變成瘦弱。（插圖11）

中產階級的思想常常侈說那些“偉大的原理”——其實不如說是大謊話。

至於人民的思想，却是使萬人都得着麵包。當那些中產階級以及染受了中產階級思想的工人們在“談天處”讚美他們的修辭學，“實際家”正在滔滔不絕地討論政府的形式的時候，我們（所謂“烏托邦的夢想家”）却不得不考慮每日麵包的問題。

我們可以大胆宣言：每個人都有取得麵包的權利，我們的社會裏的麵包已經很多了，足以供給萬人取用了；我們的革命要以“萬人的麵包”作口號，才能夠得着勝利的。

II

大家都說我們是夢想家。誠然，正因為我們是夢想家，所以

我們相信革命應該，並且它也能夠確實地保證萬人的衣食住，——這種思想是中產階級的市民（不論他是屬於什麼黨派）極不喜歡的。因為他們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飢餓得到了滿足，他們便不容易使人民服從了。

我們始終堅持着我們的主張：革命的民衆應該得着麵包；麵包問題應該放在其他一切問題的前面討論。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爲目標，那麼，它便會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結果；因為要解決麵包問題，我們必定要依據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無其他的解決方法。

將來的革命——恰如 1848 年的革命一樣——一定會在工業的大恐慌中爆發的。近五十年來世事沸騰，並且只有日趨險惡。萬事都向着這方面進行——新的國民又加入了國際貿易，來爭奪世界市場，戰爭和租稅也不斷地增加。國債，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規模的殖民計畫，件件都是向着那條路進行的。

現在歐洲有數百萬的失業工人。一旦革命爆發了，像火藥點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燒起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歐洲或美國一旦發生了革命的戰鬥，失業工人的數目立刻會加到兩倍之多。我們究竟怎樣來供給他們的麵包呢？

那些自稱爲“實際家”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有無切實的具體

研究，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曉得他們要維持工錢制度，所以我們對於他們所可期待的，不過組織“國民工場”和“官營事業，”把它當作養活失業者的一個方法而已。

國民工場開設於 1789 年及 1793 年；在 1848 年也用過同樣的方法；拿破崙三世居然以官營事業使巴黎無產階級滿意了十八年（這使巴黎至今還負債八千萬鎊和每人名下平均三四鎊的市政稅）⁴⁹ 這種“馴野獸”的絕妙方法，在羅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慣用的；古代的專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了的東西分一小塊給人民，因而乘機提起鞭子來敲打他們——因為這些緣故，自然那些“實際的”人物要費這種方法來把工錢制度維持到永久。我們既然還能夠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麼為什麼還要費我們的腦筋去想別的呢？

假若革命被誤引到這條路上去，那麼，一定會得到失敗的結果。

1848 年 2 月 27 日巴黎國民工場開辦時，巴黎的失業者僅有八千人，兩星期後竟增加到四萬九千人。不多時就會增加到十萬人，並且從各地方來的人還不算在內。

但是在當時法國的工商業所雇用的人數僅及今日人數的一

⁴⁹ 1904年巴黎的市債共2,266,579,100法郎；爲這債務的課稅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半。我們還知道革命時期中工業與貿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騷動。我們只就那些直接或間接依賴輸出業的勞動者，以及那般從事生產少數中產階級消費的奢侈品的勞動者的數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歐洲發生一次革命時，至少大半的工廠和製造所都要停頓的。於是幾百萬的勞動者和他們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來了。我們的“實際家”要用國家的救濟事業來免除這種慘狀；這就是說創設新工業拿工作給失業者做。

蒲魯東⁵⁰在五十餘年前便已指出來對於財產的最小的攻擊也可以使那基礎在私人企業和工錢勞動上面的社會組織完全瓦解，這是很明顯的。社會本身更握着生產的全部，並且不得不把它改造過來，使它適應人民全體的需要，然而這不是一天兩天甚或一個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產組織，當然要花費許多日子；但是在此時期中，幾百萬的人將失去了生活方法。那麼怎樣辦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實際的解決只有一個——即是向着那個正等待着我們的大事業大胆地邁進；我們不要去彌補那個被我們

⁵⁰ P. J. PROUDHON (1809—1865), 法國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 曾被人稱為“安那其主義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財產是什麼？”(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 1840)。——譯者。

自身弄得快要潰滅的時勢，却應該努力把生產改造，將它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面。

因此，爲了要實際行動，據我們看來，應該由人民直接起來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歸自己管理；對於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計算，一點東西也不要浪費，那麼，靠着此等積蓄起來的財源的幫助，所有的人都能夠安然渡過難關了。在這個時期中，應該一方面和工廠勞動者約定給他們供給原料，保障他們的衣食住，要他們作工來供給人民的需要。我們不要忘記當法國織出綢緞來裝飾德國銀行家夫人，俄國皇后及散德維爾羣島（Sandwich Islands）女王的時候，當巴黎製造出精美的裝飾品和玩具供給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時候，三分之二的法國農民甚至沒有明亮的洋燈和近代農業上必需的器械。像現在許多不毛的土地都應該竭力地利用，使之盡量發展；瘠土應當使其肥沃；便是肥土，在現在的制度下尚不能發揮其固有生產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將來也應該用集約農法（Intensive Culture）來耕種培養，如對於菜園和花圃的辦法一樣。除此而外，再無其他的實際解決方法了；不問我們對它有什麼好惡，時勢所趨是要使它實現的。

III

現代資本制度的最顯著的特質便是工錢制度，我對這制度

可以簡單地說明一下：

假定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集團有着必要的資本，開設了某項工業；他設法把原料供給與工廠或製造所，規定生產的方法，付給一定的工錢與雇工，而掠取其剩餘價值（或利益）；他說，這種利益是來報酬他的經營事業的勞力，保證他所冒的危險，並且準備補償對於貨物市價的變動的。藉着這種口實，他便佔有了這種利益。

現在壟斷着資本的人爲着維持這種制度起見，多少也會有一點讓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給工人，或者甯肯創出一種計算工錢的滑尺，使物價漲高時，工錢也隨之增高。簡言之，他們爲着要依舊支配工業而且獲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見，便不得不忍受一點犧牲。

據我們所知，集產主義雖然主張把現社會秩序大大地變革一下，但是並不廢除工錢制度。對於勞動者，只不過拿國家（這即是說全國的或一個地方的某種形式的代議政府）來代替個人的雇主罷了。在集產制度之下，國家的或地方的議員，以及委員官吏等支配着工業。他們手裏握着使用生產的剩餘（說是爲着萬人的利益）的權利。並且集產主義又在通常的體力勞動者和熟習一種技術的人二者中間劃出一個極微妙而又極大的區別。不熟練的勞動在集產主義者的眼中看來，不過是簡單的勞動。

而職工，機械師，工程師，科學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複雜的勞動，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錢。然而無論體力勞動者也好，職工也好，紡織工人也好，科學家也好，都是國家的工錢奴隸——至於近來常說的“都是官吏，”不過是說來裝飾門面罷了。

那麼，將來的革命對於人類的大貢獻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錢制度不能繼續存在，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便是消滅工錢奴隸制度的利器，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縱使我們承認在繁榮和平的時代漸次實施的集產主義的改革是可能的，（實則在這樣情形之下，究竟能實現與否還是疑問。）然而在革命的時期，當數百萬飢餓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訴諸武力的呼聲一齊發生的時候，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動搖工業的基礎，而人民爭取財產的革命必然會使生產和交易麻痹停滯。國庫裏的數百萬公款還不夠支付幾百萬失業者的工錢。

我們也不能夠過於堅執着這一點。新基礎上的工業的改造（我們要指出這個問題是異常重大）不是在幾天之內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夠忍受數年的飢餓，去為那些維持工錢制度的理論家盡力。為着渡過這種危急時期起見，他們便會要求他們平常在那樣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糧食。

空講忍耐是沒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歸共有，那麼，他們便要去搶劫麵包店。

假若這時人民還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對付他們面前的一切，他們就會被槍斃。爲了要實行集產主義，無論付什麼代價，都必須要把“秩序”維持起來。——秩序，訓練，服從呵！資本家不久便會明白當人民被那些自稱爲革命家的人槍斃的時候，革命本身會漸漸成了羣衆的眼中釘，於是資本家便會來援助那些秩序的防衛者。——縱然這些人是集產主義者，也不要緊。依這樣的行動方法，資本家後來又會想出撲滅集產主義者的方法。倘使照這樣“秩序便恢復了，”其結果也是容易預料的。那些“秩序”的擁護者不以槍斃“兇徒”爲滿足，還要找出“亂民的巨魁”。他們重新設立裁判所，僱用劊子手，把最熱心的革命黨人送上斷頭台去。1793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出來。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世紀反動就是這樣地得着勝利的。最初埃伯爾派⁵¹和“瘋狂者”⁵²被殺了——米涅⁵³記着當時的爭鬥，還

⁵¹ 所謂埃伯爾派 (Hébertistes) 是指埃伯爾 (J.- R. HEBERT, 1757—1794) 和他的同志們。(埃伯爾是巴黎公社的副檢查官，又是當時最激烈的最通俗的報紙 *Père Duchesne* 的主筆。) 他們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黨。他們領導着巴黎公社，擁護民衆的利益，攻擊舊勢力，舊制度和右傾的政黨。他們在1794年3月24日被處死刑。——譯者。

稱這些人爲“安那其主義者”。⁵⁴ 隨後丹東派⁵⁵ 也上了斷頭台；當羅伯斯比爾一派把這些革命黨人殺死後，他們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斷頭台。因此人民漸漸對流血感到了厭倦，又看見革命已歸失敗，便灰心短氣，低頭束手任反動派作惡。

所以我們說，假若“秩序恢復了，”社會民主黨便要絞殺安那其主義者了；費邊派⁵⁶ 也要殺戮社會民主黨人了，再等到費邊派被反動派殺戮的時候，革命便歸於消滅了。

然而一切事實都使我們確信人民的推動力是十分充足，可

⁵² “瘋狂者”(Les Enragés)即雅各賓黨中的極端派。——譯者。

⁵³ E.-A.-M. MIGNET 是法國歷史家，著有法國革命史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24)等書。——譯者。

⁵⁴ 當時吉隆特黨人布里索 (J.-P. BRISSOT, 1754—1793) 把激烈的革命者稱爲“安那其主義者”，他們不屬於一黨派，他們散佈於全法國，——譯者。

⁵⁵ 丹東派 (Dantonistes) 是丹東 (G.-J. DANTON, 1759—1794) 和他的友人(如 C. DESMOULINS, PHELIPPEAUX 等)。丹東 是山嶽黨的三大領袖之一，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後來漸漸右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羅伯斯比爾送上斷頭台。——譯者。

⁵⁶ 費邊派 (Fabians) 指隸屬英國社會主義研究團體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1884年成立)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韋伯夫婦等都是這派的領袖。——譯者。

以成就偉大的事業；並且當革命爆發的時候，安那其共產主義的思想會得到勝利。這並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思想，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們的耳裏來的，當人們漸漸地明白其他的解決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時候，安那其共產主義者的數目便愈見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動力是十分堅強，那麼一切事情都會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進行。暴動的都市的民衆不再採用第一天搶劫麵店，第二天便受餓的方法了。他們要占領倉庫和家畜市場——其實，還要占領一切的糧食貯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會自動地團結起來，組織志願隊，把各倉庫，各店舖的物品統計起來，作一個大概的目錄。

假使這樣的革命在法國，（即是說在巴黎）爆發了，那麼，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公社便應該知道巴黎現在還不曾知道的一切（它雖有着統計委員會也無用處）以及它在1871年的圍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糧食的數量。在四十八小時以後便應該有數百萬本表冊印刷出來，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數量計算得十分精密，並且還把貯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記載得異常清楚。

各里，各街，各區都組織了志願隊（糧食志願隊），各隊員互相聯絡，協同勞動，進行得很有順序。只要雅各賓黨的槍刺不在半途來妨害他們，只要那些自命為“科學的”理論家不插進來胡鬧，

結果總是很好的。那些理論家只要他們沒有威權，沒有勢力，便讓他們隨便表示他們的糊塗的理論也是無妨的。那種可讚嘆的團結心是民衆固有的，特別在法國國民的各社會階層中此種團結尤其發達，然而少有機會來發揮實行；即如在像巴黎那樣的大都市，在革命的當中，便會發起自由勞動者的大規模的同業公會，預備來把必需的食物供給與一切的人。

讓民衆去自由行動，在十天以內供給食物的方法一定會整頓到很可讚嘆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見過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理沒在文書堆裏的人，才會疑惑這種說法。說起那個“偉大的被誤解者”（即人民）的組織的天才，這在巴黎的巷戰時代，或在倫敦船塢大罷工的時候⁵⁷（當時還要養活五十萬的飢餓者），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凡是當時在巴黎或倫敦曾身歷其境的人，會告訴你們說，他們的團結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無能比起來不知要超過若干倍。

縱使我們會因此受到兩星期或一個月的某種程度的不便和混亂，也沒有甚麼要緊。因為對於大多數的人民，和他們從前的情形比較起來，總算有一點改善的地方。並且在革命時期，一面熱心討論時事，一面吃東西，雖是一片麵包，一塊乾酪，吃起來却分外鮮美。

⁵⁷ 這次大罷工發生於1889年，勞動者是得到勝利的。——譯者。

無論什麼時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發生出來的制度，總比那些頑固的理論家坐在衙門裏或古書堆中，發明出來的東西好得多。

IV

大都市的人民爲時勢所迫便會起來占領一切的糧食，最初占領目前最急需的東西，然後漸次把其他的物品收歸公有，使全體市民的需要得以滿足。這事的實行當然愈快愈好。實行愈快，慘苦愈少，紛爭也愈少。

然而社會應該基礎在什麼東西上面 才能夠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們對於食物應得的部分呢？這便是我們最先遇到的問題。

我們回答道，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方法。要公平地建設共產制度，只有一個方法；只有一個方法才能夠滿足我們的正義的本能，它同時又是實際的。這就是歐洲農民公社採用的制度。

例如一個農民公社，不論它在什麼地方，甚至在法國，雖然那裏的雅各賓黨曾用全力來摧殘公社的習俗也不要緊。假若公社有森林和雜木林，那麼，只要在樹木很多的時候，任何人都可以隨他自己的需要來取用，要是他的鄰人們不來干涉他，便不會有什麼妨礙。至於時常缺乏的喬木，他們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場地的情形也是一樣；在十分充足而且有餘的時候，無論各戶家畜在牧場上的消費量若干，無論在牧場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頭，都是毫無限制的，只要東西不缺乏，則飼養地面並不分開，芻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兩國的大多數，只要有共有牧場地，必定實行這種制度。

在東歐諸國凡有大樹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農夫們可以隨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種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對於樹木及土地應有的部分，可以無限制地取用，但是當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時候，像現在俄國所發生的一樣，那麼，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戶的需要而分配。⁵⁸

總之，這制度是這樣的：如果社會所有的物品是很豐富的，則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沒有定額，也沒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歐洲的三萬五千萬居民中，至今還有二萬萬人仍然實行這種自然的共產制度。

還有一件我們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這種制度來分配的，這種物品異常豐富，這便是自來水，它可以自由供給與各用戶取用，並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給不會有缺乏之虞，自來水公司便決不限制各用戶的消費量。任憑各人自由取用。然而當天旱，水的供給有不足

⁵⁸ 參看互助論第七章。——譯者。

之虞時，自來水公司便會在報紙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廣告，使市民知道這事，市民也就會減少水的消費量，避免胡亂耗費。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時候，又應該怎麼辦呢？除了定量供給而外，更無其他的方法。這辦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識來說，也是很正當的。1871年巴黎兩次被圍的時候，⁵⁹就實行這種辦法。

要指出這種定量分配制度怎樣實行，要證明這種辦法是很公平的，並且還要比現在的狀態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許多表來，也用不着詳細說明。什麼表，什麼詳細的敘述，既不能說服中產階級的人，也不能誘惑那些感染了中產階級的偏見的某一些勞動者，他們把民衆看作暴徒，以為政府一旦不來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蠻的暴徒立刻就會互相吞噬了。現在只有那些不會看見人民依照自己的發意而決斷而行動的人，也許會暫時懷疑一旦羣衆做了時局的主人，究竟他們能否依據極嚴正的公道與平等來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給一切的人。

⁵⁹ 第一次的圍城時期是從1870年9月到1871年1月，這是在普法戰爭中，法軍大敗，法皇拿破崙三世被擒以後。當時巴黎在共和黨人甘必大(L. GAMBETTA, 1838--1882)領導之下，組織國防政府，繼續抵抗普軍。巴黎被圍了四個月後才投降。第二次圍城是在同年5月。這便是巴黎公社的鬥爭。巴黎被圍了幾個星期後，終於在5月22日被國民議會的軍隊攻入。巴黎公社覆亡於血泊之中。——譯者。

假使你去參加民衆的集會，發表意見，說凡是美味（如野鳥之類）都應該貯藏起來專給游蕩的貴族食用，黑麵包則應該拿給醫院裏的病人吃，那麼，你一定會受到人們的叱罵。然而你只管在這民衆的集會或在十字街頭和市場等地方去演說：極精美的食品應該留給病人和弱者——特別是病人——取用；假使全城內只有五隻鷓鴣和一箱西班牙產的葡萄酒，那麼，便應該完全留給病人和病後未復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後還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夠全市民食用，則應該爲小孩們留起來；假使社會陷於非常窮困的時候，連最後的一片肉也應該留給小孩和老年人吃，壯年人吃的只有黑麵包。

總之，你再說，倘使某種消費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時候，那麼，感覺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這時說了，你一定會得到大衆的同意。

一生飽食的人決不能了解這個道理，但人民却能夠了解，並且也常常了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拋在街頭，日與民衆接觸，他也會漸漸了解這個道理的。

那些理論家——他們把兵士的制度和兵營的食堂當作文明的東西——自然主張開辦國立廚房分配“斯巴達湯”⁶⁰。他們說要是這類的大廚房設立起來了，各人無論何時，都可到那裏去得着定量的湯，麵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食物二者的經濟上所得

的利益是很顯然的。

我們並不疑惑此等利益。我們深知人類已經實現了燃料與勞動的經濟，他們依着這種重要的經濟方針，（如廢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麵包爐等）已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們很能明白，與其一百家人各自燒火，不如同時在一處煮好一百家的肉湯更經濟。此外我們也知道馬鈴薯的煮法有許多種，不過用一口大鍋同時把一百家人需要的馬鈴薯煮起來，也是一樣地好。

其實菜蔬的烹調法隨各個廚子和管家婦的手藝而差異，這也是我們知道的；然而把一百磅馬鈴薯放在一處煮熟，然後各人再依自己喜歡的方法去烹調，也沒有什麼不便。而且以同樣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種不同的湯來適合一百種不同的口味。

這些事實，我們也都知道，但是我們仍然主張對於那個願意自己燒火，做菜的管家婦，誰都沒有權利強迫她到公共廚房去拿已經做好的馬鈴薯。特別我們希望各個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館裏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廚房會發達起來代替那些現在毒害世人的餐館。現在巴黎的主婦已經可以從屠戶那裏取得做湯的材料，隨自己

⁶⁰ 古希臘，斯巴達男子不在家中與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們沒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他們最嗜好的是一種濃湯，又稱為黑湯。他們貧富同席，吃同樣飲食。——譯者。

的意思來烹調了。倫敦的管家婦也知道把肉和蘋果餅等食品放在麵包店裏去燒，只須付很少的錢便可以節省時間和燃料了。並且在公共廚房（將來的公共麵包店）設立起來的時候，人們得以烹調食物，並且沒有受騙和食毒的危險，那時各人從公共廚房裏取到爐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調起來，這會成為大眾的習慣。

然而如果定要把這個製成一個嚴厲的規則，規定必須各人帶着已經做好的食品回家，這樣思想一定會被近代的人嫌厭的，他們會把這個思想當作和那寺院兵營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壓制與迷信）造成的偏曲的頭腦裏所生出來的不健全的思想——同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從公社取得食物的權利呢？這是我們必須自問的問題。各都市會自己答覆這個問題，並且我們相信這解答是受着正義的感情指導的。要是勞動還沒有改組，混亂的時期也沒有終止，人們也無法分別出懶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業的勞動者的時候，必須的食物便應該毫無差別地分給所有的人。那些反對民衆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會急急地逃開的。但是據我們看來，那些豁達大度而且沒有復仇性的民衆對於共同留在新社會的人不問是勝者，敗者，一樣地把他們的麵包分給這些人。受到這種思想的鼓動，對於革命也不會有什麼害

處；並且當工作回復，事業重興的時候，昨天的敵人今天會在同一個工廠裏接膝作工。在勞動自由的社會中，懶惰者是不足為害的。

批評家立刻會說：“然而糧食在一個月以內便要缺乏的。”

“那就更好，”這便是我們的回答。其實，我們可以證明出來自有史以來人民能夠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這還是第一次。至於怎樣才能夠得到新的糧食的供給，這個方法我們會在下面來討論。

V

在社會革命時期中，一個城市能夠以什麼方法來供給食物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很明白，所採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區及鄰近各國的革命的性質來決定的。假若全國或者全歐洲的人民一齊起來完成了社會革命，開始便實行完全的共產主義，那麼，我們的處置便是很簡單的了；然而倘使只是歐洲的三兩個地方試行社會革命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採取另一種方法。那時候的情形會把方法指示給我們。

這樣，我們在採取何種措置以前，便應該先看清楚歐洲的形勢。我們並不想來預言什麼，但我們可以預料革命會採取什麼樣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要特點是什麼，也應該預先知道的。

假若全歐洲同時起了革命，到處都實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產主義的原理激動了，這自然是我們很希望的事。像這種普遍的大暴動一定會使我們現世紀的工作變為異常簡單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們相信這樣的大暴動是不會實現的。革命將要波及於全歐洲，這件事是無可疑惑的。假使歐洲大陸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維也納（奧京），布魯塞（比京），柏林（德京）——中間有一個起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個就會在幾星期以內起來響應，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島，甚至倫敦和聖彼得堡⁶¹在最短期間也會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處所表現出來的是否同一性質，這確實還是一個疑問。

誠然，將來無論何處都要實行大規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歐洲的某一個大國實行了這種政策，其他各國一定會受到影響，這是確實的；然而革命的開始便會表現出地方性的差異，革命的進行為各國也是不同的。在1789—1793年之間，法國農民費了四年之力，才得擺脫對於封建領主權利的賠償的負擔，中產階級費了四年之力，才得顛覆了王權。我們須把這個記在心裏，再來觀察革命漸漸地自然發展。假使我們看見革命的進行有時不免遲緩，我們也不必垂頭喪氣。無論如何，在最初歐洲各國的革命是

⁶¹ 又稱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後改稱列寧格勒。——譯者。

否都有顯明的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還是疑問。我們要記着德國至今還是在做實現聯邦帝國的夢。德國的進步的各黨派還在夢想實現一個像1848年法國的雅各賓的共和國，和路易·布朗的“勞動組織”；同時，在另一方面，法國平民却很熱烈地要求一個自由的公社，無論共產主義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總要是自由的。

將來的革命發生的時候，便是德國也要比1793年法國的行動更要進步些，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過。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比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⁶²更進一步的；法國人民在一擊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貴族等的權力消滅了，而英國尚保留着此等權力以至於今日。然而倘使德國將來比較1793年的法國更進一步，而且會做出更大的事業，那麼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促成此次革命發生的思想會是1848年的思想；而鼓勵俄國革命的思想也許會是1789年和1848年的思想的結合。

我們雖然不把這種預料看得過分的重要，但我們也可以得着下面的結論：歐洲各國的革命各有一個不同的性質；便是關於財富的社會化一點，也不是到處一樣的。

難道真如人們常說的，做運動的先鋒的國民有和留在後方

⁶² 指推翻國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判處死刑。——

躊躇不前的國民調整步調的必要麼？我們必須等着一切文明國內共產主義革命的時機成熟麼？當然不能這樣做！縱然我們願意這樣做，也是不能夠的。歷史不能等待立在後面的人。

並且，我們還不相信在任何國家內，革命是一舉或一瞬間就可以成功的，如某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一般。⁶³ 假若法國的六個大都市——巴黎，里昂，馬賽，里爾（Lille，）聖德田，波爾多（Bordeaux）——中間的一個宣布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個皆會起而做做的，還有許多小城市也會照這樣做：這是靠得住的。於是各種鑛山區和工業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脫離，由勞動者自身組織成自由團體。

然而許多鄉村地方還沒有進步到那一點。公社已經革命化，而鄉村却依舊抱着觀望的態度，還在個人主義的組織之下過活。可是農民因為沒有公差和稅官來攪擾他們，他們對革命黨也不懷着敵意，甯肯利用這新時勢來拖延償付本地掠奪者的債

⁶³ 最有害的謬說莫過於論及柏林 3 月 18 日革命之膚淺的社會主義小冊子中所宣傳的“一日的革命”，以為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魯士成立了代議制的政治，其實這是極錯誤的。我們已經看見這謬說在 1905 至 1907 年間在俄國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實是這樣：普魯士直到 1871 年才和現在（1913 年）的俄羅斯一樣有些叫做“憲法”那樣的紙片，然而並沒有代議制的政府。在 1870 年以前國務大臣可以隨意提出任何預算案，國民不得過問。——著者（英文本）。

款。然而他們以實際的熱誠(這是一般農民暴動的特質,我們還記得 1792 年的法國農民的熱烈的勞作)竭力耕種土地;既不納租稅,又不付押款,他們對於土地便自然更加愛惜了。

說到其他的國家,革命會到處爆發,不過革命的面目却是不相同的;這一個國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那一個國家又實行聯合制,其細目雖不一致,但大體上各處多少都採取社會主義的。

VI

現在我們再說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裏的市民怎樣才能夠爲他們自己備辦食糧。假若國民全體還沒有採行共產主義,他們又怎樣能夠得着必須的食品呢?這是應該解決的問題。我們且拿法國的一個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來說也可以——來說。巴黎每年要消費幾千噸的穀類,四十萬頭牛,三十萬頭犢牛,四十萬頭豬,二百萬餘頭羊,此外還有許多野禽。這個大都會還要用去二千萬磅以上的牛油,二萬萬個雞蛋,其他物品的消費也是依着這個比例的。

巴黎消費的麥粉和穀物都是從美國,俄國,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度等處輸入;畜類是從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羅馬尼亞和俄國等處輸入的;至於雜貨,都是從世界各國來的。

我們現在且來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樣能夠靠着法

國內地出產的食糧來維持，又怎樣能夠使農人高興地把這些食物從各地方送來。

在那些信賴“強權”的人看來，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們起先會建立強固的中央集權的政府，設置一切強制壓迫的機械——警察，軍隊，斷頭機等。這政府會把法國所有的生產物登記下來。然後它把法國劃成各個供給區，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種食糧於某月某日送到某個地方，在某個車站交付，在那裏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個特別的官吏領收，放在特別的倉庫裏去。

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樣的解決不僅不會受人歡迎，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實行。這才是真正的“烏托邦”！

一個人手裏拿着一管筆坐在書齋裏可以做這樣的夢，然而要是他和實際生活接觸一下，那麼，便會證明出來這種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年的事便是一個證據；因為這一類的理論太輕視人類的獨立精神。這種舉動會引起普遍的暴動的，會使再有三四個凡德省⁶⁴出現，並且會引起農村對都市的叛亂；倘使某一個城市要把這樣的制度強迫施行於全國，那麼，全法蘭西皆會武裝起來反抗這城市的。

雅各賓派的烏托邦我們已經看得太多了！我們再看另外有

⁶⁴ 法國西部凡德省（Vendée）的農民在1793—94年曾激烈地反對革命。——譯者。

沒有適當的組織方式呢？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農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饑餓，這樣殺死了革命。並且在 1792 至 1793 年中間法國穀物的生產不但未減少，反而增加，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然而農民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己有，而且得到收穫後，却不肯賣給那些使用紙幣的人。他們把產物藏起來等待價格增高，或者等別人用金幣來收買。國約議會⁶⁵雖然用過最嚴厲的手段，也沒有什麼功效；雖以死刑來恐嚇農民，也不能解散其黨徒，使他們出售其穀物。國約議會的議員曾毫無顧忌地把那些不肯拿穀物到市場去賣的人捉來斬首，又把在食糧方面投機的人毫無容赦地處以死刑。但是無論如何，穀物仍舊不來，使都市的人苦於飢餓。

那麼，用什麼東西來報酬農夫的辛苦呢？土地債券麼？⁶⁶那是市價天天跌落的紙片。那是票面印出 500 livres 而並無真實價值的紙幣。一千 livres 的紙幣不能買一雙長靴；農夫終年勞苦得到一張紙幣，連一件襯衣也買不到。

只要這種沒有價值的紙幣——不管它叫做“土地債券”也

⁶⁵ 1792 年 9 月屠殺後，立法議會即無形消滅，9 月 20 日一個革命的議會正式成立，即是國約議會(Convention Nationale)。——譯者。

⁶⁶ Assignat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以土地為担保而發的紙幣。——譯者。

好，或叫做“勞動券”也好——仍還拿給農業生產者作為報酬的時候，情形總是一樣的。農村便把生產物藏起來使都市苦於窮乏，雖像前次那樣殺死一些反抗的農夫，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不再用毫無價值的紙幣來和農夫的勤勞交易了，我們要拿農夫目前需要的製造品來和他們交換。他們沒有耕田的適當器具，沒有避寒的衣服，沒有可以代替燈芯或蠟燭的微光的洋燈和煤油，也沒有鋤，鋤和草鎌。在現社會情形之下農夫連什麼東西都沒有，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他們在苦鬥和窮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東西都不能夠到他們的身邊；因為他們沒有錢來買這些東西。

都市革命後，應該立即着手製造農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製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們的裝飾品了。巴黎的縫紉機也應該製造鄉下人的衣服：作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國的貴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們穿的高價的晚禮服了。各工廠各製造所也應該立刻從事製造耕作器械，鋤頭，草鎌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國送這些東西來交換法國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應該再遣派什麼掛着紅的，青的，虹色的肩章的監察員到鄉下去，命令農人把生產物拿到這裏或那裏了；只是派幾個親切的代表到鄉裏用和睦友善的樣子對鄉下人說：“我們要你們的產物，可是你們也可以隨便在我們的倉庫和店舖裏取用你

們需要的東西’。於是糧食便從各地方送來了。農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餘的全送到城市裏來，這是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次，他們覺得都市的勞動者是他們的同志——他們的弟兄，而決不是掠奪者了。

也許有人要告訴我們說，同時需要着工業的完全的變革。當然，在某一些部門這是不錯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過來，使衣服，鐘錶，家具，以及其他現在都市以額外價值售與農夫的簡單器械都由農人自由取用。織工，裁縫，鞋匠，洋鐵匠，木匠以及其他許多工匠，技術家等不再製造奢侈品了，把他們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製造上面，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應該完全相信這種變革，並且把它視作正義和進步的行動；而一般人也不會再被某一些理論家的得意的夢想所欺騙了，——他們認為革命只限於占取工業的利潤，而讓生產和商業仍舊照現在的樣子存在，其實這樣的革命的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我們對於整個問題的意見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麼紙片去欺騙農夫，——縱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額，也是無用的；我們要用他們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換他們的生產品。於是土地的產物便可以源源輸到都市裏來。假使不會做到這樣，我們的都市便受着飢餓，反動與失望亦將接踵而至。

VII

我們已經說過，大都市需用的穀物，麥粉，肉類等不僅是從國內各地方購來的，而且還有些是從國外買來的。各國輸進巴黎物品雖有很多的香料，鳥類以及各種美味，但穀物和肉類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發生的時候，這些城市應該盡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賴外國。俄國的小麥，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雖有很多的出現於西歐市場上，然而並不是因為輸出這些物品的各國已經十分有餘了，也不是因為這些東西像牧場上生的蒲公英一樣是自然生長的。例如在俄國，農民每日作十六小時的工，然而爲了把小麥輸出外國，繳納地主和國家的租稅的緣故，每年竟要挨餓三個月乃至半年之久。當俄國農村收割好了的時候，警察便立刻出現了，要是農夫遲納租稅或未把地主的租錢付清，他就隨便把他們的牛馬拿去公賣；要避免這個辦法，農夫只有含着眼淚承認把穀物賣給經營輸出業的商人。通常農夫都願意只留下九個月的糧食，把其餘的都賣去，免得別人把他們的牲畜拿去賤價出售。這樣，因為要維持生活到第二次收穫的時候，他們便不得不把樹皮和草葉拌合在麥粉中吃，在豐年他們只吃三個月的樹皮和草葉就夠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

六個月之久；同時在倫敦的人，却用他們（俄國農夫）的小麥做成餅乾來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發生，俄國農夫便會留着很充足的麵包預備給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農夫也要照這樣做；我們希望印度人照這樣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國的農夫來完全補足歐洲穀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難。所以要靠他們供給小麥和玉蜀黍以滿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中產階級的文明是基礎在對劣等種族和工業落後國家的榨取上面的，那麼，革命的第一個恩惠，便是，威脅這“文明，”使所謂劣等種族把自己解放出來。

然而這個大恩惠會使輸入西歐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給，現出顯著的減少現象。

要預言各地方的事務進行的狀況是很困難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隸將乘着革命的時機伸直他的彎曲的背。他們不再像現在那樣，每天做十四、五小時的工作了，他們只作工七、八小時，其結果自然要減少主要消費物（穀物與肉類）的生產量。

但是在他方面，當農夫知道他們的勤勞不會再被拿去幫助懶惰的富人的時候，生產額立刻就會增加起來。新區域的土地要開墾出來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⁶⁷論及法國大革命時曾經告訴我們說：“當 1792 年

法國農夫從地主手中取回他們垂涎已久的土地時，他們耕種土地的熱心和勤懇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自然，在短期間內集約農法便可以得到衆人的採用。改良的機械，化學肥料以及其他的這類物件都成了社會的共有財富，由公社來供給。然而事實指示出來，在法國及其他各國，最初也會有農產物減少的現象。

無論如何，還是預先估計着從外國輸入的和從內地送來的東西總是減少，這樣倒更聰明，——那麼有什麼方法來補救這樣的減少呢？

沒有別的，只有我們自己開始來工作！救濟的方法近在我們的身邊，我們不必徒費腦力去求諸遠方了。

大都市和鄉村一樣，都應該著手來耕種土地。我們必須恢復生物學上所說的“各機能的總合”(th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s)——就是說，在分工之後，又實行“全工”：這是遍於全

⁶⁷ 米席勒(J. MICHELET, 1798—1874)是法國的歷史家，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二版增訂本，共六卷)，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等書。——譯者。

⁶⁸ 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蘭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說：“1794年的第一次豐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國，至少農村是如此，因為這時城市仍有糧食缺乏的恐懼。”——譯者。

自然界的進程。

此外，且撇開學理不談，環境的力量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個月後，麵包便要缺乏，它就會立刻開始種起小麥來。

土地是不會缺乏的，因為在大都市的周圍，特別在巴黎周圍，大地主的花園和娛樂場是很多的。這幾千英畝的地面，只須加以熟練農夫的勞動，立刻會比那被日光晒乾了的南俄羅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產更多的田野便會在巴黎的四周出現了。勞動是不會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萬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給俄國王公，羅馬尼亞貴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們的豪華娛樂品，那麼，他們的注意會轉到什麼地方去呢？

有了現世紀的一切機械的發明；有了習於管理複雜機械的勞動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發明家，化學家，植物學教授，以及像金內威黎（Gennevilliers）的市場園藝家那樣的實際植物學家；有了這些人用來增加和改良他們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團結精神，他們的勇氣和精力——巴黎的安那其主義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之下，它的農業當然和埃爾壇納（Ardennes在法國東北部——譯者）的粗笨農業大不相同。

蒸汽，電氣，太陽熱，風力，都可以隨人取用了，蒸汽鋤，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準備的粗工作；地面因為犁來犁去，已成了肥

沃的土壤；只需要人們的聰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爲葱葱鬱鬱的植物所掩蓋了；——而且一年不僅一次，竟會有三四次之多。

從有經驗的專門家學習了園藝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來做各種不同栽培法的試驗；互相比賽看誰能得到最好的結果；因爲不做過度的工作，由於身體的運動便恢復了在都市裏所缺乏的健康的體力。——這樣，男子，婦女和小孩都喜歡到田間去勞動；這不再是奴隸的苦役了，這是一種快樂，一種節日，一種快樂與健康的更新。

“世界上無不毛之地，土地的價值因人而定。”——這便是近代農業的結論。去向土地要求麵包，假使你要求得當，它一定會給你的。

就像在賽納(Seine)和賽納·埃·俄斯 (Seine-et-Oise) 兩省那樣小的地方，即使要它們養活像巴黎那樣大的都市，實際上也會產出充足的食糧的。除此以外，並無別法。

農業和工業的聯合，一個人同時做農夫又做工人——安那其共產主義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發點，結果會把我們引到這方面去的。

讓革命一直向前猛進，飢饉並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敵，可怕的危險是在中途停頓，在怯懦，在頑迷。這危險丹東已經看破

了，他便向法國叫道：“大膽！大膽！更要大膽！”⁶⁹先有大膽的思想，然後才有大膽的行爲。

⁶⁹ 丹東在1792年9月2日對巴黎民衆演講“祖國的危急”，（據 A. AULARD 說，這似乎是爲着阻止“9月屠殺”而發的），結尾的話是：“……就要響起來的警鐘並不是驚慌的信號，這是襲擊祖國的敵人的信號。爲了要征服他們，我們應該大膽，更要大膽，永遠大膽，這樣法國才會得救。”（見 H. FLEISCHMANN 編的丹東的演講錄，1920年版。）——譯者。

第六章

住居

I

曾經仔細注意過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勞動者中間發達的人，一定會覺得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民的居住問題)上已經不知不覺地達到了一個確實的結論。在法國各大都市和許多小城市中，一般的勞動者已經漸漸地斷定住宅無論如何都不是那些被國家所承認為房主的人的私有財產，這是確實的事實。

這種思想在人民的心中自然發展起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權”應該擴張到房屋上面去的。

房屋並不是房主建築起來的。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錢來活命(插圖12),在木廠,磚瓦製造所和工場裏作工的無數的勞動者建築,裝飾,裝置起來的。

至於房主所花費的金錢,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勞生產出來的。這和一切其他的財富一樣,也是由於那種只付給勞動者所應得的工資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奪了其他餘的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積蓄起來的。

而且——這種辦法的罪惡，在這一點上是最為明顯的——房屋的實際價值是由房主可以從房屋收得的利潤而定的。這種利潤又是由於那房屋建築在一個都市裏的事實的結果，——即是說因為這房屋是建築在千萬所房屋的中間，是在一個有鋪石的街道，有橋梁，有碼頭，有美麗的公共建築物的大都市中，一個有着輝煌的燈光，而且能夠供給居民以農村間所不知道的無數的愉快與便利的大都市中，一個常與其他的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業，商業，科學，藝術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個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勞力造成的這樣又美麗，又衛生，又宜於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這房屋才有很高的價值。

譬如說在巴黎某處有一所房屋，價值一百萬法郎，並不是因為造這所房屋所費的勞力值得一百萬法郎，不過是因為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罷了；由於幾百年間的無數勞動者，藝術家，思想家及學者文人的供獻，才使巴黎成了工業，商業，政治，藝術與科學的中心；而且因為巴黎有着它的過去的歷史；又因為靠着文學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稱遍傳於國內和國外；又因為這是五十代的法國國民在一千八百多年間的勤勞的結果，——這樣才使巴黎的房屋能夠有很高的價值。

然則，要不是去作那不義的事，誰還敢把在巴黎這樣的都市

中的一小塊土地，一所小建築物佔據在自己的手中呢？誰又有權利來出賣這共同遺產中的最小部分呢？

在這一點上，勞動者的意見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圍困，無產階級已高唱拒絕房主要求的條件時，這不納租錢居住的觀念已經很明顯地存在着了。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時代，巴黎勞動者已經期待着公社的會議大胆地決定廢除房租了。在未來的新的革命發生的時候，這便是貧民關心着的第一個問題。

無論在革命的時候或在和平的時候，勞動者必須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頭上不能不有屋頂來遮蓋烈日和暴雨。但是，縱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樣壞，怎樣污穢，而房主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將他逐出的。固然，在革命的時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來把勞動者的襤褸的衣服和其他的東西拿出來拋到街上去；然而誰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樣做呢？誰又能斷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來逼迫勞動者搬出他們所居住的破屋呢？我們難道不曾看見巴黎公社只免除4月1日以前——只是4月1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嗎！⁷⁰ 在4月1日以後，雖然那時尚在混亂時期，工業也完全停滯了，但房租仍是必須繳納的。至於那些武裝起來防衛巴黎獨立的革命者，除了每日三十個蘇的薪金外，再沒有什麼東西

⁷⁰ 3月30日的公布：此布告廢除1870年10月，1871年1月與4月的房租。——

著者。(插圖13)

來養活他一家人了！

那麼，勞動者必須明白地知道在拒絕付給房租與房主時他們不僅是乘着強權瓦解的機會而行的。他們應該知道房租的廢除是一般人公認的原則；不納租錢而居住是平民高聲宣言的一種權利了。

這種辦法實在是和每個正直的人的正義感相和諧的，那麼，我們爲什麼還要等着這些組織臨時政府的中產階級中間的幾個社會黨人來採用這種辦法呢？假使要那樣做，我們就只有長久地等待着——其實，恐怕還要等到反動重來呢！

因此，那些熱誠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東西（這是強權與奴隸制的招牌），他們仍以平民的身分生活在平民中間，與民衆共同工作，使房租的廢止和房屋的充公成爲事實。他們培養着思想，使思想向着這方向發展；當他們工作的結果成熟的時候，人民便進而著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總有一些妨礙這個的理論——如什麼要賠償房主的損失，什麼應該先有必要的基金之類，但這是不足慮的。

在房屋實行充公的那一天，從來被掠奪的勞動者將知道新的時代來了，勞動不再受富貴權勢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地宣布了，革命已經成了真實的事實，並不是像從來那樣的戲臺上的假東西了。

目

假使充公的觀念一經人民採用，那麼雖有許多來威脅我們的障礙也不足慮，充公是會漸次實行的。

自然那些穿着新制服坐在市政廳裏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着來堆積障礙。他們要談論怎樣賠償房主的損失，製出統計表，做出長的報告書等等事情。他們的報告是極長的，一直會到人民在這種被強制的怠惰的狀態中不能夠再等待了，不能夠挨餓了，可是總不曾見着這些官員的調查得到何種效果，後來便灰心短氣，喪失了對於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動派去了。新官僚政治結果會使充公成了萬人疾視憎惡的東西。

這裏實在有一個巖礁，會把我們的希望撞沈的。然而假使人民用耳朵來聽聽那些迷惑他們的似是而非的議論，知道新的生活需要着新的社會狀態，假使他們自己起來擔任這個工作，那麼，充公的實行便不會遇到多大的困難了。

你們要問：“然而怎樣呢？要怎樣才能夠呢？”我們要試來答覆這個問題，不過要審慎一下。我們並不想把充公的計畫極詳細地描寫出來。我們早就知道凡是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所能夠指示的，總不及實際出現的時候好得多。人們靠着簡單的方法，會成就更大的事業，並且還比較用別人預先想定的方法所得

着的結果更要好些。我們現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可以成就充公的方法。我們對於那些斷言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們，也不想用別的方法來回答。我們只要答覆說，我們並不絕對地主張何種特別的組織方法。我們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夠由人民的發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夠有效。

事實看來似乎是這樣，當充公實現的時候，各區，各街，各巷都有志願隊組織起來，並且著手調查房屋的數目，何處是空着的，何處是住滿了人擁擠不堪的，何處是污穢的陋巷，何處是住的人數少而地方寬，應該把那些擁擠在一間小屋子裏的許多人搬些過去，——這些都應該調查得清清楚楚。在幾天之內這些志願隊要把所屬各街，各巷，各區的一切住宅，租屋，公館，別墅等等的房間和整套的房間究竟是衛生或不衛生，大或小，寬或狹，臭穢或華麗等等調查得極清楚，製出全部的表冊來。

這些志願隊自由地互相通聲氣，所以他們的統計，在極短期間內便可以完成。若說虛偽的統計，這是可以在什麼局裏或事務室裏製造出來的；然而正確而精密的統計却非由個人着手擔任不可，而且要由簡單進到複雜。

於是，那些市民並不等待什麼人的允許，就快快地跑去尋找那些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屋中的同伴，並且向他們說：“同志們，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要誤解它。今晚上在某處開會；所有的鄰

居都會到的。我們要把住房重新分配過。如果你們嫌那污穢狹小的房子不好，那麼，請來選擇一所有五間屋子的住宅，只要你遷移進去以後，什麼事都由你自己處理，無論住到什麼時候都可以，不必害怕。因為人民已經武裝起來了，即使有人敢來驅逐你們，人民也是不答應的”。

有人說：“任何人都願意住華麗的屋子，寬大的住宅！”其實不然，這是錯誤的見解。人民從不曾有過把月亮取來放在桶裏的妄想。相反的，他們每每著手來矯正某種弊害；羣衆的好意和正義心常使我們感動。我們幾時看見他們要求過不能做到的事呢？在1792到1794年的恐怖時代中，或者在巴黎兩次被圍攻的時候，巴黎的人民等候着麵包和燃料的分配，然而他們中間何嘗起過什麼爭奪的事情？他們忍耐力強又能夠放棄權利，在1871年就已經表現出來了，並且常常受着外國報紙通信員的讚美。然而這些忍耐的等待者，也完全知道最後來的人是得不着食物與燃料過日的。

如果把現在社會中的各個人分開來看，自然，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們很知道這個。但是我們以為倘使要把人民居住的問題拿給什麼局，什麼委員會去解決，（其實就是依賴着任何形式的官吏主義的恩典）。其結果便使這種利己的本能復活，而且還要培養它，使之發展。於是一切的

惡念都起來了，而且誰是局中最有勢力的人物也成了問題了。稍微有一點不平等的事便會引起爭論和攻訐的。假若某一個人得到了一點極小的利益，這件事便會成爲怒罵叫號的根源，——而且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然而假使依各街，各區，而組織起來的人民，依着自己的計畫來把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子裏的居民移到沒有人居住的中產階級的房屋裏去，那麼，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們很少求助於民衆的良善的本能，——這是救助革命時代的沉沒船隻的最後的一個辦法——然而這樣的求助，決不是無效的；勞動者每次都以義勇和獻身的精神來回答這樣的求助聲。將來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雖然萬事都說過，做過了，但是仍還會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情存在的。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久已沉淪在利己主義的泥沼中，雖然遇着絕大的危機，也不能夠自拔出來。這時不是將來有沒有不公道的問題，却是怎樣可以減少不公道的問題了。

一切的歷史，一切的人類經驗，以及一切的社會心理學都給我們指示出來，所謂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於信任那些與這件事最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決定。只有這些人才會注意到那種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忽略了的無數的細小事情，而且會來設法

處理它們。

III

並且一切住房的重新分配也沒有立刻就要得着絕對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許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實行了充公的社會中，不久便可以把它矯正的。

石匠，木匠及其他與房屋的建造有關係的人得着每天的麵包不會欠缺的保證以後，他們除了每天作幾小時他們原來的職業的工作以外，也不再要求什麼了。他們要把那些耗費了無數奴僕的時間建築起來只供給幾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樓改造過，在兩三個月中間便要造出來比現在的更合於衛生更輕便的房屋了。安那其主義的公社向着那些還沒有得到安適的住居的人說：“同志們，請忍耐一下罷！在我們的被解放了的都市裏，不久會有比任何資本家爲他們自己建造的房屋更壯觀更美麗的宮殿出現的，這些房屋是屬於那些需要最迫切的人的。安那其主義的公社並不是爲着想增加歲入才來建造房屋的。這些爲着市民而建立的紀念物，這些共同精神的產物是要給全人類做模範的；這些都是你們的東西”。

假若革命的民衆把房屋充公了，並且宣布對房屋不收租金——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着適當的居住的權利，——那

麼，革命在開始的時候，便有了共產主義的性質，方針一定，便向着那方面進行，不容易再搖動。這對於個人私有財產當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其實社會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裏面。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性質也要靠着充公的成就的情形而定。或者我們一直向着安那其共產主義的道途上進行，不然便仍舊陷在專制的個人主義的泥土裏。

由此，我們可以料到我們一定會遇着許多的反對論——一部分是理論的，一部分是實際的。因為這是維持不平等的問題，所以反對我們的人自然也要“藉着正義的名義”來反對。他們說：“這不是異常可恥的事嗎？鄉下的農夫住的只是快要倒塌了的茅屋，而巴黎人民獨把這些美麗的房屋都佔據了去”。然而我們不要弄錯。這些熱心正義的人，因為健忘的緣故，却忘記了他們自己也在暗中防護着這種“異常可恥的事”。他們忘記了便在巴黎也有無數的勞動者窒息於污穢狹小的房中，然而從窗子裏却可以看見富豪的高樓大廈。他們忘記了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悶死在連空氣日光也享受不到的貧民窟裏面。革命的第一個工作便是矯正這種不公平的事實。

我們不要被這種愚劣的抗議迷惑住而停止前進。我們知道在革命開始的時候，都市與鄉村間雖不能平等，但這只是暫時的

現象，經過一些時日就會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為如果農夫不再作地主，富農，商人，放債的人和國家的牛馬，那時，村落便會立刻著手來改良來居住的。難道爲着要避免偶然的暫時的不平等，我們便不應該去把從前錯誤矯正麼？

那些所謂實際的反對論也是不厲害的。它們說，有一個貧窮的人盡力勞動，受了無數的困苦，買到一所房屋，恰恰夠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們現在把他這樣辛苦地得來的幸福剝奪了，反將他驅逐到街上去！這是合理的嗎？其實我們決不會這樣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只夠他一家人居住，那麼，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叫他搬出去。就讓他培植他的小小的庭園，我們的人是不會來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着幫助的時候，他們也會去幫助他。然而假使他有餘的空屋租給別人，那麼，人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說：“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後不應該再付一切給從前的房主了。你就在這裏住下去罷，可是不要再付什麼租錢。從前那樣的收租人和收捐人都沒有了；社會主義把那一切都廢止了。”

我們再想想看，房主一個人佔據一二十間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貧窮婦女同她的四五個小孩却擠在一個小房間裏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設法使那些空屋變做那貧窮婦女和她的四五個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這與一方面使那貧窮的婦女

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裏受苦，一方面却讓大人先生坐在高樓大廈裏作樂的事比較起來却是公平多了。而且或者那位大人先生會自動地來做這件事情；他的夫人因為沒有了從前驅使的奴婢，覺得這樣大的房子難得收拾，也會願意讓出一半來的。

那些擁護法律和秩序的人會說：“你們要把什麼東西都推翻了。什麼驅逐呀，遷移呀，都不會有停止的時候。其實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門外去用拈鬮的方法來重新分配，這豈不更好？”他們的批評是如此。然而我們却堅決地相信假使沒有政府的干涉，而一切的變更的事都委托給那些特別組織起來擔任這種工作的自由團體去做，那麼，驅逐和遷移的事一定會比較在現社會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貪慾而起的這類事情少得多。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內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穢狹小的屋子裏的居民居住的。至於廣大的宮殿和美麗的房屋，許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去住的。假若沒有許多的奴婢，一個人也難得“保持”着這樣大的房屋。便是現在住在這些房屋裏的人不久也會覺得有另找較簡樸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麗的貴婦人自己到廚房裏去烹調，她們便會覺得這樣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適宜的了。人民會漸漸安定下來。人民不必用槍刺來把豪奢的銀行家逐到欄樓裏去，也不必用武裝來護衛貧窮的工人搬進銀行家的大廈裏，他們沒有遇到

什麼阻力，也沒有感到什麼不便，就會和平地把適當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現在的農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並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這樣聰明而良善的方法，誰能不佩服呢？在俄國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與常常到法庭去起訴訟的在私有財產權名義之下的田地比起來，前者改換主人的時候較後者更少。難道我們會相信歐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組織力還不及俄國與印度的農民嗎？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所有的革命，多少總含着一點擾亂日常生活的意義；那些希望從舊社會跑到新社會時，甚至於連資產階級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會震動的人，不久會覺悟他們的這種見解是謬誤的了。誠然，改換政府的時候，可以不必去攪擾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紳士，然而社會對於維持養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惡，決不是由任何政黨的把戲所能救濟的。

紛擾是免不掉的；不過我們應該使它不致成爲完全沒有意義的損失，而且我們應該設法使它減少。而且——我們不憚煩地重複說着——我們要減少每個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着直接的利害關係的團體商量，決不能委諸官廳和委員會；這樣才能夠得到最大的成功。

人民用投票法選舉出輕浮的候補者，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了。這個候補者要求獲得代表人民的榮譽，而且裝出什麼事都知道，

什麼事都能夠做的樣子。然而當人民自己去做他們所知道而且和他們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時，總要比讓什麼官吏什麼代表去做時所得到的結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個適合的例子麼？倫敦船塢的大罷工不也是這樣的麼？而且我們不是在每個村落公社中都見到這個事實的證據嗎？

第七章

衣服

房屋已經成了市民的公共財產，而且每人每日的食物也不缺乏，那時候便要更進一步了。這次要討論的，自然是衣服的問題；而這問題的唯一的可能解決，也不外乎以人民的名義把一切出賣和貯藏衣服的店舖倉庫占領了。然後打開給一切的人，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用他所需要的東西。衣服的共有（每人都有在公共倉庫中取去他所需要的東西和在成衣店裏製衣服的權利）是由房屋和食物的共有所得來的必然的推論。

顯然的，我們並不必把一切市民的大衣脫去，把所有的衣服堆在一處叫各人來拈鬮均分，如那些聰明巧妙的批評家所說的。有一件大衣穿在身上的人，讓他穿着好了，——縱然他一個人有十件大衣，也沒有取去的必要；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喜歡穿新的大衣，誰還願意穿那已經被肥胖紳士的肩頭磨擦舊了的大衣呢？並且那時新的衣服已經很夠了，也用不着舊的了。

假使我們把大都市裏的店舖倉庫和倉庫內放着的一切衣服和製衣服的材料統計一下，作一個目錄，我們便會發現在巴黎，

里昂，馬賽，波爾多等處已有很充足的衣服和材料使得公社可以供給市民全體(不問男女)的需要了。縱然一時有所不足，公共的成衣店也可以立刻補其缺數。我們都知道要是現在的成衣店有了適用於大規模生產的機器，那麼它們的工作便會進行得異常迅速。

反對的人又會說：“然而每個男子都想穿黑貂皮襖裏的大衣，每個女人都想穿天鵝絨的衣衫呢！”

坦白地說，我們並不相信這樣的話。女人不見得都喜歡天鵝絨，便是男子也不見得全喜歡黑貂皮裏子。就在現社會中假使我們要女人選擇她們的衣衫，其中定有不少的人愛樸素適用的衣服，勝於交際社會中流行的華美的服裝。

趣味是隨時代而變遷的。在革命的時期中流行的，一定是樸質的東西。社會與個人一樣，有怯懦的時期，也有英勇的時期。雖然現今的社會沉淪在狹隘的個人利益之追求和卑鄙淺薄的思想之中，現着何等可憐的樣子，但是一旦大危機到來的時候，它的風氣和態度就要變換了。社會也有它的偉大和熱誠的時期。現在一般庸俗之徒手裏握着的勢力將要移到豪爽善良的人的手中了。獻身的精神勃興，崇高的行爲更如風起雲湧般發生着；便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到了那時也覺得徘徊不前是可恥的事了，縱然自己不做那種高貴的和勇敢的舉動，至少也要

讚歎它們。

1793年的大革命中便充滿了這類的例子。在這樣精神的復活(在個人如此,在社會亦如此)的時候,熱誠的大潮流驅使着人類向前猛進。

我們也不想過於誇張這種崇高的感情的效力,也不想把我們的社會理想建設在這種感情上面。然而我們希望得着它們的幫助來通過第一個最大的難關,這並不算是過分的希望。誠然,我們不能希望我們的日常生活會不斷地爲此種高揚的熱誠所鼓動着,然而我們可以期望第一下便得到它們的幫助,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一點。

安那其主義的新社會要把幾百年來奴隸制與壓制所堆積起的污物渣滓掃蕩淨盡,把地面洗滌一下,這非用博愛的波浪不可。到了後來,這新社會不必再有這種自己犧牲的精神也能夠存在了,因爲壓制既已絕跡,並且一個充滿着休戚相關的感情的新社會也已經成立了。

革命的性質要是果如我們所說的,要消滅利己主義者的努力,那麼,非讓個人的自由發意得到廣大的活動範圍不可。各街,各區的居民都應該組織團體擔負供給衣服的責任,他們要做出這城市所有的一切物品的目錄表冊,由此可知他們可以處分的財富額究竟能夠有多少。市民在衣服方面也採取在食物方面

採用的同一原理，這是確實的。——這便是說，“數量很豐富的東西，可以任人自由取用；數量很有限的物品，則平均分配。”

要每個男子都得着黑貂皮襖裏的大衣，每個婦女都得着天鵝絨的衣衫，是不可能的事，社會要把必需品和多餘品分別得很清楚。至少黑貂皮和天鵝絨應列在生活不必需的多餘品之類；今日的奢侈品到明天不見得就成了萬人普遍有的東西，這還要讓時間來證明。至於必需的衣服，則安那其主義的城市的每個市民都應該得到可以取用的保證。我們暫時視為奢侈品的東西，只可以拿來供給病人和老幼使用，還有不能列入一般市民的日用品中的特別物品也可以拿來供給身體軟弱的人使用，這些事都任私人行動，不加干涉的。

會有人說：“這簡直是灰色的單調，並且還要消滅人生和藝術上的一切的美。”

我們便回答道：“決不是這樣”。縱然把我們的意見基礎在現時的事物上，我們也會指出安那其主義的社會能夠滿足人民的最高的藝術的趣味，並不因此使他們去替富豪作牛馬，增加富豪們的財產。

第八章

生產的方法與手段

I

假若一個社會，一個都市，一個地方要向它的居民保證生活必需品不會缺乏，(我們要知道此種生活必需品的概念還可以擴大，甚至可以包含一些奢侈品)，那麼，無論如何必定要把生產所絕對必需的東西——土地，機械，工廠，運輸機關等佔據下來。在私人手中的資本也應該充公，歸還與社會全體。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大害處不僅是資本家佔取了各種商業的大部分利潤，因此他們可以不勞而食；而且還是使一切生產皆向着錯誤的方針進行，並不以保證萬人的安樂為其目的。這就是我們攻擊現社會的理由。

要使現在商業的生產依着為萬人的利益的方針進行，實際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做到這個，無異乎希望資本家離開他的領域去履行一個資本家(即是企圖自己發財的個人製造家)所不能夠盡的義務。資本主義的組織(這是基礎在每個企業主自

身的利益上面的,)已經把它願意拿出來的一切交給社會了,它增加了勞動的生產力。資本家利用着因採用蒸汽機而起的工業革命,化學和機械的急激的發展以及現代的其他各種發明等等的機會,爲着自己的利益盡力增加人類勞力的出息,在大體上已經得着很大的成功了。然而要它再做別的事情,這便是不行的,例如期望資本家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使用他的這種勞動的優越的生產力,直無異乎向他哀求仁惠與慈善,然而資本家的企業是不能基礎在慈善上面的。

現在,社會的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把今日限於某種工業的這種巨大的生產力擴充起來,並且應用它來謀全體的福利。然而社會爲着利用此種優越的勞動生產力來保證萬人的安樂起見,必須佔有一切的生產機關,這是很顯然的。

經濟學家常常說,那些熟習一種特別技術的某一類少壯勞動者,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可以得着比較安樂的生活。誠然,他們常帶着驕傲的樣子把這少數人指示給我們看。但是這少數人所享到的特權——安樂,便是安全的嗎?或者到了明天因爲雇主的貪慾,淺慮和怠慢的緣故,這些享受特權的人便要失業了;現在所享受到的快樂便成了將來幾個月或幾年的貧困艱苦的根源。許多大工業——織物,鐵,砂糖等,其他的短命小工業且不說——或因受着投機的影響,或因事業自然變動的結果,或

因資本家自身間競爭的影響，遂至凋零或陷於停頓；難道我們不曾看見嗎？假使主要的紡織和機械工業等再經過像 1886 年所遭遇的那種恐慌，那麼，所有其他的小工業一時會完全停頓，這也是不用多說的。

而且我們再看爲着要使某一類的勞動者得到比較的安樂的緣故所付的代價究竟有多少？不幸，這實在是用農業的衰落和對農民之無恥的掠奪，以及民衆的慘苦買來的。我們且拿那些度日艱難，糧無隔宿，無一定工資，無一定工作地方的千百萬人以及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餬口的農夫，來和這多少享受着一點快樂的少數特殊勞動者比較看！資本使農村的人口減少，資本掠奪了殖民地和工業落後的國家，資本判定了大多數的勞動者不能受着專門教育，使他們甚至對於自身的職業也只有普通的智識。

這不僅是偶然的事，而且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的結果。因爲要報酬某一部分的勞動者，便使農民不得不成爲背負着現社會重擔的牛馬；鄉村不得不爲都市之故而荒蕪；小工業也不得不聚集在大都市附近的污穢地方，去製造許多極廉價的物品，而使大工業的製造品可以達到那些收入甚少的購買者的身邊。因爲要把粗惡的衣服賣給收入很少的勞動者，成衣匠便不得不以那點不夠吃飯的工錢爲滿足。因爲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

使二三種特殊工業的勞動者得着有限的愉快生活的緣故，那些落後的東方國家便常常被西歐掠奪榨取。

因此現在制度的弊害並不是如羅德伯爾都斯⁷¹與馬克思所說，生產的“剩餘價值”歸到資本家手中這件事，這樣簡直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的見解弄得狹小了；“剩餘價值”本身是一種更深的原因的結果。真正的弊害與其說是一般人民沒有消費着剩餘，不如說是使剩餘價值有存在的可能這件事；因為剩餘價值的存在即是一般男女和兒童為飢寒所迫，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獲取他們勞力的產物的一小部分，尤其是他們的勞力所能夠生產的物品的一小部分。當生產機關仍被握在少數人的手裏的時候，這種弊害是不會消滅的，只要人們為着要求獲得耕種土地使用機械的權利，便不得不納重稅給所有主的時候，只要土地與機械的所有主可以隨意生產那些可以給他們帶走最多的利潤的物品（並不就是有用的物品）的時候，那麼只有少數人暫時可以得着安樂的保證；這是以社會上大部分人的貧困購買來的。實在，要是一方面許多其他的工人被掠奪的時候，僅僅把由商業所得的利潤平均分配與少數特殊的勞動者，這是不夠的。這問題是在於費去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小的人類精力，生產出最多的保證萬人安樂的必需品。

71 KARL RODBERTUS (1805—1875), 德國經濟學家。——譯者。

這個普遍化了的目的，決不能是個人資本家的目的；因此整個社會既然以這種生產的見解爲它的理想，它便不得不把一切可以增進安樂的物品實行充公。社會應該占有土地，工廠，礦山交通機關等等，而且還應該研究適當的生產的方法與手段，以及什麼樣的生產物才能夠增進全體的安樂的問題。

II

一個人爲着生產他一家營養的食物，舒服的住居，必需的衣服等，一天究竟應該勞動幾小時呢？這是社會主義者常常討論的問題，他們大概都得着下面的結論：假若全人類都來勞動，那麼，每天只要勞動四五小時便夠了。富蘭克林⁷² 在十八世紀之末便決定這勞動時間爲五小時；雖說安樂的欲望增加了，但生產力也同時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速度更大。

更就農業來說，我們可以看出，要是人們依照合理的科學方法來耕種，而不再像現在那樣，在那些以粗拙的方法耕的田地中，隨意散播種子，⁷³ 那麼，土地能夠貢獻給我們的產物一定是很多的。在美國西部的田地，有些有三十方哩的面積，然而與文

⁷² B. FRANKLIN, (1706—1790) 美國政治家，美國獨立建立者之一。

——譯者。

⁷³ 這是前幾十年的情形。——譯者。

明國家的施過肥料的土地比起來總算是瘠弱的，每一英畝的出產只有十英斗乃至十五英斗；這就是說比較歐洲以及美國東部的田地所出產的要少一半。⁷⁴ 而且靠着機械的力量，兩個人一天可以耕種四英畝的田地，一百個人在一年之中，可以產出坐在他們家裏的一萬人全年的食品了。

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一個人只要作了三十小時（每天五小時共要六個半天）的工，便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全年的麵包而有餘了；要是作十個半天的工便可以養活五口的家族了。

假使我們採用集約農法，一個人還用不到作六十個半天的工便可以獲得他的全家所需要的麵包，肉類，蔬菜以及奢侈的水果：這是可以從現今得到的結果來證明的。

我們再來考察建築在今日的大都市中的勞動者的住所的代價，我們便可以相信在英國大都市中建築一所勞動者居住的小屋（索價二百五十鎊），只要一千四百天乃至一千八百天的工作（假定每天作工五小時）就夠了。這種房子至少可以保持五十年；一個人一年二十八天乃至三十六天的半日勞動就可以得着他一家的家具齊備，又合衛生，而且極其舒服的住宅了。但是倘使從房主那裏去租賃這樣的屋子，那麼，勞動者每年便要作七十五天乃至一百天的全日的工作才夠支付房租。

⁷⁴ 這也是從前的情形，下同。 譯者。

這個計算表示出來目前英國的一所房屋的最高價值，我們要注意這是在現社會的缺陷組織中所得到的計算，在將來良好的社會中當然更要廉價得多。在比利時的工人區（Cités ouvrières）中的工人住房的建造，更要價廉得多。所以我們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便可以斷言在良好的社會裏一個人在一年中三十天乃至四十天的半日勞動便足以得到一個極舒服的家。

現在再說到衣服上面，衣服的真正價值是很難決定的，因為經紀人（中間人）等所得的利益是不能算出的。例如說，把從地主，養綿羊的人，羊毛商人以及其他一切中間人起一直到織造公司，工廠主，紡織工人，出賣現成衣服的商人和販賣衣服的經手人等等在每碼呢上徵收的租稅，一起計算起來，我們便可以想像到我們爲着每件衣服付給那一羣資本家的代價究竟有多少。因此，那些在倫敦大商店裏面售價三鎊四鎊的大衣，要說是值得多少天的勞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所能斷定的，便是靠着現在的機械的力量，我們能夠製造出幾乎不可相信的那樣多的物品，價值既廉而且快。

只舉兩三個例便夠了。因此在美國七百五十一個棉紗工廠（紡績和織物）中十七萬五千個男女工人，除製造出大量的線外，還造出二十萬三千三百萬碼的棉布。平均算來，每日作工九小時半，一共作了三百天的工，便可以生產出一萬二千碼以上

的棉布，即是每十小時生產四十碼。就說一個家庭每年至多不過需要二百碼，這等於五十小時的勞動，即是每日五小時共作十天的工。此外我們還有線；這就是說縫紉用的線和製造毛棉混合物用的絲。

至於單獨紡織所得的成績，依美國政府的統計，在1870年勞動者每天作十三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工，在一年之中製造出一萬碼的白布；過了十六年後（1886年）只要每週作五十五小時的工，便可織出三萬碼了。到了現在，生產率更是很快地增高起來。

便說到花洋布，（紡織和印花的時間在內，）每年二千六百七十小時的勞動——每小時造出十二碼內外——也可以生產出三萬二千碼來。那麼，要得到二百碼的白地印花的棉布，只要每年作十七小時的工便夠了。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原料從耕作地方送到工廠去，而漸漸變形一直到造成了棉布，這其間所費去的時間都是在這十七小時以內。然而如果要從商人那裏去買這二百碼的棉布，一個收入較多的工人，至少也必須付出十天或十五天（每天十小時）勞動的代價，這即是說要付出一百小時或一百五十小時的勞動的代價。要是一個英國的農夫想得到這種奢侈品，他便要去作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的工才能夠付出這種奢侈品的代價。

由此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在良好社會組織之下，只要每年五十天的半日勞動，我們便可以得着比現在小資產階級所穿着的更要華美的衣服了。

如以上所述，我們爲着要得到土地的產物，只要每天作五小時的工，共作工六十天便夠了；爲着要得到房屋居住，只須作工四十天便夠了；爲着要得到衣帽穿戴，只須作工五十天便夠了；假使我們把休息日除開，每年的勞動日子算成三百天，那麼這不過是半年的勞動罷了。

因此，還要剩餘下一百五十天的勞動，這可以用來製造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葡萄酒，砂糖，咖啡，傢具，運輸等。

固然，這些計算只不過是近似的，並不是極正確的，然而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證明。我們看：在現在所謂文明國家中有許多人徒手遊蕩，不作一事；有許多人終日從事於應該消滅的，有害的職業，還有許多無用的經紀人；這樣我們可以知道無論在任何國家中，實際生產者只有其國民的半數，假使從前十個人作的工，現在由二十個人來作，製造有用的物品，假使社會努力節省人類的精力，那麼，這二十個人每天只要作五小時的工便夠了，生產也並不會減少的。現在，每個富豪的家裏養着許多無用的奴婢；而且在行政機關裏，差不多等於爲着每十個居民或者甚至於六個居民設置一個官吏，這是無益的浪費；假使我們盡

量地減少了人類精力的這種浪費，而且利用此等力量來增加國民的生產力，這是很夠的。實在，我們能夠把作工的時間減少到每日四小時或三小時，而同時物品生產的數量並不比現在所產出的爲少。

倘使我們把這些事實綜合地研究一下。我們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假定現在有一個居民不過數百萬的社會從事於農業及種種的工業——例如，巴黎同着賽納·埃·俄斯省。假定這個社會裏的兒童所學習不僅是腦勞動，而且還是手勞動。除開那些從事教育兒童的婦人而外，凡是成年的人，從二十歲或二十二歲起，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止，每天都應該勞動五小時而且還要從事一種這城裏所認爲必需的職業，但任其選擇任何部門。這樣的社會才能夠保證其中一切人的安樂。比今日中產階級所享受到的安樂還要實在些。並且這個社會裏每個工人至少每天有五小時的時間用在科學，藝術，以及那些不便歸在必需品的項下的個人的欲求（在人類生產力增加的時候，這些東西也成爲必需品，不再是奢侈難得的東西）上面的。

第九章

奢侈的欲求

I

人類不是僅以衣食住爲其一生之目的。他的物質的需要一經滿足，其他的可以說是帶有藝術性質的欲求，便會立刻發生。這樣的欲求種類很多，而且是因人而異的；社會愈文明，個性愈發達，則慾望的種類也愈多。

便是在今天還有人不承認有獲取這種無謂的東西，或者求得某種特殊的快樂以及精神上物質上的享受的必要。一個基督教徒或禁慾主義者自然會排斥此等奢侈的慾望；然而正要靠着這些無謂的東西，才能夠打破人生的單調，使其成爲愉快而有趣味的。要是人不能於其每日工作以外，得到一種適合他個人嗜好的快樂，那麼，這個充滿着愁煩與勞苦的人生，還有活下去的價值麼？

我們希望的社會革命，不用說第一着就要把麵包分給一切的人，把我們的這個可詛咒的社會改造過——在這個社會裏許

多強壯的工人因爲找不到一個可以掠奪他的雇主，便失了業終日向人搖尾乞憐；許多婦人和小孩晚間在街中游蕩，沒有宿處；全家就靠着乾麵包來維繫生命；男人，婦女和小孩因爲看護不足或甚至食物缺乏而餓死：這都是我們每日常見的。我們起來反抗，便是爲着想禁絕這些不公平的緣故。

但是我們所期望於革命的，却不祇是這一點。我們看見工人爲苦痛的生存競爭所迫，甚至到了完全不知道人類所能得到的高尙的娛樂——科學（特別是科學的發見）的娛樂和藝術（特別是藝術的創造）的娛樂。爲着要把今日少數人所佔有的娛樂供給與一切的人；爲着要使一切的人都有發展他們的智能的餘暇和能力，那麼，社會革命必須保證每人每日的麵包。在麵包上得着保證以後，至上的目的便是閒暇了。

自然，在如今千萬的人缺乏着麵包，煤炭，衣服，住所的時候，奢侈便是一種罪惡；要滿足奢侈，便會使勞動者的小孩沒有麵包吃！然而在將來人人都得到必需的衣食住的社會中，今日視爲奢侈的東西，那時都會覺得是必要的了。因爲所有的人並不是一樣的，而且也不能都是一樣的，（嗜好與欲求之不同，正是人類進步的主要保證。）所以常有，而且也應該常有許多的人，他們的慾望超越了平常人的慾望的範圍而趨向於特殊的方面。

並不是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天文鏡的，因爲縱然學問如何普

及，仍有許多人喜歡用顯微鏡來檢查物體，而不願研究天空的星座。有些人喜歡彫像，有的人喜歡繪畫。有的人什麼都不想，只想要一架上等鋼琴，而別的人又只喜歡手風琴。趣味雖各異，可是人人都有藝術的欲求。一個農夫現在常用某個地方的風景畫片裝飾他的房間，要是他的趣味較為發展，他便希望有一張美麗的雕板畫。在現今可憐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一個人如果不是大資產的承繼者，或者不會千辛萬苦地去求得那個能使他從事安樂的職業的“智慧的資本，”則他縱有藝術的欲求也是不能滿足的。他仍還存着將來便可以多少滿足他的嗜好的希望，因此他便輕視理想主義的共產社會，說這是以各個人的物質生活為其唯一的目的。他說：“在你們的共同倉庫中，你們有很充足的麵包，可以供給萬人取用，然而並沒有美麗的圖畫，光學器械，美麗的家具和美麗的寶玉細工等等；——總之，凡是與人類的各種趣味嗜好相適應的東西，你們都沒有。公社所能供給與各人的只有麵包和牛乳，此外獲得其他物品的可能性都被你們壓止了，所有的婦女也不得不穿起褐色的麻布衣服。”

這種反對論是各種共產主義制度應該攷究的，而且又是那些在美洲荒野的地方建立新社會的人所不了解的。⁷⁵ 他們以為

⁷⁵ 指邁文（圖插14），加伯及其他在北美洲平原上組織共產社會的人。

邁文曾在美國的印第安那州建設“新和諧村”（插圖15），後又在墨西哥從事於

只要社會能夠得着充足的衣服，供給各分子使用，並且有着一間音樂室，“同胞們”可以常常在裏面胡亂地彈奏一曲樂調，或演一幕戲劇，便夠了。他們忘記了藝術的情感是人人都有的，不管是農夫也好，紳士也好，他們一樣地都有着對藝術的感情，不過因他們的教養不同，故藝術感情的表現也就各別，然而在大體上還是一致的。社會只供給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與各分子，而且還壓制着促成個性發展的教育，除聖經以外的書都不許讀——但這些努力都是無用的。個人的嗜好紛出，一般人的不平時起；有人提議買鋼琴或科學的器械引起了爭吵；進步的諸要素遂歸於衰滅。這個社會要是不破壞一切個人的情感，一切藝術的傾向以及一切的發展，它便不能存在。

難道安那其主義的公社也要照着這同樣的方針進行麼？——不，決不是這樣。假若它明白要生產物質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必同時努力滿足人類心靈的一切表現，那麼它絕對不會照着這樣的方針進行。

II

我們明白地承認：當我們想到我們四周的貧困苦痛的無底深淵時，當我們聽見那些求工作而徜徉街頭的勞動者的哀告時，

建設同樣的共產協社，但都歸於失敗。參看註96和103。——譯者。

我們實在不忍來討論下面的問題：在各分子的衣食住得到了相當滿足的社會中，人們要怎樣來使那些想要色佛爾⁷⁶的磁器或天鵝絨衣服的个人滿足呢？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我們最先把麵包問題完全解決了，然後才來談磁器和天鵝絨問題。”

然而我們不可不承認人類於食物之外尚有其他的需求，而且安那其的力量在於它能了解一切的人類的才能，一切的激情，什麼也不會忽略過去，因此我們要簡單地說明一個人怎樣才可以使他所有的智慧與藝術的需求得到滿足。

我們已經說過，一個人每日勞動四五小時，一直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他便能夠很容易地生產出保證社會的安樂的一切必需品了。

然而那些習慣於勤勞的人也不必限定每日勞動五小時；他可以每天作十小時的工，一年勞動三百天，一生繼續勞動下去也無妨。自然要是一個人永遠被束縛在一架機器旁邊，他的健康不久就會被損壞，他的才智也要變成愚鈍；可是當一個人可以隨時變更職業，特別時常互相替換地做着手工作與腦工作的時候，那麼，雖然每天勞動十小時或十二小時，也不會感到疲倦，反而覺得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每天作了四五小時的工以後，已足以

⁷⁶ Sévres, 法國賽納·埃·俄斯的城市，出產磁器的地方。——譯者。

維持他的生活了，還有五六小時，他可以利用來滿足自己的嗜好。假若他與別人合作，這五六小時的時間，除了產出一切的人的必需品而外，還能夠充分地產出他所希望的一切物品。

他要先在田地，工廠以及其他的地方勞動，這是他對於社會上一般的生產所應盡的義務。過後他使用他的其餘的時間來滿足他的藝術和科學的欲求和嗜好。

爲着要滿足各種趣味，各種嗜好，便有無數的團體勃興起來。

例如有些人想用他們的餘暇來研究文學。於是他們組織了團體，包含着著作家，排字人，印刷人，彫板人，畫圖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即是廣闊地傳布他們所愛好的思想。

現在一個著作家知道有一種叫做“工人”的牛馬，只要每天給他們幾個法郎，他們便會印刷他的書；然而印刷所內容如何，他便不得而知了。假使排字工人染受鉛毒而受苦，管理機器的學徒得着貧血病而死，難道還愁沒有貧窮的奴隸來代替他們嗎？

然而在那些爲着微少的工錢而甘心出賣他們的勞力的饑餓者沒有了的時候，而且現在被掠奪的工人都受到教育，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印出，使別人知道的時候，那麼著作家和學者們爲着要把他們的文章和詩歌公布於世起見，便不得不和印刷工人聯合起來了。

只要人們把簡單的手工作視作下等事情的時候，他們看見著作家自己排字印刷他的著作，便會覺得這是異常奇怪的，難道他沒有體育場或其他的遊戲來振刷他的精神嗎？然而當人們不以手工作為恥辱，而且所有的人都不能不做手工作的時候，再沒有人來替那些著作家勞動了，於是他們以及愛讀他們的著作的人都要來學習處理排字架和鉛字的技術了；這時候，大家（著作家和一切愛好那些在印刷中的著作的讀者們）合作來揀鉛字排成一面一面的版子，又放上印架，然後運轉機器，印成一本極精美的書，——這種快樂，他們已經知道了。這些精美的機器，在現在那些從早到晚管理着它們的學徒們看來，固然是虐待的器具，而在那些要利用它們來發表自己或自己平日所愛好的著作家的思想的人看來，却實在是娛樂的泉源了。

難道文學會因此受到損害麼？難道詩人在戶外勞動或幫助來印刷他的著作過後，他的詩人的價值便減低了麼？難道小說家在樹林或工廠中和別人共同勞動之後，或者參加了道路工作鐵路工作以後，便失去了對於人類天性的知識麼？對於這個問題，不見得就有兩個回答罷。

也許書的篇幅要減少，然而所說的事一定會多。也許有一兩冊無謂的書出版，然而這是很不常見的事了，大概印出來的書都是值得精讀，吟味的。因為讀者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富於

判斷力，書籍的價值讀者自己會判定，無謂的書也不會出版了。

並且印刷術自顧登堡⁷⁷ 以來，沒有什麼進步，現在還是在幼稚期中。現在用十分鐘寫出來的東西，要費兩小時的時間才能夠用鉛字排好，不過現在正講求傳播思想更便利的方法，而且不久便會發見的。⁷⁸

一個著作家對於他自己的著作的印刷居然毫無關係，這實在是異常可笑的事！否則，印刷術早就有了很大的進步了，我們也不會再使用十七世紀式的鉛字了。

難道我們是在做夢麼？——自然在那些曾經攻察和熟思過的人們看來，這並不是夢。便是在現在，生活已驅使我們向着這方面進行了。

III

在某一個社會中，人人都是生產者，人人都受着研求科學與藝術的教育，而且有閒暇來做這樣的事，那時人們爲着要印刷他們所選擇的著作而聯合起來，各自貢獻他對於手工作應盡的一部分責任——這果然是夢想嗎？現在我們已經有無數的學藝，文

⁷⁷ J. GUTENBERG (1397—1488) 德人，活字版印刷術的發明家。

——譯者。

⁷⁸ 自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此種方法已經發見了。——著者(英文本)。

學及其他的學術團體；這些團體都是許多對於某部門的學問感着興趣的人，爲着刊布他們的著作的目的而聯合起來，自動地組織成功的。在這些團體的會報上發表文章的著作者並沒有得着報酬，會報除去一定的份數以外，大半都是非賣品，免費送與世界各地研究同樣部門的學術的團體。這團體的甲會員可以把他的觀察概括地寫成一頁在雜誌上發表；乙會員也可以把他窮年累月研究的結果寫成長篇論著刊布出來；而其他的會員又以這雜誌所刊載的東西爲起點，而從事進一步的研究。總之，這些著作家和讀者都是爲着要出版他們所感着興趣的著作的緣故而聯合起來的。

實際上，一個學術團體和個人的著作家一樣，也要到現在工人在那裏勞動的印刷所裏去從事印刷。現在學術團體的會員們都輕視手工作。誠然，現在手工作的進行狀態是異常惡劣的；然而在將來的社會裏各分子都受了廣大的哲學與科學的教育，自然會知道改善手工作的方法，使它成爲人類誇耀的事業。那時的學術團體會成爲科學的愛好者，探求者和勞動者等的聯合，大家都知道一種手工作的技術，大家都有科學的興趣。

例如，這個團體是研究地質學的，各會員都要盡力探查地球的地層，都要作實地觀察，在今天的研究者不過一百人，到那時便會有一萬人。因此他們在一年中間所做的事，比現在我

們在二十年中間所能做出的還要多。當他們的著作要刊行的時候，便有熟習各種技術的一萬多人來盡力幫忙，或繪地圖，或彫板，或排字，或印刷。他們很快樂地來利用他們的閒暇——在夏天去探險，在冬天去作室內工作。而且當此等書籍出版的時，對於這共同事業感着興趣的讀者也不僅有一百人，大概有一萬人之多。

進步是向着這方面進行的。便是今天如果英國需要一種完全的英語字典，也不必等待着以畢生精力從事於這種工作的利德勒⁷⁹的降生了，這種工作應該靠着那些志願的人。會有一千多人自然地而且無須報酬地來爲此盡力，或則涉獵圖書館或則記錄註釋，在數年之內能完成一個人畢生所不能完成的事業，在其他一切人類智慧的各部門中，也同樣湧現出此種精神，如果我們看見這種嘗試的合作漸漸地代替了個人事業，我們還不能預料將來如何，那麼，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關於人類的智識，實在是很有限的。

如果這部字典果然是真正的集合的著作，那麼，許多志願的著作家，印刷者，校對者，都應該來共同勞動；然而社會主義的報紙已經實行了這個方針的一部分，把手腕的工作與精神的工作

⁷⁹ M.P.E. LITTRÉ (1801—1881), 法國哲學家。他的大著法文字典是費了許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譯者。

聯合的例子指示給我們看過了，現今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有時也親手排印他自己的論文。固然這樣的事情是不常見的，但是我們因此也可以看出進化是向着什麼方向進行的。

這給我們指示了到自由之路。在將來，一個人如果要發有益的言論——超於他所處的時代的言論，他不必去找可以供給必要的資本的出版家了。他只去找知道印刷術並且贊成他的新著作中的理想的人來同他合作，他們就可以共同地出版新著作或雜誌了。

文藝與新聞事業不再是賺錢的利器和掠奪他人的工具了。難道真正能夠了解文藝和新聞事業的人會不熱烈地希望文藝終於會從以前的保護者和現在的掠奪者手中逃出來嗎？不希望文藝從那愛好庸俗以及投合大多數的惡趣味的世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嗎？

當文學與科學脫離了金錢的束縛，專爲着那些愛好它們的人，而且由這些人來培植的時候，它們才能夠在人類發達的事業中占一個適當的位置。

IV

文學，科學，藝術，不可不由自由的人來培植的。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它們才能夠從阻礙它們的國家；資本以及資產階級

的庸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現在的科學家要用什麼方法來從事自己所感着興趣的研究呢？懇求國家的幫助嗎？國家只能在一百個候補者中間幫助一個，而且祇有那個明白承認不致逸出前人的軌外的人才能夠得到這種幫助。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科學院怎樣非難過達爾文，⁸⁰聖彼得堡學院怎樣侮慢過門得列夫，⁸¹倫敦皇家學會曾把助勞⁸²決定“熱之力學等的價量”的著作認爲“非科學的，”不肯公布的事實。⁸³

因此，從來一切的大研究，一切使科學發生革命的大發見，都是在學院和大學的外面完成的，這樣的成功都是靠着像達爾文，利愛爾⁸⁴那樣有充分的家產可以獨立研究的人，或者那些在貧困中勞苦工作致損壞其健康，且久苦於沒有實驗室，不能得着必要的書籍和器具以繼續其研究，而仍不屈不撓地保持其希望的人的力量。他們中間有的人甚至在目的未達到時候就中途

80 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 英國博物學家。——譯者。

81 D. I. MENDELEEF (1834—1907), 俄國化學家。——譯者。

82 J. P. JOULE (1818—1889), 英國物理學家。熱之力學的等價量之發現爲近世科學的一大勝利。——譯者。

83 英國化學家蒲來非爾 (PLAYFAIR, 1818—1898) 在助勞死後，曾言及此事，因此我們才知道。——著者。

84 C. LYELL (1797—1875), 英國地質學家。——譯者。

病死。這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就大體說，國家補助制度是極有害的，因此常常企圖着脫離掉這個羈絆，因此在歐美便有志願者組織的無數學術團體成立起來——其中有一些極其發達，它們有的貴重品，甚至是那些得着國家補助的團體的全部資源和大富豪的一切資財都買不到的。一切政府的學術機關總不及倫敦動物學會富足，然而這個團體却是靠着隨意捐助來維持的。

這個動物學會的動物園裏養的無數的動物不是買來的，而是其他的團體和全世界的採集者的寄贈品。有時孟買動物學會送一隻象來，有時埃及的博物學家送一匹河馬或犀牛來。每天都有從世界各地送來的這些偉大的贈品——鳥類，爬蟲類，昆蟲類等等。其中常有雖用全世界的黃金也買不到的動物。例如，某一個旅行家冒着生命的危險，獲得一個動物，便像愛兒子一般地愛牠，他也會把牠送到動物學會來，因為他知道動物學會會小心看護這個動物。這動物園也是要收門票的，每日無數的參觀者所付的門票費已足以維持這個大的機關了。

倫敦動物學會以及其他同類的團體的缺點，就在會員不能繳納會費時，不得以工作來代替；而且不承認這個大機關的管理人和許多的雇員爲學會會員，但以那些除了想在名片上寫着 F.Z.S.[Fellow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動物學會會員)]

的略寫]外，並無其他目的的人爲會員。總之，它還缺少着更圓滿的合作。

我們所說關於科學家的事實也適用於發明家。誰都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大發明都是用多大的辛苦買來的；常常夜裏不能睡眠，一家人沒有麵包吃，又缺乏實驗的材料和器具，——這便是幾乎所有那些使工業發達的發明家的歷史，他們的發明真是現代文明的驕子。

然而我們應當怎樣把這衆人所認爲不良的情形改善呢？已經試用過專利權了，其結果是我們所知道的。發明家得了幾鎊的金錢，便把專利權賣掉了，而此種發明所生出的絕大利益却落到那些出借資本的人的懷中。而且專利權還要使發明家陷於孤立的地位，使他隱秘他的研究，因此常得到失敗的結果；而事實上從那些對根本觀念沒有多大研究的頭腦中想出來的簡單的暗示往往足以助成發明，使它豐饒而且成爲實際。專利權和一切國家的管理一樣，阻礙着工業的進步。原來思想是不能夠專利的東西，專利權在理論上是一件大不公道的事。在實際上成了對於發明的迅速進步的大障礙。

增進發明精神所必需的：第一，便是思想的覺醒，認識的大胆，這是現代的全部教育努力在摧殘的；第二，是科學教育的普及，因而研究者的數目增加了百倍；第三，是對於人類繼續不斷

地進步之信仰，因為從來鼓舞着一切大發明家的便是熱誠，也就是爲善的希望。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夠推動思想，才能夠生出這種大胆，這種知識，這種爲萬人而勞動的信念。

這時，我們將有具備各種原動力和器具的大的組織，還有爲所有的研究者開放的廣大的工業實驗所。當人們盡了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以後，便可以到這裏來工作以求他的夢想實現；在這裏他們可以費五六小時的閒暇作他們的實驗，在這裏還可遇着熟習某部門的工業的人來研究某種艱難的問題，因此他們可以互相幫助，交換知識，——各人的思想與經驗的湊合，便會發現出來許久未能得到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決不是夢想。聖彼得堡的散勞諾高羅道克場（Solanoi Gorodok）關於工藝的一方面已經實行了一部分。這是一個器械具備而且爲萬人開放的工場；器具與原動力都是免費供給的；只有使用金屬和木料才要付代價。不幸勞動者沒有空暇，他們在工廠裏勞動了十小時，弄得精力疲倦後，只能在夜間到那裏去。而且他們互相隱秘着他們的發明，因為他們被專利權和資本制度束縛住了。這兩種東西實在是現社會的大患，也是道德與智識的進步路上的陷阱。

V

關於藝術又怎樣呢？到處我們都聽見在嘆息藝術衰頹之聲。

實際我們遠不如文藝復興時期⁸⁵的諸大家。藝術的技巧近時已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有無數賦有某種程度的才能的人在分類研求，然而藝術却似乎離開文明了。學問漸漸進步，但靈感却不常來到藝術家的畫室了。

這個靈感究竟應該從什麼地方來呢？只有偉大的思想才能夠鼓舞着藝術。根據我們的理想，藝術直與創造同義，它應該永遠眺望着前方，不可不着眼於前人未發之處；然而在一般職業的藝術家中却很少很少有人能夠脫離庸俗境域，而看到新的天際的。

這種靈感決不是可以從書本中得來的；這只能由實生活裏得來，然而現社會却不能喚起這種靈感。

拉斐爾⁸⁶和萊利諾⁸⁷在那新理想的探究還能夠適應於舊的宗教的傳說的時代中作出他們的名畫。他們作畫來裝飾大寺院，這些寺院自身便足以代表這都市的世世代代的敬虔的事業。那帶有神秘景象與莊嚴偉大的殿堂直與都市的生活相結合，而且

⁸⁵ Renaissance, 指第十四至十六世紀中間在意大利發生的文藝復興的運動。——譯者。

⁸⁶ RAPHAEL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畫家，文藝復興時期三大家之一。——譯者。

⁸⁷ B. E. MURILLO (1617--1682), 西班牙畫家，他善畫宗教畫，及街市景象，如乞兒和賣花女。——譯者。



圖 1.——P.馬旦死後的照
像（1916年，8月，6日）。

（根據當時印行的明信片。）



圖 2.——近代社會主義
三大派的創立者之一聖
西門(1769—1825)。

(錄自 O. RUHLE:
*Die Revolutionen
Europens*, 第二卷,
1927.)



圖 3.——近代社會主義三大派的創立者之二，查理·福利葉 (1772—1837)。

(錄自 H. W. LAIDLER: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927.)



圖 4.— 近代社會主義三大派的創立者之三，羅拔特·渦文(1771—1858)。

(錄自 F. PODMORE:
Robert Owen, 1923.)



圖 5. 被稱爲“安那
其主義之父”的 P.-J.
蒲魯東 (1809—1865)

(錄自 P.-J. PROUDHON:
*Jésus et les Origines
des Christianisme*, 1896.)



(錄自 O. RUHLE: *Die Revolutionen Europas*, 第二卷, 1927.)

圖 6. ——路易·腓力布的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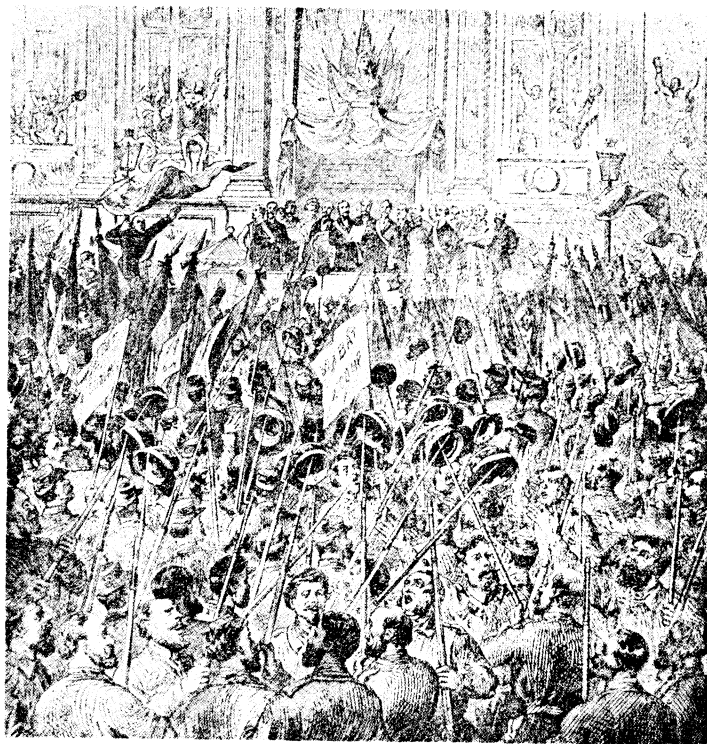


圖 7.——1871年 3 月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錄自 O. RUHLE:
*Die Revolutionen
Europas*, 第二卷,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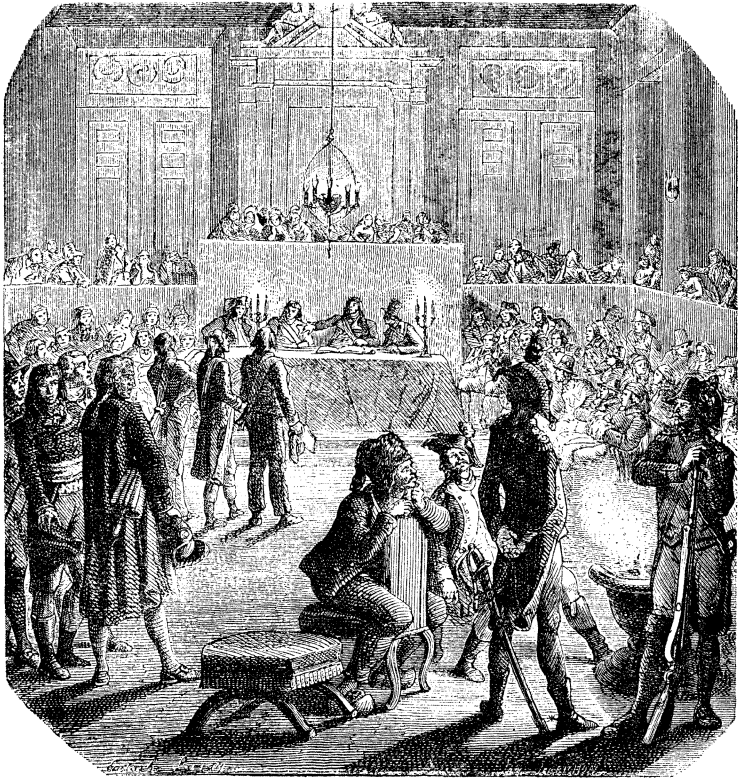


圖 8.——1793年巴黎公社的會議廳。(錄自 A. DE LAMARTINE:
Histoire des Girondins.
第一卷, 1865—1866.)



圖9.—— 饑餓來了。俄國
畫家 N. PIGOROV 作。

(錄自 M. J. ORGIN: *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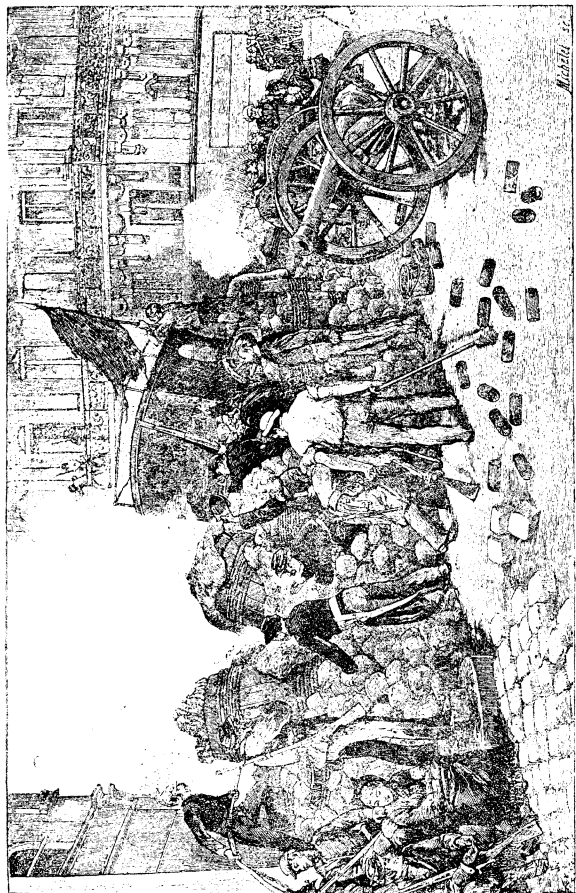


圖 10.——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
命者在市街的障礙物旁邊作戰。

(錄自 E. BENOIT LEVY: *Histoire de Quinze Ans*, 1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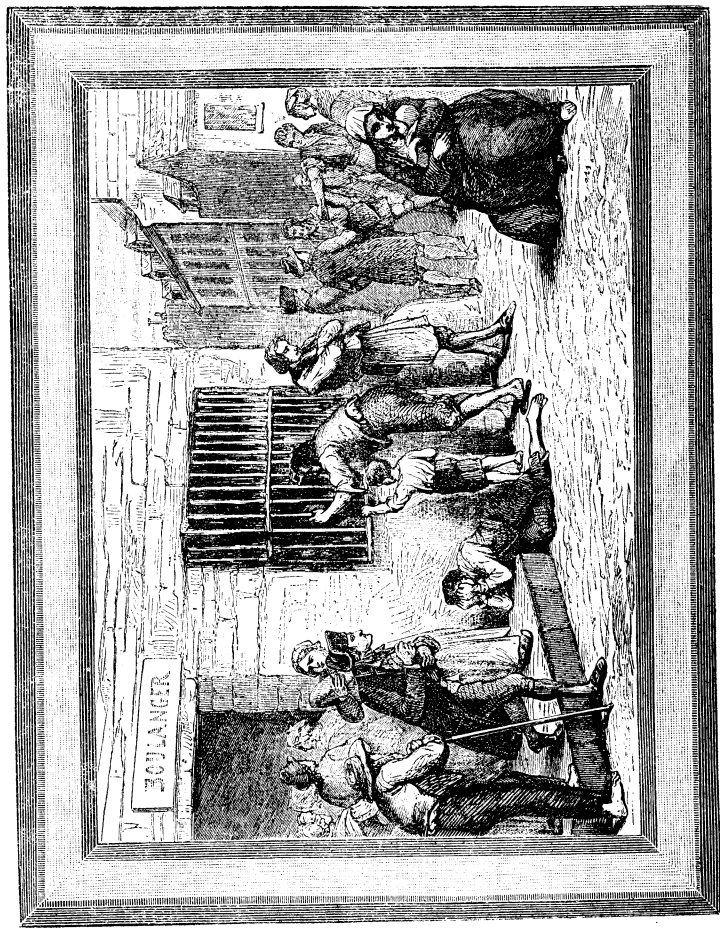


圖 11.——1789 年巴黎的饑餓。

(錄自 LOUIS BLANC: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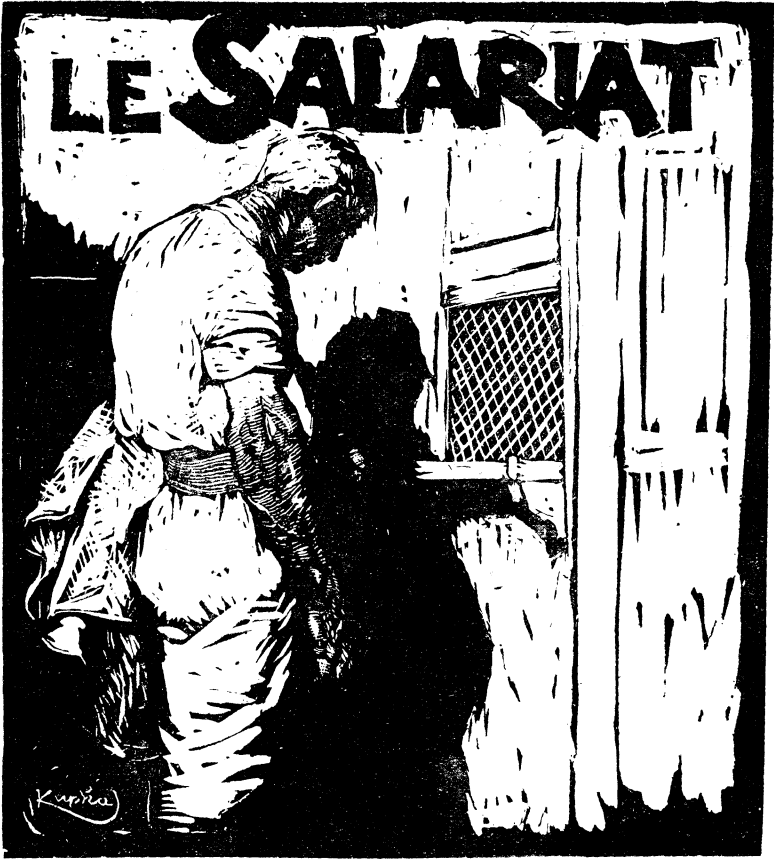


圖 12.——領取微少的工錢。這是克魯泡特金的小冊子工錢制度的封面。

(根據1911年巴黎新時代社出版的原書。)



Il paraît en 71.

LA GRANDE JOIE

OU

PÈRE DUCHÈNE

Parce que les citoyens membres de la Commune ont supprimé les trois termes, et que les bons bougres de patriotes ne seront pas foutus à la porte par les propriétaires jean-foutres!

Et sa grande motion pour que les infâmes épiciers et autres jean-foutres d'accapareurs ne bénéficient pas du décret de la Commune.

Ah! quelle joie, mes enfants! quelle joie!
 Tu vois une Commune!
 Ça n'est pas de la petite bière, ça!
 Il y a quelque temps, avant l'effroyable arrêt de Jean-Foutre bonapartiste Vrony, le Père Duchêne demandait déjà qu'on prit en considération les

plaintes des pauvres vieillards de petits commerçants qui ont mangé leurs portes de croûtes pendant le siège.
 Et qui étonné par voir les aux étrangers.
 Il voulait qu'on ne lui point payer la totalité des loyers, et si même un décret dans ce sens.
 C'est qu'il n'osait pas tout dire, le bougre!
 Et quel sait bien que qui trop embrasse mal étreint.
 Ah! si l'espérer pas une solution aussi pacifique de la crise, une aussi aussi cordiale!
 Il croyait être presque méritait en demandant la remise de la moitié des loyers.

Vive la Commune!
 Et qu'il est amoureux, le vieux père, de s'être trompé et de voir que les citoyens membres de la Commune ont été aussi loin que ses vœux et plus loin que ses espérances!
 Ah! comme tout va bien!
 Si vous avez vu comme le Père Duchêne rigolait en se collant sur l'estomac une grande tranche de pain de hêtre coulé dans un plat d'épave à la crasse!
 Le Père Duchêne n'a pas besoin d'apprendre aux bons bougres de patriotes que son verre contient juste une chopine, et qu'il le vide d'un trait, à la santé de la nation!

Mais ces bons bougres n'appréhendent pas sans une certaine satisfaction qu'après tout le Père Duchêne l'a vidé deux fois à la santé de la Commune.
 Sans compter le verre de file-en-queue qui, hier, était bien en usage!
 Ça n'est pas pour dire, Ah! pour faire son éloge.
 Mais le Père Duchêne s'en est foutu une sacrée bosse!
 N'est-ce pas!
 Et tout dire aussi que les patriotes ne sont pas habitués à voir tous les jours des décrets comme celui-là.
 Vous l'avez tous lu, ce sacré décret qui va faire danser comme des rats les bons bougres de prolétaires et de petits commerçants.
 Le voilà, le boug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Considérant que le travail,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ont supporté toutes les charges de guerre, et qu'il est juste que le peuple soit en mesure de payer ce qu'il lui est dû.
 ARRÊTÉ :
 art. 1^{er}. — Remise générale est faite aux locataires des termes d'octobre 1870 jusqu'à et sans 1871.
 art. 2. — Tous les sommes payées par les locataires pendant les neuf mois seront imputées sur les termes à venir.
 art. 3. — Il est fait également remise des termes dues pour les loyers en retard.
 art. 4. — Tous les baux sont renouvelés, à la même date, les mêmes conditions, sans droit de résiliation, à partir du prochain décret.
 art. 5. — Tout contrat de location, sur la demande des locataires étrangers de l'étranger, est renouvelé.
 Paris-Ville, le 21 mars 1871.

La Commune de Paris.
 M. A. — Un décret spécial règle la question des loyers hypothécaires

圖 13.—— 刊載巴黎公社免除 1871 年 4 月 1 日以前房租的布告的 Père Duchêne(巴黎公社的機關報)第十六期。

(錄自當時出版的 Père Duchêne 合訂本,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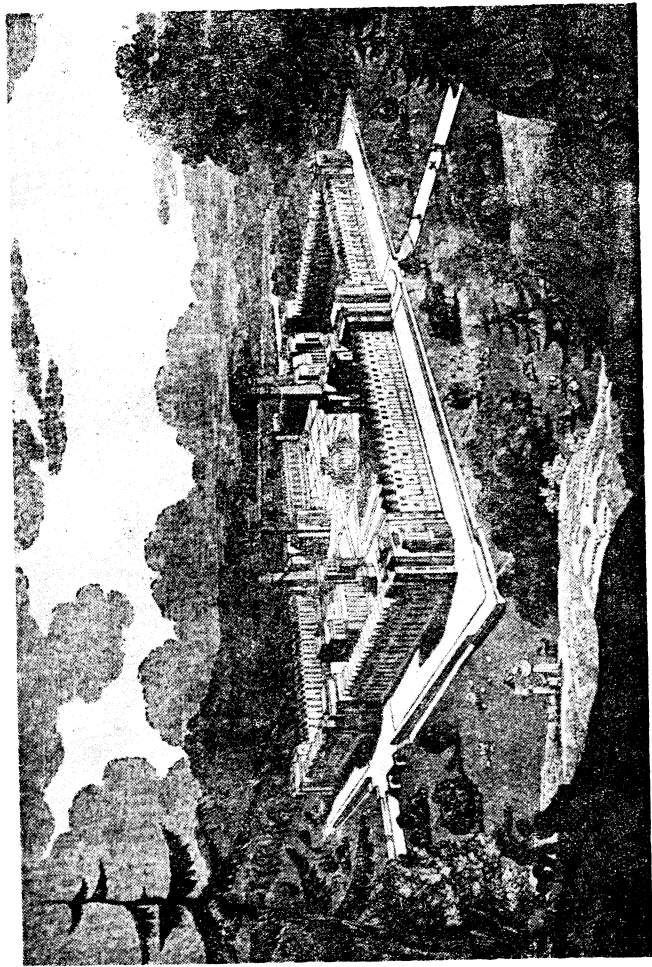


圖 14. 渥文的理想的新社會的模型 (1828
年在 *Co-operative Magazine* 發表)。
(錄自 F. PODMORE: *Robert O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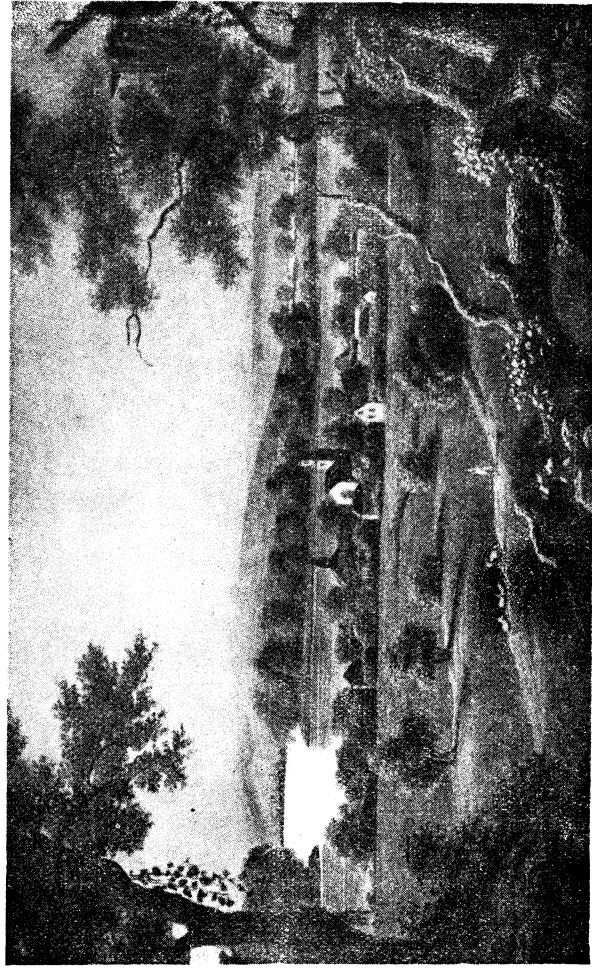


圖 15.——美國印地安那州的新和諧村，渦文的社會主義的實驗地。（這是 GEORGE RAPP 領導的德國農民共產殖民地的舊址，原名和諧村，1825年4月售與渦文。和諧村的村民則遷至 Pennsylvania 州，另建立一個經濟村。）

（錄自 F. PODMORE: *Robert O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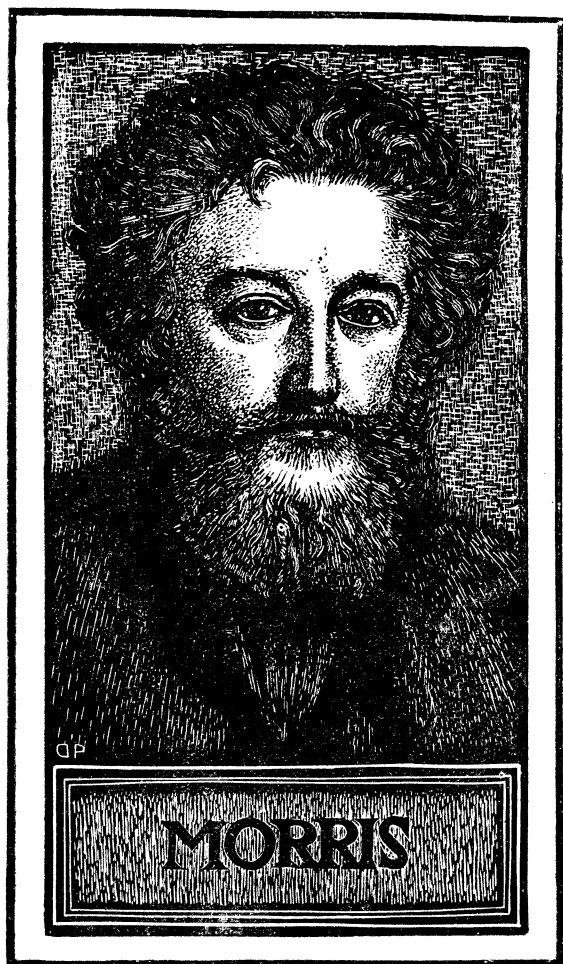


圖 16.——英國社會主義的（錄自 H. NEWBOLT:
編選的 *William*
詩人 W. 莫理思 (1834—1896) *Mor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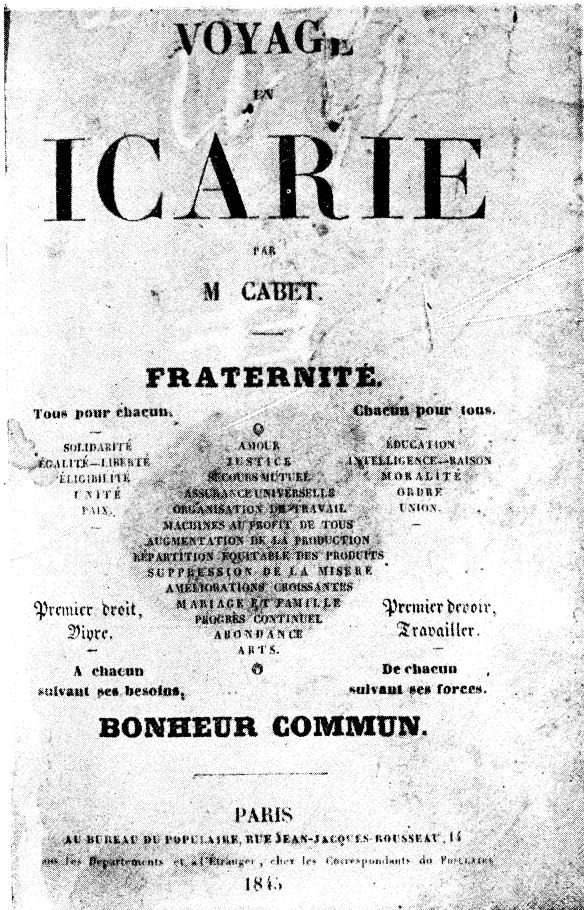


圖 17.—— E.加伯的意 (依照1845年出版的原書。)
加利遊記的裏封面。



圖 18.——羅拔特·溫文的勞動券。（錄自 F. Podmore: Robert O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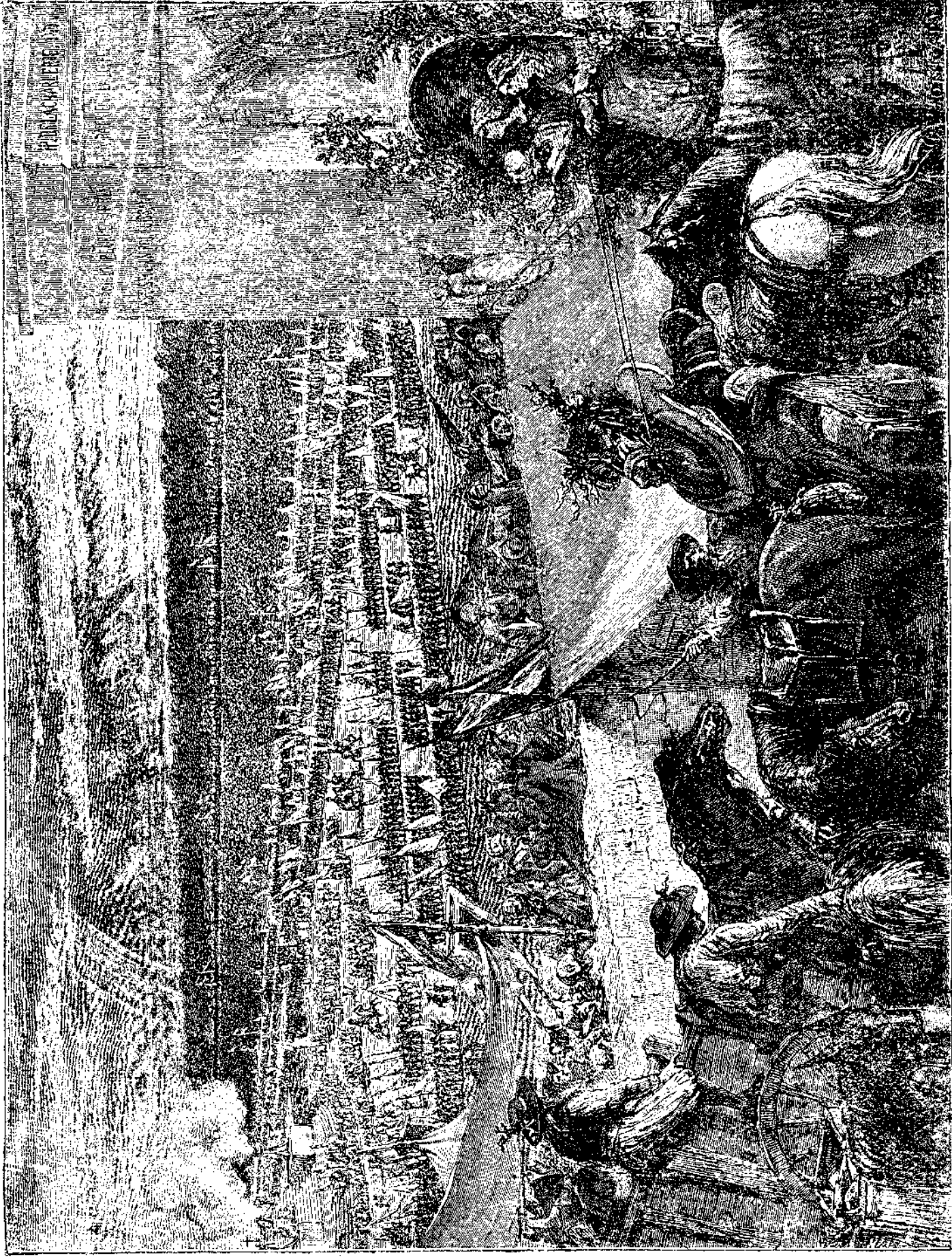


圖 19.——1790 年 7 月 14 日巴
黎的“聯合大祭”(在大校場。)

(錄自 LOUIS BLANC: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一卷。)



圖 20.—— 法國大革命中最偉大最美麗的一天。大家都到大校場去勞動，爲着聯合大祭日的準備，拿起鋤鍬共同鏟平大校場的土地。

(錄自 LOUIS BLANC: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能鼓舞起畫家的靈感。那麼，他是在爲建立一般民衆的紀念物而勞動，他對他的同胞發言，因此他自己也得到了靈感；他對民衆發言，猶如寺院的正殿，圓柱，染色的窗，彫像以及彫刻的門等等自身對民衆發言一樣。今天的藝術家所能希望到的最大榮譽，不過是把他的畫布張於鍍金的木架子上掛在博物館，一種古董店裏，在那裏和在布拉多⁸⁸一樣，我們可看見萊利諾的“昇天”（Ascension）懸在威拉斯開士⁸⁹的“乞丐，”和“腓力二世的羣狗”⁹⁰等畫的旁邊。可憐的威拉斯開士，可憐的萊利諾！可憐那些曾在都市的城樓上“生活過”的希臘彫像，現今皆窒息於魯佛爾⁹¹的赤色暖簾之下了。

當希臘的雕刻家雕刻大理石的時候，他是在努力表現那都市的精神與心情。它的一切激情，一切光榮的傳統都復活在他的作品之中。然而如今團結的都市已不存在，思想的傳達早已

88 Prado，西班牙國家博物館，在馬德里，內設圖畫彫刻兩部。——譯者。

89 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ASQUES (1599—1660)西班牙畫家。——譯者。

90 腓力二世 PHILIPPE II (1527—1598)，西班牙國王，愛好藝術，對西班牙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很有幫助。——譯者。

91 魯佛爾(Musées du Louvre)，法國國家美術館，在巴黎，內分：1，繪畫，銅版畫；2，希臘羅馬古物；3，東方古物；4，埃及古物；5，中世紀，文藝復興及近代的藝術品和彫刻；6，人類學和航海術等六部。——譯者。

沒有了。城市如今只是人民的偶然聚合，這些人彼此不相知，沒有共同利害，唯有損害他人以利自己而已。所謂祖國也不存在。……難道國際的銀行家和拾破布的乞丐會有一個共同的祖國麼？只有當都市，州郡，國家或國家的聯合重新開始過着和諧的生活的時候，藝術才能夠從這都市或聯合所共同保持的理想中得到靈感。這時候建築家要設計建築都市的紀念物，那不再是寺院，監獄或炮台了；畫家，鑄像家，雕刻家，裝飾家等也知道應該把他們的畫布，雕像，裝飾放在什麼地方了；他們從同一活力的泉源得到了實行力，堂皇地共同向着將來前進。

然而到了那時，藝術也只能說是存在而已。近代藝術家的最好的繪畫大抵在描寫自然，村落，山谷，危險的大海及莊嚴的高山。但是如果一個畫家從來不曾享受過田園勞動的樂趣，只憑思索，只憑想像，他如何能夠描寫出這種詩趣呢？假使他不知道田園，不過像候鳥之知道田舍那樣，僅在遷移的時候從上飛過罷了；假使他在青春的氣力旺盛的時期，早晨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那些歌聲響於空際的少女們競爭，他怎麼能夠描畫出田園勞動的詩趣呢？對於土地和生在土地上面的東西的熱愛，是不能從畫筆的揮灑中得來的——畫筆唯供其役使而已；然而要是不愛它又怎能夠把它描畫出來呢？因此便是現在最優秀的畫家在這方面的作品也都是不完全

的，而且對於人生也不忠實，幾乎常是感傷的。其中毫無力量。

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你會看見美麗的夕陽。倘使你要看那壯麗的光景，便不得不作農夫中的一人。倘使你要了解捕魚的詩趣，便應該日夜與漁人共同在海上辛苦，自己也要捕魚，與波濤相鬥，忍受着風暴，你做了這些困難的工作以後，把網扯起，要是網很重，裏面裝滿了魚，你便會感覺快樂；要是網裏是空的，你便會感覺到失望；總之，要經驗過這事情，才能夠了解捕魚的詩趣。你如果要瞭解人的力量，並且把這力量表現在藝術的作品裏面，你便不得不長久地在工場裏勞動，知道創造工作的疲勞和快樂，以熔鐵爐的烈火來鑄造金屬，感覺到機械裏面的生命。實在你如果想寫出人民的感情，你自身便應該浸透在這種感情裏面。

而且將來的藝術家要與人民過同樣的生活，像過去的偉大藝術家那樣，他們用不着販賣他們的作品了。這些作品是一個活的整體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沒有這些作品不完全，這些作品沒有它也不完全。人們要欣賞這個畫家的作品，可以向他所在的都市裏去，而且這樣的創造品的活潑與清新之美，在人們的心意中，會生出有益的效果。

藝術為求其發展，必須在各種等差程度下與工業相結合，拉斯庚⁹² 與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詩人莫理思⁹³（插圖16）曾屢次證明

藝術不可不與工業混和，他們的證明是很好的。凡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東西，或在街上，或在公共紀念館的內外，都應該具有純粹藝術的形狀。

然而此種情形只能在萬人都享受着安樂與閒暇的社會中實現。在這時候我們能看見許多藝術團體，其中的各會員都有發揮他的能力的餘地；因為藝術不能和那無數純手工的和技術的補充工作分開。這些藝術團體還要預備裝飾各會員的住宅，猶如那些善良的志願者，愛丁堡的青年畫家，去裝飾他們的城裏的貧民醫院的牆壁和天花板一樣。

又某一個畫家或雕刻家把他自身的感情表現在作品中，獻與他所愛的女子或親友等。爲了愛，或被愛所鼓舞而完成的作品，難道果然劣於現在那種單以售價高昂來滿足俗人的虛榮的藝術嗎？

關於日常生活必需以外的一切娛樂，也都要依着這同樣方針進行。例如想要大鋼琴的人，就可以加入樂器製造家的團體。

92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國著作家，藝術批評家和社會改革家。——譯者。

93 WILLIAM MORRIS (1834—1896) 英國詩人和藝術家，又是社會主義者。他那部表現他的社會理想的小說虛無鄉來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1)是一本被人廣讀的書。——譯者。

只要貢獻了他的若干半日的閒暇，便可以得到他夢想的鋼琴。假若他非常愛好天文學的研究，他便可以加入天文學家的團體，同着這團體的哲學家，觀察者，計算者，製作天文學器械的技師，學者，以及愛好者共同工作；他如果擔任了這個團體的工作的一部分，便可以得到他所渴望的天文鏡，因為要建造一個天文台，最需要的工作是粗重的工作，如磚瓦匠，木匠，鑄物匠和器械工的工作——最後才輪着專門技師來較對精確的機械。

總之，一個人爲着生產必需品費了幾小時的時間後，每天還有五小時甚至七小時是他自己隨意作事的時間，奢侈的欲求的種類雖不同，但這已經能夠充分地滿足它們了。還有無數的團體企圖來滿足這些慾望。今日極少數人的特權，將來衆人都可以得到了。所謂奢侈不再是資產階級的愚劣而且虛誇的表現，却成了一種藝術的娛樂。

所有的人都是更幸福的了。各人爲着要達到他所希求的目的——想得一本書，一件美術品或一件奢侈品，欣然來從事共同的工作，在這工作裏面他們會得到一種刺激，一種使人生成爲愉快的必要的舒暢。

我們爲着廢除主人與奴隸的差別而勞動，其實也就是爲着兩者的幸福，爲着全人類的幸福而勞動。

第十章

愉快的勞動

I

社會主義者主張說，在脫離了資本家控制的社會中，勞動一定會是愉快的，此後也不會再有什麼可厭的，不衛生的賤役；但是他們却得着一般人的非笑。就是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少的在這方面的顯著的進步；凡是達到這種進步的地方，雇主們都能夠因此節省不少的精力。

要使一個工廠變成像科學實驗室那樣又衛生又適意的地方，也是顯然可能的。並且做到了這樣，也很有益，這一層也是很顯然的。在廣大而空氣流通的工廠裏，工作的結果是更好一點，而且很容易實施種種小的改良，每次改良的結果，都使手工和時間得到節省。至於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工廠，大半都是污穢而不合衛生的，這是因為一則在現今的工廠組織中勞動者是絲毫不足輕重的，二則現在工業組織的特點正是在最荒謬地浪費人類精力。

然而我們現在已經常常看見設備得很好的工廠了，這些工廠的設備實在很好，假使每日的工作時間不過四五小時，而且各人能夠依他的嗜好選擇，變換各種工作，那麼在這工廠裏面勞動，實在是極愉快的了。

據我所知在英國中部地方的某幾個大工廠不幸被用來專門製造軍用品；但是若以這工廠的衛生及智能方面的組織而論，它們實在很完善的。地面共佔五十英畝，其中的十五英畝是有玻璃屋頂的。路是用耐火磚鋪的，而且很清潔；玻璃屋頂也是異常清潔的；有一羣每天專門擦玻璃的工人。在這些工廠裏，可以鑄造出二十噸重一塊的鋼鐵；大熔鐵爐的火焰有一千度以上的熱度，然而假使你站在離這熔鐵爐有三十英尺遠的地方，你就會毫不覺得熱；倘使不時常看見它張開大口吐出怪物一般的鋼鐵鎔汁來，你甚至不會覺得你是站在熔鐵爐的旁邊。至於這鋼鐵的怪物，就只有三四個職工來對付它，他們走來走去，打開龍頭用水的壓力來轉動那巨大的起重機。

你走進這些工廠，以為可以聽着那震得人耳聾的打鍊機的響聲了，然而進去一看裏面並沒有打鍊機。百噸的大炮和大西洋航路的輪船的曲拐軸，都是用水力的壓榨鑄造成的，工人只在旁邊扭龍頭，使鋼鐵塊合於模型，造成各種形狀；用這個方法，不拘如何厚的鐵塊，都可以成為一點縫隙也沒有的性質純一的金屬。

我又以為會聽見討厭的軋軋聲，然而我看見機器切斷三十英尺長的鋼鐵，卻像在切乾酪一樣，沒有什麼響聲。我不禁向着引導參觀的技師表示我的讚歎。他答道：

“這不過是經濟問題而已！這刨平鋼鐵的機器已經用了四十二年了。要是機件的各部分配合得不好，刨床每次移動的時候發生阻礙，發出軋軋的聲音，這樣一定用不到十年！”

“至於熔鑄爐呢，若不利用熱而任其發散，這實在是浪費。要是因放射而失去的熱有幾噸煤炭的熱量的時候，豈不是要蒸殺職工麼？”

“可以使附近五海里的房屋震動的打鍊機，也是空費的。用壓榨來鑄造，比用錘打好些，而且費用少——實在損失也少。

“在這些工廠裏，要得着光亮，清潔，而且使坐的地方有廣闊的地位，這都不過是經濟的問題。假使你能夠明白你在做什麼，而且你又有自由活動的餘地，那麼你的工作一定會比從前更要好些。”

他又說：“老實說，我們在來這裏以前，是非常困難的。在大都市附近地方的土地非常昂貴——因為地主任意把持！”

就是礦坑的情形也是這樣。我們從左拉的描寫⁹⁴和報紙的

⁹⁴ EMILE ZOLA (1840—1902) 法國自然主義的小說家。這裏指他的描寫礦工的慘苦生活的小說萌芽(*Germinal*, 1885)。——譯者。

記載，便可以知道今日礦坑的情形是怎樣的。將來的礦坑，空氣之流通，溫度之適宜，完全像圖書館那樣的安排；在那裏面，馬也不再會死在地下了；至於坑內的搬運，都靠着放在坑口的自動的電纜。通風器常動，也沒有煤氣爆炸之虞。這並不是夢想，這樣的礦坑在英國已經可以看見了；我已經下去看過。這種卓越的組織也只是經濟問題。我所說的這個礦坑，雖是非常之深（四百六十六碼），但是只用兩百個礦工，每天竟能夠產出一千噸的煤——即是每一個礦工每天產煤五噸，而同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間）在英國的其他二千多個礦坑中，平均一個人一年所產的煤還不到三百噸。

倘使是必要的話，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關於物質的組織。福利葉的夢想決不是“烏托邦。”

然而這個問題已經常常在社會主義的報紙雜誌上討論過，因此關於這點，一般的輿論大概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工廠，鐵工場，礦坑都能夠弄成像現代大學的實驗室那樣又衛生，又漂亮的，組織愈完善，則人類勞動的生產亦愈多。

果然，將來在平等的社會裏，勞動者不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在任何條件之下作苦工了，我們還能夠疑惑在那時候勞動不是一種快樂，一種娛樂麼？煩厭的工作也會消滅了，因為這種不衛生的狀態是有害於社會全體的。只有奴隸才能夠屈服於這種舊

環境，然而自由人是要創造新環境的，他們的勞動將要成為愉快的了，而且生產力也會無限制地加多。今日的例外到明天就會成為通例了。

家庭裏的工作現在完全是放在那些今日負擔着人類中的賤役的婦人的身上，但是也和前面所說各種事物的情形一樣，在將來應該有新的改革。

II

依革命而改造的社會還要消滅家庭的奴隸制——這是奴隸制的最後形式，它由來最古，所以也許是最穩固的。然而這是不能由共同居住論者夢想的方法或強權共產主義者屢次想像的方式而實現的。

“共同居住”並不是大多數人所喜歡的。思慮極深的人為其同事業的目的，自然會感到有和他的夥伴會合的必要；他愈感覺得他自身是一個大的全體的一部分，他對於同事業，便愈感到興味。然而在休息與團聚的閒暇時間裏則不如是。“共同住居”和“一族同居”却沒有想到這一點，再不然它們就以人為的集合來努力滿足此項需要。

“共同住居”在事實上不過是一所大旅館，可以使某一些人快樂的，甚至可以使所有的人在他們的生涯的某一時期中，引以

爲快樂的，然而大多數的民衆却喜歡家庭生活（自然是將來的家庭生活）。他們喜歡單獨的房間；盎格羅·薩克遜人⁹⁵ 甚至還想要六個乃至八個房間的住宅，以便一家族或一羣友人可以在裏面分別居住。有時“共同住居”是必要的，但是它如果成爲普遍的規則，就可厭了。在化費了一些時間在社交方面以後，想過着清靜的生活，這是人類天性中的常態的慾望。因此監獄裏的最大苦痛之一，便是不能獨居，這和永久受着單獨禁錮不能過社會生活的情形一樣。

有人以爲“共同居住”是一個經濟的辦法，其實這完全是雜貨商的經濟辦法。最重要而且唯一的合理的經濟乃是使人人得到生活的樂趣，因爲人在生活上得到滿足後，他的生產力之大也是那些終日詛咒環境的人所遠不能及的。⁹⁶

⁹⁵ 即英國人。——譯者。

⁹⁶ 青年意加利亞共產社會中的人已經知道在工作以外的日常關係中自由選擇的重要。原來宗教的共產主義者常以共同會食爲其理想；從前的基督教徒以共同會食爲皈依基督教的表示。聖餐禮即其遺跡。然而青年意加利亞的人却已廢棄了此種宗教的習俗；他們雖在公共食堂裏會食，但裏面設有分別的小桌子，任他們檢選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坐。安那瑪（Anama）共產社會的人各有自己的家庭，從公共倉庫裏領了食物，拿到自己家裏去吃。——著者。

意加利亞是法國著作家加伯（E. CABET 1788——1856）的理想社會，關於這社會的詳細描寫，見他的有名的著作意加利遊記（*Voyage en Icarie*，1845）。這書的裏封面上印得有理想社會的標語。（見插圖17。）加伯於1848年在

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也排斥共同居住。然而你去問他們家事如何處理，他們便會答道：“各人會做自己的工作。我的妻子整理家屋；資產階級的太太們也應該做這一樣的事務。”假使說這樣話的人是一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他便要帶笑對他的妻子說：“我愛，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不是沒有女傭嗎？那麼，你也要像我們的同志保羅君或木匠約翰君的太太一樣勞動呢？”

人常常叫婦女(女傭或妻子)治理家事。

然而婦女最後要出來要求得到人類解放的權利。她不再願意做家庭的牛馬了。她犧牲了許多歲月來養育兒童，她以為這已經夠了。她不再願意做廚役，補衣婦，打掃房屋人了！因為美國的婦女要貫徹她們的要求，結果在美國內屈身處理家事的婦女便漸漸減少了，因此便引起一般人的歎息。現在的太太們都喜歡藝術，政治，文學或賭博等；作女工的極少，至於願意做女傭的人，在美國更不常見。結果，解決的方法是異常簡單的，而且是生活本身指示出來的。家事的四分之三都是靠着機器來做。

美國，得克薩斯(Texas)州建立他的理想社會(即青年加意利亞)，後又遷到伊立諾斯州。安那瑪的共產社會是德國安那瑪的農民在北美建立的。當時因為美洲地價低廉，而且比較自由，許多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都到那裏去建設新的社會。——譯者。

你擦你的皮鞋，你知道這種工作是怎樣地笨。然而一雙皮鞋要用毛刷刷二三十次，豈不是更笨嗎？歐洲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得不賣他們身子來換得污穢狹小的住處和不充足的飲食，婦女們也只得甘於奴隸的境遇，以致幾百萬的女性每天早晨不得不去做這樣的工作。

然而理髮匠已經應用機器來梳理頭髮了，不管是軟髮硬髮都可以弄得很快。我們何不可以把這個原理同樣應用到脚上面呢？現在已經這樣做了，在現在歐美的大旅館裏都普遍地使用擦鞋機。而且漸漸地流傳到旅館以外。在英國，大的學校內，學生寄宿在教師家裏，因為每天早晨要用機器擦一千雙鞋子，便特設了一處擦鞋所，很覺便利；這可以免除那些特別雇來做這種愚笨工作的一百個奴僕了。這擦鞋所每天晚間把鞋子拿去用機器擦得很乾淨，第二天早晨再送回原處。

至於洗衣物呢？沒有一個地方的婦女不怕做這種既費時間又污穢的工作。這種工作大概都是用手來做，僅僅因為這是家庭奴隸的工作，是無足掛齒的。

在美國現在比較好一點，美國有很多的城市，已經用水管送熱水到各家戶，就像在歐洲供給冷水一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問題便是極簡單的了，而且已被一個婦人——柯黑蘭夫人（MRS. COCHRANE）——解決了。她的機器費不到三分鐘的時

間，便可以把十二打盆子，碟子洗淨揩乾了。伊立諾斯 (Illinois) 州的某工廠製造出這樣的機器來，以平均中等人家能夠購買的價格賣出。又小家庭內爲什麼不像送鞋子到擦鞋所那樣，把器皿也送到洗的地方去洗呢？其實連這兩種職務——擦鞋子與洗器皿——都可以由同一個團體承辦。

搓洗衣服會使手脫皮；掃地板，刷絨氈會使塵埃像雲霧一般地飛起，而且這樣做，塵埃也不容易消除的：——這些有害健康的工作至今還是由人來做，因爲婦女們現在還被視作奴隸；然而因爲這也可以用機器來做，而且做得很好，婦女們已漸漸地不做這種工作了。將來所有的機器都要備置在家庭裏，要是再把原動力分送到各家庭，人民不必勞其筋骨就可以使用機器做各種工作了。

製造這種機器的費用也是很小的。現在它們之所以賣價很高，是因爲這些機器不能得着普遍的使用，尤其因爲紳士們對於各種機器要課額外的稅，這些人永遠想過奢侈體面的生活，而且在土地，原料製造，販賣，專利，稅金等等上面做投機事業。

然而要從家庭的勞役解放出來，這不是僅僅靠着小的機器就能成功的。所謂家庭漸漸地脫離它們現在這種孤立狀態了；各家庭開始互相聯合起來共同去做它們從前單獨做的事。

實際，在將來像擦鞋的機器，洗器皿的機器，洗衣的機器等

等，不必每家都設備一架。反之，將來會有一個共同火爐送熱到全區域的各家屋裏，免得每家單獨升火。在美國現在有幾個都市已經這樣做了。從一個中央火爐供給熱水與各家，各屋，這是用水管流通的；要加減溫度，只要把龍頭扭一下，就可以得着適宜的溫度了。要是想在某一個房間升火，只要把爲着溫暖的目的從中央貯藏室供給來的煤氣點燃，就行了。所有掃烟突，保持火種的工作不知費了婦女們的若干時間，現在漸漸地消滅了。

蠟燭，洋燈，煤氣都是過去的了。在有些都市內，無論是到什麼地方，你要光亮，只須把那個電扭一按，就行了，而且要得着充足的電燈光，這也只是單純的經濟與智識的問題。在美國，人已說到組織團體來進行處理家政的工作。每條街都必須設一個處理所。每天用一輛大車子到各家去收集要擦的鞋子，要洗的衣服，要修補的東西（倘使這是值得修補的），要刷的絨氈，到第二日早晨都弄得很清潔的送回來。在兩三小時以後，熱的咖啡和煮得很好的雞蛋都會擺在你們的桌上了。從十二點鐘到兩點鐘中間，有兩千萬以上的美國人還有和這個數目差不多的英國人在吃烤牛肉，烤羊肉，燒豬肉，馬鈴薯以及各種新鮮的蔬菜。在兩三小時中間至少有八百萬家在燒火烘灸肉羹烹調蔬菜；有八百萬的婦女犧牲她們的時間來預備一餐飲食，把所有各家庭做的菜蔬的樣數算起來，至多也不過十二種不同的樣式。

有一個美國婦人寫過這樣的話：“本來在一個地方燒火便夠了，現在却要在五十個地方燒火。”假使你喜歡，你可以在你自己家裏同你的小孩用膳；然而你試想一想，要做幾杯咖啡，一餐飲食，爲什麼應該犧牲五十個婦女一早晨的光陰呢？兩個人用一個地方的火已經足以烹調所有這些肉和這些菜蔬了，然而爲什麼還要用五十個地方的火呢？假使你有特別的嗜好，你自己可以隨意去烤牛肉羊肉，也可以隨意烹調各種新鮮菜蔬。然而你只應該要一個廚房，一處火，並且要盡力把這個廚房設備得異常精緻完備。

爲什麼婦女們的工作就不是掛齒呢？爲什麼每個家庭要一個主婦和三四個用人爲着一餐飲食費去那許多時間呢？這是因爲那些企圖解放人類的人並不曾把婦女包括在他們的解放的夢中，他們以爲想到“這種廚房裏的工作，”便損失了高貴的男性的尊嚴，他們把這樣的工作放在那些做賤役的婦女們的肩上。

所謂婦女解放不僅是把大學，法庭，議會的大門打開了，請她們進去。因爲現在那些所謂“解放了的”婦女，常常把家庭的工作放在別的婦女的肩上。真正的婦女解放，是在於使婦女不再去做像現在那樣烹調飲食，洗衣物的折磨人的工作；是在於使她把家庭整理得很好，使她有時間來養育小孩，並且參加社會活動。

這樣的時代快要到來了。如前面所說。萬事都是前進不已的。只是我們應該完全了解：一個革命縱然醉心於自由，平等，休戚相關的美名，倘使仍然維持着家庭的奴隸制，便不得謂之革命。假使這一半的人類仍還在做火爐旁邊的奴隸，那麼她們仍然會起來反抗那別的一半的人類的。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I

我們因為受了遺傳的偏見，不健全的教育和虛偽的訓練等等的影響，所以除却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因此便有人相信要是一旦沒有了警察，我們人類恐怕會像野獸一樣地互相吞食起來；倘使在革命的時期中強權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於絕對的混亂狀態之中。其實現在許多的人類集團，並沒有受過何種法律的干涉，却自由地自己組織起來，還要比較那些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得到更優越的結果；這樣的事，却被我們輕輕地漏過了。

假使你翻開一份報紙，你會看出其中所記載的不外是政府的處理事件和政治的勾當。要是另一個世界中的人讀了它，一定會相信在歐洲除了證券交易所的事情外，沒有主人的命令，什麼事都不能夠做的。反之，關於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長發育的各種制度，却不見有什麼記載。沒有——差不多完全

沒有！即使有標題着“雜訊”一欄，（法國報紙常有 Faits Divers 一欄）也不過記載着與警察有關係的事件而已。家庭的戲劇和叛逆的行爲，倘若使不牽涉到警察，報上也不會有記載的。

三萬五千萬的歐洲人⁹⁷ 相愛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着他們的收入生活；然而除了文學，戲劇運動以外，他們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政府的何種方式的干涉，報紙是不會注意的。便是歷史也是與這相同。如果論到國王的生活和議會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極詳細地知道；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壞的演說，即使如某個老議員所說的“便是對於任何一個議員的投票上也不會有影響的”，演說，也得以保存至今。國王的駕臨，政治家的脾氣好不好，他們的談諧和陰謀都被小心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閱覽。然而我們要知道中世紀的都市的狀況，要瞭解漢撒商業同盟各都市間存在着的巨大的貿易機構，要曉得盧昂城怎樣建築它的大教堂⁹⁸，這都是異常困難的。要是一個學者費盡他畢生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他的著作是不會被人知道的；然而議會的歷史——這是不完全的東西，因為它只論及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却繼

⁹⁷ 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統計。1914年歐洲的人口爲四萬五千二百萬。據近時調查，已超過五萬萬。——譯者。

⁹⁸ 參看互助論第五第六兩章。漢撒同盟是中世紀保護德意志沿海貿易而結的通商條約。——譯者。

續出版，流傳甚廣，而且又被人用作教材，在學校中教授。

這樣，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民的自發的集團每日成就的巨大工作；其實這樣的工作，便是現世紀的主要的事業。

我們因此要指出幾個最顯著的現象，而且表示出來，人們的利益倘非絕對衝突，他們必能和諧地一致行動，完成性質非常複雜的集體的事業。

顯然的，在我們這個基礎在私有財產上面（即是說基礎在掠奪上面，又是基礎在偏狹愚劣的個人主義上面）的社會中，這種事實並不多見，這是自然的事。現社會中所謂合意常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目的雖非可詛咒的，然而常常是可鄙的。

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並不在舉出幾個可以隨便盲從的例子，（這是現社會所不能供給我們的。）我們想做的事，却是指出來：不管強權的個人主義如何壓迫我們，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以全體而論）裏面，仍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僅僅依着自由合意而活動的；而且沒有政府時，事情還要比較平常一般人所想的更要容易。

爲着證實我們的見解起見，我們已經舉出鐵道爲例，現在我們再回轉來說到它們。

我們知道在歐洲有十七萬五千公里的鐵道⁹⁹，在這個鐵道網

⁹⁹ 這也是從前的統計。據1934年統計歐洲鐵道共有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公里。——譯者。

中要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馬德里到聖彼得堡，從加來 (Calais) 到君士坦丁堡，倘使你搭特別快車旅行，並不要中途換車，就可以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車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央亞細亞也好，都可以運到你下車的地方交給你，手續也很簡單，不過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紙片上寫明下車的地方就行了。

要得到這個結果，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要有像拿破崙¹⁰⁰或卑斯馬克¹⁰¹那樣的英雄出來把歐洲征服了，從巴黎，柏林，或羅馬，畫出鐵道地圖，規定開車的時間。俄皇尼古拉一世便夢想過這樣的權力。當他看見莫斯科，聖彼得堡間的鐵道的圖樣時，他拿起一把界尺在俄國地圖上這兩個都城中間，引了一條直線，一面說：“這就是我的計畫。”這條路線真是依着一條直線建造的，穿過了深的山谷，架起了高的鐵橋；然而過了數年，這個工作便被放棄了，每一英里的鐵路約值十二萬鎊乃至十五萬鎊。

這是一個方法，但是幸而人們還用了別的方法。鐵道一線一線地被建造起來，各線互相聯絡在一起，而這各線所屬的幾百

¹⁰⁰ 指拿破崙一世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他是1804—1814年間法國的皇帝和征服歐洲的英雄。——譯者。

¹⁰¹ OTTO BISMARCK (1815—1898), 德國政治家, 德意志的統一與帝國的建立以他的功勞為最大。——譯者。

個不同的公司，關於車到車開，以及從一線通過他線時，貨物不必卸下，從各國來的車輛使得通行全線等等事情，漸漸地成立了種種的協定。

這一切都只可以依着自由合意，書信或提案的交換，或者由會議而達到成功的。在這樣會議中各公司的代表聚會來討論某種特別的問題，他們爲着求得一個合意而來的，決不是要來製造法律。會議完畢，代表們各回到本公司，他們帶回去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約的草案，至於承認或拒絕，尙待公司來決定。

自然，也有遇到困難的時候。因爲世界上還有異常固執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終究能夠使所有的人成爲一致。對待那些頑固的人，也沒有請軍隊來威壓的必要。

這樣連結起來大的鐵道網，以及因此生出的可驚的運輸力，實在是十九世紀的最顯著的事蹟，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結果。在八十年前，倘使有人預言着這樣的事情，我們的祖先一定會以爲這是狂人或瘋子。他們一定要說：“你不能夠使一百多個公司的股東都來聽道理！這是烏托邦，這是神話。這樣的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鐵腕的獨裁者可以強制地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這個組織裏面並沒有什麼歐洲鐵道的中央政府！沒有！沒有鐵道大臣，沒有獨裁者。甚至連大陸鐵道議會或管理委員會都沒有！萬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國家主義者常說：“便是僅僅爲着調節交通運輸的事，也不可不一個中央政府。”我們要問問他們道：那麼，歐洲的鐵道並沒有政府，何以又會處理得很好呢？那幾百萬的旅客和堆積如山的貨物，又怎麼能夠通行全歐洲呢？既然各個鐵道公司都能夠互相合意，那麼，將來佔據鐵道的那些勞動者，又爲什麼不能夠互相合意呢？既然聖彼得堡，華沙線和巴黎，柏耳福（Belfort）線的鐵路公司能夠和諧地作事，不必去設一個無用的共同管理機關；那麼，在我們這個自由勞動者的集團所組成的社會之中，爲什麼一定需要一個政府呢？

II

以全體而論，現在的社會組織是極不合理的；然而甚至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要人們的利益並不正面衝突，那麼雖然沒有強權的干涉，他們也能夠得到合意的——我們要舉出實例來證明這個的時候，我們對於別人會提出來的反對論也是要預先知道的。

我們舉的這些實例，自然都有一些缺點，因爲現在實在找不出一個沒有強者掠奪弱者，富者掠奪貧者這類情形的組織。因此那些國家主義者要用他們得意的論理向我們說：“要消滅這種掠奪，國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們却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原本是國家製造出無產

階級來交在掠奪者的手中，這樣對現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幫助，他們對這些事一點都不說。事實上要消滅掠奪而讓掠奪的第一原因——私有資本和貧乏（貧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國家故意造出來的）——繼續存在，這是否可能，他們也忘記告訴我們。

當我們談到在各鐵道公司中間訂立的協定的時候，我想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國家的人一定會說：“你不看見現在的鐵路公司不是在壓制，虐待雇員和旅客嗎？那麼，爲着保護工人和公衆起見，國家便不得不來加以干涉。”

但是我們不是屢屢說過，只要有資本家存在，這種權力的濫用是不會有底止的嗎？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獨占權，正是那個自稱爲我們的恩人的國家所給與的。國家不是創立了租借權和保證制度嗎！國家不是派兵壓制過罷工的鐵路人員嗎？在最初的試驗中，（最近我們在俄國還可看見這樣的事，）國家爲着使它所保證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擴張過那些鐵道巨子的特權甚至禁止報紙揭載鐵道上的事故嗎？國家不是袒護過范德貝爾特，波立亞柯夫（Polyakoff），P.L.M.公司，G.P.R.公司，聖哥塔特等等的巨頭——所謂“當代的王侯，”把獨占權給與他們嗎？

因此倘使我們舉出鐵道公司中間的默契合意爲例，我們決不把它視作經濟的處理之理想，也不把它當作技術的組織之理想。這只是證明縱是那些以損人利己爲目的的資本家，不必試

立什麼國際部也能夠經營鐵道獲取厚利；然則，勞動者的社會不必任命什麼歐洲鐵道的大臣，便也可以處理得同樣的好，或者更好一點。

這裏又有一個反對論來了。最初看起來，這個反對論好像更嚴重的。有人說，我們現在所說的合意並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對小公司頒佈法令罷了。例如一個得着國家資助的富足的德國公司，強迫着那些從柏林到伯勒(Bâle)的旅客不經過萊比錫鐵道，而取道科樂尼(Cologne)和弗蘭克福。又某公司爲着取得有力的股東的歡心起見，在運輸貨物的時候，繞道走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線衰落。在美國也是一樣，爲着使得金圓大量地流進范德貝爾特的私囊起見，公司常常讓旅客和貨物糊裏糊塗地走了許多迂曲的路程。

對於這個，我們的答覆仍是一樣的：只要有資本家存在，大資本家就會壓迫小資本家。然而壓迫不僅是資本的結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壓迫小公司，也要靠着國家的幫助以及國家替它們造出的獨占權。

初期的英法社會主義者早已指出來英國的立法怎樣盡全力來促成小工業的沒落，使農民貧困，使無數的人不得不去替富裕的工業的雇主們作工，並不問工錢的多寡。鐵道的立法的功用恰和這相同。不管是軍事線或補助線，以及那些得了萬國郵政

獨占權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着增加富裕的資本家的利益一方面進行的。當全歐洲國家的債主羅斯齊爾德投資於鐵道的時候，他的忠僕（即各大臣）必盡力使他得着更多的贏利。

在美國，即是強權論者所認為理想的民主國中，和鐵道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是極其詐偽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用廉價的辦法把競爭者打倒了；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常常是因為它可以從國家所贈送的土地中取得報償。近時發表的關於美國小麥商的文件，已足以證明國家怎樣幫助強者來掠奪弱者。蓄積的資本的力量得到了國家的幫助，更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來。因此，當我們看見鐵道公司的聯合會（自由合意的產物）能夠成功地保護小公司抵抗大公司時，此種自由合意的實力居然能夠保持自身來抵抗那個得着國家恩寵的萬能的資本，——這樣的事使得我們不能不驚歎了。

事實上並不管國家的偏袒，小公司依然存在着。假使我們在集權的法國內僅僅看見五六個大公司，那麼我們要記着，在大英帝國內却有一百個以上的小公司處理得非常協和，而且關於迅速運送旅客和貨物的組織，確要比法、德兩國的公司好得多。

而且，問題還不是那樣。大資本得着國家的袒護，只要有利於它，它便可以常常壓倒小的資本。我們所視為重要的是這個：歐洲鐵道所屬的數百家資本家的公司中間的合意，是不要

那個以法律來牽制各種公司的中央政府干涉而成立的，此種合意是以各代表組成的會議來維持的；代表們互相討論完畢後給那些舉派他們的人帶回去的，只是提案，而不是法律。這是一種新原理，完全和君主制或共和制，獨裁制或代議制等等一切政治原理不相同的。此種革新，曾經被人們戰戰兢兢地介紹到歐洲的習俗裏面，現在，它却止足不前了。

III

我們常常在那些喜歡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讀到這樣的話：“要是這樣，那麼在將來的社會中，誰來定下運河交通的規則呢？倘使你們安那其主義的“同志”中間有一個人想把他的貨船橫在運河中，妨礙着多數的小船通行，那時誰能夠制止他，誰又來強迫他服從理性呢？”

我們不得不說這種想像是多少有點滑稽的。然而還有這樣的說法：“倘使某一個公社，或公社的聯合體想使自己的貨船在別公社的船之先出發，那時候，也許要因為運輸自己的石子的緣故，把運河堵塞起來，而別的公社所急需的小麥，却不得不停着等候輪值。那麼，如果沒有政府，誰又能夠頒佈貨船交通的規則呢？”

然而實際生活指示出來，就是在這種地方也和在其他的一

切地方一樣，沒有政府，事情的進行也是很好的。自由合意，自由組織，代替了那有害的費用大的制度，而且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知道在荷蘭，運河是怎樣的東西。這實在是荷蘭的公路。我們又知道那裏的運河的交通運輸是異常熱鬧的。在我們用鐵道和公路運輸的東西，在荷蘭便要用運河的小船來轉運。在那裏倘使你的船要爭先出發，便會引起爭吵的。政府爲着保持運輸交通的秩序起見，也得實際地加以干涉。

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荷蘭人已經以更實際的方法來解決一切事件了，在很久以前，他們就已設立過一種公會，即船夫聯合會。這是因航行上的真正需要而產生的自由聯合。船舶的通行權，皆依着航行登記簿上記下的次序而行；一個一個依着自己的輪次出發。誰也不能夠越過別的船隻先走，倘使有人犯規，就會被公會除名。停船的時間也是一定的，誰也不能在碼頭上多停一刻；倘若在那一定的時間中，某一隻船沒有貨物裝載，船主更倒楣，應該立刻把這空船駛開，讓別的船隻來停泊。這樣，縱使船主間的競爭仍還繼續存在，却也把障礙免除了。倘使連船主間的競爭也被克服了時，此種合意便是更加出於至誠。

至於船主們是否得加入船夫們的聯合會，在這裏也沒有提說的必要，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大多數已經加入了。而且這種聯合會所提供的利益，是非常之大，因此它們便能夠沿着萊

因(Rhine)威塞爾(Weser)奧得(Oder)諸河發展,甚至推廣到柏林。船夫們並不等着一個偉大的卑斯馬克出來把荷蘭併吞到德國去,然後委任一個“全國運河航行事務局總務長官,”在他的衣袖上縫了許多條金邊,算是符合着這樣長的官銜。船夫們却願意自己來獲取一個國際的協調。此外,還有許多航行德國與斯干的那維亞間,甚至航行於俄國的船主們,也都加入了這些聯合會,以便規定波羅的海的交通,使船舶的交錯,得以調和。這種團體是自由發起,而得着志願的贊成者加入,與所謂政府是毫無關係的。

雖然,在這裏也有大資本壓迫小資本的事。這些聯合會也有成爲壟斷的傾向,特別在得着國家庇護的聯合會中,此種傾向更是顯著,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聯合會自然要出來加以援助。我們不要忘記,這些聯合會不過是一種團體,它的會員僅有私人的利益;而且在生產,消費,交易成爲社會化以後,船主們爲着滿足他們的需要,也不得不加入聯合的公社,或別的幾百個協會,那時候情形一定不同了。在海上有勢力的船主們,在陸地上便沒有勢力了,他們與鐵路,工廠及其他團體訂立合同時,也不能不讓步一點。

將來的半暫且放下不提;但是無論如何現在還另有離開政府而組織成的自發的團體。我們更要舉出一些例子來。

因為我們在說船舶的事，便不可不提起在十九世紀中產生的極好團體之一，我們也可以拿它自豪的——即是英國救生艇會(Lifeboat Association)。

誰都知道在英國海岸遇難的船隻，每年多至千餘艘以上。堅固的船在海上是不怕暴風雨的。只有在淡近海岸時才容易遇到危險，——如打破船尾骨的大浪，吹落橋和帆的狂颯，使船簸動不易駕駛的波濤，使船擱淺的沙灘和暗礁等等，在近海岸的地方更容易時常遇到。

在古代沿海岸的居民常常燒火引誘船隻向着暗礁進行，以便搶掠船上的貨物，此種舉動在當時且成了習慣，大家不以為怪，但甚至就在那種時候，他們也常常努力去救助被難的船員。他們倘使看見船隻遭難，立刻駕起小船去援救遇難的水手，縱使他們自己葬身波濤，也不顧惜。在海邊的每個村落裏都有一些男子或女子救助遇難船員的英勇的事蹟。

自然，國家與科學家曾經盡力減少死亡的數目。燈臺，信號，航海圖與氣象的警報也曾大大地減少了死亡的數目，可是每年還有一千多船隻和幾千的性命需要人救助。

少數善良的人，因此曾竭盡他們的精力來從事這種工作。他們自己便是很好的水手和航海者，發明了足以抵禦暴風雨不致為其破壞或顛覆的救生艇，盡力引起公眾對於他們事業的興

趣，募集必要的款項來製造救生艇，停泊在沿海岸一帶，無論何處，只要用得着救生艇的地方，它們便要在那裏停泊。

這些人不是雅各賓派，所以他們並不傾向於政府一方面。他們知道要使他們的企圖完全成功，只有靠着大家的合作。熱心和地域的知識，尤其不可少的乃是水手的犧牲精神。他們也知道在發第一次信號的時候，便要把小船駕出去向波濤中駛去，在夜間，黑暗與大浪都是不易避免的；和猛烈的風浪奮鬥了五六小時，甚至十餘小時以後，他們才能夠達到遭難的船——這些預備犧牲自己生命去援救別人的人確實是受着休戚相關的感情和犧牲的精神所鼓動的，那種感情和精神決非徽章能夠買到。這完全是出於自由合意與個人發意的自發的運動。在沿海岸各地方已成立了數百個地方團體。發起人是明白的人，他們不會拿出主人的架子。他們在漁人的村舍中訪求賢明的人，倘使某一個富豪要在海邊的村莊裏設置一處避難所，捐一千鎊的錢作設備的費用，他交出這筆捐款以後，地址的選擇等事，還是由本地方的漁夫和水手們去決定。

新救生艇的樣式也不由海軍部來規定。這個協會的一個報告中曾說：“因為救生艇的船員應該十分信任他所駕駛的船，這是極重要的，所以本委員會主張依照船員表示的希望，而決定救生艇的建造與設備”。因此，每年都會有新的改良。

這種事業完全由志願者團結起來組織委員會及地域團體來担任；完全以合意與互助來完成的。——呵！安那其主義者呵！而且，他們不向納稅人取錢，只收自動的捐款，一年中間至少可以收到四萬鎊。

至於成績呢，請看：在1891年該會共有二百九十三隻救生艇，在那年救過遇難船舶三十三隻，水手六百零一人；從成立到現在，救生艇會一共救了三萬二千六百七十一人。

在1886年有三隻救生艇載着船員在海中沉沒了，立刻便有幾百個新的志願者出來組織地域的團體，結果，建造了二十隻新船。我們還要知道這個會每年還要把上等的晴雨表送給漁夫和水手們，收回比市價少三倍的代價。這使氣象學的知識普及，且以科學者所預報的天氣急變警戒會員。

我們還要知道，這幾百個委員會與地域團體的組織，是不分階級的，完全是由志願者，船員以及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的人們組成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不過是通信聯絡的中心，並沒有干涉的職務。

倘使在某地方發生表決地方稅或教育問題的時候，全國救生艇會的委員並不參加討論。——這樣的謙遜的態度，可惜那些議會的議員不會做效。然而關於救人的事，這班勇敢的人便不許那些不曾冒過暴風雨的人來替他們立法。當遭難的第一個信

號發出的時候，他們立刻跑上救生艇，奮勇前進。他們並不希望什麼徽章，也沒有鑲金的制服；這全是出於仁愛心。

我們再舉出一個同種類的團體，即是紅十字會，我們不必管它的名稱，現在且來考察它的內容。

我們且想像有人在五十多年前說過這樣的話：“國家只能夠一天殺二萬人，傷五萬餘人，然而並沒有能力去救護自己的受傷者；只要有戰爭存在，便不可不用個人發意去干涉，而且那些善良的人爲着這人道的事業，必須成立國際的組織”。那個敢於說這種話的人，當時不知道受過何等樣的嘲罵！最先他就會被人罵爲空想家；如果他還讓別人說下去，他就會聽到下面的話：“這簡直是胡話！最感到需要你們志願者的地方，志願者一定就會缺乏。你們志願者的病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而在戰地醫院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像你這樣的空想家完全忘記了國家的敵對，就是這個才會使可憐的兵士得不到救助而死的。”這樣令人沮喪的議論，竟然得着許多論客的附和。我們中間誰又沒有聽見過這種論調呢？

現在我們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紅十字會在各國在各處都自由地自己成立起來了；當1870到1871年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志願隊便組織起來著手工作了。男子和婦女都盡力去服務。無數的醫院和戰地醫院都組織成功了；火車上設着戰地醫院，並運送

食料，紗布及藥品到戰地去。英國的委員會爲着幫助耕種因戰爭而荒廢了的土地起見，便把食物，衣服，器具，播種的穀物，負重的牛馬運送到鄉間去，甚至把蒸汽犁和使用它的人送去！只要去讀莫華尼耶¹⁰²著的紅十字會一書，你便會驚嘆它所成就的事業之廣大。

至於那些預言者，他們常常否認別人的勇氣，熱誠和賢明，却相信只有他們自己能夠用着鞭子來支配全世界，然而他們所預言的一切完全沒有實現過。紅十字會志願隊的義勇決不是言辭所能形容和讚美的。他們只去尋找危險的地位；然而那些受着國家薪俸的軍醫，當普魯士軍隊逼近的時候，便跟着他們的參謀部逃走了；只有紅十字會的志願隊，却仍還在槍林彈雨之下繼續他們的工作，忍受卑斯馬克和拿破崙三世的將校們的虐待，熱心救護各國的受傷者。荷蘭人，意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時人甚至中國人和日本人也都協同一致，做得很好。他們依着需要，分設醫院及戰地醫院。他們特別講求醫院的衛生設備。至今我們還聽見有些法國人說起他受過紅十字會戰地醫院的荷蘭人或德國人的志願隊的仔細的看護，並且表示深的感謝。然而，在一個強權論者看起來，又覺得怎樣呢？他的理想人物，便是那個

¹⁰² GUSTAVE MOYNIER (1820--1910) 瑞士慈善家，紅十字會的創立者之一。——譯者。

受國家薪俸的軍醫。至於紅十字會和它的衛生的醫院却是他不願意顧及的，因為看護婦並不是什麼官吏！

有一個組織最近才成立，立刻便有數十萬的會員；有不少戰地醫院，病院列車，並用新方法來治療受傷者；這也是由於少數獻身的人的自動的發意，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也許有人會說在這個組織裏面，國家多少有一點力量。不錯，國家伸過手來想把這個組織抓在手裏。幹部現在是由那些被諂佞者所稱爲“赤血的王侯”的人來指揮。皇帝同皇后也很盡力地庇護本國的委員會。但是這個組織的成功，並不是由於這種庇護的力量；却是靠着幾千個各國的地方支部，個人的活動，以及所有那些努力救助戰爭中負傷者的人的獻身精神。要是國家不來干涉，這種獻身精神只有更加發達。

總之，英國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國人在1871年奮起救助傷兵，並不是因爲受了國際幹部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在侵佔區設立醫院，把戰地醫院移到戰場上去，也不是因爲受了國際幹部的命令。這是由於各國的志願者的發意而成功的。他們到了那裏，並不像各國的雅各賓派所預料的，立刻爭打起來；他們共同作事，忘記了國家的區別。

我們一定會可惜這樣大的努力竟用在像戰爭那樣的事情上面，我們會像詩人的兒子那樣地問着：“既然後來要治療他們，爲

什麼又要先把他們弄傷呢？”我們要破壞資本家的權力和中產階級的強權，便要立刻阻止那個叫做戰爭的大屠殺。我們希望紅十字會的志願隊同我們一起努力作消滅戰爭的活動，並不希望他們專門去救助傷兵；我們在這裏提到這個大組織，不過用來作為自由合意與自由扶助所產生的結果的另一個說明而已。

倘使我們想把滅絕人類的技術一一列舉出來，實在是舉不勝舉的。只要提出那些幫助德國軍隊強盛的許多團體便夠了。德國軍隊的強盛，並不如世人所相信的，只靠着訓練，那些以普及軍事知識為目的之各團體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在最近一次的軍事同盟會 (Kriegerbund) 的大會中，共有二千四百五十二個聯合會的代表十五萬一千七百十二人參預會議。此外還有射擊，軍事競技，兵略競爭，風土研究等等的許多團體——這些便是發展德國軍隊的技術的知識工場，至於聯隊附設的學校，却算不得什麼。這實在是聯絡各種團體的一個大網，裏面有軍人，有文官；有地理學者，也有體育家；有獵人，也有工藝家；這些人自動地團結起來，組織，聯合，討論，並且往國內各地探檢。造成德國軍隊的真正脊骨的，便是這些志願的自由的團體。

他們的目的是可詛咒的。這是在維持帝國。但是我們所留意的是：縱然軍隊組織是“國家的大使命，”但在這一部分也是

一樣要由團體的自由合意與個人的自由發意來做，才能夠得到更大的成功。

便是和戰爭有關的事，也要靠着自由合意的力量。爲着更充分地證明我們的主張起見，我們再舉出瑞士的風士考察志願隊（他們曾經詳細地研究過山路），法國的飛行隊，三十萬的英國義勇隊，英國國家砲兵聯合會，正在組織中的英國海岸防禦會；又如商船隊，腳踏車隊，以及私人汽車，汽艇的新組織，都得靠着自由合意的力量。

在各處，國家都不斷地把它的神聖職權讓給私人。各處的自由組織都侵入了國家的領域。以上所舉的事實，不過略略表示在將來國家消滅的時候，等候着我們的自由合意的大概而已。

第十二章

反對論

I

我們現在來檢討那些非難共產主義的反對論。大部分的反對論都是出於單純的誤解，然而它們也引起了重大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那強權的共產主義所引起的反對論，我們是不答辯的，——因為我們自己也反對強權的共產主義。文明各國的國民爲着個人解放的長久的艱難的鬥爭，勞苦過甚，他們不能放棄他們過去的努力，讓那個干涉人民生活細故的政府存在，縱使這政府的目的是在謀社會的福利，他們也不能忍受。強權社會主義的社會縱然能夠建設成功，它也不能夠繼續下去；一般人的不滿不久便會使它消滅，或者使它不得不依據自由的原理而自行改造。

我們所說的安那其共產主義的社會，即是承認個人的充分的自由，而不容許任何強權的存在，也無強迫人勞動的必要的社會。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經濟方面，且看看假使這樣的社會仍

是由像現在一樣的人民(既不較好，也不較壞，既不較現在的人勤勉，也不較現在的人懶惰)組織成的，這樣的社會有沒有成功發達的機會呢？

下面的反對論我們是知道的：“倘使各人的生存都得到了保證，倘使沒有掙取工錢的必要來強迫他們勞動，那麼，誰也不會勞動罷。要是自己不做也可以，那麼無論誰也會把他的勞動的責任放在別人的肩頭上的。” 我們最先要說這個反對論是由於出乎事實以外的過分的淺慮而起的。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一方面，究竟以工錢為目的勞動所得的結果是否更為有效；他方面，志願的勞動的生產量是否少於受着工錢鼓勵的勞動。然而發出反對論的人却不曾想到這個問題。適當地說，這個問題是值得嚴密研究的。然而在精密的科學裏，人對於那些極不重要極簡單的問題，却加以嚴密的探討，而且謹慎地蒐輯和分析事實，然後才決定他們的意見。——獨獨對這個問題，他們並不稍加考察，而且僅以一件特殊的事實，如美洲幾處的共產社會不曾成功¹⁰³之類為滿足，便立刻加以判斷了。他們的舉動恰像一個律師，他不顧反對方面的理由，以及和他自己的意見相反對的主張，他只知道對方是他在辯論時的敵人；假使他的運氣

¹⁰³指 加伯和滿文以及其他許多宗教的共產主義者在美洲建立理想社會的實驗。——譯者。

好，能夠隨機應變制勝，他並不管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當。因此一切經濟學的本質的基礎的研究，即以人類精力的最少浪費供給社會以最大量的有用生產品之最有利的條件之研究，便不能前進了。人們或則僅限於反覆地述說着平凡的斷定，或則裝出不知道我們的主張的樣子。

在此種淺見之中極可驚異的，便是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中，也有幾個著作家迫於時勢，不得不疑惑這個科學的創立者所定下的公理：饑餓的威脅乃是對於人類的生產勞動之最好的鼓勵。他們現在知道，在生產中有一種集合的要素，這種要素到現在差不多還沒有人注意過，但是實際上却要比個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工錢勞動的下劣性質，近世農工業的勞動中人類精力之可怖的浪費，那些把自己的負擔放在別人肩頭上的快樂追求者之不斷的增加，以及生產中某種活氣的缺乏之漸漸顯著；凡此種種現在已開始成了“古典派”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問題了。他們中間有一些人自己也疑惑起來，究竟走入迷途沒有：那個假定被不義之財或工錢所誘惑的想像中的惡人究竟存在不存在。這種異端的見解居然進到了各大學裏面，便在正統派經濟學的書籍中也可以見着了。

雖然這個個人報酬說和工錢制度的舊城堡已由其舊的防守者一塊一塊地拆除下來，使敵人有攻擊的機會了，可是許多社會

主義的改革者仍還擁護着它。

他們耽心着要是沒有人來加以強制，民衆便不會勞動。

然而我們一生不是聽見人兩次表示過這同樣的恐怖麼？一次是在美國解放黑奴以前，反對廢止奴隸的人所表示的；還有一次，是在農奴解放以前，俄國貴族所表示的。反對廢止黑奴的人說：“不用鞭笞，黑奴便會不勞動的。”俄國的農奴所有者也說：“農奴要是不受主人的監督，便不去耕田，而任其荒廢。”這是在1789年法國貴族所唱的“覆唱詞”，又是中世紀的“覆唱詞”，也可說是自有世界以來的“覆唱詞”；凡起了掃蕩不正不義的問題的地方，我們便可聽見這樣的“覆唱詞”。然而每一次，現實的事實又證明出來它的虛偽。1792年解放的農夫曾以他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那樣熱烈的精力來耕種田地；解放了的黑奴也比較他的祖先更加勤勞地努力工作；俄國的農夫把星期五當作和星期一樣一樣的休假日，來慶祝他們解放的“蜜月”以後，便以他們所獲得自由之程度為比例而努力從事工作。最自由的農夫，便工作得最勤苦，最熱心。在田地屬於他自己的地方，他便不顧死活地勞動；這是一句很恰當的話。那些反對廢止奴隸的人的“覆唱詞”對於奴隸所有者是有價值的；至於奴隸自身，因為他們知道這種“覆唱詞”的動機，所以也知它的真實價值了。

而且，經濟學家自己告訴我們說，工錢勞動者勞動總是淡漠

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財富的增加是與其努力為比例的人的勞動，才是熱烈的生產的勞動。一切稱頌私有財產的讚美歌皆可以歸結為此種公理。

我們應該注意，經濟學家想稱頌私有財產的恩惠，向我們說，雖是不出產的，卑濕的，像石頭一樣的土地，若用農民的私有者去耕種，也可以得到非常豐饒的收穫；可是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能夠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擁護說的證據。經濟學家承認使你的勞動結果不會被人掠奪去的唯一保證便是佔有勞動機關，（這是真實的），他們也不過證明一個人能夠自由勞動，他能夠自由選擇職業，沒有監督者來妨礙他，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勞動所得的利益只有他自己和那些同他一樣勞動的人才能夠享受得到，懶惰者是得不到的，那時候他的生產量實在是最高的。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論據中演繹出來的，就只有這一點；而且這也就是我們自己所主張的。

至於佔有勞動機關的形式，那些經濟學家只不過在他們對於耕作者保證他的生產和改良所生的利益的論證中，間接論及。並且，他們又擁護私有財產，反對一切其他形式的佔有，所以他們又指出土地在共有財產的形式下，不能夠生產出像在私人佔有下面那樣豐富的收穫。然而他們也不能證明這個；實際上事實所表現的恰與這相反。

例如瑞士服區 (Vaud) 的公社在冬季村民全體一同去斫伐共有的樹林。在這勞動的節期中，對於工作的最大熱心以及人類精力的最大表現完全顯示出來了。一切工錢的勞動和私有主的努力都不能與這個相比。

又如俄國的某村，全村人民一同到公社所有或租借的田地上去割草。在那裏你們便可以看出當人們爲着共同生產而共同勞動的時候，能夠生產若干量的東西。同伴中間互相競爭所割的草的多少，婦女們也奮勇做事，不落刈草者之後。這也是一個勞動的節期，在這個節期中一百個人在幾小時之間便能夠完成平日各人分開做時，幾天中方能夠做完的工作。孤立的所有者的工作，如果拿來和這個比較，便是一個何等可憐的對照。

實在，我們還可以從美國的開拓者和瑞士，德國，俄國以及某一些法國的村落中，引出許多的例子。又如俄國石工，木匠，船夫，漁夫等的“阿爾特耳”(Artel，即同業公會)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引用的，這些人共同地擔任一種工作，自己分配他們的生產或者所得的報酬，並不要經過中間人(經紀人)之手。我在英國造船所中所見到，依照這同樣的原則，付給報酬時所完成的工作量，也是可以引用的。我們還可以舉出游牧種族的共同大狩獵以及其他無數偉大的共同事業。無論在什麼地方共同事業確實要比工錢勞動者與孤立私有主的工作優勝得多。

安樂——即是生理上，藝術上，道德上的欲求之滿足，常常是鼓舞勞動者的最有力的東西。做傭工的人雖辛辛苦苦，還難於維繫生命；而自由的勞動者知道爲着他自己和別人的安富與奢侈，是以他的努力爲比例而增加的，因此他便愈加發揮他的精力與智力，更得着很多很多的生產物。一個是永遠釘在貧窮上面的，其他一個却有將來的安富和奢侈的希望。全個秘密就在這裏。因此在一個以萬人的安樂爲目的的社會，以人人有享受生活的一切表現之可能性爲目的的社會中，當然只有志願的勞動，是比較在現在的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制的鞭笞之下的勞動所生產的物品更多而且更好。

II

如今凡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勞動的負擔放在別人肩生的人，都這樣做，而且誰也相信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生存所必需的勞動主要的乃是筋肉勞動。我們無論做藝術家也好，科學家也好，要是我們沒有筋肉勞動所做出來的東西——麵包，衣服，道路，船舶，燈光，熱度等等，我們連什麼事都不會做出來。而且無論我們的快樂是何等高尙的藝術的，何等深遠的玄學的東西，然而都是離不掉筋肉勞動的。這種勞動乃是

生活的基礎，但是一般人想避免的又正是它。

我們早就想到如今的情形一定是這樣。

因為現在要做筋肉勞動，便是把自己每天關閉在不衛生的工廠裏面經過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把自己鎖在同樣的工作上面，經過二三十年，甚至於一生。

這便是說這些人被命定為得着些少的工錢，不能顧到明日的安全，常有失業的恐懼，永遠是貧窮困苦的，其中大部分的人在為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以外的人的衣食住，娛樂，教育等等勞動了四十年之後，總是悲慘地死在慈善病院裏面。

這便是說把你的一生蓋上了“劣等”的印記；因為政治家常說：筋肉勞動者總要劣於頭腦勞動者，那個在工廠裏勞動了十小時的人並沒有時間，更沒有方法，來享受科學與藝術的高尚的快樂，甚或沒有欣賞此等快樂的修養準備；他不能不就拾起從特權階級食桌上面落下來的麵包碎屑認為滿足了。

我們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筋肉勞動自然會成為命運的詛咒了。

我們又知道所有的人只有一個夢想，——即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脫離這種劣等的狀態為着他們自己創造一個“獨立的”地位，這是什麼意思呢？——便是也靠着別人的勞力來生活。

只要筋肉勞動者的階級與頭腦勞動者的階級分開存在的時

候，只要黑手與白手中間的區別存在的時候，情形總是如此的。

實在，要是勞動者知道從生到死所等待着他的命運，便只是生活在凡庸，貧窮與明日的不安中間，那麼，他對於這沉重鬱悶的工作還能夠有什麼興趣呢？因此當我們看見大多數的人每天早晨動手去做他們的艱苦的工作時，我們不禁驚奇他們的堅忍和對於工作的熱心，以及那種使他們像盲目地服從動力的機械一樣，過他們的困苦生活的習慣：他們不但絲毫沒有明日的希望，而且他們永遠不會想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或者至少是他們的子孫會因為是人類的一份子，便應該享受今日少數特權者所壟斷了的人類共有的一切豐富的自然界的寶藏，一切由智識與科學的和藝術的創造等等所產生的快樂。

我們要廢止工錢制度，我們要實行社會革命，便是要廢止筋肉勞動與頭腦勞動中間的區別；如此，則勞動便不會再是命運的詛咒了；它將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而成為：人的全部才能之自由的行使。

而且現在應該把那假定優等的勞動只能在工錢制度的鞭子下面產生的傳說加以嚴格的分析了。

我們不必去參觀什麼特殊的模範工廠和製造場，只要到那些普通的工廠裏去看一下，就足以看出那種成了近代工業特徵的人類精力之巨大耗費。例如有一個組織多少合理化的工廠，

同時就有一百以上的工廠把人的勞力任意浪費掉，而其真正的動機也不外是每天替雇主多掙幾鎊金錢罷了。

在這裏你又會看見許多從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終日坐在板凳上，胸部陷入，像患着熱病那樣地搖着他們的頭和身體，又像魔術家那樣快地挽繫那些織花邊機上剩下的廢物——不值價的棉絲斷節的兩端。像這樣搖搖戰慄的身體能夠生出怎樣的子孫貢獻給社會呢？雇主們却要說：“但是他們在我的工廠裏所占的位置很小，每天不過替我賺了六便士的淨利。”

在倫敦的某大工廠裏，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因為常常把放着火柴的木盤頂在頭上從這間屋搬到那間屋去的緣故，在十七歲便禿頭的女子，其實把火柴搬到桌上去的工作，一架最簡單的機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沒有特別技能的婦女的勞動並不值錢，爲什麼還要用機器呢？假使這些女工不能再做下去，我們還可以另外雇用一些來代替，因為在街上這類女子多得很。”

在一個結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赤足的小孩挾着一束報紙睡在一所大廈門前的石階上——因為童工是如此價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這個小孩每晚沿街賣報，賣得十個便士，他~~只~~能夠得到一便士或一便士半。而在所有的大都市中，你又會看見許多強壯的男子在街頭彷徨，他們已經失業數月了；同時他們的女兒在機織工場裏過度炎熱的蒸汽中，漸漸失去了臉上的血

色；他們的兒子或則提着鞋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鞋，或則呆立在街角，向過往的人乞討一兩個便士，或則把應該用來學習一種技能的光陰耗費去替賣小菜的人提籃子，到了十八歲或二十歲就變成了永遠的失業者。

從舊金山到莫斯科，或者從拿波利(Naples)到斯托哥爾摩(Stockholm)，情形都是一樣。人類精力的浪費，便是近代工業的最顯著，最重要的特徵，至於商業上的浪費，比較更大得多，這是不用說的。

把經濟學這個名稱，給與在工錢制度下面浪費人類精力的學問，這是何等可悲的諷刺！

還有呢，假使你去和一個組織很完備的工廠的管理人談談，他便會直率地向你說，現在要得到一個熟練，勤勉，熱心的專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一來求工作的二三十個人中間有一個這樣的人，縱然是我們裁人的時候，我們也決定雇用他。我們一見這樣的人便知道的，我們一定要雇用他，縱使第二天就不得不把一個年紀較大，工作較不勤快的工人開除，我們也情願。”而那些已經接到解僱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進資本的預備兵大隊（即失業的工人）裏去，這些人僅僅在工作很多或者發生罷工潮僱主抵抗罷工工人的時候，才能夠在織機或工作檯旁邊作工。至於那些因

廠內的工作減少被上等工廠辭退出來的普通的工人，他們也會加入這羣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隊伍，到二等工廠裏去作工，這些二等工廠就靠着用譎詐欺騙的方法對付購買者（特別是遠方國家的購買者），來賺錢維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們談談，你一定會明白工廠裏的通例是——永不要你盡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錢——下等工作。”這便是工人初進這樣的工廠時，他的同伴給他的忠告。

因為勞動者都知道，假使他們起了好心，依着雇主的願望努力勞動，增加物品的產量，以適應大批急迫的定貨，那麼，這種辛苦的勞動便會成爲將來工資表的標準了。所以在這一類的工廠裏，他們決不願意盡力去生產。在有些工業裏，人們爲着維持高的價格起見，故意限制着生產額，有時還有一種口號，“狡猾地去幹”，這就是說，“工錢少，工作壞”。

工錢的勞動便是奴隸的勞動罷；這樣的勞動並不能夠，而且也不可以生產出它所能生產的。現在正應該把以爲工錢制度是生產的勞動之最好的獎勵的那種傳說拋棄了。如果論到現在的工業比我們祖父時代的工業，在生產上加多了幾百倍，這是由於前世紀末葉物理化學的突然發達；不但不是靠着工錢制度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力量，而且還是與這組織完全無關的。

III

那些認真地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決不能否認共產制度的利益，不過他們認為這個共產制度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換句話說，是安那其主義的。他們知道受着金錢的報酬的勞動，甚或就在“勞動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國家付給它所支配的勞動團體的)也仍舊保存着工錢制度的特質及其弊害。他們承認縱使社會佔有了生產機關，全個組織不久也會受到工錢制度的害。他們更承認：要是對於所有兒童實施一種“完全的”(integral)教育，保持着文明社會的勤勞的習慣，而且讓各人有選擇和變更職業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見同等的人爲了萬人的安樂所從事的工作的引誘力，那麼一個共產的社會中是不會缺乏生產者的，反而這些生產者立刻會使土地的生產力增加到三倍乃至十倍以上，並且給工業以一個新的刺激。

這個，反對我們的人也同意的。他們却又說：“但是危險是要從那些少數的懶惰者方面來的，他們即使在那種使勞動成爲愉快的優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勞動，而且也不會有正規的勞動習慣。如今因爲有飢餓的恐慌，所以無論誰，即使是最倔強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動作。遲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隻黑羊可以染污全體的羊羣，二三個怠惰者和倔強者就足以誘

惑他人，惹起工場裏的混亂與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爲不可能；所以結果我們不得不恢復原來的強制制度，強迫那些倔強的罪魁與他人同樣工作。那麼，以工作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工錢的制度，豈不是既不傷害勞動者獨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強制的唯一方法嗎？所有其他的手段多少總帶有由強權來不斷干涉的意味，這是自由的人所極憎厭的。”我們相信這個反對論的真義便是如此。

我們第一便要認清這樣的反對論是屬於擁護國家，刑法，裁判官，獄吏一方面的。

強權論者說：“只要還有極少數的人不服從社會的習慣，我們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監獄等等，縱然這些制度已經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無法的事。”

所以我們只能夠重述着我們關於強權本身屢次說過的話：“你們要避免一種弊害，却把一種更大的弊害用來做避免的方法，而且這個弊害就是你所要補救的那些弊害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你們是早已知道的了。你們不要忘記創造出現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便是工錢制度，即不出賣勞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種強權論者的論法，不過是詭辯地替現制度的罪惡作辯護。工錢制度並不是爲着要除去共產主義的弊害而創設的；它的起源和國家，私有財產的起源相同，是從別處來的。這

是從被武力強迫實施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生出來的，不過穿上近代的服裝罷了。因此，擁護工錢制度的議論，和替國家與私有財產辯護的議論一樣，都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我們仍還想把這個反對論考察一下，看看裏面究竟有沒有真理。

第一，一個依照自由勞動的原理而建設的社會，假使遇到懶惰的人，是不是用不着像現在有的那種強權的組織和工錢制度，也能夠維持下去嗎？

例如有一個爲着某種特殊企業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的團體。因爲大家都相信這個企業會得到成功，他們一心一意地勞動着，然而其中有一個人，他却常常缺席，不盡他的責任。難道因爲他一個人的緣故，便必須把這團體解散嗎？或者選舉出一個會長來課以罰金嗎？再不然，製造出懲罰的條例嗎？其實，顯然用不着這樣做，只有在某一天這個使企業陷於危險地位的朋友會受到勸告：“朋友，我們很願意和你在一起工作；可是你時常放棄你的責任，你又荒廢了你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不和你分離了。去罷，去找那些對你這種行爲覺得不要緊的同伴罷。”

這是極其自然的方法，各處都在實行的，便是如今在所有的工業裏，這個方法和罰金，扣薪，監督等制度同時流行，甚或彼此競爭着；一個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到工廠裏去，然而假使他的

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懶惰的習慣和其他的缺點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愛吵鬧的，那麼，就只有最後一個手段：他必須離開這個工廠。

強權論者認為在工廠裏使得工作有規則而且品質優良的人，便是萬能的雇主和監工，實則，在每個稍為複雜的企業中，在一件生產品完成以前必須經過多數人的手，那個使工作優良的人，便是工廠本身，換句話說，即是全體工人。因此在英國私人工業的工廠中，所謂監工那樣的人實在很少，平均比法國工場中監工的數目少得多，而且比英國國有工廠裏的也更少。

維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種標準，也用這樣的方法。強權論者說這是靠鄉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實際上公德的維持，和鄉丁，裁判官，警察等並沒有什麼關係。有人在很久以前就這樣說過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僅在工業製造所裏事情的進行是向着這方面的；其實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事實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書呆子，才是沒有注意到。要是一個和其他鐵路公司聯合的某鐵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約，讓火車耽誤了時間，使貨物凌亂地堆在車站上，其他的公司便會以解除此種契約來威脅，這種威脅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贊成國家的一派是這樣相信的，商業

上的契約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為懼怕法律的緣故。但事實絕對不是這樣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約的商人都不會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審判的。像倫敦那樣的商業最繁盛的地方，萬一有債權者提起訴訟的事，大多數的商人就會完全拒絕和那個強迫他們中間的一個發生訴訟的人進行任何交易。

既是這樣，那麼在工廠裏的工人，商業中的商人，以及運輸組織中的鐵路公司中間，現在所通行的方法，為什麼又不能用於以志願的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中呢？

例如有一個團體，它的各個會員約好履行下面的條約：“我們共同承認凡是我們的房屋，糧食，街道，運輸機關，學校，博物館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從二十歲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這二三十年間，每天應該拿出四五小時來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選擇你所願意加入的生產集團，或者另組織新的集團，但以從事必需的生產為限。其餘的時間你可以用來和你所喜歡的人共同從事於娛樂，藝術，科學，總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傾向去做就是了。

“我們所求於你的，不過是一年中間在從事衣食住的生產集團中勞動，或者在公眾衛生，運輸等機關中服務一千二百小時乃至一千五百小時。我們對於這些勞動的報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這些集團所已生產或將生產的東西。然而倘使屬於我

們聯合的幾千個團體都不容納你，(不管動機如何)；倘使你絕對不能生產有用的物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麼，你就像孤獨的人或廢人那樣地過日子罷。倘使我們是異常富裕的，能夠以生活必需品給你的時候，我們也很高興給你的。你是一個人，你也有生活的權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條件之下生活，離開人民的隊伍，那麼，你在和別的公民間的日常關係上，一定會受到苦惱。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們發見你的才能，親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勞動，解除你對於社會的一切道德的義務，那麼你就會被人視爲中產階級社會的鬼魂。

“最後，假使你不喜歡這個，你就去罷，你到這個廣大世界的另一個地方去找別的条件，找別的同志，和他們一起根據新的原理組織起來。我們却還是喜歡我們自己的東西。”

假使共產社會裏懶人太多，這便是在那個社會裏去掉懶人的方法。

IV

我們不相信在真以個人自由爲基礎的社會中，會有耽心這樣的事的必要。

其實，不管資本私有權怎樣鼓勵懶惰，事實上沒有病而真正懶惰的人却是比較的少。

工人們常說資產階級是懶惰者。自然在這些人中間懶惰者確實是很多的，不過他們也是例外。反而在各個製造工業中我們常常看見幾個異常勤勉的資產階級的人。誠然資產階級的多數憑藉着特權地位的利益，安排他們自己去做勞苦最少的工作，而且他們要在空氣，食物等等合於衛生的條件下面工作，所以他們做起事來不會感到多大的疲乏。然而這些工作的條件，正是我們認為所有的勞動者應該沒有例外地享受的。

我們還應該說，有錢的人靠着他們的特權地位只去做無益的事，或者有害於社會的事。不過閣員，局長，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幾小時他們自己多少有點討厭的工作，雖然他們中間誰都不喜歡這些義務工作，甯願享受他們的閒暇時間。倘使這種工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他們也是一樣地感到厭倦。然而正因為資產階級用過大的精力來防衛他們的特權地位，甚至來做有害的事（有意或無意的），所以他們才能夠打倒地主的貴族，而得長久支配民衆。假使他們是懶惰者，他們早就不能夠存在了，像古代貴族那樣地消滅了。所以在將來那個只要求他們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時的愉快有益而且合於衛生的工作的新社會中，他們一定會好好地勞動，而且他們也不能讓現在勞動者所享受的可怕的條件繼續存在，而不加以改良。假使像赫胥黎¹⁰¹那樣的人，只要跑到倫敦溝渠裏作了五小時的工，他一

定會發見把這溝渠弄得像他自己的生理學實驗室那樣衛生的方法。

至於說大多數勞動者的懶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經濟學家和慈善家才能夠說出這樣的胡話。

你如果去問一個聰明的製造家，他一定會告訴你說，要是工人只知道懶惰，那麼所有的工廠都只得關門了，無論什麼嚴酷的手段和偵察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你該記得1887年幾個煽動者用“狡滑地去幹”主義——“工錢少，工作壞！”；“馬馬虎虎地做就行了，不要過於勞苦，把你的能力耗費盡了”，等等來宣傳的時候，英國的雇主們恐慌狼狽的情形。這些人先前還痛罵勞動者的不道德和他的工作的粗惡，這時候却大聲疾呼：“他們使工人墮落，他們要毀滅工業”了。假使工人早就是懶惰者，對於他們，雇主還不斷地拿着逐出工廠的話來恐嚇；那麼，“墮落”二字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當我們說起懶惰者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知道這是社會中極少數人的問題；而且在為少數人立法以前，我們先來研究懶惰的原因，豈不更好嗎？任何人如果用賢明的眼光來觀察事物，他一定可以看見在學校裏被稱為懶惰者的兒童，大半是那些不懂得教師所講授的功課的人，他們之所以不懂，實則並非由於

¹⁰⁴ 指 THOMAS HUXLEY (1825—1895)，英國生物學家。——譯者。

他們的懶惰，而是教授法不良的結果。又有很多兒童因為貧窮與不合衛生的教育的緣故，得到了“腦貧血”的病，以致對於教師講授的功課不易理解。一個對希臘語，拉丁語等等功課不用功的兒童，如果教他學習科學，在教授時一面用筋肉勞動來幫助講授，這個學生的功課就能夠做得很好。一個在數學方面愚鈍的女孩，如果偶然有人把她從來不曾理解的算術初步對她詳細解說一番，她也許會成為班中的第一等數學家。在工廠裏懶惰的工人，如果去培植他的園地，他在天剛剛發亮時就會起來，一面眺望着初昇的紅日一面勞動；傍晚當一切都休息的時候，他又會到園裏去工作。

有人說塵埃便是那在不適當地方的物質之謂。這個定義在現今所謂懶惰者的十分之九身上都可以適用。他們是走錯了和他們的性質，才能都不適合的方向的人。我們讀到偉大人物的傳記，一定會驚訝在他們中間竟然有很多的“懶惰者。”他們在未發見正當的路以前，總是異常懶惰；但是後來就非常勤快了。達爾文，司提分生¹⁰⁵及別的許多人都是這一類的懶惰者。

所謂懶惰者常常是這樣的一種人：他們不願意把一生的光陰犧牲來專門做針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錶的工作的百分之

¹⁰⁵ 指 GEORGE STEPHENSON (1780—1848) 英國工程師，火車頭的發明者。——譯者。

一，却想把他有的豐富的精力用在別的地方。他又是一個反叛者，他不甘爲了替雇主獲得無數的快樂的緣故，讓自己一生都在工作檯旁邊過日子，同時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比他更愚笨，不幸的只是他沒有生在高樓大廈中，却出生在一間破陋的屋子裏面。

還有多數懶惰者之所以懶惰，是因爲他們對於自己被強迫學習用以謀生的職業不大清楚了解。他們看見自己親手做出來的物品並不完全，盡力想好好地去做，却總不成功，後來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不良的工作習慣，永遠不會成功了，因此就憎恨起他們的職業來，而且因爲他們又不知道別的職業，他們便憎恨起一般的勞動來。無數的勞動者和技術家都失敗在這個原因上面。

反之，從年青時候便學習鋼琴彈得很好，或者把鉋鑿，毛刷，銼子等等使得很好的人，他決不會拋棄他的鋼琴，鑿，銼子等等的。只要他不勞動過度，他便會覺得他的工作是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這個懶惰的名稱之下集起了由各種原因生出來的結果，這些對於社會並不是害惡之源，而且能夠成爲利益之源。像關於犯罪和人類才能的一切問題一樣，人們聚集起許多事實，但彼此間並無共通點。他們說起懶惰和罪惡，却不去分析它的原因。他們只忙着處罰這些過失，而不去考究刑罰是否反能獎勵

“懶惰”與“犯罪”。¹⁰⁶

所以自由社會如果看見了其中懶惰者數目的增加，要設法阻止，它在求助於刑罰之前便會先去考察懶惰的原因。例如在那個我們先前所說的患貧血病的兒童的腦筋中，是不能夠再把學問貫輸進去的了，我們應該先給他吃營養品，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體質強壯；不要再把他的時間浪費了，帶他到鄉下或海邊去；並不用書本，就在露天給他講授各種學問——教幾何，就測量某尖頂的距離，某樹木的高度；教博物學，就採集花草或在海裏捕魚；教理科，就製造捕魚用的小船。然而千萬不要把什麼古典的文句和已經死了的語言，¹⁰⁷再裝入他的腦裏去。不要把他弄成一個懶惰者。

這樣的兒童是不會有秩序和正規的習慣的。所以應該使他們先在自己中間保持秩序，然後，在聰明的教師的指導下，實驗室，工場，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許多器具所做的工作，都會把這方法教給他們，然而千萬不可讓你們的學校把他們教育成混亂無秩序的。因為學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桌子的排列整齊，而且學校在講授教育方面真是混亂得很，它決不會引起任何人對於

¹⁰⁶ 參看我的俄法獄中記（*In Russian and French Prisons*）。

1887年倫敦出版。（譯者按原書已絕版，譯文即中譯本全集第二卷）——著者。

¹⁰⁷ 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譯者。

和諧團結的愛心，也不能教授任何人以工作的規律方法。

八百萬個學生代表出八百萬不同種類的才能，你們用一個教育部長爲這八百萬學生所制定的教授法，只不過實行一個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罷了。難道你們不知道麼？你們的學校成了一個懶惰的大學，恰如你們的監獄是一個犯罪的大學一樣。讓學校自由，把你們的大學學級廢掉，只靠着志願者的講授；你們應該從這種方法開始，不要再製造什麼制止懶惰的法律了，因爲這樣的法律只有使懶惰者的數目愈見增加。

那麼，對於那些不願一生專門去做某物品的極小部分的勞動者，以及整年整月悶在製釘機旁邊終於發生憎厭的工人，應該使他們有機會去耕種田地，斬伐樹木，冒風雨，航大海，乘火車頭在世界各處奔馳；但不要再強迫他們一生去伺候一架小機器，或繫螺旋釘的頭，或鑽縫針的眼孔。

去消滅懶惰的原因罷，而且你們也會明白真正嫌厭勞動，特別嫌厭志願勞動的人，是極少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因此也沒有特別爲他們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第十三章

集產主義的工錢制度

I

在我們看來，集產主義者的改造社會的計畫犯了兩重的錯誤。他們一面主張廢止資本主義制度，一面，又希望保存着代議政治和工錢制度——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至於所謂代議政治，我們已經常常說過了。在英國，法國，德國或在美國，歷史留給人們的教訓已經不少了，爲什麼那些聰明的人士（在集產主義者裏面也有不少這樣的人）仍還去做國會或市議會的議員呢？我們實在不能夠明白。

現在議會制度已經崩壞了，四面八方都起了攻擊議會制度的呼聲，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不僅代議制度的結果，便是它的原理，也被人攻擊得沒有存在的餘地。然而那些號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怎麼還可以擁護這個已經受到死刑宣告的制度呢？

議會制度是中產階級建立來反抗王權保持自己的權利的，

他們同時還用它來辯護並且擴充他們支配勞動者的勢力；因此，議會制度實是中產階級特有的制度。便是那些擁護這種制度的人也沒有認真地主張過一個國會或市議會真正就可以代表一國或一城。其中較有見識的人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不過利用議會制度來建築一道堤壩，反抗王權保護自己罷了，並不會給人民以自由的。況且現在的人民都覺悟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時這利益的種類又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這個制度便格外沒有用了。因此各國的民主主義者雖然努力追求各種改善的方策；但終於是徒然的。“國民投票”(Referendum)試行過了，然而結果是失敗的；有些人又空談着“比例的代表制”，“少數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的“議會的烏托邦”，還是沒有用處。總之，他們都是努力去找出不可能實現的東西，每次總是經過新的實驗後才知道失敗了；於是，人民對於代議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就工錢制度而論，也是一樣的；因為既然人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將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又怎樣能夠維持着工錢制度呢？然而集產主義者却要這樣做，他們拿“勞動券”來做集產主義的大雇主（即國家）報酬勞動的方法。

從羅拔特·渦文的時代起，英國的初期社會主義者採用“勞動券”制度（插圖18），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不過企圖使

資本與勞動協調而已，他們排斥那個主張用革命的行動來奪取資本家的財產的思想。

蒲魯東後來也抱着這同樣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義的制度裏，他努力想減少資本的害毒，並不管私有財產的存廢；私有財產是他平日極其厭惡的東西，然而他相信要保護個人反抗國家，私有財產却又是必要的了。

還有那些多少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經濟學家贊成“勞動券”，也是無足怪的。至於把“勞動券”作為工錢付給勞動者，或者把印有帝國元首或民主國首領的肖像的錢幣付給勞動者，他們都視為無關重要的。他們只想保存着房屋，土地，工廠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着房屋和製造上所必需的資本的私有制，而“勞動券”恰好適應着保存私有財產的目的。

只要“勞動券”能夠與珠玉車馬等交換的時候，那麼，有房屋的財主也會願意把它們當作房租收進。只要房屋，田地，工廠等等屬於私人，那麼就會有許多勞動者為着求得財主們允許在他們的田地上或工廠中作工，或在他們的房屋裏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錢給他們；不管是“勞動券”也好，或錢幣也好，但總是租錢。只要向勞動者索取租錢的制度仍舊存在，而且這種索取租錢的權利仍還留在財主的手裏，那麼，財主們也願意接受金錢，紙幣，以及可以與各種貨物交換的支票。然而當我們承認房屋，田地，

工廠不應再歸私人占有，而應該成爲公共的財產時，那麼怎麼還可以擁護這個工資的新形式——“勞動券”呢？

II

我們現在且來詳細考察現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集產主義者所倡導的勞動報酬的制度。¹⁰⁸

約言之，集產主義便是這樣：各人在田間，工場，學校，病院，和其他的地方作工。至於勞動時間則由領有土地，工場，道路等等的國家來規定。對於每日的勞動都由國家給以“勞動券”作報酬，在這“勞動券”上面清清楚楚寫着：八小時的勞動。勞動者拿着這張紙票便可以向國有商店或各種組合購買各種東西。這種票子又是可以分開的，可以隨意買一小時勞動的肉，十分鐘的火柴，三十分鐘的烟草。在集產主義的革命成功以後，我們不再說什麼“兩便士的肥皂”，却要說“五分鐘的肥皂”了。

多數的集產主義者迷信着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定的（也相信着馬克思所定的）技術勞動與單純勞動的區別，告訴我們

¹⁰⁸ 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者現在還自稱爲集產主義者，他們所謂“集產主義”包含着一切生產機關的共有，以及“各團體依據共產主義或其他原理，照他們認爲是適當的辦法，來自由分配生產物”的意義。——著者。

現在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者不再稱爲集產主義者了。——譯者。

說：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的報酬，應該比單純勞動的報酬多。因此一小時醫生的勞動應該視作和兩三小時看護婦的勞動或三五小時掘土工人的勞動相等。所以集產主義者格龍倫德(GRONLUND)說：“專門或技術的勞動所得的報酬，應該比單純的勞動所得加倍，因為這種勞動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的”。

其他的集產主義者如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蓋德¹⁰⁹等則不承認此種區別。他們主張“工錢平等”。即醫生，小學教師，大學教授與掘土工人所得到的工錢(用“勞動券”支付)是一樣的。醫院裏看護病人的人的八小時勞動，是和八小時掘土的勞動，或在工廠礦坑中的八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

還有一些人更讓步一點；他們以為可憎厭的不衛生的勞動(如在陰溝裏作工之類)應該比那些愉快的勞動所得的報酬多。他們說，在陰溝中勞動一小時應該和大學教授的二小時的勞動相等。

此外還有一些集產主義者贊成依各產業組合的勞動總額付給報酬。某一個組合可以說：“這裏有一百噸的鋼鐵，是我們團體裏一百個工人花費了十天的工夫生產出來的。他們每天勞動八小時，那麼，生產一百噸鋼鐵，要費去八千小時的時間，一噸便要費去八十小時”。因此，國家便給這個組合以一小時的勞動券

¹⁰⁹ JULES GUESDE (1845—1922)，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八千張。這個組合得到八千張勞動券，便以他們所認為適當的方法來分配給鐵工組合的各會員。

另一方面，一百個礦工花費了二十天的功夫，掘出八千噸煤，則一噸煤值二小時。於是礦工公會得到一萬六千張一小時的勞動券，且照他們所認為適當的方法把這些勞動券在會員中間分配。

假使礦工抗議地說，一噸鋼鐵的價值不是八小時的勞動，不過是六小時的勞動；假使大學教授要求他每日的報酬應該四倍於看護婦；那麼，國家便會出來干涉，解決他們的爭端。

總之，這便是集產主義者希望在社會革命後產生的組織。他們的原理，我們已經知道了，便是：生產機關為集合的財產，且以各人所費於生產的時間為標準，同時斟酌他的勞動的生產力而分配報酬。致於政治組織還是議會制度，不過改良一下罷了，如採用國民投票——國民全體參加表明可否的投票——且對於被選作議員的人予以強制的訓令。

我們以為這種制度在我們看來是絕對不能實行的。

集產主義者最初宣言一個革命的原理——私有財產之廢止，可是言猶在耳，他們便起來否認此種主張，並且維持着那個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生產和消費的組織了。

他們一面宣言革命的原理，一面又忽視這個原理的必然的

結果。他們忘記了要廢止勞動機關(土地,工廠,道路,資本)的私有,便必須使社會向着新的道路進行;而且還必須完全顛覆現在的生產組織,使它的目的和手段都應該完全改變,而且在土地,機械和其他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的時候,各個人間的日常關係也就應該馬上跟着變更。

他們說:“不要私有財產”,但立刻便努力來維持私有財產之日常的表現。“就生產方面來說,你們是一個公社,什麼田地,工具,機械,以及其他一切已經發明的東西——工廠,鐵道,港口,礦山等等都是你們的。在這個集合的財產中,各人應有的部分都是相同的,並沒有絲毫的差別。

“但是從明天起你們要仔細商量你們各人對於製造新機器,開掘新礦山等工作應該擔任的部分。你們要精密地估量新的出產物的哪一部分是屬你們各人的。你們要計算你們勞動的時間,並且還要注意不要使你們的鄰人的一分鐘比較你們的一分鐘購買到更多的物品。

“並且以一小時,兩小時來計算是沒有正確的標準的,因為在有些工廠裏一個工人同時可以管理六架機器,在有一些工廠裏一個人却只能管理兩架;你們便要計算你們所費去的體力,腦力,精神力。你們又要計算你們做學徒的時間,以便估計你們各人對於今後的生產的貢獻。這些都是在你們宣言並不計算各人

對於過去財產所應有的部分以後所應做的事。”

但是我們很明白一個社會是不能基礎在兩個完全對立的原理，兩個永遠衝突的原理上面的。要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公社有了這樣的組織以後，那麼，它不是被強迫回復到生產機關的私有去，就是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共產的社會。

III

我們已經說過某一些集產主義的著作家企圖在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與單純的勞動中間定下一個區別。他們以為工程師，建築家，醫生等入的一小時的勞動應與鐵匠，泥土工，看護婦的兩小時或三小時的勞動相等。而且在那些必須學習的各種職業與散工的每日的簡單工作中間，也應該定下一個同樣的區別。

要定下這種區別，就一定會維持現社會的一切的不平等。這便是在工人與那些企圖管理工人的人們中間預先劃出一個界限。這仍然把社會分成兩個區別得很明顯的階級——上面是有智識的貴族，下面是手胼足胝的賤民——一個階級的人民命定了去替別一階級服役，用自己的手去供給別一階級的人的衣食；而別一階級的人却利用他們的閒暇去研究怎樣管理那些替他們勞動的人的方法。

這便是使現社會的一個顯著的特性復活，而且使它得到社

會革命的認可。這便是把在古代衰亡的社會中就受到攻擊的弊害，當作一種原理建設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會得着怎樣的回答。他們會說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還要引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及馬克思的話來證明工錢的等級有存在的理由，因為工程師的“勞動力”所取償於社會的實在比較掘土工人的“勞動力”為多。實際上——經濟學家不是證明過工程師應該比較掘土工人多支二十倍的薪給，因為要造成一個工程師所“必需”的費用，是要超過造成掘土工人必需的費用麼？馬克思不是也主張過這兩種筋肉勞動中間的區別是同樣合於邏輯的麼？他採用了里加圖的價值論，主張貨物的交換，應以生產此貨物時社會上所需的勞動量為正比例，此外，再不能夠得着別的結論。

然而我們對這個問題另有意見。我們知道假使工程師，科學家，醫生所得的報酬比一個工人所得的大十倍或百倍；織布工人的報酬比農業勞動者的大三倍，比製造火柴的女孩大十倍，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生產費”，不過是由於教育的壟斷，或工業的壟斷而已。工程師，科學家，醫生不過利用他們的資本（他們的文憑證書）恰如中產階級的雇主利用他的工廠，貴族利用他的門第爵位一樣。

至於雇主之所以付給工程師以比工人的多二十倍的報酬，

這不過是爲着個人的利益；假使這個工程師一年裏可以使生產費用節省四千鎊，雇主便分八百鎊給他。假使一個工頭很巧妙地剝削工人省下四百鎊，他便很高興地每年分八十鎊或一百二十鎊給這個工頭。他拿出四十鎊，便希望得到四百鎊；這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至於各種手工業間的差別，也是基於這同樣的理由產生的。

因此我們不必再討論那個提高熟練勞動的價值的“生產費”了；他們也許又要告訴我們說：一個在大學裏愉快地度過他的青春的學生有權利得到比較一個從十一歲起就辛辛苦苦地憔悴於深山窮洞之中的礦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錢；一個織布工人有權利得到比農業勞動者大三四倍的工錢。實際上教養一個織布工人的用費並不見得就比教養農業勞動者的費用大四倍。織布工人得到這種恩惠，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工業在國際貿易中，從別的工業未發達的國家所得來的利益，而且還是由於各國政府所給與這工業的特權較農業爲優。

誰也不會計算過一個生產者的生產費，假使說一個高等游民對社會的費用比一個勞動者多數倍，我們把貧民中幼孩的死亡，貧血病的流行，以及夭亡等等事實計算起來，且看看一個健壯的普通工人對社會的費用究竟是不是比熟練的職工少些！

例如付三十個蘇給一個巴黎勞動者，付六個蘇給一個爲了

製造花邊快弄瞎眼睛的奧威尼¹¹⁰農家少女，付四十個蘇給農夫，難道有人能夠說這便是代表他們的“生產費”麼？我們知道他們有時得到的工錢，還要比這個數目少，但是我們又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全是因為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要是他們不願意這點微少的工錢，他們便會餓死。

從這裏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報酬的等級乃是租稅，政府的保護和資本家的獨占之混合的結果。總之，這是國家和資本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關於工錢的一切學說都是發明來掩飾現社會的不公平的，我們不必再來討論它們。

又有人會向我們說，集產主義者的工錢等級是一個進步。他們說：“我們甯願見熟練的職工得到比普通工人所得的多兩三倍的工錢，却不願意看見一個大官在一天裏得到一個工人一年中勤苦作工所不能得到的錢；因為前一件事總比較好一點。而且這是更進一步趨向平等了”。

但是在我們看來，這却是退步。要在新社會中定下單純勞動與專門勞動的區別，這無異乎在革命時期中又把我們現在所屈服忍受而又不能不認為是不正當的殘暴事實加以認可，當作一個原理了。這簡直在做做法國議會¹¹¹的那班先生們的舉動，

¹¹⁰ Auvergne, 在法國南部。——譯者。

¹¹¹ 指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譯者。

他們在1789年8月4日宣言廢止封建權利，然而在8月8日他們又承認這同樣的權利，徵收農民的賦稅以賠償貴族，且把此種賦稅置於革命的保護下。這又像在做俄國政府，俄國政府在解放農奴時又曾宣言，從前已認為屬於農奴的土地，今後又為貴族所有。

或者再舉出一個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1871年巴黎公社議決公社議事會會員的薪資每天十五法郎，而同時城壘上的國防隊的兵士每日僅得着三十個蘇，（即一個半法郎）還有人稱讚這決議為高的民主的平等。實際上公社不過把從前官吏與兵丁，政府與被統治者間的不平等加以認可罷了。這種決議若出之於投機的衆議院，似乎還值得別人稱讚，若出之於革命的公社，則未免可笑了。公社還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諸實行，就先把它們宣告死刑了。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部長每年得着十萬法郎的薪俸，而勞動者却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錢為滿足；工頭所得的工錢也要比尋常工人的工錢多兩三倍，並且在工人中間也分出許多等級，從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個蘇一天的農家少女；我們不贊成部長的高俸；同時也不贊成工人和貧家女子中間有十法郎和六個蘇的區別。我們說：“推倒教育的特權和門第的特權”。我們之所以要做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就是因為我們看不過這種

特權，我們要反抗它們。

我們在這個強權的社會中就已經起來反抗它們了。難道在將來宣告平等的社會裏，我們還能夠讓它們存在嗎？

有些集產主義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響的社會中，再要維持工錢的等級，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便急急提倡工錢的平等。但是他們又遇到了新的困難，他們所謂的“工錢平等”也就和別的集產主義者的“工錢等級”一樣，是同樣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社會既把一切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並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對這財富皆有權利，並不管他們對於生產這財富時所盡的力量如何，——這樣的一個社會，便不得不廢除一切的工錢制度；不管通貨也好，勞動券也好，應該一律廢止。

IV

集產主義者說：“以各人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報酬”，換句話說，就是以這個人對於社會所盡的職務的分量來作標準。他們以爲在社會革命發生，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的時候就應該即刻實行這個原理。然而在我們看來，假使社會革命竟不幸而倡導這個原理，則無異乎自己表示它的失敗；這也就是表示過去千百年放在我們肩上的那個社會問題，現在又不能夠解決了。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工人勞動愈久，所得報酬愈少，——

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這種原理，初看起來，好像是對正義的渴望。然而實際上它却只是繼續着從前的不公道。有了這個原理，工錢制度纔得以發生，於是產生了現社會的一切弊害和顯著的不平等；因為自從社會用貨幣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錢來估量勞動的價值的時候起，自從社會決定工人只應該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錢的日子起，那個得着國家幫助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歷史，實際上已經預先寫出來了；它就包含在這個裏面。

那麼，難道我們還要回到出發點，再經過一番這同樣的進化嗎？那些理論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以為革命必須是共產主義的，否則，它就會淹沒在腥血之中，於是一切又須從新開始了。

我們為社會所盡的職務，不管是在工廠裏，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夠用金錢來估量價值的。說到生產上面，實在並無所謂價值（一般人誤稱為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亦無使用價值的正確尺度。假設現在有兩個人，每天為社會勞動五小時，年年不息，雖是職業不同，然而所給與他們的愉快則一。所以在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勞動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工作分開，說甲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相等。

我們在大體上可以說，一個人一生每天犧牲了十小時的閒

暇，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是比較那些每天只犧牲五小時的閒暇或全然不犧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們却不能夠單單指出他的兩小時的工作，說他這兩小時工作的出產是要比較別一個人的——小時的出產多一倍，付給報酬時也多給一倍與他。這樣做去，便是蔑視了工業農業和現社會全部生活的複雜關係；而且把個人工作是全社會的過去和現在的勞動的結果這樣的事，完全忽視了。這好像一個人明明生在鋼鐵時代，還夢想在石器時代中生活一樣。

我們要是走進一個近代的煤礦去，便會看見那個立在大機器前面升降吊籠的人。他手裏拿着一條槓杆，停止或逆轉機器的動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間吊籠便逆轉了方向，他把吊籠扯上來又放下去，做得異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兩眼不動地注視着指針器，這指針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着那升降的吊籠每秒鐘所達到豎坑的那一點。指針若達到一定的度數時，他立即停止吊籠，恰在所需要的地點，一碼也不會高，也不會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車取下換上空車，於是他立刻扭轉槓杆，吊籠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須這樣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時或十小時。假使他的腦筋稍為休息一下，吊籠便會飛起來與齒輪衝突，打碎車輪，弄斷繩索，撞傷人，使礦坑裏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動槓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鐘，那麼雖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礦坑裏，每天也會

減少二十噸乃至五十噸煤的出產。

那麼，在礦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嗎？或者是那個在下面發信號叫他扯起吊籠的小孩呢？還是那些在豎坑下面冒着生命危險，甚或因煤氣爆發死在礦中的礦工呢？還是那個在計算上錯誤一點就會失却礦脈，叫礦工去掘毫無價值的岩石的工程師呢？或者還是那個投資於礦山，不聽專家的勸告，相信那裏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礦山主呢？

所以在礦坑中勞動的人對於煤炭出產的貢獻，當依他們的體力，精力，智識，才能，技能為比例。我們可以說他們各人都有生活的權利，滿足他的需要的權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證之後，也有滿足他的幻想的權利。但是我們怎樣能夠估量他們中間各個人勞動的價值呢？

並且，他們挖出來的煤，就完全是他們的工作的結果嗎？這也不是那些建築鐵道達到礦坑的人，以及在車站的四面八方修築馬路的人的成績嗎？又還不是那些耕種田地，挖掘鐵礦，斬伐森林，製造燒煤的機器，漸漸地使全個礦業發達的人嗎？

要把這些人各個間的工作劃出一個區別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們工作的結果來估量他們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們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勞動的鐘點來算分數，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對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

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應該承認一切參加生產
作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權利，其次應該承認他們的安樂的權利。

然而我們且就人類活動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種生活現象的全體來看。我們中間究竟誰能夠爲他的工作來要求最高的酬報呢？是診斷疾病的醫生呢？還是那個用她的合於衛生的看護治好病人的看護婦呢？最初發明蒸汽機的那個人呢？還是那個偶然一天拉繩子（這繩子從前用來拉開舌門，使蒸汽從活塞下進去）疲倦了，把繩子縛在機器的槓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遊戲，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他已經發明了現代機器的主要部分——自動的舌門的小孩呢？

是火車頭的發明家呢？還是那個提議用枕木來代替石頭（從前鐵道下面用石頭來墊，因爲沒有彈力，所以火車時常出軌。）的新壘城（Newcastle——在美國）的工人呢？是火車的司機人呢？還是那個執紅綠小旗叫火車停止或前進的打旗號的人呢？

我們又把那橫貫大西洋的海底電線的功勞歸給什麼人呢？歸給那個在博學的科學家們宣言海底電線不能通消息的時候，堅持着要這樣做的電氣工程師呢？還是歸給那個曾進言說用不着粗大的繩索而應該代以藤一般的電線的地文學家莫理¹²呢？或是歸給那些不分晝夜在“大東方”¹³船的甲板上一碼一碼地檢查海底電線，把那輪船公司的股東誤放在電線的不導電的外包

裏面，使電線無用的釘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士的志願者呢？

並且就較大的範圍來說，即在包含着快樂，憂患，以及種種臨時變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領域中，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該記得某人對他盡過職務，而且是個很大的職務，倘使有人用金錢來估量那職務的價值，他就會生氣的。有時這種職務不過是一句話——一句合時的話，有時或者又是要幾年幾月的經營才做得到的。難道對於這“不可計算的”勞役，我們能夠用“勞動券”去估量麼？

“照各個人的成績計算！”然而假使各人不願意使他的勞役超過自己所得到的金錢，鈔票或社會的報酬，那麼，人類社會將不能繼續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親的不肯花費光陰養育她的兒女，假使各人不能夠得到相當的代價，便一點東西都不肯拿給別人，假使人們看不見酬報的地方，就不肯多給一點與別人，那麼，人類種族便要滅亡了。

假使資產階級的社會仍舊一天一天地腐敗下去，假使我們已經走入一條沒有出路的窮巷裏面，非用大刀，闊斧，火把來攻擊舊制度，便不能夠脫逃出來；這全是因為我們計算得太厲害

112 M.-F. MAURY (1806—1873), 英國水道學者。——譯者。

113 Great Eastern 船名，原書缺，這是依據倫敦自由社出版的小冊子第一種工錢制度(*The Wage System*, 1920年新版)補入的。——譯者。

了。這是因為我們心中存着“爲求獲得方肯給與”的觀念。這是因為我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以債權和債務爲基礎的商務公司。

而且，集產主義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實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績爲標準而分配”的原理，社會便不能夠存在了。他們以爲個人必要的需要（我們不是說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樸¹¹⁴說：“這個原理（卓越的個人主義的原理）會被爲着兒童與青年的教育（包含他們的養育和寄宿）的目的而行的社會的干涉，以及關於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勞動者養老院等等的社會制度所緩和了”。他們知道一個有了三個小孩的四十歲的男子，他的需要總比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多些。他們也知道一個夜夜不睡，坐在搖籃旁邊喂小孩吃奶的婦人，不能夠和一個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樣多的工作成績。他們似乎也知道那些爲着社會勞動過度以至於衰弱的女，多半不會再比那些隨便把光陰消遣過去，過着國家高官的特權生活，自飽私囊的先生們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他們極力設法和緩他們的原理。他們說：“社會自然會來養育小孩，自然會來扶助老人和弱者。社會自然會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績）來做價值的尺度，以緩和此種工作成績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遠是基督教的慈善，這次却由國家來做了。

¹¹⁴ CESAR DE PAEPE(1842—1890), 比利時勞動黨的創立者。——譯者。

改良孤兒院，實行養老保險和疾病保險——他們相信這樣就可以和緩他們的原理了。然而他們還是免不掉有那種“先弄個傷痕，然後再來醫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產主義，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後，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便發覺他們自己忘記了什麼東西，這就是生產者的需要，這需要他們現在也承認了。不過他們要國家來估量這需要，而且要國家來確定究竟需要與勞動是否相稱。

國家要做慈善事業。從這裏去英國的貧民救濟法與貧民習藝所僅差一步而已。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差異，因為甚至我們所反對的社會的這個繼母，也已經不得不緩和她的個人主義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这同樣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對着共產主義的方向讓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搶劫，特來施捨最下等的飲食；她又建立醫院（大概是設備得很壞的，但有時也有極其壯麗的）來防止傳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鐘點付給報酬以後，她也常常照顧被她掠奪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們的需要，又來做點慈善事業。

我們常常說過，貧窮是財富的第一原因。創造第一個資本家出來的便是貧窮。因為在我們常常聽見人說起的“剩餘價值”

蓄積起來以前，就有許多人迫於饑寒不得不賣却他們的勞力，以免餓死。貧窮造就了資本家。至於中世紀中貧民的數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於國家建立以後隨之而起的侵略與戰爭，以及因掠奪東方各國而產生的財富之增加。這兩個原因，便把農村與都市的人民的聯絡切斷，教他們廢止從前在部族生活時代中實行的連帶責任，而代以有利於掠奪者的工錢制度的原理。

難道生出這種原理的革命，敢稱為社會革命嗎？社會革命，這對於受餓，受苦，被壓迫的人，是一個何等親切的名辭！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當舊的制度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之下打得粉碎的時候，呼聲便起了：“我們要的是萬人的麵包，住居和安樂！”人民會聽從的；他們要說：“我們要來滿足我們自己從沒有忘記過的對於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渴念。等我們人人都嘗到了這種快樂的滋味，我們便要動手來工作，把中產階級統治的痕跡，和它的從賬簿中得來的道德，‘借貸’的哲學，‘我的，你的’的制度，一起來毀滅。像蒲魯東所說：‘我們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我們的建設的主要基礎在安那其與共產主義上面的”。

第十四章

消費與生產

I

如果我們以一種完全和一切強權學派的不同眼光來觀察社會及其政治組織，不是以國家爲起點，而下及於個人，乃是以自由的個人爲出發點，而後達到自由的社會，這時候對於經濟問題，我們也採取這同樣的方法。我們在討論生產，交易，租稅，政府等問題之前，應該先研究個人的需要（欲求）和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

初看起來好像這兩者的區別是很小的，其實此種區別就會把御用的經濟學完全推翻。

不論翻開任何經濟學家的著作，最先總是討論生產，即是分析現在用來製造財富的方法，如分工，工廠及其機械，資本的積蓄等等。從亞丹·斯密到馬克思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這樣着手的。至於消費，即是現社會中用來滿足個人需要的方法，只不過在他們著作的後面才略略談到，而且他們只解釋在那些互

相競爭佔有財富的人中間財富是怎樣瓜分的。

也許你要說這是合於論理的。滿足需要之先，自然應該製造用來滿足需要的物品。然而在生產任何物品之前，是不是必須先感到了需要嗎？譬如人去狩獵，牧畜，耕種，製造器具，後來又發明機械，這不都是先感到必要才做的嗎？支配生產的不應該是對於需要的研究嗎？所以應該先考究需要如何，然後再討論爲着滿足此等需要應該有怎樣的生產組織，這至少也是很合於論理的。

這正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經濟學，則經濟學的形態會完全變更的。經濟學不再是單純的事實的記載，而成了一種科學；我們並且可以給它下一個定義：“人類需要(欲求)及以人類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費來滿足此種需要的方法之研究。”它的真正的名稱，應該是社會生理學。它實在與動植物的生理學所構成的科學並立。所謂動植物的生理學，即是動植物的需要及滿足此需要的最有利的�方法之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所占的地位與有機體的生理學在生物科學中所占的是相同的。

譬如說，人類結合而成爲一社會。大家都感到住衛生房屋的需要。野蠻人的小屋已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需要着稍爲

住得舒服的堅固的房屋。於是發生了下面的問題：依照現在人們的生產力來說，究竟所有的人都能夠各有各的房屋麼？難道又有什麼東西阻礙着他們，使他們不能得到呢？

而且當我們發出這個問話後，我們便知道在歐洲的各個家庭都能夠有一所完全像現在在英國，比利時或蒲爾滿城¹¹⁵裏的房屋一樣舒適的住宅，或者和那類似的一套房間。人只要做了一定的日數的工作，就可以造成一所傢具完全，電燈輝煌，空氣流通，異常清潔的房屋了。

然而十分之九的歐洲人從來不曾住過一所衛生的房屋，因為一般平民天天都要去爲着滿足統治者的欲求作工，永遠沒有閒暇和金錢來建造自己所夢想的房屋。要是現在的社會狀態繼續不變，他們便不能夠得着房屋，而且只有永遠居住在僅能容膝的小屋裏面。

由此可以看出來，我們的方法是和經濟學家的方法完全相反的。他們相信所謂生產的法則是一定不變的，他們又計算每年新造的房屋的數目，用統計來指明，因為新造的房屋太少了，不

115 Pullmann-City, 這是美國工業家蒲爾滿 (G. M. PULLMANN, 1831—1897) 在美國伊立諾斯州，芝加哥附近爲他的公司的工人建築的一個小城，居民共有一萬人，都是在蒲爾滿公司的鍛鐵，製造火車頭，鐵道材料等等部分作工的勞動者。這可以說是一個工人城。——譯者。

能滿足一切人的需要，所以十分之九的歐洲人是不能不住小屋的。

更就食物而言。經濟學家逐一計算了從分工所得的利益，便告訴我們說，分工後有些人應該做農業的工作，有些人則應該從事製造業的工作。他們說，農夫出產這樣多，工廠生產那樣多，交易就照那樣的方法進行；他們又分析販賣，利益，利潤，或剩餘價值，工錢，租稅，銀行事務等等。

然而我們聽他們說了這樣久，却毫無所得。假使我們來問他們：“各個家庭每年已經能夠生產足以養活十人，二十人乃至一百人的小麥了，爲什麼還有百萬的人類得不着麵包呢？”他們仍然唱起從前那個單調的讚美歌來回答我們——什麼分工，工錢，剩餘價值，資本等等，而且還是達到“生產不能滿足萬人的需要”的同一結論。其實縱使這個結論是真實的，也不能答覆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問的是：“人們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勞力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麵包？要是不能夠，那麼，他是受着什麼的阻礙呢？”

現在有三萬五千萬的歐洲人。¹¹⁶ 他們每年需要這麼多的麵包，這麼多的肉，酒，牛乳，蛋，牛油等等。他們又需要這麼多的房屋和衣服。這是他們的需要的最小限度，他們能夠生產這一

¹¹⁶ 參看註97。——譯者。

切東西麼？要是能夠，難道還有充足的閒暇來研究科學，藝術，娛樂麼——換句話說，就是還有餘暇來享受在絕對必需的物品以外的各種事物麼？假使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什麼東西妨害着他們的前進呢？他們應該用什麼方法來破壞那障礙物呢？要達到這樣的結果，是不是需要長時間呢？他們趕快動手罷！但是我們不要忘掉生產的目的——這就是使萬人的需要皆得以滿足。

假使人們的最迫切的需要現在尚未滿足，——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增加我們的勞動的生產力呢？難道沒有另外的原因麼？也許是因為生產忘掉了滿足人們的需要的那個目的，走入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也許是因為生產的組織陷於錯誤罷。我們雖然能夠證明情形果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應該來研究怎樣改造生產的組織，使它能夠真正滿足萬人的需要。

在我們看來，這便是處理事物的唯一的正當方法，也就是使經濟學成爲一種科學（社會生理學）的唯一方法。

這是很顯然的：這種科學在敘述文明國民，印度的公社，或蒙昧人現在所行的生產事業的時候，與現在經濟學家所記的事實並不會有什麼大的差別；這即是說，這是單純記述的一章，和動物學植物學的記述的各章相同的。然而假使這幾章是寫來說明那個滿足人類需要所必需的精力之經濟，那麼，它除了記述的

價值外，還應該是正確精密的。它應該明明白白地指示出來現社會制度下面的可驚的人類精力的浪費，而且應該證實要是現制度存在一日，人類的需要便永不會滿足的。

我們知道，觀點現在應該完全變更了。在那織出許多碼布的織布機後面，在穿過鋼板的穿孔器後面，在存儲股息的保險箱後面，我們常常看見那些從事生產的工人替別人預備宴席，而自己却完全享受不到。我們也應該知道那立足點是錯了，所謂價值與交易的“法則，”不過是現在發生的那些事實之一種虛偽的說明而已；而且當生產組織已經改造來適應一切社會的需要時，萬事都會向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進行的。

II

如果從我們的眼光來觀察，那麼，沒有一個經濟學的原則不會改變形狀的。

譬如說生產過剩，這是我們常常聽見的一個名詞。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學士會員，或學士會名譽會員的候補者，未有不承認經濟的恐慌是由於生產過剩，——即在某一個時期中生產了更多的棉花，衣服，鐘錶等等超過需要以上！對於那些無理地拚命去生產超過世人的消費額的物品的資本家的貪慾，我們早就大聲反對過了！

然而，要是我們肯仔細考究一下，我們便會知道這些理論都是不正當的。實際上在世間一般的用品中果真有一件生產過多的物品麼？我們試把各國的重要輸出品一件一件地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所有輸出品全部如果拿來供給與輸出國的居民消費，數量還是不夠呢？

俄國農民送到歐洲的小麥，並不是他們的剩餘。在歐洲俄羅斯境內就在收穫極豐饒的時候，所產的小麥和米也只足以供給本國人民的消費。然而照例，農民要繳納地租與賦稅，便不得不忍饑挨餓賣掉他們真正需要的小麥。

英國送到世界各處的煤，也並不是它的剩餘，因為每年留給內地各家庭消費的煤平均每人不過四分之三噸，連一噸都不到。數百萬的英國人在冬天都不能烤火取暖，甚或只能夠煮一點菜罷了。實際上，除去無益的奢侈品而外，在輸出為各國之冠的英國，只有一件普遍使用的物品的生產額也許超過了社會的需要——這便是棉花。然而就英國全體的居民看來，三分之一以上是穿着破爛衣服的，這件事便足以使他們疑惑那些輸出的棉花，如果用來供給人民全體的真正的需要，不是也還嫌不夠麼？

通例，輸出品並不是剩餘的，也許起初的時候是這樣，但現在却不是了。俗語說：“做鞋子的人沒有鞋穿。”真不錯。在從前，個人的職工是這樣，在現在，國民也是這樣。我們把必需的

物品輸出去了。我們這樣做，因為工人用他們所得的工錢不能夠買到他們所生產的物品，而且每件生產品的售價裏面還包含着資本家與銀行家的房租，地租，利潤與利息。

人類的不斷地增進的安樂幸福之欲求，不但沒有滿足，而且生活的絕對必需品也時常缺乏。因此所謂“過剩”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像那些經濟學的理論家所解釋的那樣意思。

再從別一點來觀察——所有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早已證明了的法則，即是：“人的生產額多於他的消費額。”他靠着自己勞動所得的東西過活，而且還有剩餘。所以一個農家所生產的東西，足以供給數家族的消費。

在我們看來，這種反覆地說着的句子並無什麼意思。假使這是說明每一代的人多少總要留下點東西給後代，這却是真的；例如一個農夫種了一棵樹，這棵樹可以繼續生長三四十年乃至百年，他的孫子還可以採取這樹的菓實。又如他開墾了幾英畝荒地，也就增多了留給後代的遺產。道路，橋樑，運河，他的房屋和他的傢具也都是留給後代的莫大的財富。

然而他們的意思却不是這樣。他們說農夫所生產的是要比他所必需消費的多些。其實他們却應該說，國家常常把他（指農夫）的生產的大部分當作賦稅拿去了，教士也向他徵收什麼年稅，地主又向他索取地租，結果便創造出來一個階級；這階級的

人在從前還是消費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不過除去防備爲着意外災禍或填補植森林，修道路所需的費用等留起來的一部分。）但現在却不能不過着艱難困苦的生活，工作度日，其餘的出產都被國家，教士，地主，盤剝重利者等等取去了。

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說：農業勞動者與工業勞動者等所消費的不及他所生產的那樣多，——因爲他們不得不出售他們的勞動的產物的大部分，而以剩下的一小部分爲滿足。

我們知道，假使以個人的需要爲我們的經濟學的出發點，則我們一定會達到共產主義，即是以最澈底最經濟的方法來滿足一切需要的組織。反之，如果以現在的生產方法爲出發點，以利益及剩餘價值爲目的，而不問我們的生產是否適合滿足我們的需要，則我們必然會走到資本主義的路上去，至少也不過走上集產主義的路——這不過是現在工錢制度的兩種不同的形式而已。

實在，當我們考究個人與社會的需要，以及在人類發達的種種階段中人們所用以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時，我們立刻便會感到必須廢止像現在那樣的隨意的生產，而使我們的努力成爲有組織的。人人都知道那個不會消費的由一代傳給一代的財富是被少數人占有了，對於一般人是無利益的。而且我們又知道由此等方法，全社會四分之三的需要便不得滿足，而現在浪費人

類的精力去製造無用的東西的這種舉動更是罪惡有害的了。

而且我們知道使用任何一種物品的最有利的方法，是在先滿足最迫切的需要：換句話說，一件物品的所謂“使用價值，”並不在於從前人們常說起的單純的幻想；而在於它能滿足真正的需要。

共產主義，換言之，即是消費，生產，交易三者的一個綜合的見解，及與此見解配合的一種組織，因此就成了對事物的如此的理解之論理的結果——在我們看來，只有它才是真正科學的。

一個社會要滿足一切人的需要，而且要知道生產應該如何組織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這個社會同時便不可不掃盡關於工業的各種偏見，而最先應該掃去的便是經濟學家常常宣傳的分工的理論，我在下章裏便要來討論它。

第十五章

分 工

從來的經濟學只記述社會中發生的事實，而且只是爲着支配階級的利益使此等事實成爲合理化。因此它也贊成工業的分工。它覺得分工有利於資本家，所以便把分工當作爲一個原理建立起來。

近世經濟學的鼻祖亞丹·斯密說過。試看鄉間的鐵匠，假使他對於製造釘子的事不會熟習，即使非常勤勞，他一天也只能製就兩三百根釘子。然而假使他別的事一點不做，專門製造釘子，那麼他一天供給二千三百，也是很容易的。於是亞丹·斯密便急急地下結論道：“分工罷！專門罷！專門地去做罷！我們單要那些只知道製造釘頭或釘尖的鐵匠便夠了。我們用這種方法更可以增加我們的生產。我們會變成更加富裕。”

那個被命定爲一生專門製造釘頭的鐵匠完全失去了對他的職業的興趣。他因爲技能有限，便不得不服從雇主，任憑雇主支配，一年之中有四個月要遇着失業的事情。而且當他的工作可以用學徒來代替的時候，他所得的工錢更會減少。亞丹·斯

密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便叫道：——“分工萬歲！這是增進國富的真正金礦呵！”

後來，西斯孟地¹¹⁷與史靄¹¹⁸知道了分工不能使全體國民富裕，只不過使富者愈富而已。被定為一生只是去做針的十八分之一部分的勞動者，只有變成愚蠢，而且還會陷於貧窮的境地，——這時候那班御用經濟學家有過什麼提議麼？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們並不會說：如果勞動者一生只做一種同樣的機械的工作，便會失掉他的智力和發明的精神；反之，一人如果兼做幾種不同的職事，其結果便可以增加國民的生產力。總之，關於這樣的話，他們一句也不會說過。然而這却是我們目前應當考慮的重要問題。

假使只有博學的經濟學家來宣傳永久的而且常常世襲的分工，那倒還不要緊，讓他們談談就是了。然而學者所倡導的思想很能深入人心，而使一般人走入錯路；所有中產階級的人，甚

117 J. C. L. S. DE SISMONDI (1773—1842), 瑞士經濟學家(原籍法國)。他的主要著作是經濟學的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E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1819)。——譯者。

118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法國經濟學家, 他的主要著作是經濟學概論(*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1803)。——譯者。

或勞動者常常聽見人說起分工，利潤，利益，債權等等，當作久已解決了的問題，久而久之，到後來他們便也說起和經濟學家的同樣的話；他們也崇拜那同樣的偶像了。

因此我們看見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甚或那些不怕指出現代經濟學的謬誤的人也居然承認分工是正當的。如果我們向他們說起革命時期中的勞動組織，他們一定回答說，分工還是應該維持的；假使你在革命之前，是在做磨針的工作，革命後也應該照舊做去。自然你每天不會再做五小時以上的工作，但是你卻應該永遠磨針，一直到你死；同時還有別的人在計劃製造新的機械，預備來使你一生能夠磨成千百萬根針；還有一些人則成為文學，科學，美術等高尙的事業的專家。巴斯德¹¹⁹是生來爲着發明瘋狗咬傷症的注射的，你是生來爲着磨針的，革命叫你們兩個人仍舊去做各人的事。這個可怕的原理，對於社會是有害的，對於個人是殘酷的，這真是萬惡的淵藪，我們現在且把它的各方面來說一下罷。

分工的結果是我們所深知道的了。這是很顯然的，我們因此被分爲兩個階級：一方面是生產者，消費很少，只做體力的工作，被擯在思想以外，因爲不用腦力，所以工作也做得不好；他方

¹¹⁹ LOUIS PASTEUR (1822—1895), 法國化學家, 對醫學上的貢獻也很大。——譯者。

而是消費者，生產甚少，或者竟然不生產，他們有替別人思想的特權，他們的思想也很不行，因為他們對於那般用手勞動的人的世界，一點都不知道。農業勞動者關於機械，一點都不知道，而機械的勞動者關於農業的事一點都不懂。近世工業的理想，便是叫一個小孩子照應他所不能了解而且也一定不了解的機械。又叫一個工頭來監督他，要是他稍不小心，便要立刻受罰。現代工業化的農業的理想，便是完全不要農業的勞動者，只雇用僅會做雜事的人來管理蒸汽犁和打穀機器而已。分工的意思，就是把人一生的命運判定，——有的人在工廠中結繩，有的人做企業中的監工，有的要在煤礦的某一部分推動煤炭車，然而誰也沒有關於那個機械，企業，礦坑全體的知識。由此他們毀壞了對於工作的愛好和發明的才能，而這兩者實在是近代工業的初期中我們所自誇的機械的創造者。

他們對於個人要這樣做，對於各國民也是要這樣做。人類被分爲國別的工場，各有它的專門。人說，俄國爲自然所限定來生產穀物，英國來紡織棉紗，比利時來織布，瑞士來造就看護婦和女教師。而且各城市也將它的專門工作限定了：里昂織綢緞，奧威尼製花邊，巴黎造裝飾品。經濟學家說，這樣做便爲生產與消費開拓了一個廣大的地盤，而且這樣做去，一個爲着人類享用的無限的財富的時代便在眼前了。

然而技術的知識一旦普及到外國的時候，這些大希望便消失了。假使永遠只有英國一處在紡織棉紗和大規模地做金屬工作，永遠只有巴黎一處在製造藝術的裝飾品，都做得很好，經濟學家便可以大談分工，不會遇到什麼反對了。

然而一種思想的新潮流漸漸地使所有的文明國家都來自己製造物品。它們以前都是從外國或自己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時時努力謀脫離母國的羈絆)輸入各種物品，現在覺得在自己國內製造更有利益。科學的發見使生產方法普及，因此，本來在內地很容易生產出來的物品，而要用高價到外國去買，未免太不合算。也沒有人願意再這樣做了。分工的理論很久被人相信是極其健全的，現在我們却看見這個工業的革命給了它一個致命的打擊了。

第十六章

工業的分散¹²⁰

I

在拿破崙戰爭以後，英國把在十八世紀末葉勃興的法國的主要工業完全破壞了，而且掌握了海上的霸權，竟成為所向無敵了。它乘着這形勢，又知道怎樣利用它的特權與便利，以圖實利。它建立了工業的獨占權，拿只有它獨家能夠製造的物品去向鄰國索取高價，使它的富裕愈見增加。

然而在十八世紀的中產階級革命廢除了農奴制，在法國創造出無產階級之後，那個受到一時挫折的法國工業，又勃興起來，走向興隆的氣運了。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法國的製造業已可以獨立，不再是英國的附庸了。現在法國便成了有數的輸出國，每年輸出的製造品，其價值已達到六千萬鎊以上，¹²¹其

¹²⁰ 關於此種思想的更完備的研究，見我的田園工廠與手工場。1912年出版。——作者。

¹²¹ 這自然也是從前的統計，下同。——譯者。

中三分之二都是工藝品。法國國內製造輸出品的或靠外國貿易生活的人實有三百萬之多。

所以法國已經不是英國的從屬了。它也極力想獲得外國工業的某一部分，如綢緞與現成的衣服之類的獨占權，而且已經從此得了莫大的利益；然而法國也快要永遠地失掉這個獨占權了，猶之英國快要永遠失掉它的棉紗的獨占權一樣。

工業東漸，已達到德國。在五十年前，德國所用的屬於高等工業的大部分製造品，都是由英，法兩國供給的。現在却不是那樣了。在過去五十年間，特別自普法戰爭以來，德國已將它的工業完全改造過了。新設的工廠裏都裝得有最優良的機械；從曼奇士脫來的棉紗，從里昂來的綢緞等等的最新的工藝品，現在已經能夠在德國的新工廠中製造了。在里昂和曼奇士脫，曾經用了兩三代的工人的力量才能夠創設出來完備的近代機械，德國現在也已完全採用了。德國設立了許多適合工業需要的工藝學校，結果訓練出來一批聰明的工人（能夠用手腕與腦筋二者勞動的實際的技師）與工廠。德國工業的出發點，便是曼奇士脫和里昂兩地經過了五十年的暗中摸索，努力和經驗才達到的地點。

德國國內製造業逐漸進步，因之英法兩國輸入德國的物品便一年一年地減少。到後來不僅在亞洲與非洲，德國是英，

法兩國的製造品的競敵，便在倫敦，巴黎也是如此。一般短見的法國人也許會猛烈地抨擊“弗蘭克福條約；”¹²² 英國的製造家也許會解釋德國與英國競爭的理由，在於鐵道關稅的無差別，他們只囂囂於這個問題的不重要的一方面，而把偉大的歷史事實忽略了。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從前在英法兩國手中的主要工業，漸向東進，後來到了德國，這正是一個少壯的，富於精力，而且有着聰明的中產階級的國家，它也渴望着靠外國貿易來增加它的財富。

德意志自從脫離了英，法兩國的羈絆之後，已經能夠織出自己需用的棉布，製造自己需用的機器——實際，便是製造一切的貨物，——這時候，主要的工業在俄國也有了根基了。俄國的工業量是最近勃興的，其發展之速很可令人驚異。

在 1861 年農奴解放的時候，俄國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工廠。它所需要的一切機械，鐵軌，火車頭，上等衣料等都是從西方來的。然而在二十年以後，它便有了八萬五千所工廠了。在俄國製造的貨物的價值已經增加了四倍。

¹²² 1870 年普法兩國發生戰爭，法軍大敗，拿破崙三世被擒。第二年（1871）正月巴黎陷落，法國被迫與普魯士訂立和平條約，即所謂“弗蘭克福條約”，除割阿爾薩斯，勞倫兩省外，法國賠償普魯士軍費五十萬萬法郎。和約於 1871 年 5 月 1 日在弗蘭克福簽字。——譯者。

舊式的機械廢除了，現在俄國使用的鋼鐵全部，鐵的四分之三，煤的三分之二，火車頭，客車，鐵軌的全部和幾乎所有的輪船，都是自己製造的。

據一般經濟學家說，俄國是應該永久為農業國的，然而俄國現在已急劇地發達為一個工業國了。它在英國訂購的物品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在德國訂購的也很少。

經濟學家說，對這些事實關稅應該負責，然而在俄國製造的棉布，却與在倫敦製造的棉布一樣，皆以同樣的價格出售。資本是不知道什麼祖國的，德英兩國的資本家帶着他們國內的技師和監工同往俄國和波蘭去經營製造業，其出品的優良，足與從英國輸入的最佳的物品競爭。要是一旦把稅關撤廢了，製造業只能因此更加得利。近來這些英國的製造家又給那些經營由西歐輸入棉布，毛織物等業以一個大的打擊。他們在俄國的南部和中部設立起廣大的毛織物工廠，裝置由布拉福德¹²³輸入的最完備的機械，因此，現在英，法，奧三國所輸入俄國的，只有上等的棉布和毛織物，其餘的都在俄國國內製造，地點是在工廠和家庭工業兩處。

主要的工業不僅東漸，而且也蔓延及南部半島。1884年吐

¹²³ Bradford, 英國約克郡的一個城市，毛織物製造業的主要地方，也製造綢緞和天鵝絨。——譯者。

林博覽會¹²⁴已足以表明意大利工業品的進步；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法，意兩國中產階級互相嫉視的原因，便是由於他們工業的競爭。西班牙也成了工業國了；同時在東歐，波希米亞¹²⁵一躍而為新的工業中心，設置有完備的機械，而且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

我們也可以舉出匈牙利的主要工業的迅速進步，然而如果要舉例證，還是用巴西來做例子較好些。經濟學家斷定巴西應該永遠栽培棉花，當作原料輸出，一方面又從歐洲輸入棉布，作為交換。實際上，四十年前巴西僅有九個很可憐的小紡紗廠，紡錘的數目不過三百八十五個。然而現在却有一百六十個紡紗廠了，共有一百五十萬個紡錘，五萬架織機，每年有五萬萬碼的織物送到市場去。

就是墨西哥，它也能夠很好地自己製造棉布，不再從歐洲輸入了。至於美國，它已經脫離了歐洲的護持，現在很得意地發展它的製造力到很大的程度了。

然而最足以反對工業國別專門化的顯明證據，便是印度。

¹²⁴ 在吐林(Turin)舉行，Turin 是意大利西北部 Piemonte 區的首府。——譯者。

¹²⁵ Bohemia, 捷克西部的一省，最近被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佔去，成為德國的保護地。——譯者。

我們都知道這個理論：歐洲的大國需要着殖民地，因為要它們供給原料——棉花，羊毛，香料等——給母國。而這母國雖自稱把精良的製造品送與它們，實在不過是把損壞的織物，等於廢鐵的舊機器，以及一切它自己用不着的東西送出去罷了。這些東西，它自身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然而它却要用高價來賣給殖民地。

理論便是如此，——而且這樣已經實行了很久了。倫敦與曼奇士脫積蓄了財富，而印度同時便要破產了。在倫敦的印度博物館中我們可以看見英國商人從加爾各塔(Calcutta)，孟買等處收集來的前代未聞的財寶。

然而別的英國商人和資本家則有着簡單的思想，以為與其每年從英國輸入價值二千萬鎊，乃至二千四百萬鎊的貨物，不如就在印度本地用土人來製造棉布，更要便利得多。

這些試驗起初得到了失敗的結果。印度的織工——在他們自己的行業內是熟練的技師——不能夠忍耐這種工廠生活；從利物浦(Liverpool)運來的機械也是惡劣的，而且氣候也有大的關係；那些商人不得不先去適應了新的狀態(如今已經完全解決了)，然後才可以使英屬印度成為像今日那樣的母國的競敵。

印度現在有二百餘所紡紗廠，工人共二十三萬名，紡錘六百多萬個，織機八萬多架；此外還有製麻工廠四十所，紡錘四十

萬個。每年輸到中國，荷屬印度，菲洲的白棉布（向來稱爲英國的專門製造品）約值八百萬鎊。當英國工人常常失業，陷於非常貧困的時候，印度的婦女每天得六便士的工錢，在用機器織造那些輸到遠東各地的棉布。總之，聰明的法國製造家完全明白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就會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那些從前織造英國輸出到各地的棉布的“工廠職工”了。而且這也是顯然的：印度將來連一噸的鐵也不要從英國輸入了。至於使用在印度獲得的煤和鐵礦的第一困難，也已經除掉了；並且能夠和英國競爭的鑄鐵所已經遍設於印度洋的岸邊了。

殖民地以其工業品的生產同母國競爭，這便是可以調整二十世紀的經濟的要素。

那麼，爲什麼印度不從事於製造工業呢？有什麼障礙呢？資本麼？——然而只要有任人掠奪的窮人的地方，便有資本去的。智識麼？智識是不承認國界的。工人技術的熟練麼？——不，決不是，難道印度的勞動者還不及現今在英國織物工廠裏作工的，成千成萬的，¹²⁶不到十八歲的青年男女麼？

II

我們略略看了各國的工業以後，再來觀察某一些特別的部

¹²⁶ 法文本和德文譯本都作九萬二千人。——譯者。

門，是很有趣味的。

例如綢緞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的重要產物。我們都知道里昂是怎樣成了綢緞業的中心市場。起初製造綢緞的生絲是從法國南部來的，後來漸漸地從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高加索，日本等處購來。1875年在里昂附近製造綢緞用的五百萬基羅¹²⁷生絲內，只有四十萬基羅是法國出產的。然而要是里昂可以用輸入的生絲做綢緞，為什麼瑞士，德國，俄國又不能夠同樣地製造呢？果然，楚利克（Zurich）附近村落的綢緞工業也發達起來了。伯勒已經成了綢緞貿易的一個大中心點。高加索地方行政機關也從馬賽雇婦女，從里昂雇工人，來教喬治亞人（Georgians）以完善的養蠶法，教高加索農民織綢緞的技術。奧地利也做做這種方法。德國得到里昂工人的幫助，也建立了織綢緞的大工廠。而美國在巴脫孫，¹²⁸也做了這同樣的事業。

現在綢緞業已不再是法國的獨占業了。德國，奧國，美國，英國都能夠自己製造綢緞，而且現在法國所用的綢緞的三

¹²⁷ 卽 Kilogramme，法國重量名，或譯斤，卽一千克蘭姆之意。——譯者。

¹²⁸ Paterson 是美國新傑羅州（New Jersey）的東北部的城市，居民共十餘萬。——譯者。

分之一，還是從外面輸入的，高加索的農民在冬季，織造綢手帕，所得的工錢，還不夠里昂的織綢工人的生活費。意大利和德國也把綢緞輸到法國；里昂在1870年到1874年，輸出四萬六千萬法郎的綢緞，而現在的輸出額却僅有從前那個數目的一半。實在的，在不久的將來，里昂就會只送上等物品和新樣式的東西到德國，俄國，日本去作為標本而已。

而且在所有的工業中，都是這樣。比利時已經失去了呢絨的獨占權；俄，奧，美各國也在製造呢絨了。瑞士及法國猶拉地方¹²⁹已經不能夠再握着鐘表業的獨占權；鐘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製造了。蘇格蘭也不再把精製的砂糖輸到俄國去了；而俄國的精製的砂糖反而送了到英國來。意大利雖然沒有鐵和煤，却也能夠製造自己的鐵甲艦和輪船機器了。化學工業不再是英國的獨占了；甚至在俄國烏拉地方(Urals)也可以製造硫酸和曹達。在溫特圖爾¹³⁰製造的蒸汽機，曾博得世界的好評；現在便是那個既沒有鐵又沒有煤的瑞士，靠着它的優秀的工業學校，也能夠製造出比英國的更優良而且價廉的機械來。

¹²⁹ Jura 山脈在法國與瑞士間。猶拉省則是法國的省分，名稱就是從猶拉山脈得來的。——譯者，

¹³⁰ Winterthur, 瑞士國，楚利克的城市，鐵路的中心，是製造火車頭和機器的重要地方；也出產棉織物和酒。——譯者。

交易的理論便這樣地消滅了。

商業的趨勢也同所有其他的東西一樣，向着分散的方面走去。

任何國民都知道把農業和許多不同種類的工廠結合起來是有利益的。經濟學家所喋喋不休稱讚的專門的分工，確實增加過資本家的富裕，但是現在却已歸於無用了。反之，如果各地方，各國民自己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小麥，菜蔬，自己製造他們所消費的全部物品，對於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這樣的種類加多，便是以相互的協作，達到生產的完全發展之最確實的保證，而且是進步的動因；至於專門的分工則為進步的阻礙。

農業要接近工廠，才能夠繁盛。當一個工廠成立時，它的附近必須即刻成立其他各種的工廠，這樣地互相幫助，互相以發明來鼓勵，它們便可以增加它們的生產力了。

III

一面輸出小麥，一面輸入麵粉；輸出羊毛，而輸入呢絨；輸出鐵而輸入機械：這真是極其愚蠢的事。不僅因為運輸是要耗費金錢和時間的，而且我們特別注重的是：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在農業方面也是要落伍的；不能夠練鋼鐵的國家，它的其他的工業也是只有退後的；而且假使一個國家不從事於各種不同的工業，

來訓練它的國民的工業和技術的能力，那麼，此等能力也永遠不會發達。

在現今的生產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分離不開的。要是沒有機械，沒有大的灌溉力，沒有鐵道，沒有肥料製造所，土地的耕種也是不能成功的。而且要使機械，鐵道，灌溉機等等適應地方的狀態，必須先發展若干發明的精神，若干技術的熟練不可，然而在這種只用鋤和鍬做耕具的時候，此等精神和技術是異常缺乏的。

假使田地的耕種得宜，而且能夠產出我們可以正當期待的豐富的收穫，最重要的還是在這些田地的附近能夠有工廠，製造所，鑄鐵所建立，而且發展起來。種種不同的職業，種種不同的技藝，皆由此勃興了，它們協同地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盡力——這些便是進步的真正力量。

我們現在想像着某一個都市或一個地方（不論大小）的居民第一次向社會革命的路上走去。

常常有人告訴我們說：“一點也不會變更的：”礦山，工廠等都被沒收爲國有，或社會共有，各人仍舊回去做他原來的工作，革命這時就完成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場夢：社會革命的發生決不能是如此簡單。

我們已經說過，如果一旦革命在巴黎，里昂，或其他任何

都市爆發了，——如果工人占領了工廠，房屋，銀行等，那麼，現在的生產，便會被這簡單事實完全革命化的。

國際貿易將完全停止；外國輸入的麵粉也停止了；貨物與食物的流通也停滯了。於是這個革命的都市便不得不由自己供給，改造生產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倘使它不能夠做到這樣，便只有走向滅亡之一途。倘使它能夠成功，它就會使全國的經濟生活成爲革命化。

糧食的輸入額減少，而消費却增加了，製造輸出品的一百萬巴黎工人又失了業，這時從遠近各國輸入的貨物又未運到，裝飾品業也暫時停頓——那麼，在革命後六個月之間，人民拿什麼東西來吃呢？

我們想，在存貯糧食的倉庫空虛了的時候，民衆便會想法從土地上面獲取食物。他們會知道耕田的必要，把巴黎及其附近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聯合起來的必要，他們會把製造裝飾品業置諸不問，而先來想法滿足最迫切的需要——麵包。

大多數的都市的居民都會變成農業者了。自然，並不像現在的農夫那樣，弄得精疲力盡，才能夠獲得一年中的糧食；他們要依照市場園藝家和集約農法的原則，大規模地使用已發明及將來可發明的最良機械。他們要耕種土地，——然而却不像鄉間的牛馬：這樣的事一個巴黎的珠寶商也會反對的。他們會

依據更優良的原則來改造耕作法；這件事不必在將來，便是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中，爲避免被敵人征服起見，也要即刻做到的。

假使那些聰明的男女利用他們現在的經驗高高興興地團結起來，同做愉快的工作，他們從事農業工作的時候，恰像百餘年前在巴黎大校場 (Champs de Mars) 中爲着聯合大祭日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¹³¹工作的人們一樣。如果勞動不是過度的，又受着科學的安排，人人能夠發明和改良他的器具，而且自覺他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個有用的分子，那麼，勞動便是愉快的。

自然，他們並不專種燕麥和小麥——從前在外國訂購的用品，現在他們也要自己製造了。我們還要記着在發動革命的地方的人民看來，那些不加入革命運動的地方，也應該列在“外國的部分”內。在1793年及1871年革命的時期中，巴黎不得不把靠

¹³¹ 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事。“聯合大祭日”(插圖19)在1790年7月14日舉行。據克魯泡特金說，“這是歷史上最美麗的民衆節日之一。……它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爲着這個節日的準備，還有一些必需的工作，如平土，建造台階，建築凱旋門。離節日還只有八天了，眼看着做這些工作的一萬五千個工人不能按時完成它。——有個不出名的人，便提議說每個人都應該到大校場去做工，於是全巴黎的人不論貧富，藝術家和勞動者，教士和兵丁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到那裏去工作。從各省來的幾千個代表所代表的法國在挖地時便發見了它的國民的統一。”(見法蘭西大革命史第23章)。——譯者。

近城門的郊外地方也當作“外國的部分”。1793——1794年多羅瓦¹³²的穀物投機者曾使巴黎的“無褲黨”¹³³受到絕大的饑餓，甚至還要比凡爾賽的陰謀者所引進法國的德軍給與他們（指“無褲黨”）的打擊更要厲害得多。所以革命的都市必須不依賴“外人”而靠自己，爲什麼不靠自己呢？法國當被大陸諸國封鎖，缺乏甘蔗糖的時候，便會發明甜菜糖來代替。巴黎人民不能夠獲得小國輸入的硝石的時候，他們便在自己的土窖裏發見了它。難道我們還不如那些連科學的最初的言語也弄不清楚的我們的祖先麼？

革命不僅是現在政治制度的變革而已。革命應包含着人類智慧的覺醒，以及發明精神之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進；這是新科學——像拉普拉斯，拉馬克，拉華西¹³⁴那樣的人的科學——的

¹³² Troyes, 法國在賽納河上的一個城市，在巴黎的東南，出產物有麥，菜蔬，酒，豬肉等等。——譯者。

¹³³ 克魯泡特金在秩序一文中說過。“1793年的無褲黨是那時平民革命的敵人給與革命者的綽號”。“無褲黨”其實應該譯作“無短褲黨”，因爲那時的革命者不穿短褲，而改穿長褲，貴族們便稱他們做“無短褲黨。”這名稱後來就成爲與愛國者同意義的了。——譯者。

¹³⁴ P. S. LAPLACE (1749—1827), 法國天文學和數學家。J. B. LAMARCK (1744—1829), 法國博物學家。ANTOINE LAVOISIER (1743—1794), 法國化學家。這三個人對於科學都有極大的貢獻。——譯者。

曙光。不僅是制度的革命，而且是更深刻的人類頭腦的革命。

可是還有經濟學家向我們說，在“革命成功之後”每個人都要回到從前的工廠裏去，好像經過革命，不過與在芳丹卜羅¹³⁵樹林散步之後回到家裏一樣。

第一，所謂攫取中產階級的財產必須含有將工廠，製造所，造船所中的全部經濟生活完全改造。

革命是必須向着這方面行動的。如果巴黎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被中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把它和世界的交通截斷了一二年，那麼城內不會被工廠生活所毀壞的數百萬有智力的人民——那個鼓勵發明精神的小工業都市——不要外面的幫助，只靠着那放射光線的太陽的原動力，掃清一切不潔物的風力，以及在我們所踏踐的地中勞動着的沉默的活力，便可以把人的腦筋所能夠成就的什麼樣的事業表現出來。

我們會看見聚在一個地方，互相補助，而且受到革命鼓舞的各種各樣職業的合作能夠使幾百萬聰明的人都得到衣食住，以及一切種類的奢侈品之供給。

我們也用不着寫一部小說來證明這個。我們所已知道的，

¹³⁵ Fontainebleau 城在巴黎東南，有風景優美的樹林。英文本作 Epping Forest (愛平樹林)，是英國的名勝和遊覽地方，在英國東南部，屬愛色克斯(Essex)。——譯者。

已經實驗過而且認為可行的，就足以使它變成真的事實，不過還有一個條件，便是：應該由革命的大胆的鼓吹和民衆的自發的衝動使這個計畫成爲豐富而活潑。

第十七章

農 業

I

經濟學常常被人非難爲從一個分明虛偽的原理中演繹出一切的，這原理即是：驅使人們增進其生產力的唯一刺激物乃是最狹義的個人一身的利益。

這種非難是完全不錯的；我們如果想到在工業的大發明和大進步的時代中，人們都在追求萬人的幸福，而少有顧及一己的富裕，那麼，我們會更覺得這是不錯的了。從來偉大的科學研究者和發明家都是特別以謀人類的較大自由爲目的的。假使瓦特，司提分生，雅加爾¹³⁶ 等人當初能夠預料到他們夜以繼日苦心研究的結果，會使無數的勞動者陷於悲慘的苦境，那麼他們一定要焚燬他們的計畫書，毀壞他們的模型了。

此外在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通行的原理，也是一樣虛偽的。

¹³⁶ J.-M. JACQUARD(1752—1834) 法國機械學者與發明家，曾發明“雅加爾織機”，被稱爲工業機器的最優美的發明之一。——譯者。

這是一般經濟學家所共同默認的：縱然在某一部門中發現了生產過剩的現象，社會仍還沒有充足的生產品以滿足一切人的需要，因此人們不賣他們的勞力去求工錢的日子是永不會來到的。此種默認是建立在經濟學家所唱導的一切所謂“法則”和學說的基礎上面的。

而且當任何文明的個人團體著手來研究這個問題：萬人的需要是什麼？要用什麼手段才能滿足這些需要？這時候他們定會明白在工業中與在農業中一樣，已經有着很充足的物品足以應萬人的需要了，只要他們知道怎樣應用它們來滿足真正的需要。

關於工業，這是十分確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我們只要調查大工業中挖取煤炭和礦物，鑄鍊鋼鐵，以及大規模地製造用於衣著等上面的物品等等所取的方法，我們便可以看見生產額已經能夠增加到四倍以上，而同時勞動則較我們現在所耗費的更少。

我們再進一步說，農業和工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一樣，已經能夠增加他們的生產額不僅到四倍，而且還要到十倍以上；只要他們覺得有實行這個的必要——只要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建立起來代替了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立刻可以這樣實行的。

世人說到農業，無論什麼時候，總想到一個農夫拿着鋤，彎着腰，拿一些沒有好好選擇的種子隨便撒在地上，於是焦急地等候着好的或不好的季節給他帶來的收穫；他們又想像到那自朝至夕勞苦不息而所得的報酬不過是粗拙的床，乾的麵包，惡劣的飲料的農家族。總之，他們簡直在描畫拉布律耶¹³⁷的所謂‘野獸’了。

對於這些沉溺在如此苦海中的人，社會所提出的最上的救濟方法，不過是減輕他們的租稅和地租罷了。至於說使耕田者直立起來，每天得有閒暇的時間，而且只做幾小時的工作，就可以產出不僅養活他一家，並且至少足以養活百餘人的糧食，——這樣的事，甚至大多數的社會改革論者也還不敢想到的。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最熱烈的未來的夢想，也還脫不了美國式的粗放耕作法的範圍，這種耕作法不過是農業技術的幼稚期罷了。

然而有頭腦的農業家現在已有更廣大的理想了，——他的計畫的範圍更擴大了。他只要求一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生產出供他一家取用的菜蔬了；養二十五頭牛羊所需要的地面，並不比從前養一頭時所需的地面寬廣；他的目的是要自己製造土壤，並不去管季節和氣候，只把那些嫩植物四周的空氣和土壤都弄得

¹³⁷ JEAN DE LA BRUYÈRE (1645—1696), 法國道德家。他把人描畫成一個生性就不正，忘恩，而且冷酷無情的利己主義者。——譯者。

很溫和；總之，從前在五十英畝田地中的收穫物，現在要在這一英畝中生產出來，不但沒有何等過度的疲勞——反而會大大地減少從前的勞動量。他知道爲着養活所有的人的緣故，各人在田地上勞動的時間並不要許多，正好是各人能夠快快樂樂地安排的。

這便是現代農業的傾向了。

化學農業論的創始人里比希¹³⁸ 一流的科學家，因爲偏愛學理，往往走入謬誤之途，而目不識丁的農業家却開闢了到繁榮的新路。巴黎，多羅瓦，盧昂的市場園藝家，蘇格蘭，英格蘭的園藝家，弗蘭特¹³⁹的農人，郎巴底¹⁴⁰的農夫，傑稜與蓋因稜¹⁴¹的農民，細利羣島¹⁴²的農夫等等已經打開了極大的地平線，但是

¹³⁸ 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德國化學家。——譯者。

¹³⁹ 這裏指說 Flemish 語的比利時人。古弗蘭特(Flanders)的土地如今分屬於法，比，荷三國。——譯者。

¹⁴⁰ 郎巴底(Lombardy)，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區。——譯者。

¹⁴¹ Jersey 與 Guernsey是英屬 Channel Islands (又稱諾爾曼羣島)中兩個最大的島。出產大量的菓物，鮮花和菜蔬，供給英國本部消費。——譯者。

¹⁴² Scilly Isles，屬英國，大部分居民以養花種菜爲業，銷售處爲倫敦市場。——譯者。

許多人都還不敢接近它們。以前一個農家靠着土地的出產過活，至少需要十七英畝乃至二十英畝才夠，（農民怎樣生活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在今天如果依照集約的農法來耕種土地，那麼我們再不能夠說什麼是可以生產一個家族的一切必需品（甚至奢侈品也可以包含在內）的最小地面了。因為那時出產的豐饒，決不是我們所能夠想像到的。

在二十年前（法文本作十年前）人們已確定地承認英國的三千萬人口，¹⁴³ 只靠着國內生產的物品，不從外國輸入什麼東西，便能夠生活得很好了。然而現在我們看見法，德，英三國近來的進步，又考究了那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新地平線，我們可以說不管土地如何瘠瘦，只要用現在許多地方已經採用了的那種耕種法來耕種它們，那麼，這五六千萬的英帝國人民，和土地的生產物比較起來還是相差很遠呢！

無論如何，（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我們且認定這是絕對證明了的：假使明天巴黎和賽納與賽納·埃·俄斯兩省一旦組織成一個安那其主義的公社，萬人都來用手勞動，不要外國輸入一英斗小麥，一頭家畜，一籃菓物，他們只有這兩省的土地，然而他們不僅能夠產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穀物，肉類和菜蔬，甚至一切現在所視為奢侈品的食物也可以生產出來的。

¹⁴³ 據 1931 年統計英國人口共有四千六百多萬(46,041,485)。——譯者。

而且我們還要肯定說，這種勞動的總量比較現在拿在奧威尼與俄羅斯收穫的穀物，用粗放農法在各處生產得很少的菜蔬，和南部地方生產的菓物，來供給這兩省人民所耗費的勞動總量却少得多。

不用說，我們並不想把一切的交易完全禁止，也不要那些只能在一定的季節和氣候中生產的東西，在每個區域裏都用多少人工的耕種法生產出來。然而我們要人注意現在人們所了解的交易的理論，——“交易常常無用而且有害”，是過於誇張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斷言關於法國南部的葡萄栽培者以及俄羅斯，匈牙利等國的穀物生產者等的那種何等辛苦的勞作，世人並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事實上倘使那些生產者廢棄了現在所採用的粗放農法，而代以集約農法，則此種過度的勞動也可以因之而節省了。

II

在這裏我不能把我們的主張所根據的許多事實一一列舉出來。對於那些願意更進一步研究的人，我應該把我的另一部著作：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介紹給他們。我特別勸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諸位去讀法國和其他各國出版的幾種好書，書目附在本書卷末，（見附錄一）。至於大城市中的居民，對於農業的實

際情形如果還沒有真實的觀念，那麼我勸他們去考察附近的市場農園。他們只要去觀察，去訪問園藝家，他們就會看見一個新的世界在他們的眼前出現了。於是他們更能夠看出歐洲的農業在二十世紀中應當如何了；而且他們會瞭解當我們知道從土地中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秘訣以後，社會革命就會得到如何强有力的武裝了。

我們只要舉出幾件事實便足以證明我們的主張，決不是誇大的。我們且先來大體地討論一下。

歐洲農業陷在何等悲慘的狀態中，我們是知道了的。土地耕作者縱不為地主所劫掠，亦必為國家所榨取。假使國家的賦稅偶然減輕了一點，放債的人又會拿借據或期票來束縛他們，使他們不久就變成某銀行團體的土地的佃戶了。地主，國家，銀行家用地租，賦稅，利息三種東西來搶劫他們。劫去的數目，在各國雖是多寡不同，然而從來沒有在收穫物四分之一以下的，大概總要到收穫的半數。在法國與意大利的農業家近來繳納給國家的，竟到總出產額的百分之四十四。

而且地主和國家的所得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的。如果耕作者以極其勤勉的勞動，發明或創意使生產額大為增加，於是他應該獻與地主，國家，銀行家的貢物，也要比例地增加了。假使每英畝的收穫增加了一倍，同時地租也要增加一倍，賦稅也要增

加一倍，倘使售價騰貴，則國家更要增加賦稅。其他亦以此為標準。總之，無論何處，土地的耕種者每日總要作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的工；這三個禿鷹便把所有他可以貯蓄起來的東西全都攫去了；凡是能夠幫助他改良耕作的一切東西，都被他們攫去了。這便是農業進步如此遲緩的原因。

耕作者只能偶爾有一點進步，這是在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情形下，趁着那三個吸血鬼中間起了內訌的時候，才可以做到的。並且我們尚未說到各個耕作者付給製造家的貢稅。每架機器，每把鋤頭，每桶化學肥料，賣給他時所索的價格總要較實價高三四倍。此外，我們不要忘記還有那個中間人（經紀人）要在土地的生產物中徵收多額的稅金。

在像現今這樣的發明與進步的世紀中，農業却只能夠在有限的地域裏，偶爾得到一點改良，原因就在這裏了。

幸而我們還有那些鷹眼所看不到的沙漠中的沃地；在那裏我們可以知道集約農法能夠為人類生產的東西究竟有多少。我們且舉出幾個例子。

在美國平原（那裏只有春季的小麥收成，一英畝可以收到七英斗至十五英斗，而且常常會遭受定期的洪水的損害）只要用五百人，工作八個月，便能夠產出五萬人一年間所需要的食料。有了最近三年的改良，則一個人一年間（以三百日計算）的勞動，

便能生產出（磨成麵粉在芝加哥交付）二百五十個人一年的食料了。這個結果是從手腕勞動的絕大的節省得來的：即在那些一望無涯的大平原上，無論耕種，收割，打穀，差不多都是依着軍隊式的組織的。無益的各處奔跑，是沒有的；浪費時間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切都做得很整齊，就像軍隊行列那樣的整齊。

這是大規模的農業——粗放農法，只取天然沃土，並不想加以改良。倘使這一塊土地的生產限量告竭，他們便捨棄它而移到別的新地上去，又要把這地方的生產量取盡。然而這中間也有所謂“集約”農法，即是以機械來從事工作的，而且以後會逐漸加多機械的使用。它的目的是要把一塊限定的地方耕作得很好，施以肥料，加以改良，集中工作以求得到可能限度內的最大收成。此種耕作法年年向各處蔓延，在法國南部和美國西部沃野中的農民，用粗放耕作法，平均每年每英畝可以收得十一英斗至十五英斗，他們便以為滿足了；而在法國北部則一英畝照例可以有三十九英斗，甚或五十英斗的收穫，有時甚至可以得到六十英斗的。還要不到四分之一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產出一個人一年間的消費品了。

耕作法愈集約，則因生產小麥所費的勞力亦愈節省。倘使能在預備工作上和土地必需的改良上（排水，取除石塊等等）均以機械來代替人力，那麼將來永遠可以得到加倍的收穫。假

使是普通的田地，不施肥料，也不要其他的什麼工作，只要能將雜草除得乾乾淨淨，就可以年年豐收了。這在英國希爾福郡 (Herefordshire)的羅散斯德¹⁴⁴ 內，已繼續實行了四十年了。

我們不要寫什麼農業的小說，然而我却希望每英畝土地生產出四十四英斗的收穫。這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沃地，只要施以合理的耕作便夠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種耕作法是什麼？

賽納和賽納·埃·俄斯兩省的居民共有三百六十萬，他們的食料每年約需二千二百萬英斗的穀物(以小麥為主)；依我們推測，他們要收穫這些生產物，則在他們所有的一百五十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中，非耕作四十九萬四千二百英畝不可。當然他們不再用鋤耩耕作了，因為用鋤耩耕作要費極長的時間，一日勞動五小時，共要九十六日，才能夠耕出一英畝的田地。那麼，不如一次就把全部土地改良——應排水者排水，應坦平者坦平，還要把石塊取除乾淨，縱然這種預備工作需要五百萬日的勞動(每日五小時)，算起來平均一英畝也不過需要十天的勞動罷了。

於是他們用蒸汽犁來鋤田，一英畝只費時一日又五分之三，

¹⁴⁴ ROTHAMSTEAD 是英國諾斯勳爵 (B. LAWES, 1814—1900) 的田地。諾斯曾在他的田地上作過多種農業的實驗。關於這事的書籍除克魯泡特金在“附錄”中所舉出的一種外，尚有海爾 (HALL) 的羅散斯德實驗記 (*The Book of Rothamstead Experiments*)。——譯者。

再耕第二次，每英畝也只需要一日又五分之三。種子也不是胡亂無定地集在一處，而是用蒸汽選種機選拔過的，播種時是要整整齊齊一列一列的，不是像隨風吹散到四方那樣。假使這種工作是在良好的情形下面做的，全體合計起來，每日作工五小時，每英畝還要不到十天呢。然而倘使在三四年中間花費了一千萬日的勞動於良好的耕作，那麼，後來雖把勞動時間減少一半，也能夠在一英畝中得到四十四英斗乃至五十五英斗的收穫了。

如此，要供給這三百六十萬居民所需要的麵包，只需要一千五百萬日的勞動便夠了。而且這樣的工作雖是沒有銅鐵一般的筋骨的人，或者從來不會在田地上勞動過的人，也都可以做的。至於創意和工作之一般的分配，却非由熟悉土地的人來做不可。若說到工作本身，則住在都市中的男女學習了幾小時以後，決不會連照應機械和田地工作的一部分都做不來的。

當我們想到在現今的混沌中，在像巴黎那樣的都市裏面，除去上流階級的游民外，還有十萬內外的各種職業的失業工人，那麼，我們會知道單是在現社會組織中白白失掉的人力，若用之於合理的耕作，便足以產出這兩省的三四百萬居民必需的麵包。

我們現在還要再說一遍，這並不是在做夢，而且這時我們尚未說到真正的集約農法。我們還沒有拿小麥來作根據，依着哈勒特先生(MR. HALLETT)的三年中間的實驗，小麥一粒，再種

下去，便可以生產五千乃至六千粒，有時甚至可以得到一萬粒；五口之家有一百二十方碼的土地，一年所必需的麵包便夠了。

反之，我們却只說法，英，比等國的許多農夫所已經實行而得到成功的，以及依今日大規模的實驗所得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在明天做得到的事情而已。

然而要是不經過一次革命，不說明天，便到了後天以及以後的許多天，這也是不能實行的，因為這是對資本家，地主等沒有利益的；並且因為那些知道他們的利益就在這一點的農夫自己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金錢，更沒有時間，來取得實行這個所必需的一切東西。

現在的社會還未達到這個程度。不過要是巴黎人民起來宣告成立安那其主義的公社，他們一定會向着這個方向走的，因為他們決不會愚蠢到那樣的地步，還繼續着製造奢侈的玩具（維也納，華沙，柏林等處也已經在製造這種東西）去冒麵包缺乏的危險了。

而且，農業工作如果得着機械的幫助，就會立刻變成一切職業中最有趣味的最快樂的了。

他們要說：“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珠寶了，很多的玩偶的衣服了，現在正是勞動者藉農業來修養體力，貫注元氣，玩味自然，尋求人生的快樂的好時機了，——這些都是他們在附近城市的黑

暗工廠中，久已忘去了的事情。”

在中世紀的時候，瑞士人脫去了王侯的羈絆，與其說是靠着槍砲的力量，不如說是靠阿爾普斯一帶牧野的力量更恰當。近代的農業會幫助一個革命的都市，來打破資產階級聯合的勢力，而取得自由。

III

我們已經看見怎樣巴黎附近兩省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只要把他們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加以耕種，便可以得到足以供給他們的需要的麵包了。現在我們來討論牲畜的問題。

便是食肉最多的英國人，他們的消費量平均也不過一個成年人一年二百二十磅罷了。假定吃的都是牡牛，則一個人還吃不到一條牛的三分之一。五個人(小孩在內)每年吃一條牛便很夠了。如此，則三百五六十萬居民每年的消費量也不過是七十萬頭牛而已。

以現在的牧場組織，養六十六萬頭牛，至少也需要五百萬英畝的土地。平均每頭牛需九英畝。然而如果換以泉流濕潤恰到適度的草原，(如在法國西部的數千英畝中近來所實行的，)則只要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便夠了。如果再實行集約農法培養甜菜根以充秣草，則只要其四分之一，即三十一萬英畝，便綽綽有

餘了。要是我們更用玉蜀黍，且實行阿拉伯人保藏秣草的方法（於秣草青時便割而壓榨之，）則有二十一萬七千五百英畝的土地，便可以得到十分充足的秣糧了。

米蘭¹⁴⁵附近地方，向來用溝渠的污水灌溉的田地，共有二萬二千英畝，每英畝所生的秣草，只足以養二三頭乳牛；而在別的兩三處良好的田地上，只要十英畝便可收穫一百七十七噸乾草，可供三十六頭擠乳的母牛一年的食料。在現在牧場組織之下，養一頭牛需要着九英畝的土地，而在新式制度之下，養九頭牛也只要二英畝半的土地便夠了。這正是近代農業中兩個相反對的極端。

在蓋因稷的巴開墾的九千八百八十四英畝的土地中，差不多有一半（四千六百九十五英畝）是被穀物和菜蔬掩蔽了的；只有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還是牧場。而在此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中，却飼養着一千四百八十四匹馬，七千二百六十頭牛，九百隻羊，四千二百口豬；若把羊，豬等不算在內，平均每兩英畝地可養三頭以上的牛。不用說，這些土地的膏腴自然是用海藻和化學肥料造出來的。

返回來再說巴黎及其附近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我們可以

¹⁴⁵ Milan 是意大利北部鄧巴底區的一省，人口一百七十餘萬。——

譯者。

看出他們飼養牲畜所需要的土地，已經從五百萬英畝減到十九萬七千英畝了。但是我們不要就拿這個最低的數目作根據，我們還是以實行普通的集約耕作法所得的數目做標準，而且我們還要寬放地劃出一部分土地，去飼養可以代替牛的小牲畜，譬如我們就在供給了衆人的麵包之後餘下的一百零一萬三千英畝的土地中，拿出三十九萬五千英畝——要是你們願意，四十九萬四千英畝也可以，——來作為飼養這些小牲畜所需要的土地。

我們就慷慨一點，暫把使這些土地變成生產的狀態，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定作五百萬日。

只要在一年以內，用了二千萬日的勞動，（其中一半是用在永久的改良方面的）我們衆人都可以得到充足的麵包與肉類了，至於家禽，豬兔等肉還不算在內；而且還不會把那些有了上等菜蔬和菓物，因之消費的肉量較少的人算在裏面。這些人消費的肉量實在比英國人消費的少得多，英國人因為沒有充足的菜蔬，故以肉類來補充。試把這二千萬日的勞動（一日五小時）分配起來，一個人究竟應該擔負若干呢？實在少得很。在三百六十六萬的口中，至少有一百二十萬個壯丁，而且還有同樣多的能夠作工的婦女。那麼，要使衆人都得到麵包和肉類，一天作工五小時，每人每年只作工十七日便夠了。如果說因擠牛乳又要加上三百萬日，甚或六百萬日的勞動，總共平均起來，每人每年只

要勞動二十五日，他們的三種主要的食物都不會缺乏了，（而且這種工作簡直是愉快的田間的運動）。在現時這三種食物正是十分之九的當家的人天天焦慮着的東西。

我們又要來說一遍，這不是夢想。我們所說的盡是用大規模的實驗所已做到或正在做着的一切。只要財產法和一般人的愚昧不來加以反對，在明天農業便可以依照這個方針而改造了。

當巴黎人民明白：要知道消費何種食物及如何生產此等食物，這是一個公衆利益的問題的時候；而且任何人都知道這個問題比較現時在議會中所討論的一切重要得多的時候，——那麼，革命便會實現了。巴黎人民會將兩省佔領而且來耕種它們。巴黎的勞動者爲着購取那粗惡而且不足的食物緣故，耗費了他的生涯的三分之一從事辛苦的勞動，現在要在他的城堡（假使那時還有）的圍繞中，他的牆壁之下，自己來生產他需要的食物，每天不過做兩三小時的衛生的和有趣的工作。

我們再來說到菜蔬和菓物。我們且走到巴黎郊外去參觀一個市場園藝家的設備。這個市場園藝家在離那些學院不過兩三公里的地方，居然成就了不可思議的奇蹟。（這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所不曾知道的。）

譬如說我們所拜訪的是一位彭斯先生（M. PONCE），他是

某一本關於市場園藝的書籍的著者，(見附錄一)，他把土地所給與他的一切，完全公布於世，絕對不會守着絲毫的秘密。

彭斯先生，尤其他的工人，都辛苦地像黑奴一般地勞動着。八個人耕種了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他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乃至十五小時，即較實際必要的勞動多了三倍。他們共有二十四個人，並不算多。不過彭斯會告訴我們，他爲着這一點地每年必須納兩千五百法郎的地租，他從兵營那裏買肥料，又需要付兩千五百法郎，既然花了這樣可驚的巨款，他便不能不掠奪工人了。他一定會這樣地說：“我被人家掠奪了，我也要來掠奪別人。”他開始這個事業的時候，設備費等就使他花費了三萬法郎，其中大半都是送到工業界的高等游民的手裏去了的。實際上，這個設備所費的勞動時間最多還不到三千日。

據我們調查他的收穫：十噸內外的胡蘿蔔，十噸內外的洋葱，蘿蔔，野菜，六千顆洋白菜，三千顆花椰菜，五千籃番茄，五千打上等菓物，十五萬四千顆生菜；總之，即從一百二十碼長一百零九碼寬的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中，要生出一百二十三噸的菜蔬和菓物，平均一英畝可以生出四十四噸以上的菜蔬。

然而每人每年所吃的菜蔬和菓物至多不過六百六十磅；有了二英畝半的市場農園，便能夠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一年中間食桌上極豐富的菜蔬了。因此，只用二十四個人來耕種這二英

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每日勞動五小時，只須勞動一年，便能夠生產出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的十分充足的菓物和菜蔬。這三百五十個壯丁至少可以等於五百個普通的人。

又從別一方面看：像彭斯那樣地耕作，——現在已經有超過他的成績的了——那三百五十個壯丁每年只勞動一百零三小時，便足以產出五百個人所必需的菜蔬和菓物。

這樣的生產決不是例外的。在巴黎，五千個市場園藝家在二千二百二十英畝的土地上便常常得着這樣的結果。然而因為平均每英畝地須納三十二鎊的地租所以這些市場園藝家現在便陷於牛馬一樣的慘狀中了。

難到這些人人都能夠確證的事實，還不足以證明一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由留給我們的五十一萬九千英畝中劃出的)，可以供給我們這兩省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之一切必要的蔬菜和豐富的菓物麼？

至於生產這些菓物和菜蔬所必需的勞動，我們若以市場園藝家的工作為標準而計算，一天勞動五小時，不過五千萬日而已，即是每個壯丁勞動五十日。如果採用傑稷和蓋因稷兩地所流行的耕作法，還可以減省一些勞力。我們還要記着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為要繳納那高無倫比的地租，便不能不生產先於季節的菓物，以求售得高價，因此他們便要更加勤苦；而且這種耕

作法所需要的勞動，比較生產平常的榮蔬和菓物所需的更多。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為沒有供給他的農園多額費用的力量，加之又不得不出高價去買玻璃，木材，鐵，煤炭等，所以他們雖然知道溫室中取熱費用較少，也只得仍舊從肥料中取人工的溫度。

IV

如今的市場園藝家爲了要得到他們的可驚的收穫的緣故，便不得不變成了一種機械，而摒棄了一切人生的快樂。然而這些辛苦勞動的人，對於人類確實有過了一個大的貢獻，即是教我們知道，土壤是可以“用工人製造”的，他們用肥料的煖床製造土壤，這肥料的煖床對於植物的苗和早生的菓物所必需的溫熱是已經有了功效的；他們製造出的土壤是很多的，如果不分賣出去，則農園的地面每年要增高一英寸。他們製造土壤的成績是極其良好的，（巴拉爾¹⁴⁶在他的農業字典中一篇關於市場園藝的論文裏這樣告訴過我們，）所以近時的契約中規定着，倘使市場園藝家離開他現在的地方遷往別處的時候，他可以把他的土壤帶去。肥土是要和各種器具，玻璃架子一同放在車裏運去的，——這便是實際耕作者對於里加圖之流的博識議論（認定地租是均平土地的天然利益的一個方法）的答辯。“土壤的價值

146 J.-A. BARRAL (1819—1884)法國化學家與農學家。——譯者。

與人的價值相等。’這便是園藝家的格言了。

然而巴黎和盧昂的市場園藝家，倘使要得到與蓋因稷或英國本部的同類勞動者所得的同樣的結果，則必須比較他們更加三倍地勤苦。因為那些人把工業應用到農業上，用溫室的方法，更進而製造氣候。

在五十年前，溫室不過是富貴人家獨享的奢侈品。它的用處只是培養外國植物，供有錢的人娛樂；但是現在却漸漸地爲一般人使用了。近來在蓋因稷和傑稷一個大工業已經勃興起來，在這兩個地方有幾百英畝的土地是用玻璃罩着的——還不曾算入其他各地小農園中無數的小溫室。又在威孫¹⁴⁷（在1912年共有一百零三英畝），在倫敦郊外，和在其他幾處英格蘭，蘇格蘭的地方，幾英畝幾英畝的溫室正在不斷地建造呢！

它們的建築是有各種性質的：最上等的用花崗石作牆壁，下等的是用木板和玻璃架子製的，僅足以蔽風雨而已；像後者的建築費，縱然加上應納與資本家，經紀人等的各項費用，現在算來，總共也不過是玻璃罩着的每一方碼，不到三先令六便士。一年中大概至少暖三四個月；而且還有全不需要熱的冷的花房，也能產出優良的出品，——自然，不是葡萄和熱帶植物，而是馬鈴薯，胡蘿蔔，豆子，番茄等物。

¹⁴⁷ Worthing 屬英國塞塞克斯郡(Sussex)。——譯者。

人用這種方法便可以脫離氣候的束縛了，同時像用暖床那樣辛苦的勞動也可以免掉了，一方面肥料可以節省，一方面工作也可以節省。每一英畝中用三個人，每個人一星期作不到六十小時的勞動，從前要有幾英畝的土地才能夠產出的東西，現在在這極小的地方便生產出來了。

這一切近代耕作法的進步的結果，即是，如果某一個都市的壯丁的半數工作了五十天，（每日五小時），來培養不合季節的最新鮮的菜蔬和菓物，那麼，他們便可以供給這個都市全人口一年所需要的此類菜蔬和菓物而有餘。

然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實，我們不應該忘記的。在今日，溫室已變成單是玻璃罩下的菜園的一種傾向。因為如果是爲着這個目的而使用，那麼，只要有玻璃和木板罩着，不要溫暖，便可以得到驚人的收穫，——譬如馬鈴薯的第一次收穫在4月的末尾，一英畝能收得五英斗：此後在玻璃罩下的夏天最高溫度中，也還可以得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收穫。

我在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一書內已經舉出許多傾向於這方面的最顯著的事實了。在這裏我只預備略爲提說一下：在傑稷，用三十四個人勞動，（其中只有一個人是熟練的園藝家，）耕種在玻璃罩下的十三英畝的土地，他們便得到了一百四十三噸的菓物和早生菜蔬；而這種非常的耕作所費的煤還不上一千噸。

在傑稷和蓋因稷已經大規模地實行這個了；單單爲着輸出這些溫室中的收穫物的緣故，已經有無數的輪船不斷地在蓋因稷與倫敦之間航行了。

現在要同樣收穫五百英斗的馬鈴薯，我們每年必須耕種四英畝的地面，還要做種植，培養，除草等等的工作；然而在玻璃罩下，縱然起初因造溫室的時候每一方碼的地面大概每人要費半天的勞動，——但是以後在每年的勞動量中，却要較前節省一半，甚或省至四分之三了。

這些都是事實，任何人都能夠自己確證的成績。這些事實所暗示的是：如果人能夠巧妙地使用土地，他便可以從土地中得着何等豐富的物品。

V

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經過了實地試驗的。如田地的集約農法，灌溉過的牧場，暖室以及玻璃罩下的菜園，完全是實在的東西。而且這些耕種方法漸漸地擴張和普及，這個傾向我們已經可以看見了，因爲此等方法使生產加多而工作減少，並且生產較前更有把握。

實在，倘使去考察蓋因稷的最簡單的玻璃棚，我們可以斷定4月裏在玻璃下收穫馬鈴薯所費的勞力，比較在露天之下收穫

時所費的勞力少得多，如果在露天裏耕作，則必須挖掘四倍大的土地，又要做灌溉除草等等事情。假使採用完善的器具或機械，雖最初要用去一筆巨款購買器具，可是後來却能夠使勞力節省很多。

關於在玻璃罩下普通菜蔬的種植現在還沒有精確的計算。因為這種耕作法是近來才開始採用的，所以實行的地方還少。然而關於這五十餘年來早生葡萄的培養法的計算却已經有了。這些計算是極其明確的。

在英國的北部，蘇格蘭的邊境上，煤坑附近的地方一噸煤的售價不過三先令，人們久已用它們來培養暖室中的葡萄了。三十年以前，這些葡萄在1月裏成熟後，培養者便以每磅二十先令的價格出賣了，販賣的人買到後，又以每磅四十先令的售價轉賣與拿破崙三世的手下人，送到而拿破崙三世的食桌上。但是如今這同樣的培養者只要得着每磅二先令六便士的價格，便把他的葡萄出賣了。他自己在一本園藝雜誌中這樣地告訴我們。價格低落的原因，是在1月裏有許多噸的葡萄不絕地運到了倫敦與巴黎。

靠着煤炭的廉價和培養法的巧妙，葡萄却和尋常菓物的方向相反，漸漸地從北部移到南部了。它們的費用是極少的，所以在5月裏英國和傑稷的園藝家僅以每磅一先令八便士的價格，

便把他們的葡萄賣去了，而且此種價格恰與三十年前的四十先令的價格一樣，只是靠着弛緩的生產來維持的。

在3月裏，比利時的葡萄售價六便士到八便士，而在10月裏，大量的葡萄培養出來了，(在倫敦附近地方，玻璃罩下，稍加一點人工的熱度以後產出來的，)每磅的售價恰與瑞士和萊茵的葡萄園裏的售價相同，即是每磅售價兩三個便士而已。然而這仍要較實際費用高過三分之二，因為這個園藝家要支付過高的地租，以及開業的費用和溫度的經費等給資本家和經紀人。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那麼我們便可以斷言當秋涼之際，在我們的深霧的倫敦，和在同一緯度的地方，只要以“幾乎少到沒有”的費用便可以得到味美的葡萄了。例如在某個郊外的地方，靠近我們的屋子的長九英尺十英寸，寬六英尺半的一個灰泥塗抹的舊玻璃屋，在10月裏也能夠收穫五十磅的葡萄，這樣已經繼續了九年了。這收穫是從德國漢堡種的長了六年的葡萄莖來的。¹⁴⁸而且這玻璃屋又漏雨。在夜裏的溫度竟會與外面的一樣。這顯然是不能加熱的，因為這恰和街道一樣，加了熱又有什麼用處呢？所能加以注意的：便是每半年光景把葡萄藤剪削一

¹⁴⁸ 便是這葡萄莖本身也可以表示出二三代園丁的苦心的研究。這是一株漢堡的變種，極適於寒冷的冬季；要受着冬天的霜，才能夠成熟。——著者。(英譯本缺)。

次，把一車的肥料放在種在棚外赤色黏土中的葡萄莖的周圍。

在他方面，我們若估計萊因或勒曼湖(Lake Lemman)的附近地方培養葡萄所需要的費用：在山邱的斜坡上疊石重重地築修平場，把肥料和土搬運到二三百英尺高的上面去等等，我們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即全瑞士或萊因河畔培養葡萄所必需的工作的費用，比較在倫敦郊外的玻璃棚下的費用更大得多。

這似乎是離奇之論，因為一般人都相信在歐洲南部葡萄是自然生殖的，栽葡萄的人並不必再有什麼花費。然而農業和園藝家却不反對我們的說法，而且反來確證我們的主張。英國園藝雜誌的主筆兼實際園藝家的某君曾在十九世紀¹⁴⁹中說過：“在英國最有利益的耕種，即是培養葡萄。”而且葡萄的市價本身即可證明的。

如果把這些事實譯成共產主義的用語，我們便可以下斷語道，在歐洲的任何氣候中，簡單的玻璃棚下培養兩三株葡萄(無論男女)只要每年把閒暇時間分出二十小時，稍稍費點精神來看顧，(這種工作大概是極愉快的)，就能夠產出他的家族和朋友所需要的十分充足的葡萄了。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葡萄，而且可

149 *Nineteenth Century* 是當時在倫敦出版的學術月刊，編輯人 J. KNOWLES 是克魯泡特金的友人。克魯泡特金在這雜誌上面發表了不少的重要文章。——譯者。

以適用於一切的菓樹。

一個公社如果大規模地實行集約農法，則公社的各居民每人每年只做十小時內外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各種各類的內地產和外國產的一切菜蔬和一切合意的菓物。

實在，以直接的經驗來確證上述的事實，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我們假定有一百英畝輕鬆的肥土（像在威孫的那樣）搬到了幾處市場農園裏面，每一個農園都有養育幼苗和種子的玻璃屋。又假定還有五十英畝蓋着玻璃屋的土地，而且全部事務都由那些有實地經驗的法國市場園藝家與蓋因稷或威孫的溫室園藝家來管理。

要維持這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拿傑稷的情形做標準，在玻璃棚下的每英畝地需要着三個人的勞動，（每年要不到八千六百小時的勞動），一百五十英畝的地需要着一百三十萬小時的勞動。假使其中有五十個適當的園藝家每天工作五小時，則其餘的勞動可以交給普通的工人去做，那些人雖然沒有園藝的技能，但漸漸地也知道使用鋤鏟，照應植物的方法的。這種工作的結果，至少也可以產出作為四五萬人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蔬菜與菓物了。（這事實我們在前章裏便已經知道。）在這些人數當中，有一萬三千五百個壯丁，他們願意在菜園中勞動的；每個人一年中只要勞動一百小時便夠了。這種勞動時間簡直和在或

許比較傳說中的塞米拉米斯的花園¹⁹⁰更美麗的園子裏同着朋友及兒女們一起度過的愉快的休養時間無異。

這便是使我們能夠享用充足的菓物和豐富的蔬菜所需要的勞動的出入帳；現在我們的菓物是被人掠奪去了的，至於菜蔬，我們的管家婦每天只肯拿很少的量給我們吃，因為她時時耽心着不肯多化一個便士，免得落進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裏。（見附錄二）。

在將來，人類一定能夠自覺到什麼是他所能做的，這種自覺便會使他有要做的力量。

那時他一定會知道到現在妨害着一切革命的障礙便是精神的怯懦。

VI

我們能夠很容易地認出在社會革命前面的新地平線。

我們每次說起革命的時候，那些見過兒女們受餓的狀況的勞動者一聽見，便陰沉着臉，問道：“麵包究竟怎樣解決？假使各人盡量地吃，也夠麼？假使那班常常做反動派的愚昧的工具的農民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的黑黨 (Bandes Noires)¹⁹¹那樣，使

¹⁹⁰ SEMIRAMIS，神話中的人物，她是古巴比倫和亞述的女王，她有着極其美麗的花園。——譯者。

我們都市居民陷於饑餓，我們又將怎樣做呢？

讓他們照最壞的做罷！大都市不依靠他們也能夠生存的！

那麼，現今窒息在手工場和工廠中的無數勞動者恢復了自由以後，又會被雇用去做什麼呢？難道在革命以後，他們還要繼續把自己關在工廠裏面麼？當穀物告罄，肉類缺乏，菜蔬絕種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想去繼續生產，還要依舊製造輸出的奢侈的玩具麼？

決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要離開都市走到田間去的！他們靠着那個連身體極弱的人也能夠使用的機械的幫助，要使從來受着束縛的農業發生革命，像他們使得制度和思想起了革命那樣。

許多英畝的土地都會被玻璃掩蓋了，無數的男女都要用他們的手指來培養草木幼苗的生長。又有許多英畝的土地是要用蒸汽犁來犁過，用肥料來改良，更把岩石弄成粉末造成人工的土壤以肥沃土質。那麼偶爾來參加勞動的愉快的人羣，會使豐饒的收穫出現在這許多英畝的地面上；這時候，那班偶然的勞動者的工作和實驗，一方面是受着精通農事的人的指導，另一方面它們又會特別受着那些從長夢中驚醒而且為光亮的烽火（即萬人的幸福）所照耀着的人民之偉大實際的精神的鼓舞。

¹⁵¹ 當時竊賊軍人的一種組織，專門從事搶劫搜刮，以所謂殺頭的如爾

當 (JOURDAN Coupe-Tête) 為首領。後來如爾當被處死刑。——譯者。

而且在兩三月之內，早生的收穫便可以滿足最迫切的需要了，然後供給人民的一切食物，他們盼望了千百年到現在至少可以滿足他們的饑餓，盡量地大吃了。

同時那些知道自已的需要的革命的國民中最孚人望的天才便更進一步，努力來實驗新的耕作法，這些新方法我們已略窺見其端倪，只需要再受着實驗的洗禮，便可以被一般人採用了。第一要受着實驗的便是“光”——這個新的耕作法的未知的主動力在雅庫次克¹⁵²的緯度之下，四十五天中間，便使大麥成熟了；集中的或人造的“光”，在促成植物生長的工作上，將要和“熱”競爭了。將來的穆學¹⁵³會發明一種機器利用太陽光線來做工作，於是我們不必再求地底的煤炭中所貯藏的太陽熱了。其次實驗培養細菌來灌溉土地的方法，——這僅是昨日才發生的合理的思想，我們依此，可以把那些能夠培養植物支根，分解與同化土壤成分的微細生物放在土地裏面。

往後他們還要實驗……但是我們就說到這裏為止，否則便要走入空想的領域中了。我們還是來研究已經得到確證的事實。我們如果採用那個對抗工業的競爭得到了勝利的大規模地

¹⁵² Yakutsk, 俄國西伯利亞的省分。——譯者。

¹⁵³ A. MOUCHOT (1825—18??), 法國物理學家，以他的應用太陽熱的實驗出名。——譯者。

使用的耕作法，則我們的愉快的勞動就可以爲我們取得安樂與奢侈，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便可以明白近代科學的發見所指示的各種方法，如何可以實行。現在我們只來著手開闢一條新的道路，這條路就是在人類的需要及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之研究中間。

革命有時會缺乏的唯一的東西便是發意的勇敢。

我們的心在年青時代便被養成了極其狹小的，而且在成人時代又被過去的事實束縛着，因此我們幾乎不敢思想。對於一種新思想，在表示我們自己的主張以前，我們却必須先去參考百年前的陳腐書籍，以便知道古賢先哲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如何。

假使在這次革命中，發意和思想的勇敢並不缺乏，那麼革命決不會因食物而失敗。

在法國革命的偉大日子中，最偉大而最美麗的一天，便是從法國各處來到巴黎的代表們爲着聯合大祭日的準備，一同拿起鋤頭來鏟平大校場的土地。(插圖20)

那一天全法國結成一體了：法國受着這種新精神的鼓舞，在這共同耕種土地的勞動中，法國也瞥見它的將來的面影了。

將來的那些得到了自由的社會，由於共同耕種土地的勞動，便可以發見它們的結合力，而且會消除那種使它們分裂的憎恨與壓制了。

因此，新社會要是能夠了解休戚相關的聯帶性（那個使人們的精力和創造力增進百倍的絕大力量，）便會以所有青春的元氣，向着未來之征服邁進。

如果社會不再替那班不知道姓名的買主生產，而只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嗜好，那麼它不但能夠完全保證各分子的生活與安樂，而且還可以使他們各人都得着隨意選擇工作，隨意完成工作的自由，和由此生出的道德上的滿足，以及過着不侵擾他人生活的日子的快樂。

從休戚相關的感情生出來的新勇氣鼓舞着我們大家向着征服知識和藝術創造的最高快樂之目標前進。

受着這樣的鼓舞的社會是不怕內訌和外患的。對抗着舊勢力之結合的便是新的和諧，各人和全體的發意，以及由人民才智的覺醒所生出的勇氣。

在這種不可抗拒的勢力之前，“謀叛的王侯”是沒有力量的了。他們不能做別的事情，只有低頭屈服去作駕車的馬，拖起人道的馬車，向着社會革命所開闢的新地平線馳去。

附 錄

I

參考以下各書：

La Répartition métrique des impôts, by A. TOUBEAU, 共二卷, 1880年 Guillaumin 書店出版。(我們對於杜波的結論, 毫不贊同, 但這書乃是指示那些證明我們從土地可以得到如何收穫的材料的一部真正百科全書。

La Culture maraîchère, by M. PONCE, Paris, 1869.

Le Potager Gressent, Paris, 1885. 這是一本優美的實際的著作。

Physiologie et culture du blé, by RISLER, Paris, 1881.

Le blé, sa culture intensive et extensive, by LECOULTEUX, Paris, 1883.

La Cité Chinoise, by EUGÈNE SIMON.

Le dictionnaire d'agriculture, by BARRAL. (Hachette,

書店出版。)

The Rothamstead Experiments, by WM. FREAM, London, 1888, (不用肥料的耕作法等等) the "Field" office 出版。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by P. KROPOTKIN. (Thomas Nelson & Sons 書店出版。)

II

關於農業的計算，即證明賽納和賽納·埃·俄斯二省的居民每年只須費極少的時間，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來生產食物，就可以過着完全安樂的生活的數字，現在概括如下：

賽納和賽納·埃·愛俄斯二省

1889年居民數	3,900,000
土地面積 (英畝)	1,507,300
每英畝居民平均數	2.6

因養育居民所耕作的土地面積 (英畝)：——

穀類	494,000
天然和人工的牧場	494,000
蔬菜和菓物	從17,300到25,000
其餘房屋，道路，公園，森林等所占面積	494,000

因耕作及改良上述土地的面積一年中必需的勞動日數（每日五小時）

穀類(耕種與收穫)	15,000,000
牧草,牛乳,牧畜	10,000,000
市場園藝,上等菓物	33,000,000
其他臨時的勞動	12,000,000
總計	70,000,000

要是強健的壯丁（男女都包括在內）的半數願意從事於農業，則七千萬日的勞動，分配與一百二十萬人，每人每日勞動五小時，每年只要勞動五十八日便夠了。那麼，這兩省的居民所必需的一切麵包，牛乳，菜蔬，菓物等，無論是作日常品用的，或奢侈品用的，都可以得到了。在今天一個工人要得到他的一家必需的食物，（其實大體上他們的需要總沒有得到滿足過，）所費的時間，至少要占去他的一年三百天勞動日的三分之一，即並不是二百九十小時，而是一千小時。換句話說，他竟然要多勞動七百小時來餵肥那些游民和所謂支配者；那班人不能夠生產自己的食物，却花錢從商人那裏去買，商人又向農夫那裏去買；農夫因為被國家和地主掠奪了，不能夠得到良好的器具，只好用粗惡的器械，勉強打起精神去作工，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得不到良好的收穫。

後 記

麵包與自由的法文本原名 *La Conquête du pain*，出版於1892年。在1909年就有了幸德秋水的日文譯本（麵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節譯本刊於二十年前。全譯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1927）的事。我這次重譯仍以我的舊譯文作根據，不過參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1925年翻譯本書時，曾參考過幸德秋水的日譯本，後來這書被人借去失落了，現在我手邊有的是1930年黑色戰線社的新譯本）。我另外還補譯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譯的，舊譯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譯文。至於俄文本的兩序，在舊譯本中有賈維兄的譯文，這次我根據（其實只能說參照）小池英三的日譯文改譯了。我沒有見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譯文裏一定有錯誤的地方，只得留待將來的改正。這幾篇序文中的註釋都是我加上的。

“麵包略取”這個名稱，一般的中國讀者都說不易了解。這次改譯我便採用俄文譯本的題名：麵包與自由。這個名稱是作

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題名倒是作者的友人愛利賽·邵可侶代取的。

全書沒有插圖，這裏附印的二十幅都是我蒐集的，我在每幅圖版下面註明了它的出處。

索引是朱舜萆先生編製的。

譯 者 1940年3月。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Ardennes 埃爾壇納	Broussistes 布魯斯主義者
Artel 阿爾特耳	Buonarroti, Philippe 蓬拿 洛底
Assemblée Nationale 國民 議會	
Auvergne 奧威尼	Cabet, E. 加伯
	Catiero, Carls 加非洛
Babeuf 巴布夫	Calais 加來
Bacon 培根	Calcutta 加爾各塔
Bakunin 巴枯寧	Champs de mars 大校場
Bâle 伯勒	Champs-Élysées 香·熱里熱
Balzac 巴爾扎克	Coblentz 或 Koblentz 柯布 林茲
Barral, J. A. 巴拉爾	Cochrane, Mrs. 柯黑蘭夫人
Bellamy, Edward 倍拉米	Cole, G. D. H. 柯爾
Bismarck, Otto 卑斯馬克	Collot d' Herbois, J. M. 柯 羅·德爾布瓦
Blanc, Louis 路易·布朗	Cologne 科樂尼
Blanqui, Auguste 布朗基	Commune de Paris 巴黎公 社
Bohemia 波希米亞	Considerant, V. 昆西大朗
Bordeaux 波爾多	Convention National 國約
Bradford 布拉福德	
Brissot, J. P. 布里索	
Brousse, Paul 保羅·布魯斯	

議會

Danton, G. J. 丹東

Dantonistes 丹東派

Darwin, Charles R. 達爾文

Engels, F. 昂格思

Epping Forest 愛平樹林

Essex 愛色克斯

Fabian Society 費邊協會

Fabians 費邊派

Flanders 弗蘭特

Fontainebleau 芳丹卜羅

Fouché, J. 福協

Fourier, Charles 福利葉

Frankfort 弗蘭克福

Franklin, B. 富蘭克林

Gambetta, L. 甘必大

Gennevilliers 金內威黎

George, Henry 亨利·喬治

Georgians 喬治亞人

Girondins 吉隆特黨人

Goldwin, William 高德文

Gothard, St. 聖·哥塔特隆
道

Great Eastern 大東方

Green, William B. 格林

Gronlund 格龍倫德

Grove, M.R. 格勞夫

Guernsey 蓋因稷

Guesde, Jules 蓋德

Gutenberg, J. 顧登堡

Hall 海爾

Hallett, Mr. 哈勒特先生

Hebert, J.R. 埃伯爾

Hebertistes 埃伯爾派

Hegel, G. W. 黑格爾

Huxley, Thomas 赫胥黎

Illinois 伊立諾斯

Intensive Culture 集約農法

Jacobins 雅各賓派

Jacquard, J.M. 雅加爾

Jersey 傑稷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Joule, J.P. 助勞	Malthus, T.R. 馬爾薩斯
Jourdan 如爾當	Manchester 曼奇士脫
Jura 猶拉	Marx, K. 馬克思
	Maury, M.F. 莫理
La Bruyère, Jean de 拉布律	Mayer 馬搖
耶	Mendeieef, D.I. 門得列夫
L'ange 南吉	Michelet, J. 米席勒
Lamarck, J.B. 拉馬克	Mignet, E.A.M. 米涅
Laplace, P.S. 拉普拉斯	Milan 米蘭
Lassalle, F. 拉沙爾	Mill, J.S. 彌爾
Lavoisier 拉華西	Morris, William 莫理思
Lawes, B. 諾斯	Mouchot, A. 穆學
Leman, lake 勒曼湖	Moynier 莫華尼耶
Lenin, N. 列寧	Muriilo, B.E. 萊利諾
Levachoff 來瓦學夫	
Leverdays 奈渥爾德斯	Naples 拿波利
Liebig 里比希	Napoleon I (姓 Bonaparte)
Lille 里爾	拿破崙一世
Littré, M.P.E. 利德勒	New castle 新壘城
Lombardy 郎巴底	New Jersey 新傑稷州
Louvre 魯佛爾	Nottingham 諾定漢
Lyell, C. 利愛爾	
	Oder 奧得
Malatesta, E. 馬拉鐵斯達	Owen, Robert 渦文

- Paepe, de 德·柏樸
 Pasteur, L. 巴斯德
 Pataud E. 巴多
 Paterson 巴脫孫
 Pecquer 柏格爾
 Philippe II 腓力二世
 Pi Y Margall 畢·伊·馬加
 爾
 Playfair 蒲來非爾
 Polyakoff 波立亞柯夫
 Ponce 彭斯
 Possibilistes 實行派
 Prado 布拉多
 Proudhon, P.J. 蒲魯東
 Pullmann-City 蒲爾滿城
 Pullmann, G.M. 蒲爾滿

 Raphaël (姓Sanzio) 拉斐爾
 Recluc, Elisée 愛利賽·邵可
 侶
 Referendum 國民投票
 Rhine 萊因
 Ricardo, David 李嘉圖

 Robespierre, M. 羅伯斯比爾
 Rocker, Rudolf 魯多夫·洛
 克爾
 Rodbertus, Karl 羅德伯爾都
 斯
 Rothamstead 羅散斯德
 Rothschild 羅斯齊爾德
 Rouen 盧昂
 Ruskin, John 拉斯庚

 Saint-Simon 聖西門
 Sandwich Islands 散德維爾
 羣島
 Say 史靄
 Scilly Isles 細利羣島
 Seguin, M. 施甘
 Seine 賽納
 Seine-et-Oise 賽納·埃·俄
 斯
 Semiramis 塞米拉米斯
 Sèvres 色佛爾
 Sismondi, J.C.L.S. de 西斯
 孟地
 Smith, Adam 斯密(亞丹)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Solanoi Gorodok 散勞諾高羅 Winterthur 溫特圖爾
道克場 Worthing 威孫

Sonvillier 松維葉

Stein, L.V. 斯太因

Yakutsk 雅庫次克

Stephenson, George 司提分
生

Zola, Emile 左拉

Stockholm 斯托哥爾摩

Zurich 楚利克

Sussex 塞塞克斯

Thiers, Ad. 濟葉

Thierry, A. 基埃爾

Thomas, Clement 託馬士

Troyes 多羅瓦

Turin 吐林

Urals 烏拉

Vanderbilts 范德貝爾特

Velasques 威拉斯開士

Vidal, F. 維達

Watt, James 瓦特

Webb, S. 韋伯

Weser 威塞爾

索引

三 畫

大西洋40,152;~的海底電綫223
大東方223
大校場290
土耳其18,166
土地債券92
勺得封xliv
凡德x x,91
凡爾賽27,68,253
山嶽黨26,66,77
工業集中li
工團主義xl,xli
工錢制度 liv,33,71,74,75,191,193
—196,207,208,219,227,237
工錢勞動186,194ii

四 畫

日內瓦xxxii
日本179,180,252,253
支加哥231,269
中央亞細亞166
中國19,49,55,56;~的紅十字會179,
180;~輸入的白棉布251

公共廚房85
公社主義xxxiii
比利時 xxviii, 125, 179, 231, 242,
253, 264, 284
丹東66,77,99
丹東派77
互依主義xxviii,xxxii,xli,209
互助論liv,39,81,164
王黨xix
文藝復興144
巴比倫287
巴西249
巴布夫xxv,xxvi
巴多xi
巴拉爾279
巴枯寧xx,xxxii,xliii,xliv
巴枯寧派xx
巴脫孫252
巴斯德241
巴爾扎克42
巴達哥尼亞18
巴黎 xviii, xx, xxi, xxv, xxx,
xxxii, xxxiii, xlv, 255, 265, 272;
~大倉庫6;~廢王22; ~國家圖書館

36; ~缺乏麵包 61; ~三個月的飢餓 68; ~負債71; ~製造品73; ~食糧的數量78; ~的同業工會79; ~民衆的團結力79; ~的巷戰時代79; ~的主婦 84; ~每年的消費90; ~的縫紉機93; ~的輸入品95; ~的田野98; ~人民的團結精神98; ~之安那其主義的公社 98; ~房屋的價值102; ~被圍困83, 103, 107; ~人民在恐怖時代中107; ~人民的住居110; ~市民的衣服116; ~鐵道圖116, 168; ~勞動者216; ~造裝飾品242, 243; 普法戰爭~陷落247; ~工人失業256; ~大校場725; ~的無種黨258; ~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259; ~市場園藝家264; ~居民失掉人力271, 273, 276; ~附近居民飼養牲畜所需土地275; ~郊外市場園藝家 276, 278, 280; ~輸入葡萄282; ~聯合大祭日 290

巴黎公社 xxxii, xxxvii; ~的革命 23, 24; ~的燬滅27; 1871年的~62; ~的鬥爭 82; ~時代勞動者的住居 103, 114; ~會員之薪資218

巴黎會議 xxxix

五 畫

匈牙利~的鐵道36; ~供給巴黎穀麥之消費90; ~輸出之葡萄酒95; ~農夫

96; ~主要工業之迅速進步249; ~的穀物生產者266

甘必大82

民主主義者208

民主國171

尼古拉一世166

白色恐怖68

加伯131, 156, 184

加來166

加非洛 xliii

加爾各塔250

左拉153

布拉多145

布拉福德248

布里索77

布朗基25

布朗基派 xxxvii, 25

布惹 xl, xli

布魯塞87

古典派的經濟學家185

古希臘84

立法議會92

北美洲131

瓦特8, 261

瓦德林24

司提分生203, 261

弗蘭克福47, 170

弗蘭克福條約247

弗蘭特²⁶⁴

代議政體^{44, 207}

代議制度^{xlv}

史靈²⁴⁰

六 畫

充公 ^{xi, xvii, 21, 38, 45, 48, 57—60, 62, 63, 87, 104, 105, 109, 119}

自由公社^{xx, xxxviii}

自由合意^{liii, 167, 171, 173, 176, 181, 182}

自由社會⁴⁵

伊立諾斯州^{157, 159, 231}

共同住居^{xxx, xxxiii, 155, 156}

共同住居論者^{39, 155}

共和主義的民主制^{xxx}

共和國^{xix, xxx}

共和黨^{xix}

共產主義 ^{xi, xvii, xviii, xxiii, xxxi, xxxv, xxxviii, xxxix, xliii, xliv, liv, lvi; 都市的~xxv; 強權的~xxv, xxvi, 183; 國家~35; 無政府~xxxvii; 自由的~34, 35, 38, 39; ~是消滅工錢奴隸制度的利器75; 安那其~86, 87, 88, 90, 99, 110; 安那其~的社會沒有強權183, 220, 227, 237; ~即是消費, 生產, 交易三者的綜合238; ~的用語235}

共產制度¹⁹⁵

合作主義^{xli}

西班牙^{xix, xx, xxi, xxxvii}; ~的真相^{xx}; ~的葡萄酒^{83, 95}; ~供給巴黎的消費物⁹⁰; ~的安那其主義者²¹⁰; ~也成了工業國²⁴⁹; ~生絲²⁵²

西伯利亞²⁸⁹

西斯孟地²⁴⁰

西歐^{xxiii, xxxiv, xliii}

安那其^{xii, xiii, 39, 58, 133, 227}

安那其主義^{xx, xxvi, xxviii, xlvi, 49, 57, 58, 109, 117, 118, 132, 172, 195, 265}

安那其主義者^{xv, xxxvii, xxxviii, xliii, 77, 177, 218}

安那瑪¹⁵⁷

吐林²⁴⁹

吐林博覽會²⁴⁹

色佛爾¹³³

印度~成爲英國殖民地^{xviii}; ~的輸出物^{90, 95, 96}; ~的農民¹¹³; ~的公社²³³; ~因工業國別專門化而破產²⁵⁰; ~的紡織廠²⁵⁰; 荷蘭~²⁵¹; ~婦女的工錢²⁵¹; ~的煤鐵²⁵¹

印度洋²⁵¹

印度博物館²⁵⁰

印第安那州¹³²

米席勒⁹⁶

米涅76
 米蘭274
 列寧34
 列甯格勒87
 吉隆特黨人66,77
 如爾當288
 多羅瓦258,264

七 畫

君士坦丁堡166
 里比希264
 里加圖111,215,279
 里昂xx,xxv,xliv,61,67,89,116,242,
 246,252,253,255
 里爾89
 芳丹卜羅259
 沙何8
 亨利·喬治53,59
 克來服中央監獄xv,xl iv
 利物浦250
 利德勒138
 利愛爾140
 希特勒xxxi,lvi,249
 希爾福郡270
 希臘xxiii,145
 伯勒10,170,252
 助勞140
 李嘉圖33

佛羅倫斯xliii

八 畫

法國ix,xv,xvii,xviii,xix,xx,xxi,
 xxiii,xxiv,xxv,xxvii,xxviii,
 xxx,xxxii,xxxiii,xxxvii,3,16,
 18,26,91;~1848年革命47;~三次革
 命61;~三大民衆運動65;~工商業所
 雇用人數71;~的綢緞73;~農民73;
 ~國民的團結心79;~農民公社80;~
 共有牧場地81;~的雅各賓共和國88;
 ~人民要求自由的公社88;~的六大
 都市86;~農民熱烈的勞作90;~生
 產物登記91;~供給區91;~穀物的生
 產92;~的葡萄酒93;~農夫97;~勞
 動者的住居101;~議會217;~科學
 院140;~鐵道公司171;~人受紅十字
 會之看護179;~的飛行隊182;~貴
 族的覆唱詞186;~的共同勞動188;
 ~工場中監工者198;~集產主義者
 的勞動報酬210;~馬克思主義者
 蓋德211;~主要工業被英國破壞
 245;~創造出無產階級245;~成
 爲有數的輸出國245,246;~與普
 魯士訂立和平條約247;~製造家
 251;綢緞爲~重要產物252;~輸
 入綢緞253;~被大陸諸國封鎖
 258;~南部的葡萄酒栽培者266;
 ~出版的幾種好書266;~農業家
 繳納國家租稅

- 267; ~南北部粗放耕作269; ~西部的農業273; ~市場園藝家286; ~大革命時的黑黨287; ~最美麗最偉大的一天290
- 金內威黎98
- 來瓦學夫xliv
- 亞丹·斯密lii, 33, 229, 239
- 亞洲xlvii, 60, 246
- 亞述287
- 波立亞柯夫169
- 波希米亞249
- 波爾多89, 116
- 波羅的海174
- 波蘭248
- 拉布律耶263
- 拉沙爾xxviii
- 拉馬克258
- 拉斐爾144
- 拉華西258
- 拉斯庚148
- 拉普拉斯258
- 昆西大朗 xxvii, xxviii, xxix, xxxiii
- 阿拉伯人274
- 阿爾普斯5, 273
- 阿爾薩斯247
- 東京12
- 俄法密約ix
- 俄國 ix, xx, xxi, xxxix, xli, xlv, 36, 73, 89, 98; ~的林木和土地81; ~革命88; ~代議制的弊害89; ~供給巴黎消費物90; ~小麥95; ~農民95, 113; ~王公98; ~公社113; ~鐵道166; ~自由航海團體174; ~農奴解放反對論者186; ~某村的共同生產共同勞動188; ~的阿爾特爾188; ~政府又將農奴土地收為貴族所有218; ~農民送小麥給歐洲235; 人說~為自然所限定來生產穀物242; ~的新興工業247, 248; ~精製砂糖253; ~製造呢絨253; ~烏拉地方製造硫酸和曹達253; ~收穫的穀物266
- 昂格思xxxii
- 門得列夫140
- 彼得保羅壘xliii
- 彼得格勒xli, 87
- 卑斯馬克166, 174, 179
- 孟買250
- 孟買動物學會141
- 奈渥爾德斯44
- 急進黨25
- 協會xxxii
- 社會主義xviii, xxi, xxiii, xxiv, xxv, xxix, xxxi, xxxii, xxxv, xlv, xlvi, li, 90, 101, 111, 122; 近代~xxvi; 無國家 ~xxvi; 科學的 ~xxviii,

xxix; 國家~xxxiv, xxxviii; 都市~xxxiv; 自由~xliii; ~的報紙已實行共同勞動138; ~的工廠, 鐵工場和礦坑的完善設備154; ~的社會裏沒有女傭157; ~的勞動組織262
社會主義者 xxvi, xxxi, xxxix, xlix, l, 4, 16, 88, 123, 151, 156; ~排斥共同居住157; 初期英法的 ~170; 喜歡國家的~172; ~對於分工的話241; ~最熱烈的未來夢想263

社會民主黨 xxxviii, xxxix, xli, 77

社會黨 24

松維葉 xliv

保羅 157

保羅·布魯斯 25

九 畫

紅十字會 178, 179, 180

施甘 7

柯布林茲 67

柯黑蘭夫人 158

柯爾 xxxi

柯羅·德爾布瓦 67

南吉 xxv

勃列東 xix

柏耳福 168

柏林 87, 89, 98, 166, 170, 174, 272; ~圖書館36

柏格爾 xxix, xxxiii

韋伯 xxxiii, 79

萊利諾 144, 145

洛克爾 xx

約克 248

約翰郡 157

軍事同盟會 181

威拉斯開士 145

威孫 280, 286

威塞爾 174

美洲 ~的新社會131; ~的共產社會184

美國 xli; ~大原野機械生產力2; ~的財富16; ~人參加黑奴解放32; ~大財產的來源53; ~失業工人70; ~供給巴黎的消費90; ~的農夫96; ~土地的出產124; ~棉紗工廠125; ~生產率的統計126; ~的婦女157; ~的用水158; ~的中央火爐160; ~小廚房的浪費時間160, 161; ~鐵道170, 171; ~小麥商的文件171; ~解放黑奴的反對論186; ~的開拓者188; ~的製造力249; ~在巴脫孫也建立綢緞大工廠252; ~製造呢絨253; ~式的粗放耕作法263; ~平原的出產268; ~西部沃野的農民269

查理一世 88

查理十世 xxvii

哈勒特 271

英國 xviii, xxi, xxvii, xxxi, xxxii, xxxiii, xxxviii, xxxix, xli, lvi, 16, 17, 18, 264, 280; ~憲法的意見 26; ~革命 88; ~供給法國農具 93; ~大都市勞動者的居住 124; ~中部的工廠 152; ~的礦坑 154; ~的擦鞋機 158; ~小廚房的浪費時間 160; ~立法 170; ~鐵道公司 171; ~委員會幫助耕種 179; ~的救護傷兵 180; ~義勇隊 182; ~海岸防禦會 182; ~的造船所 188; ~私人工廠 198; ~國有工廠 198; ~的採用勞動券 208; ~集產主義者的勞動報酬 210; ~的貧民救濟法 226; ~各家庭的舒適住宅 231; ~送到世界各處的煤 235; ~輸出的棉花 235; 人說 ~ 爲自然所限定來紡織棉紗 242, 243; ~掌握了海上霸權 295; ~將失去棉紗的獨占權 246; ~的製造家 247; ~商人的財寶 250; 白棉布爲 ~ 專門製造品 256; ~亦能自己製造綢緞 252; ~由俄國輸入砂糖 253; 化學工業不再是 ~ 獨占 253; ~的人口 262; ~人食肉最多 273, 275; ~本部的勞動者 280; ~北部煤坑 283; ~園藝家 283; ~的葡萄 285

英國救生艇會 175, 177

格勞夫 7

格龍倫德 211

香·熱里熱 26

范德貝爾特 48, 168, 176

科樂尼 170

十 畫

個人主義 32, 33, 34, 36, 37, 89, 110, 165, 226

郎巴底 264

埃及 12, 18, 19, 71, 90, 141

埃白爾 76

埃白爾派 76

埃爾壇納 98

海牙 xxxii

海爾 270

高加索 5, 252, 253

高德文 xxvi

高賽 xix

烏托邦 xxvi, 91, 154, 156, 167, 219

烏拉 253

馬克思 xxvi, xxix, xxxii, xlix, lii, 33, 75, 122, 210, 215, 229

馬拉 66

馬拉鐵斯達 xliii

馬搖 7

馬爾薩斯 15

馬德里 145, 166

馬賽 xx, 89, 116, 252

格林 xli

倍拉米 xli

剛果12
 拿波利193
 拿破崙 xxiv,xxvii,xxx,166,245
 拿破崙三世27,71,82,179,247,283
 紐約xxxii
 託馬士24
 盎格羅·薩克遜人156
 倫敦xxxii,xlv;~大船塢6;~大罷工
 79;~民衆團結力79;~的管家婦85;
 ~船塢大罷工114;~大商店125;~某
 大工廠的禿頭女子 192; ~商業訴訟
 199;~從工業勃興積蓄了財富250;~
 的印度博物館250; ~ 郊外溫室280,
 285;~航行汽船282;~輸入葡萄283,
 284;~的深霧284
 倫敦自由社lvi,224
 倫敦皇家學會140
 倫敦動物學會141
 倫敦博物院36

十 一 畫

第一國際 xxviii, xxix, xxxii,
 xxxiii,xxxvii,xxxix,xliv
 第二國際xxxix
 偉也勒xv
 國民工場71
 國民投票208
 國民議會xxviii,xxix

國約議會xxv,92
 國家主義168
 國家社會主義39,90
 國際勞工協會xxvii,xxxii,xxxix
 捷克249
 得克薩斯157
 畢·伊·馬加爾xx
 細利羣島264
 曼奇士脫工廠32,246
 粗放農法269
 培根xlix
 基埃里xxi
 基爾特xlii
 基爾特社會主義xli
 勒曼湖285
 莫理223
 莫理思148
 莫華尼耶179
 莫斯科xli,166,193
 產業上的民主主義xlii
 剩餘價值1,122,226
 強權論者198
 荷蘭xxi,xxxix,173,174,179

十 二 畫

腓力二世羣狗145
 斯干的那維亞174
 斯太因xxviii,xxix

斯巴達⁸⁴
 斯巴達湯⁸³
 斯托哥爾摩¹⁹³
 勞工黨^{xxvii}
 勞工議會^{xxxix}
 勞倫²⁴⁷
 勞動力²¹⁵
 勞動之聲社^{xli}
 勞動券^{37, 93, 195, 208, 209}; ~八小時
 的勞動²¹⁰; ~以適當方法分配給會員
 212; 不可以~計算的勞役²²⁴
 勞動組織^{xxviii, 88}
 渦文^{xxvi, xxvii, xxxii, xxxv, 131,}
 132, 184, 208
 渦文派^{xxxii}
 猶太^{xii, xxviii}
 猶拉^{xix, xliii, 253}
 猶拉同盟^{xliv}
 萊比錫¹⁷⁰
 萊因^{67, 173, 284, 285}
 雅加爾²⁶¹
 雅各賓派^{xix, xx, 25, 65, 91, 176, 180}
 雅各賓黨^{xix, 26, 77, 78, 80}
 雅各賓俱樂部²⁶
 雅庫次克²⁸⁹
 華沙^{168, 272}
 喬治亞人²⁵²
 菲洲^{12, 29, 60, 93, 246, 251}

溫特圖爾²⁴³
 喜馬拉亞⁵
 黑格爾^{xlvi}
 黑黨²⁸⁷
 集產主義^{xx, xxix, xxxi, xxxiii,}
^{xxxvii, xliii}; ~是國家的工錢奴隸
 74, 75, 76; ~的工錢制度^{207, 208, 210}
 集產主義者^{25, 32, 33, 74, 76}; ~改造
 社會的計劃^{207, 211, 217}; ~說以各人
 的成績為標準而付給報酬^{219, 225}
 集產制度^{74, 80, 81}
 集約農法^{73, 124, 265, 268, 269, 271,}
 273, 282, 281
 彭斯^{271, 277, 278}
 散勞諾高羅道克場¹⁴³
 散德維齒羣島⁷³
 普魯士^{xix, 27, 67, 89, 179, 247}
 傑稷^{264, 278, 280, 281, 282, 283, 286}
 費邊派⁷⁷
 富蘭克林¹²³

十三畫

萬國博覽會³
 萬國郵政聯合會^{44, 170}
 愛丁堡¹⁴⁸
 愛平樹林²⁵⁹
 愛色克斯²⁵⁹
 愛利賽·邵可侶^{ix, xlv}

瑞士～日內瓦是反抗者創刊地 xvii;
 ～猶拉山谷 xlili;～松維葉 xliv;～
 風土考察志願隊 182;～服區的公社
 188;～的共同勞動188;人說～來造就
 看護士和女教師242;～不再握鐘表業
 獨占權253;～能製造機械253;～人脫
 去王侯羈絆273;～葡萄售價284,285

瑞典179,180

意大利xix,xxv;～的移民 19,32;～
 的輸出物90,95,96;～的紅十字志願
 隊179;～集產主義者之勞動報酬210;
 ～工業品的進步249;～生絲輸出252;
 ～綢緞輸出253;～製造輪船機器253;
 ～農業家繳納國家的租稅267

意大利聯盟xlili

意加利亞156,157

資本主義 xxviii, xxxix, xlix,
 li,4,34,119,121,122,131;～的經濟
 學183;～的基礎207;～的本質216;
 ～社會學全部歷史220

資本制度xxxix,l,lii,34,73

資本論xxxii,33

奧地利252,253

奧威尼217,242,266

奧得174

聖西門xxvi,xxvii,xxxv

聖安娜十字章ix

聖彼得堡37,87,143,166,168

聖彼得堡學院140

聖哥塔特169

聖哥塔特隧道32

聖得田xix,xx,xxxii,89

塞米拉米斯287

塞塞克斯郡280

楚利克252,253

路易·布朗xxviii,xxxiii,29,83

路易·腓力布22,29,47

路易·拿破崙xxxix

新幾內亞xxxix,63

新壘城223

達爾文liv,37,140,203

賈維xli

十 四 畫

維也納87,272

維達xxviii,xxix

實行派25

蓋因稷264,274,278,280,282,286

蓋德221

福利葉 xxv, xxvi, xxvii, xxviii,
 xxix,xxxv,39,154

福利葉主義xxv

福利葉派xxxii

福協67

蒲來非爾140

蒲爾滿城231

蒲魯東 xx, xxviii, xli, xlix, li,
72, 209, 227
赫胥黎 201
漢撒同盟 xxxiii
漢撒商業同盟 164

十五畫

德木南 77
德·柏樸 xxviii, 225
德國 xix, xx, xxviii, xxxi, xxxii,
xxxiii, xxxviii, xli; ~國家社會
主義者 39; ~共有牧場地 81; ~的夢想
88; ~鐵路公司 170, 171; ~自由航海
團體 174; ~紅十字志願隊 179; ~軍隊
的強盛 181; ~的共同勞動 188; ~集產
主義者的勞動報酬 210; 德國的新興工
業 246, 247; ~與英國工業競爭的理由
247; ~得到里昂工人幫助建立綢緞大
工廠 252; ~綢緞輸法國 253; ~漢堡的
葡萄 284
墨西哥 132, 249
歐洲 ~大反動 xxvii; 拿破崙統治 ~
xxx; ~的反動 xxxviii; ~近代國家
之中央集權組織 liii; ~用人力耕種
的土地 5; ~鐵路 10; ~農奴制的生長
12; ~軍備的耗費 12, 19; ~職工的窮
困 18; ~財產的來源 53; ~失業工人
70; ~農民公社 80; ~人的自然共產制

度 81; ~的社會革命 86; ~的四大首都
87; ~各國的革命 88; ~穀物的不足
96; ~大都市的居民 113; ~土地的出
產 124; ~的勞動者 158; ~的用水 158;
~的不自由 163; ~的人口 164; ~鐵道
165, 167, 168, 170, 171; ~國家的債主
171; ~各家庭舒適的住宅 231; ~人十
分之九住小屋 232; ~人的需要 232; ~
的米麥生產 235; ~棉布輸出 249; ~大
國需要殖民地 250; ~二十世紀的農業
267; ~南部葡萄 285
蓬拿洛底 xxv, xxvi

十六畫

魯多爾夫·洛克爾 xliii
魯佛爾 145
龍河 xix
諾定漢 10
諾斯 270
諾爾曼羣島 264
盧昂城 xix, 32, 164, 264, 280
盧森堡委員會 xxix
穆學 289

十七畫

聯合制 90
蕭伯納 78
薩克遜-科堡-哥塔 xix

賽納99,258,265,270

賽納·埃·俄斯 99,128,133,265,
270

濟葉22,27

彌爾44

十 八 畫

職工組合主義者xxxix,xxxii

舊金山193

十 九 畫

羅伯斯比爾26,66,71

羅馬xii,71,166

羅馬尼亞90,98

羅馬法41

羅散斯德270

羅斯齊爾德47,48,49,57,171

羅德伯爾都斯122

廿 畫

釋迦牟尼xiv

蘇格蘭253,264,280,283

蘇彝士運河32

二十一畫

顧登堡136

鐵道聯合會44

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

這是一部俄國文學史的名著。作者比許多作家都更了解他的本國人和他們的文學。什麼抓住了俄國人的心，也就抓住了作者的心。而且他還會用適當的語言把牠表現出來。所以他是俄國文學的最好的解釋者。在本書裏他不但忠實的繪出俄國文學的全貌，抓住俄國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及背景，還在俄國文學中看出了爭自由鬥爭的發展和一個民族的渴望。作者在麵包與自由中所表示過的藝術觀念和社會思想在這裏也有闡明。

田園工廠與手工場

這書可稱爲“麵包與自由”之姊妹篇。對於懷疑社會之實現是不可能的人這兩書便是最有力的答覆。本書分三部分：一論工業的分散；一論農業的科學化；一論腦力與腕力合一的教育。作者用精確的統計數字證明每一個國家每一地域可以成爲其自身的生產者與其製造物品的消費者。在農業方面機器與手工的聯合使每一國家可以產出其自身所需要的糧食與原料。鄉村與城市聯合起來。心力合一的教育可以幫助智力與精力的完全的發展，而得到更大的經濟。從此國家與城市，工廠與田莊，實驗室與手工業不能再將人類區分爲各種不同的階級，反而促成了個人的完全的生活。

